

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

學問有道

杨奎松 著



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

学問有道

杨奎松 著

九州出版社

JIU 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其他

作者主要著述有：

- 1、《“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
- 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 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 5、《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 6、《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 7、《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 8、《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
-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10、《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
- 11、《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

前言

和《开卷有疑》相比，这本集子算不上是一部讨论学术研究的书。读者只要看到目录就会了解，它更多的是笔者在报刊杂志上的各种访谈录，和在一些场合演讲文稿的整理发表，谈的主要是个人研究的经历、感受和方法等等。说它们不学术，不是说它们没有讨论到学术。一个吃学术饭的人，打个哈欠都难免会有学术的味道，要想完全避开学术谈何容易。但这些文字确实不那么学术，除了那些专著的前言以外，多数文字连注释都找不到一个。让研究学术的人来读它，自然会认为它不学术。

做学术研究的人，发表不那么学术的东西，难免会被圈内人所议论，这也是我始终不大愿意应报社的邀请写些议论文的一个原因。因为一个习惯了做学问的人，难免会被这样或那样的规矩束缚了思想和手脚，往往不习惯对自己不很熟悉的问题说三道四。

但是，学问者何？明道修德，洁身自好？奈何咱终究还是个中国的学者，骨子里总会有那么点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求知问学，经世致用的企图。因此，对那些自认属于学问范围之内，又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问题，总免不了还是想要发挥一点儿所学所问的知识的作用。何况，学术的东西，如果不能和生活相联系，束之高阁，只供少数象牙塔中人切磋把玩，总让人觉得会有些遗憾。尤其我们做的是现当代史研究的问题，历史研究，目的就在求真。一方面学者有大量真相发现出来，另一方面社会上对诸多历史上的问题继续以讹传讹，甚或以之为据，还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古论今，相互指责攻讦，面对这种情况，也着实需要有学者根据所学所问的知识，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不是为了纠偏——这多半不大现实——只是为了让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了解，还有另外一种有点学术态度的，即注重考证

和史实的，比较客观一点的说法，让头脑冷静的读者有条件自己去比较，去鉴别。

当然，还是那句话，做学问久了，都会有点迂。自我觉得在报上或在讲演中发表的东西不够严谨，有时甚至会有明显的错误，是再自然不过的情况了。再加上在报刊上发表的东东，还会因报刊篇幅等原因的限制，有所删节，变得不完整，不准确，也很自然。一些访谈或讲演之类的文稿，因为应记者或编者临时所约所谈，即兴而言，匆匆而就，难免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甚至个别专著的前言，也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出现删节的情况。总而言之，有机会将它们集合起来，修订出版，对自己也是一种安慰。毕竟，这些文字还是比较好读好看，也便于喜欢我的研究的读者了解我的研究经历和研究的想法，把这些文字结成集子留下来，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所在。

杨奎松

2008年9月12日初稿

目 录

[封面](#)

[扉页](#)

[其他](#)

[前言](#)

[第一编 观念与方法的讨论](#)

[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

[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

[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与意义](#)

[研究中国现代史最需要什么？](#)

[历史研究越实证越容易有生命力](#)

[不能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

[拨开中国现代史的迷雾](#)

[如何读懂我们的历史](#)

[国共关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第二编 历史研究应有的眼界

研究历史在于反思我们的过去

多问几个怎么了、为什么？

社会发展中的“阿凡达”式困惑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

实事求是地总结抗战史的经验与教训

何谓民族主义及我们应该怎样爱国？

纪念抗战，反思自我

建构健康开放的民族主义

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第三编 书序谈史录

直面中国革命

我为什么研究西安事变？

中国革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有多大？

从中共建党谈起

应该相信记忆，还是应该从档案文献出发？

对中共革命成功原因的一点思考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问题之必要

研究历史，贵在求真

避免重犯文革错误的的关键所在

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了解国共关系的尝试

从共产党人的角度来看国共关系

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

“恩怨”之中的思考

在毛泽东“革命外交”的背后

读史不能无疑

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

如何从党史研究转向历史研究

保持客观性才容易还原历史

探求历史真实需要专业精神和技能

研究历史也应做普及工作

第四编 我和现代史研究

狱友命运的启示

寻找被埋没的历史痕迹

我和历史研究

我和中共党史研究

中央档案馆查档记

在台北看档案

封底

版权

第一编 观念与方法的讨论

[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 \[1\]](#)

问：您是怎么想起要就这个问题特别是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作演讲呢？这个演讲所面向的对象是谁？眼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受到社会高度物质化、技术化发展的重重包围，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文学科的意义何在？比如说人们常常会问，研究历史到底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在大学里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的学者，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历史研究有用没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的论文有多少人看，写本专著，有多少人读。今天一本学术性历史论著，通常只能印到两三千本，多数还收进了图书馆。一篇学术性历史论文，读者通常多不过百人，少的干脆可能只有几人。如果你一生的努力不过如此，你自然会有人生价值的困惑。

不少前辈史家说，要做历史研究，首先就要能够坐冷板凳。即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但要坐十年冷板凳，说的不过是要做好历史研究，需要打下一个好基础，没有长时间的积累不行。它既不等于现实生活允许你去坐十年冷板凳，更不意味着你真的坐了十年或二十年冷板凳之后，你的东西就会有更多的读者，会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如果你的研究远离社会现实和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你坐冷板凳的时间并不会与你可能拥有的读者的数量成正比。因为，历史总是与现实生活存在距离的。尤其进入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快节奏的社会，注重严密考据和需要大量去翻故纸堆的历史学，注定了只能扮演一个不为那些每日奔波于生计的普通人所重视的角色。

为了鼓励同学们学历史，几乎所有教历史的老师都会告诫学历史的同学说，历史学家要耐得住寂寞。但耐得住寂寞不等于自甘寂寞，更不等于应该要所有学历史的人都去自找寂寞。“人生几何，醉酒当歌”。在极为有限的生命小溪中，人能够成就事业的时间最多也不过

三四十年。如果三四十年虽生活窘迫，形孤影单，但登高眺远，振聋发聩，引领潮流，也足堪告慰。如果三四十年饮食无忧，家庭美满，桃李芬芳，虽然事业的影响力可能仅及于个别子弟，倒也不无让人满足之处；如果因寂寞弄到生活堪忧，且被社会遗忘，辛劳半辈，寥寥可数的文章著作只能被人束之高阁，与白蚁、老鼠和灰尘伴舞，此生的失败就再明显不过了。

人的一生，总要有所成就。创造，然后享受。或者生活，或者事业，或者生活、事业兼而得之。历史学能够给人提供这种成功的机会吗？注意到今日教育体制改革之趋势，注意到海外诸高校师生之比例，注意到多数著名高校历史系本科同学中几乎没有以学历史为第一志愿者，将来历史研究怕是不仅后继乏人，而且要靠收费学生人数来维持生计的历史系部分教师的饭碗，或许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那么，是不是说历史研究就真的没有用了呢？当然不是。要知道，历史研究有用没用，并不仅仅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论文、论著有多少人读。有人读没人读，或读的人多读的人少，关键还是历史学家本身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注意到今天历史研究的论文、论著鲜有人读，就断言研究历史无用。其实，只要注意到自20世纪末以来，一些报刊杂志的文章动辄呼吁维护传统史观及“正史”地位，提出有所谓“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的严重危险；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历代当政者都极端重视史官的工作，并且极力试图左右历史的记载与历史的教育，动辄祭出“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的法宝以警醒自己，我们就不难了解，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心目中，历史及其研究，不仅事涉个人、政党功过是非的评定，而且简直具有与国家命运几乎相等的地位。

历史研究之有用，尤其在于，无论有没有历史学家的参与，人们都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去“研究”历史，历史的记载和教育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作用。这是因为，人会本能地希望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现状

的由来。人类之不同于动物，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具有知识兴趣、自我认识、道德规范、经世致用等种种主动的意识需求。没有历史学家的参与，人们即使通过文学、诗歌或口头传说等等，也总是想要记录或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知识兴趣）；想要认识和探究人为什么会这样而不会那样（自我认识）；想要用历史上是非善恶的事例，告诉世人及后人，理论上人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道德规范）；想要提醒或教会人们如何参照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经世致用）。

正因为人类对历史的关心，通常都出于对今人及现实的关怀，因此，历史研究有用没用，用处大用处小，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会与历史叙说或研究的题材和内容、作用于今人和现实的程度密切相关；与这种历史叙说或研究的成果能否表现为易于为今人和现实社会所接受的语言及其形式密切相关。同样是学术专著，讲古代史的不如讲现代史的读者多；同样是说明历史，写成诘屈聱牙的就远不如写成通俗生动的受众广。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之所以能弄到广为人知，不是因为有多少人读过这两部艰深的文字，而是得益于陆键东介绍陈寅恪最后20年生命轨迹的通俗文学作品。一部《雍正皇帝》的电视剧之所以能弄到街头巷议的地步，恰恰在于它的题材与内容搔到了当今社会政治的某些痒处。

问：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是否有用，或者说作为一项精神活动的成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自身能给社会提供一系列的知识，满足人们关注自身的现实与未来的需要，而且还与其传承形式有关。不过，作为一门现代学术体系之内的学术研究活动，历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以规制严整的学术表述方式表达出来。那么在这种专业的，甚至是艰涩的研究与时下流行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历史小说乃至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二者之间，在价值体现上是否有所分别？

杨：普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历史小说以及纪实文学等等，之所以能够引起普通大众的某种兴趣，有多种原因。这里面既有其形式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能够引人入胜的原因，也有它们中有些内容能够使人基于对现实的关怀而产生某些联想的原因，更有其某些内容能够解答一些人对历史的迷惑，满足一些人求知渴望的原因。但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毕竟与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在价值取向上还是有所不同。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混饭吃，因为学了历史，研究或教学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工具，因此论文论著更多的只是换取职称和工资的一种手段，谈不上有什么事业心。一种是个人兴趣，因为喜欢历史，喜欢从故纸堆中梳理出新的史实线索，找到区别于前人成说的那种成就感，并不关心别人怎么想，社会怎么看。一种是受责任心的驱使，因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又学了历史，因此想要通过历史研究略尽自己作为社会一员的一点义务与责任。显然，在这里，我们所谈的更多的还是指后两种历史学家，尤其是能够把个人兴趣和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的历史学家。只有这种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才可能基于扎实真实的史实基础，有思想、有创见地叙说和总结历史，给普通大众真正答疑解惑。在这方面，那些历史剧、历史小说或传记文学通常是比不了的。

当然，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存在着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没有适当的形式，再好的思想内容也表达不出来。同样，也并不是所有的学术内容都可以通过通俗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生存于现代学术体系之内的学术研究活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现代社会不能没有学术，真正的学术研究活动当然应当具有其独立、自由，能够超然于社会现实政治之外的，哪怕是阳春白雪的专业特性。但是，这并不等于学术的表现形式不可以多种多样。

形式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人创造出来的，历史学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的趋势，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不反对有人坚持走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道路，就某些历史研究门类而言，如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等等，其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要求确实会高一些。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历史学家是不是能够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经常考虑一下自己研究的课题和内容所具有的意义，有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让更多的读者看懂这种强烈的意识。其实，把学术研究的成果尽可能地推广开来——并非是指一定要让“普通大众”所接受——未必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大家所熟悉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推出中文版至今，仍旧不断有新版本问世，其销量无疑相当可观，读过它的读者相信不下几十万，有谁说过他的这部书不是学术著作？黄仁宇的书之所以在大陆、台湾拥有大量读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在两点，一是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相当的现实关怀，能够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读了会有一些的启示；二是他的著作的表述形式比较通俗直白，容易为有知识的普通读者所接受。

问：那么，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是不是只能通过比较通俗的表述形式来表现呢？

杨：这倒也不尽然。陈寅恪的东西今天的人读起来并不容易，但这并不等于说陈寅恪缺少对现实的关怀。哪一个历史学家愿意自甘寂寞，不想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现世得到回响，只寄希望于来世的人能读懂自己的文字？从历史上看，一个正直历史学家的寂寞，往往都是不容于社会大环境、大背景的一种无奈。陈寅恪晚年之所以“著书唯剩颂红妆”，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两个清代女子生平故事的研究上面去，说到底还是因为生不逢时倍遭困厄，才不得不“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绝非其心之所愿。不见其诗云“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他哪里是不关心民族盛衰文化兴废，实在

是他对现状充满了无奈，以致只能学乾嘉学派，钻故纸堆以远离现实而已。他内心深处振兴民族文化的抱负与志向，怕是比我们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大得多。从振兴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角度，陈寅恪坚持半文半白的书面语言表述形式，自有其意义，故无可厚非。

但是，历史研究毕竟不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又恰恰是这种史事和人物的研究，才是广大读者关心的重点所在。而这种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并不要求历史学家们非用文言文或专业术语来表述不可。因此，形式问题就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争读者、争学生，乃至争历史研究生存权的问题。历史学家因温饱无忧，出版发表不愁，进而钻进与现世隔绝的象牙塔，或太过追求阳春白雪，或习惯了高深艰涩，全无要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是，说明历史的工作，历史学家不去做，文学家，甚至是编书匠就会捷足先登。我们经常会发现许多早已被研究清楚的问题，完全不为社会所了解，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或历史小说陈袭旧说，却影响甚广。这种情况的造成，当然不能怪社会，怪他人，绝对是历史学家自己的责任，甚至应当说是历史学界的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我这里讲三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大约十年前，近代史研究所评职称，一位专职研究民国史的青年学者参评，本来写了一部关于民国电影史的专著，既属于民国研究的范畴，也是民国史的一部分，却因为被研究所的众多专家批评为不务正业，以致不敢填报成果。

另一例子是茅海建教授写过一本非常好的通俗性历史研究著作，名叫《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 **訢**》，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但是，虽然他内心的

目的是想写一部“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到头来，他还是有点心里没底，不仅没有像他的其他历史学著作那样依照学术著作的规范，对史料大量严格注释并做详尽的附录，而且在导言中还不得不添上一句他这本书不过“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这类多少有点让人泄气的话。

再一个例子是几年前我为《百年潮》杂志编稿子时，发现许多好的专业学术论文，就是找不到几个能够改写成通俗文字的理想作者。找那些编书匠来改，文字倒是通俗了，原作的思想性不是被阉割，就是被弄得支离破碎不成思想了；找原作者来改，这些能够写学术论文的学者们往往费尽力气，改出来的东西不是扭捏造作令人不忍卒读，就是生硬呆板让人味同嚼蜡。

在这样一种历史研究的环境下，也难怪诸多历史学家纷纷都去钻象牙塔了。这不能不是当今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悲哀。

问：那么历史学家又如何能在实现其学术研究价值的同时表现其现实关怀呢？

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理应提到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即“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一说法在于强调，历史必须由今天的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如何才能赋予历史以灵魂，使之有生命呢？要达到这一数千年来治史者所渴求的幽深境界，历史学家必须学会用今人所能理解的情感和思想去重新体验历史，必须能够带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去和历史进行对话。

史学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就历史的还原工作而言，要得出绝对准确和真实的景象是不可能的。今人所看到的历史，永远都只是过去史实的真实景象的部分缩影。能否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再现历史真实，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良心（史德）和能力（史才），但选择什么样的题材

来进行研究，和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进行还原工作，却要看历史学家具有怎样一种眼光（史识）。

选择历史研究的题材之所以重要，在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才能和生命的价值，历史学家就要具有一定的远见与卓识。而任何一种远见卓识的培养，都与他对现实的关怀程度是分不开的。因为一个对现实缺少关怀，缺少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可能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的。只有立足于对现实的透彻和独到的观察，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找到那些能够对现实社会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作用的题材。一个历史学家也只有在他选对了适合于自己，同时也能够为社会所接受所需要的适当题材之后，他才有可能在其成果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出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赋予历史以灵魂。

历史上人类最伟大的史学家其实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大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见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现实关怀，也是历史作品思想性的源泉。

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思想性，也可以没有思想性。具体史实的考证，是揭示历史真相的工具，就像考古的野外发掘工作，做得好，就有价值。但是，历史研究并不都是具体的史实考据。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李德在1949年波士顿年会上曾经这样谈到历史研究与现实的

关系。他说：“事实上，他（历史学家）在历史中发现的东西往往就是他想从历史中寻找的东西。在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的事实材料时，他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某种图式（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概念）进行工作的，他经常用这个目标来研究社会的进化。对他来说，朝向自己的这个目标发展的就是进步，背离这个目标的就是腐朽。这样，用寓意的话说，他为过去描画的曲线当然也就会延伸到未来。他要么就是像斯宾格勒那样指向灭亡的道路，要么就是像托因比那样指向得救的途径。正是在这里，他拥有为社会服务的良好机会；正是在这里，他掌握着不是造福社会就是危害社会的有力工具。”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讲明了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换言之，每一个历史学家其实都有为社会服务的条件和机会，问题在于你是否真能立足于现实，有充当社会良心的强烈责任感。因为只有当你与众多普通人一样能够深切地感受这个社会的危机和问题时，也只有当你相信作为知识分子理应充当社会良心的艰巨角色时，你才可能成为被现世所重视的有所思想、有所创造的人。这也正是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题纪念碑碑文中特别要写下这样一段话，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就是绝不人云亦云，敢反潮流而动，于不疑处有疑，不仅敢而且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理解的）同情”。“自由之思想”，就是要能够“神游冥想”，大胆思考，勇于探索，不拘泥于一党一派之立场，不固守任何意识形态的界限，真正做到创造性思维。而只要我们能够跳出党派立场情感和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我们就能

够发现，历史上许多恩怨是非，你死我活，其实并不都是如我们过去和今天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只要我们能够“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我们就有可能摆脱情感和观念的纠缠，对于过去我们所不理解的历史对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理解的）同情”。而一旦我们不再把视野局限在党派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意识形态对立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觉，相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过去历史中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和去总结借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问：现在学科分工日益细密，就中国历史研究来说，至少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大领域，这三大领域里，是否都能很好实现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愿望？

杨：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去思考和总结历史，我们理应发现，历史研究具有相当广阔的发展天地。

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都有反映历史学家们表现其现实关怀很好的例子。比如我们读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就不难了解到作者的现实关怀之所在。我们读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更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作者尝试总结历史教训的良苦用心。任何一种历史研究的成果，如果仅仅满足于过程叙述和细节的探讨，而缺少了作者本身眼光独到的深邃思考与现实关怀，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读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在吸引读者这一方面，现代史研究自然最具优势。这首先是因为现代史距离今人最近，一切刚刚过去，人们记忆中许多事情依稀可辨，惟对许多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缺乏了解。更何况，每个关心自己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人，都会想活得明白些，都会关心今天如何来，明天如何去，因而自然想要知道昨天的事情，想要了解何以今天会是这个样子，许多问题是怎样形成的，有没有历史的经验或教训可以借鉴。对此，也只有具有相当思想性的历史作品才能部分地为今大的读者答惑解疑，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现代史研究之容易做出成绩，还在于这一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受政治干扰和意识形态左右，研究基础薄弱，但又具有任何其他历史时期所不具备的丰富资料。近年来大量公开的各种历史文献档案和口述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而具有极大的研究潜力。

当然，现代史研究因为距离现实政治较近，研究起来也必定会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风险越大，机会也就越多。当别人还没有研究的时候，你能捷足先登，最先的开拓者自然是你。何况，这种研究上的风险通常是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而变化的。时间越往后移，距离今天越远的问题也就越会失去其政治敏感性。昨天不能研究或不易研究的问题，今天可能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因此，我们不必因为有风险就不敢去尝试，更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主动放弃这块阵地，不去想办法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千万读者寻求他们想要了解也有权知道的历史答案。

问：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在中国其实有着很深的传统，在这一点上提到司马迁是没有争议的。而且在我的理解中，自从历史学以一门现代学科的身份逐步确立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学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相当密切的。或许可以说在历史学界有着古代的和现代的两个关怀传统，它们之间也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所以如此强大传统的失落是很让人深思的。其中原因除了前面指出的外在社会情势外，是否还有历史学界自身的原因？比如你说的现代史研究的风险问题。过于与现实切近，甚至要历史来注释现实，看起来是实现了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而经验却告诉我们，这反而会损害其固有价值实现？在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之间，是否需一定的超越？

杨：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学家表现其现实关怀的结果，有造福社会，也有危害社会的可能。造福还是危害，根本上取决于历史学家是否能够顺应并且把握住时代前进的主流和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方法。我们固然无法要求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能

够把握住时代前进的主流和精神，但是，历史学之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社会科学，恰恰在于它通常并不具有政治学、经济学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那种操作性。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或是非正误的历史评判，充其量不过是建立在严格的史实研究基础上的一种事实判断，它不仅不会对现实社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和影响，而且根本上也只能是在其专业技术范围内的一种现实关怀。你可以拿自己的研究来注释现实，但我相信没有了过去那种政治氛围和领导人的偏好之后，这种简单化的直接注释能够产生多大的效力，颇引人怀疑。其实，现在的中共党史论文和论著，相当多数仍旧在重复着这种简单的直接注释和解读现实的工作。问题是，有多少学界中人会把它们看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呢？因此，我想对于这类问题大可不必担心。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学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不怕学者逾矩。现在需要担心的，倒是有太多的学者因为怕逾矩，坚持不越雷池半步，害怕因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某种现实关怀的倾向，而被学界中人指为媚俗。

我还是那句话，人是思想的动物，人活在现世，就应当让自己活得明白些。历史学家不仅有必要让自己活得明白些，而且有责任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通过最有助于人们理解的语言文字乃至图像形式，把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观点，传播开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活得明白些。

（本文原载2002年5月17日《中华读书报》。采访者郑文。）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断过记述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样，只要有中国人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就一定会以中国人自己的过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换了什么方法，它都必定要让中国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确立起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少些；有的学者充满了现实关怀，有的学者只关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东西；有的研究方法传统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引入了许多西方学说，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七八年时间，它们便很快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各有各的归宿了。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注定也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适合者，也注定一定会存留下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应、并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却肯定也是一厢情愿。只要比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的基本

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相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

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却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藉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成社会基本成份的不同人群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其宏观又宏不到关乎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发展的特有规律与趋向，即既不适宜分析太过复杂的社会现象，也不适宜总结出一个时期的历史特质，有其明显的不足。

这样说是不是太过贬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功用呢？希望并非如此。但很显然，在西方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看不

到有哪部传统史学著作曾致力于此。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不具有工具性特点，无法像西方社会科学那样，发明出一种虚拟的结构，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模式、过程、因果关系、互动系统之类的解释工具，因此它对带有整体性的太过复杂的多数历史问题，更多的只是满足于片断的、表象的或过程的描述。而今天，历史的解读仅仅停留在表象和过程的描述上，哪怕对一些人物的研究十分深入，也是不够的了。今天，我们只要想对以往的历史进行解读，就势必要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不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纯粹虚拟的结构，不对历史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面相和系统的区分，不使用国家、民族、阶级、族群等概念来定义不同的人群，不运用所有制、生产方式、利益关系和××主义等等概念来界定不同人群之间的联系特性……就不可能处理任何复杂的历史课题，甚至无法将散落的看起来各自孤立的事实，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做出合理的解释。打一个不很准确，但可能形象一些的比方，中国传统史学和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近代以来历史学之间的区别，多少有点像中西医的不同。西医治病有解剖学为依据，有化学及物理学为基础，它可以利用科学的分析检测手段，对疾病的病灶、发生的原因和发病的程度，做出比较确切的诊断，因此对疾病的研究、诊治和预防分门别类，条理清楚，用药及施治针对性极强。而中医治病主要凭借的则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辩证观念和医生个人用药的经验，凡病皆辩证论治，用药多在求人体内在之平衡，其治病的手段虽有许多西医不可替代的重要特点，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中医需要借鉴西医之所长，不言自明。

如今的历史学必须要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不仅仅是出于所谓“宏大叙事”的需要。传统史学同样以谈论帝王将相为其所长，西方史学如今也格外注重最基础的社会史的研究。借鉴之必要，是因为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建构历史真实的基本前提条件的。而相

对于任何一段具体的历史而言，史料都不可能是完整的，且选择哪些史料和节取哪段文字来说明历史，都要视研究者的主观而定。因此，历史研究固然强调客观，但完全否认主观的存在，反对任何价值上的判断，却是难以做到的。而当我们试图解释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只要它稍一涉及价值判断，我们就不可能仅仅凭借史料来说明问题了。

举一个较为能够说明我的看法的例子。以近代史学界关于孙中山早年向日本出让满蒙权益一事的争论为例。从微观史实的角度，我们可以运用传统史学的方法对孙中山有没有向日本出让中国满蒙权益的事实本身，进行细密的考证。问题是，由于孙日之间这种交涉的高度秘密性，具体到某些史实，单纯凭借史料考证，已显不足。一些学者之所以会围绕着孙中山是否与日本在1915年签订过秘密的《中日盟约》一事，存在着极为不同的看法，即是为此。但是，围绕着《中日盟约》的真实性所展开的争论，并不足以否定孙中山曾经有过出让满蒙权益的设想和做法，因为只要把相关史实联系起来就足以做出某种合乎逻辑的推断了。比如，通过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乘清政府战败之机为夺取广州而向日本领事求援，1911年孙中山关于日本经营满蒙有利于中国的言论，1912年孙中山为抵制袁世凯夺权向日方提议以满蒙权益换取援助，1915-1916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军人和浪人的参预下，利用日本强占胶东半岛的机会，在青岛组织军队发动对北京政府的作战，以及1918年孙中山再度以满蒙为诱饵寻求日本援助等种种可以得到证实的情况，就足以证明孙中山曾经想要用满蒙权益来换取日本援助绝非虚言。

仅仅发现了上述史实，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否就足够了？有学者坚信，历史研究的使命就是发现事实，至于对发现的事实如何解释，或者从发现的事实中总结归纳某种规律和趋向，则不是历史学的任务。但是，应当了解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之所以会去研究或

去讨论某一历史问题，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研究或讨论有其必要和意义。而这里的所谓必要和意义，其实正是我们主观所赋予的。因此，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历史研究的过程通常也就是一种我们在重新解释历史的过程。既要重新解释，我们当然不能只停留在发掘事实的层面上。有些问题，只要发现了事实，解释也就存在于其中了；而有些问题，仅仅发现事实还不够，还必须有所解释才能达到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仍以上述问题为例，我们所以会去讨论孙中山出让满蒙权益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回答由此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对孙中山个人的历史评价问题。而这种回答，仅仅靠已经发现的孙中山有过想以满蒙权益交换日本援助的事实自身来说话，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我们不用历史的眼光对这样的事实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话，简单地依据现行的观念，今天的多数读者显然无法理解孙中山的这种行为。他们甚至可能会对孙中山，乃至对历史上其他有过类似言行的革命者和革命党爱国与否都会大起疑问了。

孙中山是否真的爱国呢？对此只要全面地研究过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他的政治理想，就不难明了。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孙中山的上述行为呢？在这里，就必须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思路了。比如，我们必须了解西方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当中关于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认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包括人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及其主权观念和领土疆域的划定，都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发展的过程，并非是对古代国家的一种简单的继承关系。这种情况影响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国家、民族及其主权、领土问题的认识，也不能不是一个变动的发展的过程。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目标，在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中就已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仍旧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

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而且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更有相当的差距。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一

长期以来，由于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历史观、道德观、社会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意识层面，形成了一整套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荣与辱和美与丑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艺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这一政治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大力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因此也就规定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如此“突出”的结果，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谓“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无缺的完人。因为一切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几十年来，就连表露爱情、亲情，甚至是乡情，都成了禁忌。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电视片《三峡传说》主题曲《乡恋》播出，仍旧因为内容、曲调不合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直到几年后，即1983年春节晚会，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话筒，给家乡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给《乡恋》一曲开禁，导演乃至中宣部领导人仍旧会紧张得心惊肉跳[4]。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还是逐渐遭到了摒弃，文艺创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以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一个和八个》（1984）、《芙蓉镇》（1986）等创作公映为标志，从人性的视角来发掘或塑造银幕形象再度成为可能。随着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善恶立辨、黑白分明

的角色了。“坏人”不那么坏，“好人”不那么好，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展现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面，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创作的准则，以往那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是非、善恶、正邪、荣辱、美丑观，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但由此一来，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也难免要受到极大的冲击。

近两年热播的演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的电视剧，就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亮剑》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陈默翰，《中国兄弟连》中的袁学勇和曲连虎，《潜伏》中的余则成、李涯和吴站长，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家父子等等，都让人清楚地感觉到，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用好坏来区分。就连在向共和国60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更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胜了，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很显然，当今的文学及影视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想要在历史剧中展现人性，而非如过去那样简单地从主义、阶级和党派立场来看社会、看历史。不仅如此，一时间，文艺界大有不谈人性不足以彰显艺术造诣之深刻的趋势。这样一种认识角度的突破，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最典型的就是大陆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李安执导的描写爱国女青年与汪伪特务情爱关系的电影《色戒》，魏德圣执导的描写日据时期台湾少女与日本教师爱情故事的电

影《海角七号》，和陆川执导的塑造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军官形象的描写南京惨案的影片《南京！南京！》等。这些影片的上映和观众普遍称赞的反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基于人性视角的创作即使面对敏感的中日关系，也大都能够通过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大陆多数普通国民的情感“审查”。

二

出现上述情况严格说来并不奇怪，因为，“文学即人学”，“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5] 文艺乃至艺术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展现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人的情感生活，理解不同人所具有的感情、欲望、个性及其差异短长，崇其善、扬其美、悯其弱、痛其恶，从而使读者的心灵和情感受到触动和感动。诚如休谟所言，人天生有一种同情弱者，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中世纪，到资本主义，人类因为生就这样一种情怀，因而才会一步步改变其原始的动物本性，从基于生存本能的血腥杀戮、弱肉强食，一步步进化到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崇尚自由。无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怎样一种社会之中，受到民族、阶级、党派怎样的影响，其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权的尊重，都日渐在超出其民族、阶级和党派的界限，形成一种只有进步人类才可能具有的善待生命的价值观。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已证实，人类成功迈入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飞跃性发展，首先就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通过文学艺术，如小说、诗歌、美术、音乐等等，来讴歌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情感。故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中世纪神权统治条件下一次对人的认识的思想解放，是一次人性解放的运动。甚至，现代

(modern) 一词，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正是由于发现了人，而不是神才是社会的中心，形成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认识到个人利益是构成国家、民族利益的最主要基础，对个人及其利益的尊重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正是因为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人的

权利及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日心说”才会推翻“地心说”，神权才会让位于人权，才会有为争取“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体的诞生，才会有康德所谓“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本位理念，和马克思关于人类最高理想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以人的彻底解放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6]。

由此或可看出，中国当今多半也正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即文学艺术已经重又开始高唱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虽然今日之中国还没有可能马上普及人性意识，但这种文化现象的日渐流行自然会潜移默化地洗涤人们的灵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当然，在整个社会依旧通行着传统的“政治正确”的原则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思想的极度混沌和严重分裂对立的状态。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蒋介石的各种传记传奇铺天盖地，我们上面提到的正在影响广大读者、观众悄然改变种种“大是大非”观念的文艺作品，多半都得到了官方人士，包括中共党史权威机关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称赞它们“真实”、“厚重”、“可圈可点”，“一定可以流传下来”；[7]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学历史课本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仍旧延续着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说教。中国近现代史各种教材依旧在教育学生：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着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是新兴的革命的力量。前者所言所行一定反动，后者所作所为一定进步。这种异常矛盾分裂的现象，导致今天即使是大陆网民，对很多历史及现实问题的看法也截然相反，不同立场者各有各的阵地，大家对现状都不满，情感却愈发对立，言辞且日趋极端。这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从共同的人性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历史上的种种问题。

中国人对人性观念如此歧异，纯粹是政治的历史和政治的现实造成的。但无论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有过怎样的优势地位，因为它们严重背离了社会存在的现实，因此其改变也是迟早的和必然的。正如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自建国以来，中国即不承认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使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直至进入家庭，进入工厂，进入学校”。结果是“我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被许多人遗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人们正常的情感和心理被严重扭曲[8]。以至改革开放后很多年，讲人道和人道主义仍然会被视为政治错误，并会受到公开批判。

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初，才开始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当时必须要面对开放所带来的与国际通行的人权观念的交流与交锋，因此，中国官方不得不同意在报刊上正面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

只是，对外谈人权是一回事，真正为人权正名还是另一回事。这一过程又经过了十年以上的时间。直到2004年，中国的宪法中才第一次写上了“公民人权”应该受到保护的内容。

突破了这一思想禁忌之后，2005年6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首次提出了超阶级的“以人为本”的主张[9]。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准备期间，中国政府最终迈出了承认“人性”观念的关键一步。在公开宣传“人性”观念的基础上，中国第一次喊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唱出了“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这是共产党建国后第一次公开主张不分阶级、民族和国家，大家共同追求同一个梦想。就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开始大谈人性，并自诩本届奥运“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10]

这正是为什么“人性伟大”四个字今天竟能够唱响在依旧红旗招展的中国大地的原因所在[11]。

何为“人性”，在学术上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离开社会性，能否准确说明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也有深入讨论的余地。但是，无视人性和人权的激烈的革命性改造，用毛泽东早年的话来讲，毕竟“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④如今，革命改造时代早已过去，官方也已逐渐抛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承认了人性的超阶级性质[12]。社会各界围绕着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如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13]。

自古以来，文、史原本就是一家。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探求，只不过文学作品靠的是建立在美学、语言和人类既往经验基础上的丰富想象，而历史学则是通过对既往事件发生发展原因及经过的发掘与评判来展现其意义。如果说“文学即人学”，那么，历史研究更是直接以人为研究对象。如果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必定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话，那么，任何一位缺少人道主义情怀的历史学者，要想通过历史研究赢得今天社会上多数人，特别是后人的尊重，也一定是不可能的。

研究历史需要有人性视角，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马克思早年形成其理论就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慰情况以外，恩格斯对此也有过明白的解释。他指出，人类对平等理想的追求，根本上就是由人性（“人的共性特性”）引发出来的[14]。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干脆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人性观点，并要基于人性的观念来做研究。他说：“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们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最终决定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 [15]

历史本身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文化、民族、阶级和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区别，这些注定了后人对历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多角度、多侧面，甚至是要从多层面入手的。这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增加人性视角，就认识层面上来看，不过是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增加一个重要的选项而已。它当然会丰富我们对历史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的认识。

比如，由于科学的过度发展，原本是以复合的有机体整体运行的历史如今被人为地碎片化了。太过注重技术手段和学科分类的倾向，把复杂的历史有机体切割、剥离，使我们几乎忘记了历史其实是一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显然，如果我们能够较多地注意到历史的主体——人和人的共性，我们也许能够摆脱目前流行的这种弥漫着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的尸体解剖式的研究方法，更容易“还原”人的思想、活动及其过程，更容易了解人发生这种或那种思想与活动的原因，从而更容易使我们的研究贴近我们研究的对象，即人类历史的主体——那些曾经也一样活生生的人。

又比如，传统的革命史观，着眼于政治的是非，往往只见阶级不见人；新近的现代化史观，着眼于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又往往见物不见人。流行的阶级史观，或民族国家史观，着眼于某个阶级，或某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与命运，往往只见自己不见他人。从人性视角看历史，显然能够较好地弥补这类史观的局限性。因为，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既然人有共同的特性，那么，研究历史就不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农民、精英和民众、敌人和友人、外族和国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还必须要注意到他们作为人的共性之所在，并基于对人类共性的理解，透过不同研究对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真切地了解历史中人的情感及意图所在，避免做出过于武断和片面的判断。

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例。毛母文氏之爱毛泽东，与蒋母王氏之爱蒋介石，显然分不出高低贵贱。毛泽东爱其母，与蒋介石爱其母，与他们的党派立场和阶级倾向恐怕也扯不上多少关系。舐犊之情、爱子之心，连动物都有，但趋利避害，也是一般动物之本性。何况蒋对苏俄及共产党恐惧痛恨几深入骨髓，然而他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在苏联加入共青团，历经阶级教育和革命历练，并公开发表文章揭露父亲虐待母亲，谴责其背叛革命，宣布与蒋断绝了父子关系，蒋却不顾儿子忤逆不孝之举而坚信亲情感化之力，坚持争取儿子回国达10年之久。蒋经国回国后亦在其父的诱导教训之下迅速转变，最终接班掌权。此亦足以证明，和阶级观念相比，人性之作用大矣哉。不了解这种情况，要读懂历史实恐大不易。

四

但是，历史研究者需要讲人性、重人权、倡人道，却并不简单是因为它能够在认识方法上提供怎样的研究便利，而是因为舍此断难达成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

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在求真，即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一般而言，简单求真并不难。在各种史料相对完整的情况下，要想通过文字重建某一事件的基本史实，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爱好者，也可以实现。今天网上有许多军事史的爱好者，都没有专业的背景，然而，他们因为肯下功夫，因此弄清了许多部队的历史沿革过程，甚至弄清楚了不少战役的具体经过，就是一例。

历史研究之难，说到底是在两点。一是难在历史的悟性，或曰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力上，即有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辨识真伪和读懂古人的想法，尤其是比较准确地解读古人所言所行的复杂动机和目的；二是难在知道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中和数不胜数的历史谜团当中，找出值得研究和确有研究意义的问题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触动

读者的内心，能够启发读者去思考，从而能够有助于人类历史的进步。

要读懂古人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情境差异的问题。今人和古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今人和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文化鸿沟。不必说史料上的欠缺，仅仅一个语言文字的差异，就使文献解读困难重重。这就好比让一个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外国译者来翻译中国的古代小说《红楼梦》，不要说译出原著的文字风格和作者的思想情感来，就是要想把意思译准确，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仅仅有史才、史学，有丰富的天文地理人文社会知识，能够轻易辨别史料真伪，读懂文字，如果没有通过换位思考、感同身受，来设身处地地体会古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的能力，再高明的历史研究也难免会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

要让自己有一双慧眼之所以难，首先是一个人性立场的问题。历史原本就是淹没在种种冲突对立恩怨纠葛之中的。离开了人性、人权和人道的立场，每一个研究者自身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党派，乃至肤色、族群、家族、教育的背景，注定会成为客观研究与同情理解他国、他族、他党、他派人的思想、情感、行为与动机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想要读懂本国、本族、本党、本派中不同人的内心，也很少可能。

要让自己有一双慧眼之所以难，其次是一个现实关怀的问题。历史驳杂繁芜，万象纷呈，容不得我辈一一考察辨析，当今历史研究碎片化之危险，就在于它会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无数与历史发展主线无关，因而也与今人关心的种种问题无关的琐碎史事之中。历史研究不是不可以细化和微观化，问题是历史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一颗“社会的良心”，即他首先应该有现实关怀，

有大的问题意识，历史细节和微观的研究理当服从于这种大的问题意识的需要，有助于对今人所关心的大问题的理解或了解。

据说，作家毕淑敏打过一个比喻，说社会就好比一列火车，大众是乘客，政治家司机，自然科学家是技术工，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载着乘客的列车开到目的地，而人文学者就好比是列车上的观察员。人文学者的任务就是观察列车前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关注车厢内乘客的安全与舒适情况，他们对列车是否能够到达目的地不产生影响，他们的作用是监督乘客乘车的舒适与否，保证乘客的乘车质量[16]。

其实，毕淑敏的这个比喻不很恰当。不仅所谓的“大众”是分层的和有不同利益需求的，政治家尤其是追逐权力和利益而四分五裂的。控制了驾驶室的政治家们固然可以主导列车的走向，但维护既得利益的强烈欲望与需要，必定会促使他们无视乘客中众多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群体的愿望，甚至可能不顾最适合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让列车永远在他们所希望的轨道上无休止地跑下去。在这方面，单纯的自然科学家起不到任何作用。而毕淑敏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她不知道，列车运行不是没有危险的，不仅司机的作为必须要受到监督和规范，而且列车运行的大方向也必须要由调度室预先设定的干预机制随时给予干预，以防止出现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说的那种“无赖”行为[17]而引发灾难性后果。这一切监督、规范和干预机制的设定，都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任务，而且不仅仅是人文学者，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教育学家，统统都应该起着这种监督和干预的作用。他们不起作用，社会正常运行的干预规范的机制，即从宪法到各种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没有可能。人文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在这里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们过去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什么会那样走，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为什么必须要有所改变或修正？而没有这样的研究和对过去历史中是非善恶

真相的揭示，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无法找到准确的事实依据对制定各种规范和干预机制提供正确的意见。

历史研究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也不是随便研究点什么就有意义。历史研究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和作用，历史学者本身必须要有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要有大的问题意识，这至为关键。而当今时代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单纯的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甚至也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族群的自由与解放，而是整个人类和人类社会对人，包括对人的生命，对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的自由与幸福的重视程度得到了怎样的提升。即由最初的无视到重视，由只重视部分人到重视所有人，由只重视权利的平等到重视每一个人实际的自由感与幸福度。换言之，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另一种动力，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永不休止的关心与关注，也就是人们今天会提出“以人为本”的人性观念的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在。

历史发展当然有其特定的条件，因此条件的不同会令历史发展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阶段性和渐进性。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人权会被神权所吞噬，一部分人会被另一部分人所统治，普通人的个人命运会被遮蔽在国家或集体的巨大身形下变得无足轻重。但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心和关注却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止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参与到关注自身命运的思考中来，故人们要求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一天也终会到来。

无论这一过程会经历怎样的曲折，无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认识到人性、人道和人权价值的途径会如何不同，我们都可以断定，当历史研究者开始从人性的角度看历史的时候，他们的研究也就开始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了，我们也就开始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与意义

在古代社会，无论中西，史家的职责都是记录发生过的，包括刚刚发生过的史实。从司马迁的《史记》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十八世纪欧洲史学，都不排斥对现当代史实的记述。直至十九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高等院校还专门开设有当代历史的讲座课程。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历史学界才开始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可靠性和可行性发生了争论。

英国史学家阿克顿是史上最早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可行性提出怀疑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解释说：对于史料零碎、真假难辨的古代史来说，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越是靠近现代就越是重要，因为这样的研究是最值得今人了解，也是最容易为今人所了解的；它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它关系我们自身命运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通过它找出我们前行的道路。而它同那些可能永远都只能处在云雾之中的古代史研究不同，现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近现代史的研究资料是无穷无尽的，每个国家都保留有大量的档案文件，成千上万的现代人都保存有包括私人通信在内的各种文字记录，因此它又是迄今为止史学家们最能够切近史实的一种研究对象。但是，阿克顿同时则告诫说，距离太近的历史并不是最容易研究的历史。他相信，基于学术角度，客观研究当代历史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许多档案文件还没有公开，政治动荡与认识分歧影响着每一个人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同时，活着的人总不像死去的人那样坦白，许多重要的历史见证者还没有曝光他们所了解的秘密，要证实许多史实，特别是事件发生的原因，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因此，他的观点是：“一个时代成为过去，我们才能确切地了解它”。

一方面高度肯定现代史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怀疑当代史研究的可行性与准确性，这就给后来的史学家出了一道难题：如何恰当地区

分“时代”？可以肯定，这种区分其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会有很不同的标准或尺度。比如，阿克顿就没有给出具体的划分标准，他所说的“近代”或“现代”，就跨过了三四个世纪，讲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初期历史。而进入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各主要欧美国家规定的政府档案解密的时间只有30年，也就是说，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史实材料，用不着等几个世纪，事情发生30年之后就有曝光和研究的可能了。同样的情况，对于一个相对封闭和专制，但政权更迭频繁的国家来说，这个所谓的“时代”，往往也只是指一个朝代而已。它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但也可能只在很短的时间就被推翻了。因为后来的当政者无意保守前面当政者的秘密，往往导致大批档案文件或相关史料很快即被公之于众，从而也就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契机。然而，仅仅因为西方历史学科近百年来自设藩篱，大量新开放档案的曝光和解读，多半只是成了政治学家、报刊记者，甚或文学家们重视的工作了。

现当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与我们自身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时间上严格区分哪些时段可以研究，哪些时段不可以研究，显然并不适当。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鲁滨孙说得好：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应用他研究过去人类事件的技巧，把过去的事实记载下来，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过去，特别是要使读者了解，是哪些情况导致了过去事件的发生。换言之，只要历史家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那么，不论任何时段，只要有可能会接触到足够的文献和史料，能够把某一历史事实在可能的条件下记述下来，把其背后的原因，哪怕只是部分的原因披露出来，都是值得去做的。正如阿克顿所言，近现代史之所以对今天更重要，根本上是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最近，因此最容易为有过相近经历的今人所了解。在当今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事实都证明，不要说相隔几个世纪，哪怕只是隔上一代半代人，只要

生活及知识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要想准确地了解，特别是理解刚刚过去的人、事、情感与思想，都可能会变得极端困难。不要说半个多世纪前蒋介石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想，哪怕就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后来看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种种思想行为，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何尝不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故今日研究当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简单是着眼于记述历史事实，而是具有抢救的性质了。此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简单地重建史实并不难，难的是对史实形成的种种深层原因能否“真了解”。要“真了解”，就必须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如果我们今天能利用与当代史中人物有过居同一境界、容易同情理解之便，又能依据新时代之价值判断做客观之批评，我们为何非要等上几百年，让那些已不易回到过去境界的后人再来做历史还原的工作呢？

当然，和许多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在中国大陆研究当代史的难度确实要大许多。尤其是试图从政治史、外交史或总体史的角度来记述、研究当代史，在中国大陆今天还会存在各种政治方面的禁忌或史料方面的欠缺。但是，今日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政治史或总体史的研究独霸江山或独占鳌头的局面了。

当今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门以考察研究过去人的生存状态为目的的总体人学，历史研究的对象和类别早已多元化，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更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研究重心转向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鲁滨孙所说：“近世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布罗代尔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相对于那些一次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具有规律性或普遍性的各种事情，或许会更有研究的价值。相对于可能因政治敏感而无法真实再现史实的当代史研究来说，生育、婚姻、性爱、家庭、信仰、丧葬、习俗、医疗、饮食、烹

饪、消费、建筑、交通、移民、人口、工人、农民、城市、乡村、街道、生态、灾害等等，不仅没有多少敏感问题，而且无不可入史，也无不应该加以考察和研究。十几年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方向也正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显然也适合于大陆当今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开展。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了。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史就已经被纳入到高校历史教学的内容之中来了。第二，1987年人大通过的《档案法》按照国际惯例规定了政府档案30年解密的条文，各地档案馆虽然开放程度不同，但大都执行了这一法律，逐年进行解密工作。第三，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单位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开放后大量基层单位不复存在，无数个人的、单位的和其他民间史料流散出来，为微观史、个人史和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充裕的研究条件。第四，最近十年来，原本排斥当代史研究的历史学界的教师，特别是同学们，如今越来越多地开始涉足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来了。尤其是在微观史和社会史方面，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队伍在形成中，并且已日渐积累起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一切都还只称得上是中国大陆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但这样起步的基础却是扎实的和充满了希望的。

研究中国现代史最需要什么？

就社会科学而言，因为其源自于西方，因此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紧随其发展前进的步伐，与之齐一标准并与西方学者对话，就显得格外重要。当西方的概念、方法太过束缚中国人的手脚，妨碍中国人的思维时，一些中国学者不满于此，提出西方“文化霸权”问题，想要冲而破之，也很正常。

研究中国史，如同研究中国的经史子集，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必对西方人的理论、观念和方法顶礼膜拜。傅斯年先生关于西洋学者研究中国，仅文字审求、典籍考订等就一筹莫展的说法，虽嫌武断，但要西洋学者读懂陈寅恪的文字，写出一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来，也确实太过艰难。

余英时先生讲过他是怎样“别有会心”地读出陈寅恪通过《论再生缘》所表达的“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的。这里最重要的不是方法问题——西方学者未必不会藉史料的残余片断以窥其全部结构（陈寅恪语）的方法；而是体验——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共同遭遇家国变幻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和情感颠沛流离的切身体验。

相信对历史的理解，需要人生的体验，对旧文化的颠覆有切肤之痛的余英时先生这样认为，对新政权的建设充满自豪的金冲及先生也这样认为。金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出版后再三讲过他的这一观点，即一个人有没有相应的人生体验，对能否准确地解读和理解过去的历史很重要。由隔代的人来研究历史，由于缺少体验，难免会有隔膜之处。

毫无疑问，这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所面临的一个颇为吊诡的问题。1950年代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成立之初就面临过类似的尴尬境地，因为许多人怀疑，由今人来研究他们刚刚经历过的历史，有可能客观和科学吗？

但反之，今天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人则发现，随着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社会物欲横陈，导致青年人精神追求日渐缺失。影响所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近百年来中国为何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失去了思考的兴趣和能力。

几年前在这方面发生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是1960年代初出生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把“Chiang Kai-shek”译成了“常凯申”。一时间各种传媒工具把这件事炒得沸沸扬扬，好像不可原谅。实际上，不知道“Chiang Kai-shek”是蒋介石的年轻人，包括年轻的历史研究者有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里，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班里，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一位研究中国史的美国同学在发表会上同样弄错了蒋介石的名字，当一位中国同学批评他的时候，他的回答理直气壮：“我为什么要知道蒋介石是谁？”

近年来，关于历史研究碎片化的问题开始引起中国历史学界的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和学生，借助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实证的研究方法，把他们的注意力投射在许许多多局部的，甚至是极微观的史实上去，而对历史发展的线索、逻辑、各种重大事件及其复杂原因的分析研究失去了兴趣。

与此同时，太过技术性的研究方法和太过后现代的思想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一代人与历史中人的情感隔阂。越是年轻的学者，也就越是容易站在一种审视和批判的角度看历史，他们往往不屑于在历史对象的身上投注情感。而越是青年学生，也就越是容易受到纯技术的分析技巧的影响，以至于常常忘记了事情原本的后果和意义。

更有甚者，衡量学术水准的一个本质的指标，就是创新。要创新就要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出不同的结论。以至于，今天在美国学界，众多年轻的欧美国家学者和博士生们，为了创新，除了一窝蜂地开始借助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过去鲜有研究的中国当代史外，不

少研究者的创新，就是你过去说不好的东西，我今天就偏要去证明它并非不好。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知道或不了解蒋介石，这在今天听起来还有些怪诞，却是一个社会现实。时代变了，新一代人已无从感受到旧时代的种种。投身于这个充满了谎言、物欲、诱惑和太多生活压力的社会，年青人的思想难免会越来越物质，越来越现实。让他们来体会自19世纪末以来，在中国彼伏此起，激荡了百年之久，引得无数青年为之抛头洒血的改良与革命的理想价值，当然困难重重。

但是，这并不是说年轻人就不能研究历史，特别是不能研究中国现代史了。

我从来相信，历史研究是对人——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群人，或对整个人类——所经历的事及其原因、作用和意义的研究。弄清楚事实的经过，一般说来不是最困难的事情；站在后来者的高度来批评前人，就更简单了。而真正有质量和有专业水准的历史研究，是要像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那样，能够读懂前人的心（陈寅恪事后读到余文，曾有四字赞许，谓：“作者知我”）。也就是说，真正有能力的历史研究者，必须要能够正确解读研究对象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了解他（们）所言、所行的内在动机和原因，深入而准确地分析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为什么没有如我们后人所认为的那样说，那样做？

读字读心，难么？当然难。但更难的是，既要主观，还要客观。

要主观是指，只有当我们能够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立场、情感和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去了解其所思、所想、所欲、所求时，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其所言、所行的原因与局限之所在，而不致误读与错判。

要客观是指，只有当我们能够摆脱国家、民族、阶级、政党、族群等等主观立场及利益的牵绊与束缚，摘掉有色眼镜，真正站在局外

人和后来者的角度，平等地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只有当我们不抱丝毫成王败寇的先入之见，既知甲，又知乙，并能够从更广大的时空背景和最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价值观出发，来做历史评判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观点偏颇，只看到事情的一面，而忽视了事情的其他方面。

很显然，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有体验还是不够的。我们每个人的个人体验总是有限的，人和人的体验及其由个人体验所得出的感受还往往是不同的。像余英时先生的体验，显然就不同于金冲及先生。也因此，金先生一定写不出《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而余先生也一定写不出《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

研究中国现代史，最需要什么？依我之见，最需要的恐怕是良心，即是一份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

人生的体验，可以慢慢增加。研究的方法，可以随时学习和选择。但良心是学不来的，对弱者的同情和对一切违反人性、人道和人权的行为的憎恶，只能靠心去感悟。而有此心者，自然也就具备了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最基本的要素。

因为，他一定能够发现，这100多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战争、灾祸和死亡，至今还有太多的疑问没有解开，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至今还有太多的人深陷在历史的恩怨和仇恨之中，你恨我，我恨你，甚至许多人的思维方式仍旧处在不是你灭了我，就是我灭了你的水平之上。

他也一定能够注意到，胜未必“王”，败未必“寇”。和《建国大业》中的“胜利者”一样，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书中那些“失败者”的情感经历，也未必不能感人肺腑。“胜利者”付出过苦难，“失败者”也一样付出了牺牲。大家一样是华夏子孙，一样都“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过，最后也一样克服了内乱的创伤，走到了今天。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注意到，历史上的许多是是非非，很多未必需要用流血甚至死人的方式来解决。有时只是因为观念不同，方法有异，各有各的利益和追求罢了。而无数汇成了历史长河的人们，无论他们是社会名流，还是普通百姓；也无论他们站在哪一边，有过怎样的行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其实和我们并无区别。看不到这一点，不了解许多历史悲剧形成的原因，甚至对历史悲剧视若无睹，我们的历史研究不仅难以做到真实可信，更不可能让我们的读者变得聪明起来。

[历史研究越实证越容易有生命力 \[18\]](#)

1. 《失去的机会？》这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这次再版做了哪些调整？

杨奎松：这本书出了也快20年了，其实早些年就有出版社想再版，而我也早就做了一些修订和补充，这次新星出版社主动要求由他们来再版，我也就同意了。不过，除了个别错漏文字有校正，同时补充了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交涉的一节外，其他基本上保持原样未动。毕竟，这只是一本介绍两党战时谈判具体情形和经过的书，有关国共两党关系变化的总的历史过程，我一年多以前已经另写了《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做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对这本书不必再做大的调整了。

2. 战争时期，资料容易遗失，这本书也是您多年搜集整理的成果，我想读过这本书的读者最感兴趣的就是你的资料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考证的？

杨：这本书主要是依靠共产党方面的档案资料来写的，因此当年取向阅读这些档案资料的条件很重要。而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还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当时以党校编辑的身份去有关单位查阅这方面的史料是有一些便利条件的。当然，那个年代我们也恰好赶上档案法的最初制定，又赶上所谓“第三次国共合作”宣传热潮，不仅有关部门公布这方面的资料很多，我们当时查阅中央馆的档案也比现在要容易得多。80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许多研究者都在研究国共关系史，文章和书都出了好多。我没有跟风去研究什么“国共合作史”，而是着眼于比较一些比较微观的问题。我的长处是一直在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特别是1930年代中后期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经过。因此，我当时的研究比较集中在1935-1937年这段时间里。我既关心中共的政策是怎么改变的，也关

心中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是如何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对张学良、杨虎城做工作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了中共中央1935年以后秘密与国民党代表接触谈判的情况。我90年代初接连出版了《失去的机会？》和《西安事变新探》等书，就是80年代那几年致力研究这些相对具体的史实取得的成果。

那个年代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这些问题，但多数研究题目都比较大。除了党史研究者不大习惯做史料功夫，却太容易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多数学者因为条件所限，当年大都是把眼睛盯在我们档案馆的档案上面。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那个时候如果不了解，或不重视海外，尤其是俄国方面的相关档案，包括台湾方面的档案，也包括美欧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么，无论是从资料的发掘上，还是从研究的突破性上，其实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我当年在这方面能够捷足先登，很大程度上和我阅读面广，查找资料的线索多有关。

大家今天应该很容易在图书馆里找到当年出版过的好几部大部头的国共关系史著作，不少都拿的是国家课题或省部级课题，经费很充裕，同时集合的人员也很多。但是，这些书基本上都没有再版的价值，也没有多少人会去读它们。一是当时的研究者太过于迎合时势，二是大家不注重实证性的研究。时过境迁，这种研究的学术性不强，其价值自然也就大打折扣。由此也不难注意到历史研究的一个规律，即与其迎合形势，不如扎扎实实地做实证的研究。真正有生命力，能够留存下来的成果，多半都是那些实证性的研究成果。

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集中披露了大量国共两党谈判的具体方案，以及双方，尤其是中共中央方面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和他们派出的代表之间的往来电报。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和美国就有一批资深学者，包括张九如、关中、范力沛等，写过国共两党关系的大块文章，甚至出过书。但是，他们掌握的涉及两党具体谈判内容及

其经过的资料非常有限。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年的这种谈判很多时间都是秘密的，只有国共两党中央掌握情况，外国人，除了俄国人以外，基本上不掌握具体信息。美国人曾经介入过两党谈判，但也只是在抗战最后两年和战后最初两年那段时间。因此，外国人要系统研究国共谈判史，是很难的。台湾学者有一定的条件，但是，八十年代台湾还处在解严前后那样一个过渡时期，档案还没解密。因此也只有像张九如、关中、李云汉这些有条件接触到国民党高层档案的研究者，才有可能做这方面的研究。但问题在于，当年这类谈判，在国民党基本上都是在蒋介石一个人的掌握指导之下，只靠极少数人秘密进行，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极少，故他们的研究者所能看到的资料也十分有限。

在这方面，大陆的研究就比较容易占先了。因为那十多年的两党谈判，多数都是在国民党区域里进行的，中共中央必须派代表出去谈，这样就势必要通过电报或密信随时汇报和指导。长征到陕北之后，中共根据地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这些电报资料大都保存了下来。同时，中共中央当年的工作习惯就是开会多，而且开会必记录。像谈判这样的大事情，中央高层基本上都要开会通报情况，并商量大政方针，这样也就留下了许多记录。另外，中共中央在1944年以前一直是通过电报的方式向莫斯科汇报重大情况，同时听取莫斯科方面的意见的。1935-1936年国共秘密接触和谈判，甚至还是直接由两党代表在莫斯科进行的。故在俄国档案里面，也保存着一部分这方面的资料。八十年代下半期到九十年代上半期，恰好是大陆档案比较开放和俄国解体后档案最开放的一段时期，我书中的许多档案史料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通过查阅，或通过相关机构正式刊布得到的。

当然，正如你所问到的那样，资料搜集对于我来说未必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更麻烦的其实还是资料的考证和解读。由于年代久远，

很多资料当年记录不清，或缺年代，或缺日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非详加考证，有时很难利用。

举一个小例子。长征后，国共两党最早接触时，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写过一封信。陈立夫1979年就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回忆录，影印刊布了周恩来的这封信。由于周恩来当年写信时在落款时没有标注年份，只写了一个“九月廿二日”，陈立夫肯定地说他是1935年受蒋指派担任寻找中共线索时收到的，因此包括台湾学者在内海内外许多研究者都以此为凭，认定国共两党抗战前最早的接触开始于1935年秋天，而且是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走投无路，让周恩来主动秘密写信给陈立夫，寻求谈判的。

我从最早看到陈立夫的这个说法开始，就怀疑他所说的年代的准确性。因为熟悉中共历史的研究者都了解，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刚刚与红四方面军分裂，离开川康，17日血战腊子口，转进甘肃南部，22日还没有完全脱离藏区，当时连落脚之地都还没有找到，它哪里会想到让周恩来写亲笔信给陈立夫兄弟，更何况那个时候在那种地方，又如何有条件派人送信到南京去呢？

因为我当年看到陈立夫回忆的时候，还没有想要研究两党关系问题，因此只是怀疑而已，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印证的工作。等到后来我开始关心中共中央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时间，进一步考察中共何时开始改变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时，才进一步注意到研究论证这个时间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不能证明陈立夫的说法是错的，按照台湾学者当年一致的观点，中共中央应该早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之前，还在长征途中的甘南地区，就已经确定了联蒋的方针了。而事实上，我的研究恰恰证实，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因为与莫斯科没有电讯联系的条件，以至它始终坚持着中央苏区时对国民党的政策，从未考虑过制定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它重新与莫斯科接上联系，了解到莫斯科新的统战方针，已经是1935年11月20日以后的事情

了。那是因为它9月底从甘南进入陕南后，幸运地在一个小县城里读到了一份《大公报》，在那上面发现在陕北竟然还残存有一块红军的根据地。这样，中共中央临时改变了计划去外蒙边境寻求苏联援助的方案，转去了陕北，并在10月20日前后找到根据地，在那里落了脚。一个月后，共产国际派来经外蒙辗转回到中国，与中共中央联系，并负责传达新政策的联络员张浩，也抵达了这里。这样，中共中央才获得了莫斯科的政策指示，并在这之后迅速调整了原来的政策，开始尝试着向国民党上层发出呼吁。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共中央的各种文献资料，它的政策转变，包括开始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接触或谈判，都是从1935年底开始的，特别是12月下旬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之后才开始的。

掌握了这两个重要背景，再具体分析周恩来信中讲到的一些重要信息，再结合两党最早开始的秘密接触与谈判是1936年1月在莫斯科进行的，之后才转回到国内来等情况，就不难确定陈立夫的说法是错了。事实上，1936年9月正是中共高层领导花大力向国民党高层发出呼吁的一个重要时间点。这个月里，不仅周恩来，光是毛泽东分别写信给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信，就有近10封之多。

3. 在您对国共谈判资料的整理过程中，您认为有哪些事是我们今天的普通读者很容易误解的？而历史真相又是什么？

杨：这样的例子很多。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今天的研究者或读者，总是习惯于把共产党想象成比较强势的那一方。既不相信中共会做出重大让步和妥协，也不相信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在莫斯科指导下制定的。1980年代初在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时，我和许多党史研究者争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逼蒋抗日”的问题。在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的一份文件中，曾经提出过这一概念。后来的研究者特别重视这一概念，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概念不是莫斯科提出的，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创造出来的。当时国共力量对比十分

悬殊，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就只能放弃武装，向国民党投降。因为毛泽东坚持了独立自主，坚持原则，用斗争求合作，结果，最终迫使蒋介石国民党让了步，这才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坦率地说，这种看法完全不合情理，不合常识。但那个年代在党史学界却是公认的说法。一些学者还据此演绎出了一段颇为神奇的历史，他们说，莫斯科虽然制定了新的统一战线政策，但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即表面上主张“抗日反蒋”，实际上是要逼着中共向国民党妥协投降，要求中共中央无条件实行“联蒋抗日”。他们说，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有别于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即坚持“逼蒋抗日”，坚持斗争，最后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我为主，达成了“联蒋抗日”的斗争目标。

具体的情况我这里不细讲，我只讲一个情况，即当时条件下，中共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因为共产国际最初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还没有把蒋介石纳入到团结争取的对象中来，因此，在它指导下，中共中央虽然用统一战线政策来团结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却公开口号却还是反对蒋介石。中共中央所以会在1936年9月1日提到要“逼蒋抗日”，有两个背景。一个是8月15日共产国际来电否定了反蒋方针，要求它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主要谈判对象；一个是中共中央此前已经与张、杨等地方实力派结成了秘密的盟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它一方面要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转而去积极争取对蒋谈判；另一方面它从任何方面不宜也不能放弃与有反蒋倾向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既要联蒋，又要保持与反蒋派的关系，蒋这个时候又并不接受中共所提出的条件，坚持要中共接受他的条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接受莫斯科“联蒋抗日”方针的同时，会提出“逼蒋抗日”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共产国际主张要“联蒋抗日”，也并不反对用必要的斗争的方法逼蒋抗日，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内部的讲话中就

可以注意到，季米特洛夫在七八月间谈到中共问题时，也提到过要想尽办法逼迫蒋介石抗日的观点。同样，中共中央9月1日指示中虽然提到“逼蒋”的概念，在前后的指示中也一再提到“联蒋”的方针与目的。换言之，中共中央并不曾有意违拗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一方面，在接到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的批评电报之后，20日中共中央就接连发出党内指示，对此前不重视与南京国民党谈判的作法进行了检讨。9月23日，中共中央还破天荒地就此做出正式的决议，向全党做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策略上犯了错误。前面提到的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信，以及毛泽东写给国民党大批领导人的信函，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和发出的。因此，仅仅抓住“逼蒋”一词就联想到并演生出一个“独立自主”的成功斗争经验来，恐怕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了。

究竟中共在1936，特别是1937年与国民党的谈判过程中具体做了怎样重大的，甚至是带有原则性的让步和妥协，毛泽东又是怎样说明这一妥协的严重程度，以及这种让步与妥协的必要性的，我在书里做了很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细谈了。

4. 您认为国共两党十三年间十次谈判，最终仍不免一战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杨：当年台湾学者陈永发读到我的这本书后，当面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我的这本书写得不如我前面的一本，即《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他的直观印象是，我似乎在强调两党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妥协合作的可能，可惜很多机会失去了。我告诉他，他没有注意到我书名上的那个问号。即这本书的主旨其实不是在讲失去了怎样的机会，而恰恰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真的存在这样的机会吗？

通过对两党自1936年到1949年10次谈判的具体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双方的谈判和妥协，都是有特定条件的。要么是有共同的太过强大的外部敌人，要么是有外力的有力干预，要么是双方

多少有些势均力敌，强势一方暂时还吃不掉对方……之所以会存在这种情况，而几乎不存在双方基于民族大业，共商共赢的情况，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双方都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双方都坚信，中国的一切，必须“操之在我”。因此，双方之间的分歧不仅很容易被意识形态化，而且很容易变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情感对立。双方之间的任何谈判或妥协，都注定了只能是环境逼迫下的一种暂时的策略，任何一种退让都难免会让作出退让的一方感觉屈辱。强的一方不免怀疑弱的一方妥协退让别有用心，害怕被弱方算计，因而必欲强化其监控措施；弱的一方更是会担心强的一方会寻找机会吃掉自己，因而必欲千方百计摆脱被强方控制，并且一心要壮大自己，准备东山再起。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双方虽然自1936年至1949年一直不断地在谈判，却一直也不曾找到真正使双方产生共信共赢的道路，最后还是不得不靠战争解决问题。

5. 近几年，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个方面？是否有推出新书的计划？

杨：近几年我的研究比较多地在研究新中国建国的问题，去年已经推出了从政治和外交两个方面研究这一问题的专题性著作，本来计划还可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再出一个集子，现在看可能不会很容易。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我还有一些更具体的个案在进行中，希望能尽早写出来。

不能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 [19]

一、杨老师，感谢您接受采访您去年和今年接连出了两本集子，一是《读史求实》，一是《谈往阅今》，反响都很大，在网上和各地书店连连被推上10大好书榜，作为关于近现代历史的著作，为什么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是否跟近几年的“读史热”有关？

答：其实“读史热”，并不是近几年的事情，早在八十年代“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刚开始，思想言论尺度稍有宽松之际，就形成过一波“读史热”。那个时候中共党史、民国史的书出了很多，特别是纪实文学作品十分畅销，影响极大。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相当一段时间里，许多研究党史的年轻学者都参与了“攒书”的生意。所以说是生意，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学者，或者说是老师，凑在一起做书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乘机挣钱。当年这方面力量最强的是人大党史系，有老师甚至把“攒书”做成了一门事业，专门雇了一些打字的农民小姑娘，把他们找来的各种书和文章分别录入电脑，最后由老师或老师的学生归类加工迅速成书。这比早些时候的“剪刀加糨糊”的加工方法要先进多了。那个时候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怕招收人大党史系的学生到所里来工作，因为那个年头在人大读书的硕士生、博士生有些也跟着导师做这种事情。那个年代攒书那么容易挣钱，原因也就是市场需求量很大。像以现当代史为范围的《炎黄春秋》杂志，创刊不久就发行到七八万份之多，自负盈亏而有余。

二、您觉得今天的“读史热”和当年的“读史热”有什么不同吗？

答：八九十年代虽然关心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史的读者很多，但读者以老同志和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人居多。老同志经历过“文革”后很想直截了当地了解历史真相，青年人则多抱着猎奇的读故事

的心理。因此，他们对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比较重视史料考据的著作文章通常难以接受。1997年郑惠先生找我们创办《百年潮》杂志，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想要用经过学术研究的新的史实，去影响一下热心历史的读者。结果并不十分理想。因为我们的文章大都是从学术研究成果加工改写的，学术研究讲证据，重过程，因此一般文章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有的还要连载。就因为这，我们的印数一直上不来，最多也就两三万份。即使喜欢我们刊物的那些读者，也往往会抱怨我们的文章长，说是岁数大了，一口气读不下来。

今天的情况大不同了。这几年读者的文化层次明显提高了，不仅受过高等教育的读书者越来越多，而且过去只是埋头于官场和商场的众多官员及商人，也越来越多地发现读史的价值了。包括前几年只是想着怎么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去恶补儒学或易经的许多人，如今也在现实环境的刺激下，越发关心起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来了。因此，10年前只能印一两千册的现当代史方面的学术专著，如今很容易就能印到几千。写得好的，哪怕是纯学术的、重考据的，发到上万册基本上不成问题。那些东拼西凑，小考证、不注出资料出处，信口开河的书和文章，如果不是上面布置要求，反而没有很大市场了。

三、历史研究或历史真实的揭示，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把握。您的书所以容易引起读者的重视，也与您在史料发掘方面所展现的特长有密切关系。您的研究中常常能够告诉读者很多新史料，在当下很多历史资料还没解密的条件下，您是怎么发现这些史料的？

答：其实，史料的发掘、运用和考证，是史学研究者的一项基本功。凡是基础训练比较好的研究者，相信都能做到这一点。读者今天在读现当代史的著作文章时所以会觉得我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强，纯粹是因为近100年来的历史研究起来政治上太敏感，禁区太多，早年那些史料功夫比较好的学者多数都不愿意来研究这段历史。当然，我也有我的长处。比如，我曾多年在可以读到当时还没有解密的某些资

料的中央一级部门工作过，在八十年代档案法制定前后比较开放的几年蹲过中央档案馆，在九十年代初俄国档案解密最好的时期去过俄国查档，并一直跟踪研究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一个研究积累的问题。我做中共史以及中共与国民党关系、与苏联关系的研究，已经做了30年。我最初开始着手研究中共史，就是从100年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开始研究起的，一步一步往后延伸，今天才刚刚研究到1950年代。这种循序渐进的跟踪式研究及其研究积累，对我理解中共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外复杂的历史关系、历史背景，自然有很大的帮助，也使我在解读和中共史有关的各种历史资料时，容易发现一般学者不大容易发现的问题。

研究历史，不是说发现了史料，就能够揭示出历史真相了。就个别历史事实而言，有史料和没史料确实天差地别。比如，我在《读史求实》一书中谈到的安平事件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1946年8月10日和16日冀东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订正此前说法，承认所部主动攻击美运输车队酿成事件的电报，和中共内部一连串内部检讨的电报，要翻历史上这个案就几乎不可能。但是，就许多历史事实真相的还原而言，最缺的不是史料，而是能不能发现传统说法中的偏差和能不能正确解读史料的问题。比如，我所谈的这个安平事件中的几件关键性史料，最初并不是我发掘和揭示出来的，早有中共党史学者拿这些史料写过类似的文章。只小过，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几则史料的价值所在，文章基本上还是在延续以往的说法，对还原事件的真相没起任何作用。

四、作为普通读者，还是只能从具有良知而且有着深厚研究功力的史学家那里来获取准确的历史知识。问题是，普通读者如何才能知道自己读到的是好的历史著作或好的历史作品？

答：对于这种问题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回答。我的意见是，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具有几个特点，一是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

晰的引证；二是对历史的复杂性及各个方面要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三是要能够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我不认为读那种对历史评论一边倒的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著作对普通读者有益。任何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

五、目前，很多反映近现代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很受观众欢迎，作为文学艺术作品，里面有很多虚构，有人认为，太多的编造和虚构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的正确理解，您怎么看？

答：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作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起着不同的作用，文学艺术，包括影视艺术，就有娱乐观众的功能，历史研究，包括历史教育，就不具备也不应该起这种作用。当然，文学创作或影视作品不是只具有娱乐大众的作用，它同样也应该直接或间接或潜移默化地发挥启蒙人性、净化心灵、提升文明的作用，有生命力的文学创作历来就有这样的功能。客观地说，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里，文学创作都是多面性的，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虚假宣传，也有服从于商业利益的媚俗表演。但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界和文化舆论界总是在起着某种平衡和导向的作用，太多虚假或媚俗的东西很难变成文化艺术的主流。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下，要做到这一点还十分困难。第一，这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作家要有条件独立思考和创作；第二，这需要我们有一批熟读人类历史，有良心，想反省，能够独立思考的作家、编剧和导演；第三，这需要我们有一大批能思考，也想思考的观众。在中国的今天，这三条都还不很具备。我们今天有了一批能思考，也想思考的读者，也有了一些有良心，想反省的研究者，但今天多数热衷于看连续剧和看电影的观众还不具备这样的水准，大多数编剧、制片和导演也只习惯于把眼睛盯在票房收入上。

说实话，我倒不指望大陆今天的编剧、导演能拍出《圣诞快乐》、《赛德克·巴莱》那样有想法、有观点的历史片来，问题是中国今天的编剧、导演能写出拍出像《蜗居》那样直观反映现实真实的

影视剧的都没有几个。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观众今天不仅很难从影视作品中看到历史真相，就连想看到现实生活的真相都不容易。至于说要想从我们的影视作品中得到什么具有人文思想意识的启蒙和启发，恐怕就更难了。

六、历史教育的功能更多地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任务，您如何评价现在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讲解的中国近现代史？

答：已经有很多学者批评过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了，我这里不想泛泛地讨论它的作用和意义。以课程教材研究所编人教版2007版高中历史必修教材中的几点说法为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面存在着怎样多的问题。

一是许多史实不准确。以14课为例，如说1919年五四运动中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中去，因此出现了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需要，实际上这个过程开始于1920年中共开始建党以后。如说1920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这里不仅时间被提前了，而且派出的组织也弄错了。如说中共成立后深感要战胜强大敌人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因此1923年三大通过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实际上中共成立时并无此觉悟，1922年虽有列宁和共产国际提议，中共最初仍一味抵制，后经共产国际代表再三说服，才在这一年二大通过赞同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当年9月陈独秀等就陆续加入国民党了，并非到1923年三大才通过此决定。如说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不确。因为7月15日武汉政府实行的是“和平分共”，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没有开始所谓“大肆捕杀”。“大肆捕杀”是中共8月1日策动武汉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发动南昌起义，双方彻底翻脸之后的事情。

二是许多评价既不客观，也不实事求是。如13课谈到辛亥革命问题，书中的结论是：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丰碑”。举的证据

有两点，一是说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二是说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这种历史解读明显地有问题。

第一，孙中山等1912年3月11日制定的那个临时约法，根本上是用来对付袁世凯当政的，孙中山当临时总统时通过的政府组织法大纲规定的完全是另一套办法。当他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之后，才不得不另订约法，把原先的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做了各种规定限制总统的权力。因此，这个约法不仅袁氏后来不能接受，孙中山自己当权也不去执行。只讲临时约法字面上的意义，不讲它的来龙去脉和策略目的，学生一旦了解到后来的历史，肯定会一头雾水。

第二，辛亥革命是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体制，这是事实，但说它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就不准确了。这里面最基本的问题是没有厘清几个核心概念，如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人民”，以及什么叫“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因为没有清楚界定这些概念，因此说它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丰碑”，除了君主制没有能再度复辟外，拿来解释辛亥以后中国小仅没有走上民主道路，反而越走越离民主越远的情况，也必然会发生许多问题。

简单地说，教科书里最大的问题是编纂者意识形态的色彩过强，太习惯于拿当今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名词来褒贬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因为对历史细节缺乏研究，很多武断说法既无史料支撑，也不介绍复杂的变化经过，更不研究因果关联和内外影响，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这对学习历史恰恰是最有害的。

七、我个人对您在《读史求实》一书里提到的“和平土改”很感兴趣，可以为读者简要地谈谈您的观点吗？

答：其实我把中共1946年和平土改尝试的情况抽出来写成文章，主要想法是想让读者通过这么一个个案来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问题。多数熟悉中共历史的读者都知道，中共历史上的土改都是阶级斗争式的，因而是强调斗争，是比较暴力的。所谓“和平土改”，通常指的都是政府贷款给农民，然后向地主赎买土地的办法，这种办法从一开始就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并且是国民党一直主张，它到台湾后用的也是这种办法。不要说这种办法，就是采取尽量少打人杀人的土改办法，在1950年底大陆全面土改推开后也一度被批判过。当年使用的提法，就是要坚持“斗争土改”，反对“和平土改”。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不对1946年6月底到1947年初中共中央大力推动，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全面试行的，用政府贷款向地主赎买土地的这种和平土改的尝试，感到好奇。为什么一向主张激烈斗争方法的中共这个时候竟会尝试搞和平土改呢？因此，我先要弄清史实，要考察清楚中共当年是不是搞了这么一个和平土改的尝试。在确定了这一史实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再来研究和讨论中共当年做这种尝试的原因所在。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好多很复杂的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党史著作或教科书里所说的那个抗战结束后全面爆发内战的时间点：1946年6月。如果这个时间点确实爆发了全面内战，那么，说毛泽东6月底提出和平土改的提议，7月中共中央通过决定试行，就说不通了。因为几乎所有研究中共土改史的学者都说，1946年5月4日那个决定实行土改政策的中央指示，就是为着应对6月份内战全面爆发设计的。不论这个说法对不对，如果6月爆发了全面内战，毛泽东不抓紧时机斗地主分土地动员农民参战，也不合共产革命阶级斗争的一贯逻辑。

另一个理解上的难点，是为什么毛泽东早不和平，晚不和平，偏偏在6月底开始提出要和平土改？不管6月是否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点，5月4日中共中央毕竟已经通过了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为什么

一个半月前决定土改时不同时决定赎买土地的和平土改政策呢？按照中共党史比较传统的说法，五四指示本身就已经太过温和，不大符合斗争土改的阶级方针了，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土地赎买，岂不更不符合阶级方针了吗？这样一个不符合阶级方针的土改政策，为什么中共中央小仅通过，还在陕甘宁边区试行，甚至在1947年2月上旬末刘少奇还正式代表中央宣布说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办法之一，只有好处而无害处，建议各解放区一体采用？换言之，如果我们注意到1947年4月下旬以后中共土改政策才全面转向激进和暴力，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如果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不去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会不会开始在各个根据地全面推行这一政策呢？

考察中共1946年下半年试行和平土改政策，还会碰到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中央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之间在要不要土改和如何进行土改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相互影响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也很少人会这样去提出来。但是，考察五四指示的提出，考察中共中央下半年推行和平土改政策时遭遇的种种困难，包括最后不得不放弃，一度甚至会重回苏维埃时期打乱平分甚至是打杀的政策，都不难看到中央政策受地方影响和冲击的因素。这和我们过去一直以来所以为的，毛和中央的政策只会被不打折扣地层层贯彻，一贯到底，只有毛和中央说服各地，没有各地说服毛和中央的情况，显然也有很大出入。

限于文章的题目和篇幅，我这篇文章并没有全面讨论上面这些问题，只是论证了1946年中共中央和平土改政策形成和试行的经过。但我写此文的出发点并不在简单地梳理这个过程，而是要帮助自己，也促使那些有心的读者思考这样一些和传统说法存在明显矛盾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结合1946年美国调处的全过程，以及中共中央一直到年底蒋记国民大会召开才下决心全面撤退驻南京代表团等情况来看这个

时期中共中央在土改政策上力求温和的作法，我们或许不难发现传统的说法有太多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研究历史要摆脱现实政治束缚

问：我们注意到您最近这一年来在大陆接连出版了几本书，即《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以及和沈志华教授等合著的《中苏关系史纲》。读您这些书有一种很深的印象，就是您对历史的描述和分析似乎格外注重一种客观的态度，很少像传统史书那样站在革命史观的角度去褒贬历史。这种态度让您在许多历史问题的分析说明上显得别具一格。

杨：你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多半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距离现实太近了，因而研究者太容易受自身立场、情感和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我不敢说我就能够摆脱这样的影响，但我至少相信研究历史的人需要两种基本的态度并尝试着去坚持这样要求自己。一是要能深入于历史之中，二是要能超然于历史之外。所谓要深入于历史之中，就是要能够像陈寅恪先生所讲的那段话那样，即要能够“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要学会换位思考，即设身处地地站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场景之中，按照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和当事人特定身份、地位、教育、知识等所决定的立场情感背景，来具体地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所谓要超然于历史之外，就是要努力摆脱现实政治的束缚，不受一家、一族、一党、一派，甚至一国的情感立场及其意识形态的左右，尽可能用比较科学的发展的眼光，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待历史上的种种恩怨与是非。我想，如果我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史叙事而表现出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那不过是在这两方面注意坚持而已。

问：您认为注意坚持这样一种既要深入、又要超然的研究态度，对历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杨：举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毛泽东曾经跟着斯大林一起痛批过英法，肯定过苏德条约，宣称欧洲爆发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狗咬狗，说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法美方面去了，争取同所谓民主国家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并且因此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

“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说“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德国法西斯在打败了法国之后，就转过头来进攻苏联了。事实证明，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估计，都犯过错误。他们当年的一些认识在我们今天看来，确有其不成熟、不周延、不合今人看法之处，但是，当年换了你去做毛泽东，你会在后来的历史还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做得比毛好吗？未必吧？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去细读历史的话，就能够发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像毛泽东一样的中国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革命的政党组织，没有过误判、误信的，几乎没有。如果我们理解不了毛泽东，那也就理解不了其他人，如此也就理解不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你说它的意义有多大？

问：如何理解您的这句“理解不了毛泽东，那也就理解不了其他人，如此也就理解不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比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按照传统的革命史观的理解方法，只要理解近代中国为什么要革命，谁主导革命成功，其他一切不合乎革命的人和事，只要视其为反动腐朽就可以了？

杨：我这样说，是因为毛泽东已经是大陆的中国人最容易接受和理解的一个历史人物了。换了其他人，今天大陆的许多中国人理解起

来，麻烦就更大了。比如蒋介石，大陆的许多年轻人的看法，就和众多海外华人的看法非常不同，甚至十分对立。即使是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中间，由于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生长环境等种种的不同，他们对毛和蒋的看法在今天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很难调和。这在网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试想，每个人都先入为主地认定自己喜欢的那部分人好，其他人坏，这历史还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可言吗？传统的革命史观本身就存在着这种吊诡的情况。因为都是讲革命，大陆上讲的是一套，过去台湾国民党讲的是另一套，互以对方为反革命，以自己为革命。如此来培养教育自己的国人，培养教育出来的从根子上就是对立分裂的两部分人。而这样一种历史观，又只有在政治封闭的情况下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与条件。政治相对开放之后，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历史远比那种单线式的革命解读复杂曲折得多。这也正是今天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传统的革命史观的理解方法都越来越失去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人们很容易发现，在传统的革命史观的解释背后，还有太多用革命史观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

举一个例子。记得1990年代有一次我去东北参加学术研讨会，一位军校的研究者提交的论文痛斥苏联1929年在中东铁路事件当中的侵略行径。这个问题过去史学界向来是不去碰的，不是大家不知道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而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背景相当复杂，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研究者对此显然全无意识。其说看上去自然是符合当今的“政治正确”的原则的，因为他的逻辑也确是可以成立的。文章认为，一来中东铁路是沙俄以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并霸占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之后，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花钱修建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苏俄革命成功后曾一度宣布愿意放弃其权利，后又反悔并坚持其管理权，此事已有损中国主权。二来张学良1929年武力接收中东路权，实属中国方面维护主权之行为，苏联竟至出动海陆空军侵入中国

境内，一举歼灭东北军海陆军上万精锐，重新夺回路权，实与帝国主义无异。

但是，这种在今天看来“政治正确”的逻辑，却未必符合当年中共的“政治正确”。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来肯定张学良武力接收中东路权的行动，并认定南京国民政府力挺张学良的做法是维护中国主权，那么当年中共中央高唱“武装保卫苏联”，积极配合苏军牵制打击国民党军，甚至极力压制党内如陈独秀等不同声音的做法，又当如何解释呢？显然，在这里发生了史观上的冲突。因为时代的变迁，曾经结为同盟的中苏关系久已演化为纯粹的民族国家关系，且长期交恶，影响到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从民族主义史观的角度来看待两国之间过去存在过的历史纠纷。殊不知，当年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当年收回路权的行动就是打着“革命外交”的旗号进行的，它也因此指责中共“卖国”。今天按照民族主义史观来思考这种问题，不期然就会与国民党的革命史观走到一起去，而与中共的革命史观背道而驰。当年大家不去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会面临到这种一种麻烦。

这种情况恐怕是这位研究者始料未及的，但又是今天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很难避免的一种尴尬情况。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在研究中尽可能深入于历史之中，同时又努力超然于历史之外，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来说明和评述这种历史上的外交纠纷，这种麻烦就会如影缠身，没完没了。

问：这确实是挺吊诡的一个现象。但是，如何才能做到您所说的那种超然呢？我注意到，您在《开卷有疑》一书的序言里也承认，

“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既然如此，您又是怎样做到尽量超然于历史之外的呢？

杨：我在《开卷有疑》一书中收了一篇评黄仁宇《黄河青山》的文章，谈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黄仁宇先生可以说是一位大家了，他的“大历史”观其实强调的也正是这方面的问题。作为早年的国民党军官，黄先生力求客观公正，不拘泥于一党一派的情感立场来认识历史，解释历史，可谓身体力行，非常不易。但是，历史学家是不是就可能完全没有情感和价值判断这种东西呢？不可能吧。这就是我不同意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不夹杂任何个人情感立场和价值观的看法所在。我所以举出黄仁宇在解读中共军队作战勇敢这一点上存在的问题，和他在解读自己与美国大学及相关教授恩怨纠葛时不能完全客观的情况，就是要说明，纵使像黄仁宇这样力倡“大历史”观的华人史学大家，要想完全做到不受个人情感立场和价值观的影响，也是极其不易的。这也是过去许多史家相信，历史研究要距离今人愈远才可能愈客观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可能做到尽量超然于历史之外呢？也不尽然。首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黄仁宇先生在他绝大多数研究著作中在坚持“大历史”观问题上已经做得很好了。其次，我讲“大历史，小道德”，并不是说历史研究就不能讲情感、讲道德、讲价值判断。恰恰相反，在我看来，那些对历史毫无情感，对人类普世的价值观无动于衷的人，其实是不配研究历史的。所谓“大历史，小道德”，强调的是不能拿个人的道德判断、价值判断来扭曲历史事实本身。也即是，就研究历史来说，首在尊重史实，次在道德判断，但绝不是不要有所判断。当然，对研究者来说更为重要，也是完全可以做的是，要尽可能避免倒果为因地去对“古人”自身的道德妄加论断。因为，我们今天所谓的是非善恶，道德或不道德，是依据今人的标准，不是依据“古人”当时的标准；是依据我们部分人认同的标准，而未必是当今社会其他一些人所认同的标准。比如，当我们今天评价“古人”谁“残忍”的时候，我们就可能犯了以今代古、以偏概

全的错误。因为今人视为残忍之事，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多数人看来，却可能不存在残忍不残忍的问题。在与被害人利益相关者认为残忍之事，在与加害人利益相关者看来，却同样可能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我们今天视为大恶之事，当事人依据他们所奉行的理念，很可能还认为是至善之举。也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下，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当事人自己其实并不十分了解实情，也未可知。总之，如果我们不能努力让自己“深临其境”，理解“古人”所思所想及其所以然，不把历史真实作为最大最重要的研究目标，而是首先拿今天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先入为主地下判断，要想走近历史真实是不大可能的。连基本真实的历史都不了解，又何谈判断的准确呢？

还原历史真相是件很难的事情

问：其实，还原历史真相是一件很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读了您的《开卷见疑》一书，就很让人感慨，不仅历史中间遍布疑点，就连历史著作里面也常常谬误百出。我们注意到，您在新出版的这几本书里不动声色地做了很多工作，您对此应该有很多感慨吧？

杨：你说得没错。深入也好，超然也好，根本上是要达到理解的目的。准确地理解和解读历史，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要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是因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要了解今日之种种，设想明日之所求，就非正确了解昨日之所为并探讨其如何为、所以为不可。此正所谓“以史为鉴”。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太过强调“革命”，而忽略了历史真实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大家也都在讲“以史为鉴”，却忘了你连历史这面镜子都造不好，一段段弄成了哈哈镜一般，照镜子的人又如何能正确地了解自己，改变自己？当然，我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不是“告别革命”论者。革命，无论是怎样一种革命，它既然会在中国发生，自有其发生的原因和存在的某种合理性。我相信传统的革命史观之不可取，不是因为相信革命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认为这种史观太过

强调政治的标准了。结果不要说是那种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对一些看上去并不会有碍政治形象的历史问题，它也一样会按照其既定的标准去误读历史。

我在这里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如红军长征的问题。我们刚刚庆祝过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要以1936年10月22日作为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日呢？表面上，因为这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宁会师的日子，因此可视为长征胜利“尽开颜”的标志。但实际上这却是和按照革命史观解读历史的某种需要相联系的。关于这种解读的吊诡之处在于，只要我们读历史时稍稍细心一些，就不难发现，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甘北之日，不仅不是红军长征最后胜利之时，恰恰是红军陷入空前危机之期。因为，此前红军兵分三处，国民党军顾得了南，顾不了北。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兵多将广，吸引了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因此陕北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对作战消极的地方军阀武装一度对付起来还得心应手。而这时三个方面军会合于甘北一隅之地，原定是要去接取苏联援助的，但宁夏战役的迅速失利，两万余红军主力被阻隔于黄河西岸，剩下5万红军伤病过半，粮弹匮乏，北上的官兵更身着短衫短裤，连御寒的衣被都没有。国民党中央军这时却大批尾随而至，形成三面合围，并迫使过去与中共暗通款曲的地方军阀也只好听命进攻。进入10月底11月初，红军在甘北已再无回旋余地，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新的长征作战计划，准备向东突围，以一年为期，经山西、河南几省再争取打回到甘北和陕北地区来。要知道，中央红军1934年10月突围长征时87000人，一年后辗转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五六千人，算上沿途补充的新兵，损失超过95%以上。当时红军走的还都是国民党中央军尚未涉足的西南西北偏远之地，面对的多是地方军阀，如今各方面准备大不如当年几万红军的疲惫之师，要在基本上已是国民党中央军控制的地区再度进行长途征战，其险恶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正是为什么蒋介石会

在12月初不顾一切赶赴西安，集中军政要员，坚持“剿”共作战已至“最后五分钟”，下决心要毕其功于一役。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在得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表示说：张学良这是“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如果三军会师甘北的结果，是红军全军覆灭，这种会师的“胜利”又何在呢？这个道理并不难于理解。

由此不难了解，没有西安事变，红军长征不仅不可能就此结束，而且整个红军都可能会遭遇西渡黄河的两万多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历史难免会被改写。显然，这种把红军长征与西安事变割裂开来的作法，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对西安事变及其背后中共依据莫斯科指示实施统战新策略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评估，而且也造成了对红军长征胜利原因的某种误读。受此影响，几十年来大陆书本和影视作品中的长征胜利，或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取得领导地位之结果，或是数万红军官兵艰苦奋斗精神之成功，却鲜有人注意到在此背后许许多多更为复杂，有时更为关键的各种人和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甚至将起了拯救红军命运作用的西安事变与红军长征的历史割裂开来，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慨良多。

问：提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这时在对中共命运至关重要的统战策略问题上的作用，我们发现您在自己的研究中似乎非常重视中外关系方面的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几个例子，包括您在《中苏关系史纲》一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受到俄国革命及苏联内外政策巨大冲击和影响的情况，也都显示出您对近现代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及其国际政治内在联系的高度关注。我的问题是，您对外部世界冲击的重视，以及对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性的强调，是否会导致“西方中心论”亦即“外因决定论”？

杨：我想，用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复杂现象，都是不可取的。“西方中心论”行不通，“中国中心

论”也一样太过简单化；不仅“外因决定论”难以普遍成立，就是“内因决定论”也同样解释不了所有问题。我所感兴趣的，不是找到某种万能试剂，把复杂的历史现象分解成若干化学成分，或是去测定出其中的DNA。我最希望自己做到的，是能够借助于我的专业知识，通过理性的分析和文字的描述，比较真实地再现一段又一段历史。我不会在意何者为“中心”，何者来“决定”。不会因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就去想象中国比西方更文明；也不会因为中国传统经典里没有“国民”和“共产”的概念，就认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只是一些舶来品。说实话，对于今天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来说，让自己走近真实、“还原”历史，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了。我们始终觉得，我们这代人因为距离过去的历史很近，很多思想、文化、意识和观念相通，因此理解起前人来还比较容易，因此有责任在“还原”历史方面多吃一些工作。理论方面、更宏观性的工作，如果需要的话，只能留给后来的人来做了。

问：您是否认为，历史研究中根本就不应当涉及对是与非的价值问题的讨论呢？可是我们在您写的《内战与危机》一书里特别注意到，和过去革命史观全面否定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相比，您似乎相当看重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过的历史作用，比较您分析说明同一时期导致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的种种问题，这一印象尤其强烈这是不是说明您也并非不重视价值判断？

杨：其实，不论强调还是不强调，喜欢还是不喜欢，一个传统的中国必然会走向现代，这本身就包含着某种价值观在内了。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格外强调问题意识，强调研究者要能够从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的角度，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来回答人们今天所关心的种种问题。这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对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过程，有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认知。比如，注意到胡主席提倡“八荣八耻”、数百万民众热购于丹的《〈论语〉心得》，不少学者就会思考：中国的传统

文化是从何时开始缺失的，到底是科举的废除使人们逐渐告别了经典，还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割裂了传统与现代，亦或是中共建国后全面引进苏式教育模式和破除“四旧”的意识形态运动，导致了黄钟尽毁？比如，注意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逐渐开始推行法制建设，大量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一些学者就会发出疑问：何以中共建国后几十年，除发布一婚姻法和宪法外，民刑商诸法皆无，其原因何在，影响如何？从晚清到北洋到南京，历届中国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成绩几何，不足几何？从中国现代社会演进的角度，这种历史的中断和延续，包括比较新法与旧法，又有什么值得汲取的经验与教训？显然，这种问题意识中都存在着明显的价值判断在内。而左右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的这种价值判断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肯定基于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社会必然的一个发展趋势。而它所带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冲击与裂变，势不可免。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问题，更多地不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之间的冲突对抗的问题，而是谁在何时何地如何应对了社会向现代转化，以及这种应对的方式和结果如何之类的问题。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客观地描述和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理所当然的。依据不同党派、社团、人物在整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态度及其作用，突显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种种矛盾冲突和文化碰撞的复杂性，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问：您在《内战与危机》一书中不仅着力描述了1927~1937年的中国政治史，而且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领域也用力甚多，这是否也是您想要借此来突显南京政府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中国迈向现代国家过程中所起过的作用呢？

杨：也不尽然。传统的通史写法更多地侧重于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对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教育、科学学术等等注意不多。但近二三十年来通史研究著作已经较多地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多侧

面和多层面，尤其是近些年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兴盛，更是推动了人们多维度地了解历史的强烈兴趣。任何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由许许多多无穷无尽的相关的人和事所构成的。一个社会也好，一段历史也好，原本就没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等严格的区隔与分野，所谓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等，不过是后人为了研究的便利人为地分类梳理出来的。因此，真的要想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应当注意到历史发展和影响这一发展进程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严格说来，我虽然在这方面用了点儿心，尽了点儿力，但因为我的研究一向较多地侧重在政治外交史方面，因此在你所提到的那些方面我自认为着力还非常不够。因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十分欠缺，因此本书中这些方面的努力更多地还是建立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的。而由于目前涉及这一时期的这些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能找到的多数研究也不很深入。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书中这方面的研究尝试令人满意。

关于民族国家

问：在《开卷有疑》一书中，您几处都谈到了落后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在《内战与危机》一书中，您具体地谈到了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尝试和努力。但是，今天的大陆读者多半仍旧难以完全摆脱革命史观的思维方式，而容易习惯于从谁更革命的角度来看待当时的国共两党如果让您在这里做一个概括的话，您认为应该怎样评价1927~1937年这一阶段国共两党的成败得失才是适当的呢？

杨：其实“革命”是一个用得很滥，却歧义甚多的字眼儿。古语中的“革命”，讲的是改朝换代。而我们长期生长在大陆的人今天所理解的“革命”，则多半是和被压迫阶级的暴力斗争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说谁更“革命”，就意味着说谁在对付压迫阶级的问题上更暴力。因为即使改过朝、换过代了，也还有继续压制旧阶级反抗，亦即

继续革命的问题。但对于当年的国民党人来说，“革命”则更多地只是创建和维护一个在他们领导下的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代名词而已。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简单地搬用“革命”这一字眼儿来衡量进步与反动，显然麻烦多多。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衡量标准可用呢？有。那就是实践的标准。实践证明，1927~1937年中共在政治的和军事的斗争中虽然有过局部的和短暂的成功，但其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和阶级革命的政策在总体上是失败的；国民党在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中虽然有过部分的混乱与部分的失败，但其创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努力，在总体上却是成功的。至于这个时期的国民党为什么成功，而共产党为什么失败，自然是与这个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向现代国家转变这一特殊历史课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国民党适应了并且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实现，因而虽然面临种种重大内外挑战，却依旧获得了成功。共产党则因为没有适应并且妨碍了这一课题的实现，虽然代表了部分民众的利益，却因为脱离了更大多数的民众，而归于失败。有关这方面的逻辑问题，胡绳先生有过很深入的剖析。具体的史实问题，我的书中也有很细致的说明和交待，这里亦不必多言。

问：您怎么看这个时期国民党创立统一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代价问题？比如，我们究竟应当更多地强调国民党在统一中国问题上的贡献呢，还是应当更多地批评它所建立的一党独裁的专制体制呢？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包括民族化和民主化两个方面，而中国从近代开始向现代国家方向迈进之日起，几乎所有当政者都高唱民族主权而压制人民主权的实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杨：依我所见，是工业化水平过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还不存在一个由于在经济上担负了国家的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能够产生极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欧洲民主国家早年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情况有着极大的不同。欧洲各国走向现代社会，逐渐从承认人民主权发展成为民主

制度，根本上在于在他们那里早已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第三等级。凡是盛行商品经济的地方，自然也就信守等价交换原则，知道权利平等是维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所在。中国之所以无法像当年法国那样，首先把人权、民主、自由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就在于在国内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各种势力，熟悉的只是强权和特权，是权利的不平等，他们既没有等价交换的意识，更不懂得权利平等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要求他们良心发现，来限制自己的特权地位，而给人民以取消自己特权的权利呢？列宁当年所谓俄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少的论断，正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和世界其他落后国家。事实上，上百年来，凡经济落后国家，都有此种痼疾，并非中国所独有。消除此痼疾别无他法，只有发展资本主义，使经济成长达到相当水平而已。当然，此种发展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某宗主国或某强国主导该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渐实现之。一种是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获得民族独立和统一，造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加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市场之中，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进而由经济而政治，逐渐提出各种权利要求，最终改变专制体制走向民主。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对国民党在1927~1937年间统一中国的尝试与努力，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蒋经国1987年能够自主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促成民主政治，未尝不是这种内在的逻辑力量作用的结果。

（本文由《南都周刊》记者谢海涛书面采访，经杨奎松先生修订提纲并作答复。）

中共革命胜利的偶然与必然

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家多少有一种观念：中共回应了国内的土地危机，革命成功有其必然之处，但从历史看，中共多次在存亡之际能够扭转形式，实属偶然，如1935年毛在大公报上发现陕北苏区的存在，又如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如果不是这些偶然的事件，历史的面貌将有很大的不同——既然如此，那种将革命及其胜利看作是必然的观念，又是从何而来呢？

答：历史的发生是偶然，是必然，原本就要辩证地看。有些偶然里面有必然，有些必然里面有偶然。比如1935年中共中央北上甘南进入陕南时从《大公报》上发现陕北苏区的事情，看起来很偶然，但这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北上和接通苏联的方针联系起来看，又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陕北苏区就在中共中央北上的方向上，只要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方针，读到报纸，发现陕北苏区，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样，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从停止蒋“剿共”军事，实现二度合作的角度看，确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西安事变所以会发生，又和中共政策转变，一年来策动张、杨联苏反蒋抗日的统战工作密切相关。张学良半年多前就已经在与中共密谋发动西北事变，只要蒋无法帮助张回东北，且又坚持逼张“剿共”，以张之处境、性情和对联苏抗日的渴望，斥诸兵变手段，也就不纯粹是一种偶然了。

同样的情况，看中共的胜利，也要看到事情的两面。即既要看到其胜利的偶然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胜利的必然性的一面。中共的胜利，有没有偶然的因素起作用呢？当然有。比如，中共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毗邻共产党的苏联。我们看历史地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点，即除了一个60年代初的古巴以外，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围绕着苏联建立起来的。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情况呢？这说明，地

缘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国与苏联毗邻，这是便利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但说因为这一点，中共革命就一定成功，却未必。

以芬兰为例，芬兰不仅与苏联毗邻，而且久为俄国和瑞典分治，19世纪初完全被沙俄所统治，十月革命后才乘机独立。苏联强大起来后大力扶助芬兰共产党，甚至出兵芬兰，扶持芬共建立起分裂政权，芬兰却始终保持了独立的地位，顽强抵抗苏联的入侵，没有变成共产党国家。芬兰共产党所以不能通过苏援而成就其革命，一个根本原因是芬兰人口中多数是因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而获益的农民，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且坚决抵制苏联并吞芬兰的企图。这说明，外援或外部力量的作用，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它多半要与一个国家内部的条件和需要相适应，才能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毛说内因是根据，没有错。

中共为什么会在中国成功，当然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中共里面出了一个毛泽东，比较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革命，可以说这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并不是中共有了毛泽东就一定会成功。哪有那么简单？过去中共党史把遵义会议抬得很高很高，好像因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一个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共革命的命运就由失败走向成功了。但是改革开放后很快就发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推举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新的最高负责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留苏学生张闻天。而且，遵义会议只是批评了过去的军事路线，也没有讨论和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因此，中共重获生机，根本上靠的并不是遵义会议。如果没有1935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红军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主张坚持北上，能够看到那张报纸，找到陕北苏区，也很少存活下来的可能。如果没有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不出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还是难免牢狱之灾。传统的党史解读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把中共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和党的领袖个人的作用直接挂起钩来。给人印象，领导人选错

了，革命就寸步难行；领导人选对了，革命就一往直前，显然太简单化了。

其实，讲中共成功，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讲。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失败。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和中共党史传统的写法正好相反，它是把中共的成功完全归结为苏联的帮助和阴谋。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讲苏俄的作用，苏俄历史上两度大力支持过国民党，援助国民党的力度还曾经远超过它援助共产党。说起来国民党无论历史的经验、影响、实力，当年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它的政策对头，自己争气，中国根本就没有中共革命成功的条件和可能。问题是国民党自己的政策很失败。蒋介石后来总是抱怨上了苏俄的当，并且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两度与共产党合作。可是当年同样也是毗邻苏俄的土耳其，为抵抗欧洲协约各国的压迫，凯末尔党人也接受过苏俄的援助，也曾和土耳其共产党合作过，结果它成功地赢得了民族独立，却没有造成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出来。如果我们考察国共两度合作的历史，中共也并不都是因合作而壮大成功的。第一次合作就是以中共失败而告终的，如果不是国民党自己四分五裂，内战不断，导致外敌入侵，中共也很难有发展的机会。事实上当国民党内部基本上统一起来之后，虽然仍有外敌压迫侵扰，1934年以后国民党还是打败了共产党。国共第二次合作虽然便利了中共东山再起，但战后国民党还是执政党，各方面依旧占据着统治地位，至少在战后两年时间里未必有谁相信共产党有打败国民党的可能。因此，考察历史可知，国民党的失败，根本还是败在国民党自己，败在蒋介石身上。

对于共产党来说，你说这算是偶然呢，还算是必然呢？

国共实力的大逆转

1945-1949年之间，国共双方力量突然发生逆转。原因众说纷纭，您在书中几处作了回应，比如中共接受的外援数量，以及土改在动员

中扮演的角色，都和以前流行的看法相反。您觉得国共实力逆转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答：我们看国共实力逆转，必须要从抗战看起，不能只看战后几年。从抗战结束后的情况来看，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出现某种势均力敌的态势了，不是战争结束时中共力量弱小，因为土改，或因为苏联援助，一夜之间才突然壮大起来的。光是看公开的资料就可以了解，1945年战争结束时中共光是正规军就已经发展到120多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已经有三四百万，它并且控制着连接东北的通道和包围着北平、天津、青岛、南京、上海的大片敌后根据地，形势不是对共产党不利，而是对国民党很不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日本人占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把国民党的军队逼到云、贵、川、陕等边远地区，日本一投降，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共产党就近进据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那样一来，就麻烦大了，因为共产党一旦占据了城市，瞬间就会扩充和强大起来，再靠武力来和共产党夺取那些地方就太困难了。因此，日本天皇正式宣告投降当天，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延安的毛泽东，邀请他去重庆谈判战后国内和平问题。毛拒绝后，蒋又两电恳切相邀，同时通过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命令驻华日军只能向蒋的军队投降，还通过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安排美国海空力量帮助，紧急运送国军前往华东、华北和东北各中心城市。由此就可以看出战后国共实力对比上国民党存在着很大的弱点。

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虽然国民党正规武装在兵力上仍两三倍于中共，装备也先进得多，但计算地理条件、部队士气及其作战力，双方力量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更重要的一点是，经过1944年国民党中央军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特别是中共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号，赢得中间党派广泛支持之后，无论从哪方面，毛泽东都已经有了挑战国民党统治的底气了。还在1944年12月，即日本投降前8个月的时候，他就在内部批示中写过一句话，叫“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

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到与斯大林的恩怨的时候，最不满的也是抗战结束时他拒绝了蒋介石去重庆的邀请，斯大林却打来电报严令毛一定要去。他对此十分气恼，说斯大林这是“不许革命”。这意思也是一样，即他在抗战结束时其实已经做好了和国民党一较高低的准备了。从日本天皇正式宣告投降后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部署，特别是指示各根据地组织夺取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中心城市的军事行动的情况即可看出，如果没有苏联干预，他很可能下令会发动夺占这些城市和收缴日军武器的作战行动。而这一步骤显然是冲着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去的。

从这里我们不难注意到中共利用与苏联的“同志”关系，抢在国民党军前面大举进入可以三面背靠苏联的中国东北地区，其作用影响会有多大。直到1945年底，中共全力以赴派进东北去的，不过10万人，几个月后就扩展到40万。1948年9月进行辽沈战役时已发展到七八十万人，原来没有的各种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几乎应有尽有。不论今天人们怎么计算苏联战后在军事上给中共的援助数量，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没有中共在抗战期间的迅猛发展，以及充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地位，中共战后就没有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条件；第二，如果中共战后不能进入东北，它也就很难迅速完成军事装备上鸟枪换炮的现代化转变，更谈不上在两三年内从10万近乎徒手的军队扩充成近百万装备齐全、供给充足，可以靠火力和国民党美式装备的军队一较高下的强大军事力量。关于东北战略地位的这种重要性，毛泽东还在1945年三、四月间中共七大会上就再三强调过了。他清楚地讲到两点：一是强调苏联援助的必然与便利；二是强调进东北后可取得三面背靠苏联和掌握日本重工业条件的意义。他讲得很清楚，只要我们进了东北，哪怕其他根据地都丢了，我们也能够更大规模、更大力量地打回来。后来的事实很清楚地印证了毛的这一预见性。

当然，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要想成功，还必须要有蒋介石帮忙才行。今天读这一段历史，大概最让国民党人扼腕叹息不已的，就是蒋介石当年的种种错误决策了。坦率地说，战后东北从法理上并不是中共的，而是国民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14日苏联政府与蒋领导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明确约定苏军三个月内撤出东北，交蒋介石国民政府接收，而且苏联一切援助都只能给国民政府。因此，中共北方根据地的部队虽然距东北仅一步之遥，最初却不能名正言顺地开进东北。就连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冲突，开始都无权介入东北地区的问题，因为国民党坚持那是主权接收的问题。中共方面初入东北因不很顺利，想要苏联帮忙，争取让国民党承认它在东北可以插上一脚，苏联因与国民政府签有外交条约，也明确予以拒绝。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战后东北并不就是中共的囊中之物。由于背后有美国军事上的大力支持，有几十个师可以得到全套美式装备，蒋介石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完全不把共产党的“土八路”放在眼里，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存在。也因为太过依赖于美国，尽管苏联方面最初曾经设想用不在东北扶助中共为条件，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确保苏联利益的双边协定，让政府军顺利接收东北，却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换句话说，至少在战后半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不仅有过全面接收东北的条件，而且有过多次可以合理合法地控制东北大部的机会，却都被蒋介石自己轻易丢掉了。中共武装在东北的迅速壮大，并能通过东北大力援助关内各根据地对蒋作战，导致国民党军事上日渐转为劣势，两党军事力量彻底逆转，蒋介石国民党自己昏着错着连连，不能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

您的《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一文是15年前首次发表的，再次在本书中发表时，讨论“新民主主义”似乎面临着很不相同的语

境。为此，你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你觉得有必要特别提醒今天的读者什么？

答：去年以来有不少人又开始在谈论新民主主义，虽然谈论者的意图不一，但大多数以此为话题的谈论者显然都对1940年代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方针有很高的评价。中共在抗战中成功赢得人心，改变国共在政治上的力量对比，高举新民主主义的旗帜，用一些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温和政策，对内对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就中共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当年的历史作用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我是赞成的。我当年写这篇文章，针对的是那种把这一政策主张当成一种先验的理论建构，并赋予它原本没有的国家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说法提出商榷性意见。重新发表这篇文章，也是因为我注意到，今天人们的讨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倾向和观点。

我想提醒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注意的，其实还是一个历史方法的问题。即我们虽然应该注意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但是不能简单地把二者混同起来，更不能不顾历史事实，想当然地把某一个历史阶段的情况理想化、概念化，然后拿来用在当下。第一，毛泽东当年提出这一政策主张，很大程度是基于国共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的，因此，它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策略构想的政策阐发，而非深入的理论思考和长期的战略构思。第二，“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就其质的规定性，即“民主主义”一点而言，属于中共革命“两步走”中的第一步，在中共二大就有明文规定。毛所以要加一个“新”字，只是想要强调领导权的变化。这是因为，抗战几年来，共产党一直公开承认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地位。这个时候毛泽东相信这一情况需要改变了，中国革命应该走向由共产党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方向了。因此，也是第三，新民主主义政策主张的提出，在当年显然是基于阶级斗争思维的一种进攻性步骤，它要质上不过是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经验的一种继承，其中心内容也是对斯

大林和共产国际本来主张的一种延续。1926年底和1927年初，斯大林、共产国际就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当时就曾提出过把武汉国民政府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设想。

了解到这一点，就应该看到，这一基于“两步走”方针和阶级斗争思维而形成的政策主张，和当时国共斗争力量对比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会提出新民主主义主张，基本原因就是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和3年前共产党只有两三万军队，必须服从于国民政府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但是，1940年中共也还只有40几万军队和只在敌后农村占据着一些根据地，因此，毛泽东虽然大胆地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但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差距还比较大，故他在“共产党领导”这几个字的后面还不能不小心地加上了了一个补充性的说明，即“或参加领导”的字样。这说明，毛泽东提出这一新的政策策略方针的时候，都是特别注重现实的力量对比的。一两年后毛泽东再改《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时，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和两党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就把这个“或参加领导”的说明删掉了，明白地写上未来中国政权要由共产党一党领导的要求了。由此亦可看出，这一政策主张的提出，根本上是毛泽东基于当时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着眼点更多的是侧重在策略上。

由于新民主主义不是毛泽东对未来中国前途的理性思考，而是一种策略步骤的政治表述，因此，我们只要稍微细心地考察一下毛1940年的这篇文章和以后的各种相关言论，就会发现，他提出新民主主义主张的时候，很多认识都不完善，连一些重要的政策概念都没有做过充分的研究论证。

比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初成时，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判断就很不成熟。文中反复强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亦即“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竟不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毛泽东

当时依据的基本逻辑是：“资产阶级必然叛变”，因此，他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一说中的“几个革命阶级”，并不包括资产阶级在内。毛泽东当时认为，将来只有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则是反动的。这一政策主张发表了半年多之后，毛泽东才开始注意到这一理论判断在现实政策上不恰当，因为抗战条件下策略上不宜把国民党各派力量，尤其是不宜把各中间党派、地方势力，包括工商资产阶级，笼统地当成资产阶级排除在团结的对象之外。1940年7月之后，他才开始考虑通过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的办法，把蒋介石划入到“大资产阶级”当中去，把国民党反蒋派或地方实力派等等，划到“民族资产阶级”里面来，继续当作团结的对象。类似这样的内容变动还有很多。由此也不难了解，毛泽东何以从来不曾把“新民主主义”当成自己重要的理论或政治贡献，何以1949年进城以后不久很快就开始抛弃掉这一概念了。

把被毛泽东抛弃掉的政治概念拿来应用到当下政治生活中来，不是不可以，问题是要先彻底清理旧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重新建构一套新概念的内涵和逻辑，不能简单地把两者混同起来，甚至简单地把旧的东西拿来套用到我们今天已经大大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来。

今天我们如何读史？

您在《读史求实》的前言中特别提出要警惕“剪裁历史来适应我们的主观愿望”的做法，您觉得这种做法的有害之处何在？事实上，通过重新解释历史，为现实政治寻找支持，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做法——康有为写过《孔子改制考》，斯大林编写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根据历史阶段论的需要划分中国历史的社会性质——历史学者是否有义务去面对、澄清和批评这种做法？

答：“剪裁历史来适应我们的主观愿望”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剪裁者的目的就是为政治服务，他们真的相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一种是盲目的、无意识的，剪裁者本身只是意识形态色彩太强，他们认定一种逻辑，一种历史，就听不进，也不想听任何其他的逻辑，或别样的历史叙述。无论哪一种，同这样的人都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也没有什么历史真实可以争论。这就有点像台湾今天的“深蓝”、“深绿”一样，相互间完全没有什么共同的价值判断，无论什么历史、什么真相，对他们来说，恐怕都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现实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当然不会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考量，但是，他们多数并不研究历史，或只是对很少部分历史情况感兴趣，因此，面对虚假的历史宣传或概念化的历史灌输，他们能够辨别真假的条件十分有限。坦率地说，类似的问题或困惑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不仅仅发生在高度注重舆论一律的共产党国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还是会有大同小异的类似情况。前两年引起过热议的詹姆斯·洛温著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一书，就揭示了像美国这样的崇尚自由思想的国家，教科书和好莱坞大片一样，经常会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谎言。我想，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恐怕不可避免。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不能缺少有良心、讲操守、重学术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历史研究学者。官方可以有官方的历史解读，信奉某种意识形态者也可以有自己的历史解读，但是，任何一种历史解读都不能替代基于学术独立的研究学者的历史解读。虽然，历史学者的历史解读未必能够成为社会主流一致的看法，但它们所包含的较强的科学性、客观性，较少意识形态色彩和较强的批判意识，至少会对这个社会去意识形态化起到一点应有的作用。

在现当代史领域，如果说学者和通俗作家之间常常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何专业学者对待历史材料的态度和结论也往往大相径

庭？比如，对党史和国史，您在书中就同时批评了通俗作家的演义倾向和同行的曲解倾向。

答：这并不奇怪，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时空和环境之中，有太多可以影响人的判断的因素在起作用，包括人与人的性格、经历、学养和眼界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怎么可能要求大家都保持在同一种水平之上，或一定会对一件事情产生出同样的看法呢？

有差别是再正常没有的了。学者和通俗作家间的这种差别会很大，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双方写作的出发点就很不同。只要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因为存在差异而大惊小怪。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差别，也不能因为《三国志》更接近历史真实一些，就以《三国志》为依据去否定《三国演义》。它们根本就不是可以放在同一标准下进行衡量评判的东西，两者的服务对象完全不同，其社会功能也完全不同。至于说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太大，以至于许多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历史真实，几百年过来了，事实证明这种误导的作用并不大。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所有真正学历史、读历史的人，还是不会把历史演义故事简单地当成历史来看待的。因此，我其实也并不特别看重通俗作家的演义倾向，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一种技能和生存之道。对于同行曲解历史，甚至演义历史的作法，了解其中问题的学者就不能不批评了。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学者，无论是否历史专业学者，总要遵守学术研究的规范和基本的学术要求，特别是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以讹传讹。

学者的情感和历史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对史料的想法和利用方式？一个研究现当代史的学者，他的实际生活和他的研究对象关系如此紧密，他如何做到冷静和客观？从《史记》到正在编写的《清史》，历史学家似乎都认为自己当代实际政治负有严重的责任，这是使命感所致，还是一种自我认知的错位？

答：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时间困扰着史学理论的话题。谁都知道历史研究要尽量客观，只有尽量客观才有可能在历史解读时保持不偏不倚。我们通常所讲的要学会换位思考，陈寅恪讲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对古人有同情之理解，都是强调要客观。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历史学者，都是实际生活在当下社会里面的，无论如何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或情感的影响。换言之，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主观倾向性，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价值观肯定和古人的价值观会有很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对于一些历史现象，要求一些当代学人解读评论时保持冷静，都会变得很难很难。更何况研究现当代历史，许多事情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今人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甚至是情感上的联系。由此带来的麻烦就更多、更直接。与此同时，历史学者固然研究的是历史，但他到底还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分子，他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评估体系到底是和现代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就一定会有社会责任感，也就不免会有程度不同的社会使命感，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现实的以及历史的问题有独立的批判意识与鲜明的价值判断。这些都难免会影响到历史学者看待历史的客观性。

但是，历史研究毕竟有其独特的学术方法与规范。记得八九十年代，大多数研究现当代史的文章著述，都没有，或很少引文和注释。我九十年代末出版《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时，出版社也还特别叮嘱尽量少加注释，我坚持要注释引文出处，他们最后也都处理到每章末尾去了，无论如何不让注到页下去，说是怕影响读者阅读。一直到2000年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凡是带注释的，哪怕人文类的学术著作，出版起来都非常困难，销量很小。而最近这几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读者的文化程度明显地提高了，虽然多数读者并非受过人文学科的教育训练，但大家都认识到一点，即对于

历史研究来说，一定要读那些严格地按照学术规范，讲究证据的著述。有大量引文注释的著作现在不仅好销，而且迫使过去完全不讲究这一套的通俗刊物，如今也动不动就在文中加上几条引文注释来了。这种情况不仅说明历史学者对学术规范的坚持是有效的，而且说明，这些规范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研究者在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为什么说历史研究的引文和注释有这么大的功效？这是因为，历史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证据（史料）。胡适讲：研究历史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们也经常告诫学生：写研究论文要尽可能做到“无一字无出处”。原因就在于历史研究就像警察破案一样，必须掌握足够的证据，必须能够用拼图的方法，使各种证据相互之间形成合理的逻辑联系，证据的可靠以及证据链关系的严谨至为关键。因为是凭证据（史料）说话，因此，研究历史的能力高低拼的就是一个搜集证据、分析证据和论证证据关系的能力，而不是看你能提出怎样新鲜的观点。虽然围绕着证据本身还有许多技术上需要注意的研究论证的地方，历史学者也未必每次举证都十分严密，不出一点错误，但是，只要你举证并注明出处，别人就可以就你举证的可靠性进行同样规范的考证，甚至可以追寻你的证据的出处查看你引用举证的内容是否准确、可靠。你举证或引用过于片面，别人找出不同的证据，就很容易攻破你的举证，你的研究在学术上就会被否定。如此形成的查证、论证、商榷与质疑，最大限度地限制了研究者造假和把历史简单化、片面化的作法，因而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迫使历史学者必须要注意保持研究态度的客观性。

在当下意识形态氛围浓厚，而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的情况下，重实证的历史研究因其比较客观冷静，反而更能够给关心国事的读者在思想上一些答疑解惑或举一反三的帮助，其原因就在于这一点。它未必能够针对当下的问题提出什么解决的办法，但是它对当下问题的历史

由来及其经过和原因的解读，因较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研究方法更少主观性，更多些客观性，反而容易让人多方面地进行冷静的思考。

（原载《南方周末》，2012年4月20日，副刊；《新民周刊》2012年第17期）

[国共关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21\]](#)

中国现代史学家杨奎松说，你读的史料越多，越会发现当今的宣传或教育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从小我们受到的教育会把蒋介石看成是“反革命”，杨奎松却告诉我们，蒋介石不仅不是个“反革命”，还是个“革命”狂人。所有这一切的改变，都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和原因。杨奎松还告诉我们，一向高举阶级斗争大旗的毛泽东其实也曾多次公开或者私下里讲到要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

最近，由杨天石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丛书第一本《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出版。这本书由中国现代史学家杨奎松撰写，从国民党的角度深入论述了自1921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几次“联共”、“反共”，到最后国共内战的历史时间，深入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与发展。此前中国大陆关于国共关系的论著很多，但绝大多数是从共产党的视角展开研究的。杨奎松这本书被称为这类书里的“开先河之作”，因为他首次以国民党的角度进行研究与论述。作为历史研究，“公正客观”是第一要义。杨奎松的这本书，无疑为海峡两岸学者与公众客观看待国共关系史，开启了重要的一扇门，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只讲自己一方的道理，很容易把对方抹黑了事

问：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写国共关系史，最大的局限在哪里？

杨：简单地从共产党保存的档案来研究国共关系史，难免会形成自说自话的*—《南方都市报》访谈录情况。因为共产党方面的档案所记载的多是共产党方面当时如何想如何做，以及如何猜度国民党，至于国民党在想什么以及从国民党方面看国民党这样做或那样做又是因为什么，肯定弄不清楚。如果在感情上和态度上也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历史，只讲自己一方的道理，就更容易一味地把对方抹黑了事了。这种研究的结果，很多时候连文献史料也无法准确地解读。

举一个我们过去所有谈国共关系历史的书都会提到的一个例子。1923年11月29日，华侨出身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邓泽如领衔上书孙中山，揭发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组织员，负责帮助国民党起草政纲党章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经常与共产党人陈独秀等集会，故他们怀疑“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进而认为“为苏俄政府所给养”之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对此，大陆几乎所有相关书的解释都是一样的，即说孙中山非常气愤，“亲笔在上书上逐条批驳”。但大家在引述孙中山批语的时候，却只引述孙中山解释为什么要鲍罗廷帮助起草这些文件的词句，却不引述孙中山尖刻批评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文字。给人印象，孙中山在这里表现了强烈的联共的意图和决心。为此，有的书还不分时间条件地点地举出时人回忆孙中山的话，说孙表示国民党人如果都不支持他的联共主张，他将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这就更加强化了这种说法。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来读这段批语，就能够很清楚地发现，孙中山并非对邓泽如等的担心毫不介意，他对共产党更不是毫无介蒂。孙在批语中讲得很明白：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陈独秀等并未与闻其事。陈等“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想要包揽与苏俄的交往，甚至想要阻止苏俄不与国民党往来，以便“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好在苏俄党人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受此等少年学生所欺。早就窥破其伎俩，并逼迫其加入国民党。可知“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他并且要邓泽如等放心，表示绝不会听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自行其事，甚至告诉邓等：“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

不顾史实，片面地解读历史，不仅会使读者距离历史真实越来越远，而且还会持续地制造出一代又一代在历史认识上尖锐对立的糊涂

读者。

读的史料越多，越会发现虚假的东西

问：你毕竟也是在大陆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对你的观念意识是不是一种挑战？

杨：我举一个例子：我当年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读到当年报上所载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诧异于一向高举阶级斗争伟大旗帜，从来反对妥协退让的毛泽东，何以会在报告里大讲如何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的问题。为此我曾不解地问过一位老教授，没想到他给我的答复竟然是：

“这是斗争策略。”我紧接着问道：“那这不成了搞阴谋了吗？”他毫不含糊地告诉我：“对阶级敌人就是要搞阴谋！”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当年读史料时确曾有过你所说的这种观念意识面对挑战的问题。因为那时长期所受的教育都是正统的，猛地看到历史上领袖的言论做法与我所得到的知识不一样的时候，难免会有理解上的疑惑。但是，做历史研究的一个好处就是，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要去面对历史的真实，而且这种真实在相当程度上只要你肯用心去读第一手的史料，就不难逐渐有所发现。你读的史料越多，自然也就越会发现当今的宣传或教育有许多虚假的东西。即使你不去关心为什么的问题，你也注定会像我当年那样，会想尽办法去搞清楚：到底是那位教授讲的对呢，还是存在着其他什么原因？我的进一步研究使我逐渐发现，教授的答案其实并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毛泽东当年有很多类似的言论，这些言论有些是公开的，你可以说那是讲给外人看的，是策略。但也有很多是在自己人内部讲的，说这些话也是讲给外人听的，是策略，就说不过去。再结合毛泽东在多年以后所做的自我批评，比如说抗战初期幻想改造国民党，后来证明改造不了等等，就会或多或少地看出，其实毛泽东也是人，也一样会有在不熟悉的环境条件下学习摸索的情况。我

们既不能把他看成神，好像什么他都能未卜先知；也不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心地阴暗的阴谋家，总是想方设法算计自己的对手。

问：杨天石说过，他对蒋介石的研究受过反对和攻击，您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杨：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却不是不可理解的。连我们自己研究历史的人，对历史的认识都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何况那些不研究历史，更多地只是凭借个人经验和根据个人感情好恶出发来判断历史是非的普通读者呢？每个人的出身、教育、经历、学识及其生长环境都有不同，每个人的利益所在及其关注的重点也会有所区别，这些不同和区别难免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是非判断及其历史观，何况现在的教育宣传仍旧未着重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做调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是十分正常的一种现象。很难认为这是怎样的一种压力。

还原不是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会更侧重于解释

问：即使在写“三二〇”事件、“四一二”事件、皖南事变、四平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我发现你没有花太多笔墨在事件本身，而是在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以及发展走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法？是否一直以来人们对不少历史事件的认识都存在误区？

杨：我研究历史，一是注重还原，二是注重解释。在我认为还原不是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会更侧重于解释。我并非没有花任何笔墨去交待事件经过，其实很多事件我都做了详细的交待，比如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如果不详细说明它发生的经过，只是按照传统的大陆上一些史书的叙述，那就无法厘清蒋介石是否有意要制造陷阱消灭新四军军部的问题。相反，只有细致地交待清楚当时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才能一一证实我对事件发生原因的新的判断与说明。而有些事件我采取了简约的写法，比如西安事变，一来是我有专书研究这个问题，不必在这本书里大段去重复，二来是我所讨论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着重讨论的对象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并非地方实

力派，故不打算面面俱到。至于历史解读的误区问题，我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年对国民党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一种大是大非的观念来进行的，不存在实事求是的问题。

问：您还注意对人物进行分析和解读，比如书中蒋介石有相对丰满的形象：暴躁、任性、多疑、恪守传统礼义，有时候甚至“像个孩子一样痛哭”，您还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蒋介石的性格。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研究人的历史，不注重人的性格、情感、思想及其所生存的环境等对人的言行举止的影响和作用，就不可能客观准确地了解历史的由来与发生。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往往把历史空洞化，想当然地用阶级的理论或其他什么理论，把历史中的人仅仅看成某种符号，给人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不是讲张三李四如何如何，而是以讲张三李四的名义，去讲这个或那个抽象的阶级或抽象的符号，完全忘了历史中的每个具体的人物其实都是不同的。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正是与这个或那个历史人物的个性或他的情感、思想或视野、经验乃至职务、地位以及信息来源的情况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你提到的中山舰事件，如果换了是汪精卫，而不是蒋介石碰到当时那样的情形，我们就很难想象汪精卫会像蒋介石那样多疑和神经质，更难以想象汪会像蒋介石那样处理问题。

国民党人也曾是极端的爱国者和狂热的革命者

问：这本书新发现的史料多吗？又有哪些新的观点和结论是与以往研究所不一样的？

杨：所谓新发现的史料，可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指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史料，无论大陆，还是台湾，还是海外相关学者，过去都没有注意到，是我第一次发掘出来的。严格地说，这种史料并不是太多。二是指虽然过去已有出版或提供学者查阅，就史料所藏的档

案馆，包括刊发的杂志或资料书人所尽知，但鲜有人利用，或利用者亦未能发现史料的价值或未能正确解读，这类史料则是大量的。

关于这本书中新的观点或新的解释，我想比比皆是。除了个别章节注重的是具体的历史经过，侧重于说明史实本身以外，绝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在做不同于以往大陆国共关系史的历史解读。像我上面提到的那则史料，就是我对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问题重新解读的一个很小的例子。透过我的解读，你会发现我们过去对孙中山“联共”（实为“容共”）态度的解释，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如果你从什么书上读到过国民党“老右派”，或叫“西山会议派”的情况，相信他们是一些顽固的反共分子的话，那么你在读我这本书第二章的内容之后，相信你一样会发现你过去的认识大谬不然。同样的情况，如果你从小就把蒋介石看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话，你从我这本书的第三章开始，就会发现，蒋介石不仅不是一个“反革命”，而且还是一个“革命”狂人，甚至相当一段时间里连思想都和共产党人非常接近，他与共产党人也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关系。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不能因为蒋介石后来成为反共领袖，我们就想当然地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蒋介石本身。

问：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国共关系史，有什么现实意义？

杨：历史研究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政治或社会效益。但是，客观地研究、考察和叙述、说明两党关系的历史，特别是努力尝试着从国民党人的角度去解读国民党当年的那些历史文献与史料，从而去理解国民党人当年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各种复杂的考虑与原因，肯定是有益的。我们应该让读者了解，许多国民党人当年其实与许多共产党人一样，也是极端的爱国者，甚至是狂热的革命者。他们当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不同时期所以会你倒过来我倒过去，不是没有原因的。两党之所以会走上分裂、反目和你死我活的道路，存在着很多复杂的原因，并非一个简单的我对你错的问题。多

一些读者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复杂性，这个社会就会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少一些仇恨与极端。

（原载2008年3月23日《南方都市报》，采访记者为黄长怡）

注释：

[1]—《中华读书报》访谈录

[2]—《历史研究》座谈会发言

[3]——根据在《近代史研究》杂志举办的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整理

[4]《首届春晚：中国思想解放的别样风向标——总导演黄一鹤含泪回忆解禁〈乡恋〉：“人性，需要被表达”》，2009年9月26日《东方早报》，A20—21版。

[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0页。

[7]<http://www.jsbc.com/gddt/dt/297810.shtml>。

[8]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2007年9月17日《北京日报》第8版。

[9]《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2007年6月26日《人民日报》第1版。

[10] 《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北京奥运》，2008年8月18日《人民日报》第1版。

[11] 据2009年9月27日google搜索记录显示，“共产党”一词检索到的中文词条量为70.5万条，“人性伟大”为362万条，“人性”为2730万条。

[12] 《毛泽东致和森子升兄并在法诸友信》（1920年12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13] 这实际上突破了毛泽东关于“人性”和“爱”的观点。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54、871—872页。

[14] 林喆：《人性论、人道主义与人权研究》，《法学家》2006年第6期。

[15]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5页。

[16] 沃尔什著，何兆武等译：《历史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17] 转见王志耕：《从“文史不分家”说起》，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999>。

[18] 大卫·休谟认为，在进行权力机构的体制设计时，必须紧紧盯着人性的弱点，确保从制度上对可能存在的“无赖”进行严格的防范。

[\[19\]——大连新商报社读书周刊访谈](#)

[\[20\]《羊城晚报》访杨奎松访谈录](#)

[\[21\]《南方都市报》访谈录](#)

第二编 历史研究应有的眼界

研究历史在于反思我们的过去

1、关于革命和革命史观

南都周刊：这套书[1]的主题是“革命”，为何取这个名字？

杨奎松：这套书选的是我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史的四本书，主题就是革命问题，因此用“革命”一词加以概括，是一个比较好的想法。只不过，这不是我的提议，而是广西师大“理想国”编辑提出来的。

南都周刊：这套书中的“革命”，并非特指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

杨奎松：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以及《国民党的联共和反共》，都是试图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1920年代以来的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在我的历史观察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是中国的革命党，只不过两者选择的道路和追求的理想不同罢了。最后共产党胜了，国民党败了。

南都周刊：革命的含义，毛泽东说“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现在它的含义是不是有变化？

杨奎松：从我的观念来讲没有变化，革命一定带有暴力或强力的性质，任何各国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运动，包括孙中山、毛泽东倡导的革命，都是带有某种强力在里面的，它不可能是温和的、渐进的，否则叫改良好了。

南都周刊：您的书中提到了“革命史观”，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现在史学界研究的主流？

杨奎松：革命史观是相对于其他史观而言，如现代化史观、民族国家史观等。但革命史观其实也不尽然是大陆传统的阶级斗争史观，事实上国民党过去的史观，也是一种革命史观。只不过，在大陆过去讲革命，是从阶级革命角度着眼的，国民党则反对阶级革命史观，主

张民族革命史观。因为改革开放，大陆的学界注意到了生产力或现代化的进程的影响，特别是对传统的阶级革命史观提出了许多批评，认为它不能准确反映中国整个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与演进的方向，于是一度热衷于建构一种所谓现代化史观，想要从现代化的角度、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解构中国近现代历史，曾经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南都周刊：这两种史观之间存在对立吗？

杨奎松：这两种史观当然有很大不同，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联系，不管谈革命还是谈现代化，其实我们今天谈的革命都是现代的，都是在资本主义欧洲产生之后，从欧洲开始蔓延到亚洲，到别的国家。在马克思看来，革命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只不过他相信这个革命的演进过程核心的内容就是阶级斗争或阶级革命，哪怕是民族冲突，他也把它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也是共产党后来把中国革命，无论是民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一概等同于阶级斗争的一个原因。

南都周刊：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一二十年，革命史观在学界已经是一个相对较落伍的史观？学界的观念已经多元化了？

杨奎松：对传统的革命史观自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就在反思，因为所有人，包括官方研究机构也都认为，单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太过简单化了。而革命的“以暴易暴”，尤其让许多人相信，需要从根本上反思革命的必要性。现代化史观、民族革命史观等，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今天学界对近现代史的理论解读确实是多元化了。

从生产力变革和进步的角度来解读或描述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变化，这种思考有它的意义，站在社会进化论的角度，这种思考也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对中国来讲，不管你怎么思考，革命终归是发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辛亥革命之前的各种少数人的革命呼号与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尝试，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再到

19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运动，一直到1927年以后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和抗战胜利之后推倒国民党统治的军事革命，中国一直都处在革命的风浪之中。在中国20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起主导作用的也是两个以革命为旗号的政党。避开革命不谈，只谈生产力发展，显然不可能。硬把生产力发展与革命对应起来，也常常解释不通。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假如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讲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最先进的生产力在城市、在工厂，在国民党及其中央政府主导的区域里。蒋介石就特别强调国民党掌握着现代化。而共产党则长期在农村，其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民，为什么最后代表现代化的国民党败了，而处在落后农村的共产党却胜了？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光是这一点就解释不了。

用民族革命史观，抛开“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中国革命的一切可以不可以？当然不是不可以，问题是阶级斗争怎么摆？说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的产生都是为了基于“救国”的想法和动机，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谁胜谁败，关键在谁救国救得彻底、救得好，道理上似乎也说得通。这种解释的路径也非常符合现实，符合官方及不少网民的民族主义心理。但具体拿来解释当年共产党的种种政策及其转变的时候，拿来解释两党斗争及其内外关系的时候，还是困难重重，很容易出现矛盾的情况。因为，共产党人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是讲阶级斗争的，他们当年很多时候并不是从民族斗争出发的。中共第一个党纲，上来就是反对资本家政府，就是要和苏联一起实现世界革命的，以后一切斗争目标都是把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光讲民族斗争，什么都联系到民族或爱国上去，很多历史情况就讲不清楚，甚至不能讲了。

我们在看整个中国革命史的时候，会看到国共两党经常在争论谁更爱国。但正像毛泽东经常讲的，在阶级斗争的时代，爱国是有阶级性的，你爱国不能爱蒋介石国民党的国。这里面的逻辑及其由此造成

的种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是不能简单地从“民族革命”的角度去解释的，否则越解释就越乱，越说不清楚。

2、关于个人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路径

南都周刊：您自己的史观是怎样的形态？

杨奎松：我认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功能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即首先是要弄清楚史实，要告诉世人“历史事实”是什么。我不大赞同强化哪种史观，如果非要从某种史观出发，史家很可能会过于偏重某种既定的理念、逻辑和价值判断，而有意无意地过滤历史事实。符合你的逻辑的你就去讲，不符合你逻辑的你就把它撇到一边，甚至只重视一面之词，把不符合你的价值判断的都看成是错的。所有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即把很多史实都过滤了，按照研究者所认定的历史发展逻辑或是非去进行组合排列，自觉不自觉地吧复杂的历史现象弄成了一种简单的理念宣传，我认为这是过去现当代史研究中存在过的最大问题。

我个人更多重视的是如何还原史实的问题，而不是史观的问题。还原史实，不是不需要有自己的理念、观点和是非判断。有那么多历史，一个人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当然是一个主观的选择，这里面一定有个人的观念、喜好，和价值观在起作用。但这和基于某种史观，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来重构一部带有强烈主观倾向的历史叙述，完全是两回事。

我研究历史会本着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是“进化观”。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我相信社会就历史的长程来看，是进化的，而且是渐进的。短时间里，会有进有退，有急变有缓变，但从长程上看，历史是不会跳跃的，任何人为加速社会变革的尝试，都必须具体足够的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否则是一定要失败的。其二是我相信人的成长是渐进的，由人构成的历史是渐进的，后人对历史的考察与研

究也必须要与这一渐进的过程保持同一步伐，不能一成不变地看问题，也不能倒果为因地下结论。

第二是“人性观”，我相信“人生而平等”，不止从权利的角度，即使从人的善恶本性的角度来看问题，也不应该把历史人物简单地神化或妖魔化。“人之初，性本善”。人固有性格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能决定人后来的善恶取向。每个人后天生长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条件的影响更具决定性作用，再聪明的人都要经过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生理变化过程，他对事物的了解和应对也都注定会经历一个从不知道、不熟悉，由学习、认识、熟悉的过程。没有人可以预知一切，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可以不犯错误一贯正确。同样，任何政治人物，无论其所作所为给后人的印象如何，他都注定有其和我们这些无数普通人一样，很生活化的，甚至是充满人性的一面。因此，判断一个历史人物，必须要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下来理解和观察，对其所作所为的因果认定，也必须基于当事人所处的特定条件和环境，不能超越历史局限或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来讨论问题。

我强调历史研究这样的出发点，中心目的就在于我希望能够做到我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客观。我不会因为我有今天的价值观，就在历史研究中同情这个、厌恶那个，基于我的立场选边站。历史研究不能那么简单化。我一直强调，我们不能站在今天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上去评判历史、评判历史人物，就是因为我希望保持客观。比如我们今天说谁爱国或者谁不爱国，说谁革命或者反动，都是因为我们站在某一种立场、某一种观点上，片面的那么说。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国民党对蒋介石的态度，和他们看我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两边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看他们是妖魔，他们看我们也是妖魔，其实我们看我们的领袖，他们看他们的领袖，都是圣人，都是一样的。

南都周刊：通过这种“客观”展现的历史，会不会跟以前呈现的历史有冲突？

杨奎松：肯定跟传统的看法不会完全一样，但也不是绝对相反。我一直期望，包括跟我的学生也是这样讲，要学陈寅恪，做到“同情之理解”。就是说我要对自己研究的任何一个对象，要努力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尽可能地做到换位思考，即努力尝试着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来思考：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想？保持客观，不仅仅是为了评判；评判的基础是历史事实，要准确地和全面地还原某一事件的历史事实，你首先就要做到能充分理解构成事件的每一方，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所有关键当事人的角度和立场上来体会、来考察，来了解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只有理解了他们每一方，你才能比较准确地解释他的想法和行为反应。如果你只是站在预设的立场上，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先入为主地就认定某一方是坏的、恶的、居心不良的，那么他所有的行为在你眼里都是阴谋，你的解读也好，评判也好，自然也不可能是客观的了。

我写《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想要努力去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联共，又为什么最后每每一定会走到反共上去？你抱着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深入到国民党的各种史料中去，就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我觉得，只要基于理解的态度，很多历史上的事情都是可以讲通的，也很容易发现那些被今人划上各种政治符号的历史人物，也是完全可以基于常情常理常识来了解的。

南都周刊：什么时候形成了您研究的思想基础，是人大上学的时候，还是在中央党校工作之后？

杨奎松：实际上我觉得的两个东西发生过影响。一个是对传统理论的怀疑态度，这个是在文革后期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是在中央党

校，包括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接触了许多档案史料，意外地发现历史真实是可以通过扎实的研究来重现的。

南都周刊：据说在中央党校做研究的自由度，其实比外界想象得远远要大。

杨奎松：我是1982年到中央党校，1987年走的，那段时间胡耀邦曾主持过党校的工作，我觉得当时相对来说那里是比较宽松的。也正是在那几年里，因为改革开放的关系，当时正处在制定《档案法》的关键时期，中央档案馆那几年也是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候。我在中央党校工作，又有条件去中央档案馆查档，这种自由度或宽松度，到目前为止算得上“空前绝后”了。

南都周刊：读《革命》这套书，有几点感觉比较强烈。一个是您强调外部环境，而不是我们之前说的“内因”或“独立自主”；再一个就是偶然性，比如西安事变等各种偶然事件影响革命的进程，这跟我们以前一直强调的“必然性”不一致。您抛出这些观点之后，有没有遭到什么争议甚至是压力？

杨奎松：中共党史或者我们今天讲的革命史的研究，是受时间条件制约很大的一种研究。说白了就是，你离你研究的那段历史越远，你研究的自由度就越会大些。因此，研究这方面的历史，必须要打“时间差”。做这一行的人都知道哪些研究在政治上是受到禁止的，没有谁直接跳进去挑战它。尤其是在当初刚开始开放学术研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让研究的东西，你写了也发表不出来。但是，这些禁区的设置，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时间过去久了，有些过去禁止研究的问题就解禁了。举个例子，80年代的时候我们讨论陈独秀，因为俄国一些档案披露出来了，让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陈独秀的问题，我们那时候在下面就有讨论。但那个时代不能发挑战陈独秀错误问题的文章，而过了十年，到1995年，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就把不同观点发

表出来，并且详细地做了论证。那篇文章发了之后，没有受到任何批评，相反很多人都开始写为陈独秀翻案的文章了。

但是，如果把握不好这种时间差，你就很容易碰钉子。比如80年代初的时候研究中共和共产国际关系史的著名教授，北大的向青老师，基于史料和史实，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共产国际直接帮助和影响的结果这一观点，这跟我们在教科书里的说法明显不一样，结果就受到了党史主管部门的批评，弄得好多年都再没有人讲这种观点了。我在1991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里具体讨论了共产国际是怎么一步一步帮助中共成立的，也没有用这样的话来做归纳和结论。然而，到了2004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该书经过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审查批准，书里就直截了当就讲了向青当年讲过的那样的话，即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这本书现在到处公开发行，再没有人出面去批评这种观点了。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3、关于一些具体的史学观点及其引发的争议

南都周刊：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您说中苏关系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还是双方领袖政治追求和个性冲突的一种反映，是“一山不容二虎”。相当于更注重个人个性在历史中的作用，这种观点会不会遭到反对？

杨奎松：这小是一个全面的结论性观点，是针对毛泽东与苏联关系中恩恩怨怨，针对他个人的历史作用，所做的归纳。所谓很大程度，就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苏关系上，领袖个人的作用非常突出，虽然是一个特例，但它影响的两党两国关系的走向。就像在苏联，如果列宁之后不是斯大林掌权，而是另一个领导人，可能苏联走的路就会小一样，很多事情也许小会那样发生。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不要说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在中苏关系的处理上，如果当年不是毛，而是周恩来、刘少奇，或其他一些领导人，谁会相信中共关系会

在那样短的时间，以那样一种激烈冲突的形式破裂呢？在这一点上强调的是毛作为个人对中苏关系的改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很难有谁能提出有力的反驳。

南都周刊：金冲及先生在一篇序里面写到，您为了尽量少讲或不去重述前人已经说清楚了的问题，常常着重强调事情还有他的另外一面、您是否也担心这样会给读者造成一些片面的印象？

杨奎松：这个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写人物传记是有侧重的，这本书我的标题就清楚地说明了，我着重写的毛泽东和莫斯科几代领导人之间的“恩怨”关系问题，这本来就是着重讲个人作用、个人因素，甚至是个人感受的，当然不是一部全面的中苏关系史。其实，任何人、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东西反而是不好的。我写《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写国民党的“黄金十年”，作为通史必须面面俱到，但写起来真是很别扭，因为那里面很多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了，我必须要综合很多别人的研究、别人的资料，才能把一个需要完整交待的时段交待清楚。但这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做的是学术研究，因此我一直在讲，我的研究只代表我个人从学术角度对历史真实的解读，我不能保证我的解读和我的观点一定都是对的。我只讲了我自己的看法，我只讲了我想要强调和想要给读者看的那个方面，如果大家要了解完整的历史，就要多看一些不同的学者写的不同侧面，甚至是不同观点的书，去综合，去比较。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人人写书都去面面俱到，那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了。

南都周刊：前段时间您批评金一南先生的书弄错史实、涉嫌抄袭的问题，有一些人有些不同的看法，甚至质疑您的治史目的，您怎么看待自己遭受的这种非议？

杨奎松：学术方面的东西是要用学术的方法来讨论，来评价的。我批评金一南的书，是基于学术的标准和学术的良知。如果金或有人

想反驳我，一样可以从学术的角度，用同样的学术标准来和我争论。我欢迎。可惜我没有看到任何基于学术的反驳和讨论。这说明，我的批评在学术上没有错，而金书从学术上看实在是错得太多。

网上会有少数人帮金说话，这不奇怪，也是必然的。学术研究本来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事情，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只要你能基于学术的标准对话就没错。但是，学术讨论和网上质疑不是一回事。也没有哪个做学问的人会受到方方面面的欢迎，在学界不可能，在网上就更不可能了。我研究的东西原本就跟传统的东西有很大差别，有些人接受，有些人小接受，这很正常的。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人对我的议论，有人说我是“毛派”，有人说我是“反毛派”。你会觉得很奇怪。很右的人觉得我“左”，很左的人又觉得我“右”，没有谁觉得我的立场很彻底，很鲜明。我恰恰觉得这很好，这其实就是我的特色。因为我一直努力在研究中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自然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不走极端。今天对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些历史人物评价两极化，而基于“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我既要同情和理解毛泽东，也要同情和理解蒋介石。因此，两面不讨好也是必然的。

我坚持按照求真求实的思路做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研究，除了学术上的追求外，也希望能够突破今天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极端思维。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历史是渐进的，人也是变化的、渐进的；相对于复杂和变化的历史及历史人来说，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标准。在今天看来好的东西，在过去看来未必好；在这些人看来坏的事情，在那些人看来未必坏。任何历史问题的讨论与评价，都必须放到当时当地特定人群的范围内，必须基于当时人的价值观。我们不能简单地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指责历史中的人，因为这不仅是“事后诸葛亮”，而且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或观点都已大大不同于历史中人了。更不必说，立于不司党派的、

民族的、国家的，以及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标准不同，情感不同，你是他非的情况比比皆是。历史学者如果不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偏于一方，历史研究势必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永远也不可能争出个什么头绪出来。

因此，我研究历史，最看重的还是如何能够把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如何能够说清楚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

南都周刊：看到之前有个媒体对您的采访，您提到自己的血型和星座，说个人的性格可能会潜移默化影响做学术的方式，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杨奎松：这是玩笑话。但我也确实想不大通很多事情。比如，周边有些做历史的朋友，平时也知道研究态度要客观、中立。真的研究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做不到了。不是说他们不想客观，而是很多人做不到。我过去和一些朋友一起做抗战史的研究，后来做着做着一些朋友就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了，抗战史的研究常常变成了反日声讨，对日本战争罪行和战争反省的批判，也变成了对日本民族“劣根性”的论证。我始终不赞同这样一种研究态度。为什么？因为我坚持人是平等的，即使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许多日本人，在我看来，他们跟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同。不要说我们会经常接触到许多日本学者，和我们并没有多大区别，就是那些沾有中国人鲜血的日本兵，看看方军前些年写的那本《我认识的鬼子兵》，你就会知道，那些鬼子兵在日本国内，无论过去还是后来，其实都只是一些很普通，而且很善良的老百姓，跟大多数普通且善良的中国人没什么区别。为什么一被征兵到中国打仗，人就变坏了呢？那是因为政治，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政治、因为战争，中国人自己不干那些残忍的事情吗？稍微多读一点中国的历史书，各种各样的屠杀，各种各样残酷、恐怖的肉刑与惨案，少吗？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各种残害同胞的刑罚五花八门，世间少有，为什么？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哪有那么简单。

作为个人来讲，我觉得人都是有弱点的，在特定的条件，好人也可能会做坏事，甚至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支配下，许多人做了坏事也不认识。我过去写文章讲过一句话，叫“战争把人变成鬼”。实际上，任何一种形式的斗争，尤其是打着族群、党派、国家名义的斗争，都可能把人变成鬼。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没有哪个人天生就是坏的，也没有哪个民族先天就是恶的。可惜的是，真能这样比较平衡地看问题的人不多。所以我开玩笑说，这是不是因为我是天平座的原因呢？

4、关于历史研究的其它一般性话题

南都周刊：《革命》包括四本书，之前也出版过，现在学界或者您自己在一些史实认识上有没有新的变化？比如《西安事变新探》中提到的张学良究竟有没有加入共产党，现在是否有定论？

杨奎松：没有。我的文章里讨论过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没有人有直接的证据。我看到的所有材料是不支持的。有人说“是”，但根据的是回忆。而我还是相信档案史料比回忆更可靠些。但这种问题仅凭档案史料也不能下定论，因此我只提出我的看法，我也不否认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因为在中共历史上也确有单线联系、秘密发展的先例。我的基本观点在于，去争论张学良入没入党并不重要。即使我们相信中共秘密发展了张学良，也不妨碍我们得出张学良不是共产主义者，不信奉共产主义，其发动事变不是什么组织行为，他依旧还是基于个人及东北军自身利益行事的结论。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西安事变的发动，与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意图完全无关，是张学良临机的自主的行动。张学良事变期间和事变后的种种处置，特别是事变后努力想要让东北军脱离中共影响的作法，都可以看出他不是站在共产党员的角度在考虑问题。

南都周刊：你似乎不太重视“口述历史”这种样式的资料，包括很多人对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录。

杨奎松：一般的历史学家都不会拿口述历史或者回忆录来做主要的事实依据，这是学界的常识。因为回忆的主观性很强，很容易记忆错误，而且还会因为回忆者的个人倾向发生选择性记忆的情况。包括口述历史，我们做过很多口述历史的工作，所谓口述其实是“我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提问者的引导性非常强。这种引导显然会导致一些偏向，同时，会做口述引导的人和不会口述引导的人，做出来的东西也会非常不一样。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学良的口述，他生前挑过好几个人来给他做口述，先是唐德刚，后来又换了郭冠英，最后硬是换了两位并不熟悉历史的张小姐。唐德刚是史家，他给李宗仁、胡适做口述，都做得非常好，他知道要做很多功课，看很多资料，然后去引导张讲什么，大家都觉得他做的口述史可信度比较高。但是唐德刚的口述没有做下去，后来换成了郭冠英。郭冠英是记者出身，善于挖新闻，因此他跟唐德刚的做法差不多，也是查了很多资料，提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但他也没有做下去，就被换掉了。后来让两位张小姐做，她们一个学图书馆，一个学中文，对历史不熟悉，只是因为她们的父辈跟张家比较熟。结果是今天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资料，量倒很大，却几乎没有多少对研究张学良生平和西安事变史有用的东西。

南都周刊：看您写的东西简明易懂，读懂汉字就能读懂您的著作，您之前也说不太喜欢汪晖的那种文字风格。是有意识的追求这种通俗性吗？

杨奎松：文史不分家，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或那些理论科学不同，它的任务就是要把我们人类或我们民族经历过的，但被遗忘、被扭曲、被篡改的种种经过，还原出来。它的任务是要让后人能够记住这些故事，当作经验，或当作教训，记下来。既然是留给后人的，也就不是给极少数或个别人的，尽可能的让比较多的人了解和记住历史的真实一面，就是史家的一种责任。把历史研究的结果弄成诘屈聱

牙，只能给少数专业者读的东西，不是我追求的。也正是为了要想办法让许多史学的研究成果变成普通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我们在专业研究之余，曾经花时间、花精力，专门办过一个《百年潮》杂志，目的就是想做这种转化的工作。写东西要让更多的人看懂，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我对学生也是这样要求，我要求他们写文章时必须假设读者什么都不懂，因此，使用任何一个词、一个概念，都需要注意选用最通俗易懂的用法。没有办法选择，必须要用的，一定要注意加以解释。我很不赞同一些学者故作高深，盲目搬用或硬译出一些西方的术语和概念，把明明可以写得清楚明白的东西写成多数人看不懂的东西。

5、关于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

南都周刊：关于研究历史的目的，一个是发现真实，一个是挖掘背后的规律和意义，有点以史为鉴的意味。在您自己看来，做历史研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杨奎松：每个人研究学问的选择是不尽一致的，有些人就想做纯学术的研究，不考虑社会的需要，我做研究更多关心的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想要知道“今天的我们是怎么来的”，将来的我们可能应该怎样前行，应该如何避免重蹈以往自己或别人错误的或失败的覆辙。

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社会了。无论我们今天怎样意图左右或限制社会大众的观念、思想与认识，因为种种原因，人们很容易了解到海量的信息。我们越是不想讲的东西，就越是会有各种对立的说法涌进来。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分歧，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说各话，社会思想极度混乱的情况。如果研究历史的学者也不研究，也不讲话，那就更没有真相可言了。我觉得之所以大家今天会说杨奎松做的不错，根本上不是因为我的能力如何，很大原因是因为真正有能力做研究的人很少人会来做这种研究。大家都觉得太危

险，禁区太多，资料限制太多。我因为各种机缘从大学开始就进了这个圈子，下决心要做这件事，反而磕磕绊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了。

改革开放提供的最大好处在于，第一是思想解放了，言论比较自由一些了，不会说你讲了一句话大家就觉得你反动，把你投入监狱；第二是因为思想解放，人人都在思考，都想知道历史的真相，都想弄明白今天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因此，大家的求知欲很强，越是有创新的东西就越是容易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第三是教育程度大大提高了，过去报纸杂志不加分辨地什么都接受，越是新奇通俗的传记文学作品就越是受欢迎。这些年受过大学教育，知道学术的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的读者越来越多，影响到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再去做那种学术转化工作了。过去注释曾经成为大众阅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现在没有注释和引文出处的历史书，反而会让读者起疑了。这也说明，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方面的坚持和坚守，是卓有成效的。

6、关于革命与中国的现实走向

南都周刊：看您的微博，在评价唐山大地震时候说，即使文革，很多百姓依然守着传统，中国人没有因为革命泯灭了人性。也就是说，实际上您认为革命对人性有个压制的一面？

杨奎松：革命崇尚暴力，它对人性这种东西原本就是排斥的。何况，中国经历的最大的革命还是阶级革命，阶级革命更是排斥人性，因为它相信阶级利益高于一切，认为人性、人道主义，包括人权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应该被否定的。建国以来，我们从来没有正面承认过人性或人道主义之类的概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很长时间，也没有承认。改革开放几年后，原文化部长周扬发表文章从正面肯定人道主义，还被严厉批判过。我们从正面谈论这些涉及人的概念，基本上都是二十一世纪到来前后的事情了。不难看出，革命的历史及其革命的思维模式，和人性观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对立。要脱出那样一种排斥人性的思想方法，有多么困难。

人性、人权、人道主义这些观念，多半都是中世纪神权统治后期，伴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兴起，逐渐被世人接受和认同的。但是，即使在古代，在专制的或神权统治的时代，许多民族的民间社会也还是存在着某种对生命的敬畏感和对财产权利的尊重的。即使是像我们汉民族，缺少宗教观，但民间社会一方面有儒学礼教的规范，一方面相信鬼神的作用，大家天然地害怕做坏事，害怕杀人。革命的暴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逻辑，把这一切传统的东西打破了。韩丁的《翻身》一书描写当年的土改很正面，也没有太血腥，但是他笔下那些普通农民，从害怕打人杀人，不敢分地富的财产，到最后争先恐后到富裕农民家里去掘地三尺，甚至跑到坟地里去刨人家祖坟，涌到城里去抄人家产，这种心态、观念和行为的变化，还是让人触目惊心。中国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大都会发生残酷血腥、泯灭人性的事件，甚至会酿出人道主义的惨剧，革命场域的暴力刺激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理念，是重要原因之一。

南都周刊：这段历史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进化”的感觉。

杨奎松：对呀，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为什么一直讲进化的观点？一个原因就是我相信中国人其实有一种文化上的缺憾。因为从来有一种自我中心观，突然间发现自己落后于人甚至还会挨打受气，于是便会千方百计地想要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地位上去。从这种心态出发，几乎所有有着很强抱负心的政治精英人物，都想中国能走一条捷径，很快达成强国目标，并且超越发达国家。可想而知，照此行进，只能革命，而难走进化的路。十年前，胡绳先生曾对此有所反省和检讨。他明确指出，现在看来，当年梁启超等人在五四时期关于中国非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走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才是比较符合中国社会进步的实际的。但无论是当年，还是后来，国人中能够认同社会进步要一步一步走的是少之又少。这种心态恐怕到今天都是如此。

南都周刊：这似乎跟革命目的与革命手段的那个话题有关。比如说我给你一个美好的革命目标，这中间的手段可以反人性，可以流血。如果未来真的那么美好，您觉得这种手段是可以接受的吗？

杨奎松：首先第一个，如果你的未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你所能见到的未来很难是美好，所谓以暴易暴，那是一定的。所以我说走捷径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在不那么重视人权、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时代也许人们还能够接受。然而随着社会进化，后来的人就未必能接受，能理解了。更要紧的是，破旧易，立新难。当一个社会打破了一切旧的东西、旧的秩序，像恩格斯说的，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了之后，你要重建一整套新的理念、道德、秩序，又要和旧的完全切割，最终的结果是礼崩乐坏，新的东西并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另立新理念、新道德、新秩序，充其量只能讲一些大口号、大名词，实际没有文化的基础。我们到今天到处重建所谓公民道德，每个城市都自搞一套四字经、五字经，要求公民遵守。殊不知任何一种社会道德其实都是靠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一代代传承下来，并且是靠严格的权利、尊卑、秩序的观念巩固下来的，它是无法通过搞几个顺口溜或思想灌输来主观建构的。

举一个例子，一块公共绿地横在眼前，你可以多绕几步不去踩踏，也可以径直踩进去让自己省几步路。公私观念比较清晰，有公德心的人，多半不会省那几步路，但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往往会选择走一条捷径，切着直线走，把这块公共绿地踩出一条路来。试想一下，如果这块绿地是自家的园子，第一，你不会为省几步路去把自己的园子踩出一条路来；第二，你也不会允许邻居为省事而随便穿行。私的顽固，公的脆弱，可见一斑。

革命如果仅仅是政权的更迭，即使发生一些强力、暴力的情况，还不是那么可怕。革命如果是打烂旧世界，另立新世界，问题就太多了。不是理想不好，而是人力所不能及。何况我们的革命从一开始就

把矛头指向了私的领域、私的权利，直到今天，虽然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了承认，但公也还是凌驾于私之上。问题是，作为中国这种很特殊的小农国家，公权力再强势，也不可能真正达到化私为公的目的。因为直到今天，多数国人还是处在个体小农的思想境界。公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其实一样是私的东西，只是一个是大私，一个小私而已。凭什么你可以占有，我就不能占有？如果是私有制的条件下，因为财产受法律的保护，人们相互之间的权利界限还比较清楚。公有制了，大家反而成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分不清什么公和私了。

自1950年开始，我们就不断看到地方党政工会对工人自私自利问题的各种讨论与整顿教育的提议。原因是工厂国营以后，工人中间小偷小摸、化公为私的情况十分严重，各种生产工具损耗丢失极为普遍。为教育工人明确公私界限，遵守厂纪厂规，各级主管部门没少花力气，但直到我文革后期在工厂工作的几年里，这种现象丝毫未见减少。新政权改变这种情况最重要的一步努力发生在农村，特别是大跃进期间。当时把农民几乎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生活资料统统充了公，许多地方连私的根基——家庭也破坏掉了。农民集体生活，分男营女营，吃公共食堂，孩子送幼儿园，老人送养老院。结果，凡是被公有的东西，从山林，到农具，到耕畜……，农民都不爱惜。高王凌管这叫农民的“反行为”，说是消极抵抗的表现。不管怎么分析，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一种程度是肯定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政府不得重新恢复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重新把财产权，甚至包括土地使用权交还给农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难看出，理想归理想，现实是不依理想而转移的。要人为地创造一个公的世界，在过去公权力那样强势的时代都行不通，在今天这种私领域、私权利的意识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公领域、公权利的维系

只会变得更加困难。划不清公与私的界限，总有一天连强大的公权力也难以维系。

南都周刊：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现在是比较突出的，您怎么看很多人期待的渐进式改良式的改革？

杨奎松：我刚刚讲的进化观其实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过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办法。你看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成长过程其实也经过了几百年之久，哪怕是十九世纪后期许多新的秩序、新制度开始逐渐完善和建立起来，它的最终稳固，也还是又经历了近百年时间。其间甚至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到1940年代末大家才最终在不能靠暴力改造世界的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这也是为什么，十九世纪还会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欧洲资本主义还特别混乱，社会也乱的不得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特别大，阶级斗争特别激烈，各种社会运动特别多，反对的声音特别多。许多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不行了，马上就要完蛋了。因此，即使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兴起的那个时代开始算起，资本主义也经历了一二百年才稳固下来。中国何时可以算做是资本主义的起步阶段？即使我们说从20世纪初开始算起，到现在也不过才走了10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还一直在走弯路，一直在打仗，在革命，在破坏。真正建设阶段只能从1950年代开始算起。后来又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停顿时期。大家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渐明白中国不能再乱，不能再革命，必须要走渐进改良的路了。

南都周刊：在这一进化的改良的过程中还会出现革命呢？

杨奎松：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问题在于我们会不会重走过去国民党执政时走过的路，为革命创造条件。我们许多学者一直强调我们过去革命的遗产的影响，一个靠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革命的意识 and 冲动肯定比靠渐进的改良方法建立起来的国家，要大得多。这还不要说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旧到处可见革命的痕迹，民众中大量存在着革

命的意识。从历史经验看问题，今天社会的稳定根本上取决于经济的增长和稳定。经济保持增长和稳定，即使革命的遗产影响巨大，也很难发生动乱和革命。相反，经济增长停滞，甚至下滑，影响到民众生活下降，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所以会迅速走向失败，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它在经济上出了严重问题，社会发生了严重分裂，当时又有一个共产党可以替代国民党，共产党又确实比国民党强，这个革命的选择就不可避免了。

7、关于历史研究重心的转变

南都周刊：听说这套书出版之后，您就基本不再做1949年前的历史研究，而是要把重心放到建国后的历史？

杨奎松：我出校门之后就决定要研究中共，从中共怎么产生开始，实际上是沿着时间顺序在往前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研究到50年代了，我当然希望以后的精力主要能够放在研究建国以后的历史上。

南都周刊：研究方法上会不会有变化？

杨奎松：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建国后的研究和建国前的研究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差别，一是因为建国后的档案资料太多了，过去大家研究古代史和近代史，一个很大的瓶颈在于资料不够，必须把各种零散的资料拼凑起来，然后去分析、推理，甚至于合理想象。共和国史的资料情况完全不同，浩如烟海，各地档案都在陆续开放中，多得不得了。这样多的资料，要都去读都去研究都去介绍，几乎不可能。因此，对建国后历史的研究，在技术上就多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这些材料，这么多材料，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需要有很强的选择性。

另外，建国前的历史研究，因为材料所限，我们可以主要研究一些比较宏大的问题，一些专著可以从头写到尾。像写毛泽东，就可以一直顺着这个人物的生平思想的变化往下写，一本收就可以交待清楚。但是建国后的研究很难这么做，一是上层的，即中央及其领导人

的材料有很多不开放；一是底层的、社会的、个人的材料多得不得了。如果加上民间史料，包括基层单位的小型工作会议记录、文件资料，连同个人笔记、日记、档案、信函、回忆、口述等等，多得不得了。这样就导致大家的研究会非常分散，而且趋于社会化、基层化。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题目大都非常小，关于一个村落啊、一个个人啊，微观史的研究非常多。如何能够把大量微观的历史，进一步上升到宏观上来，目前的研究非常少，力量很弱。

我们自己也一直在检讨这些问题。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一个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就是在做这一块研究。但也发现很多问题不好解决。比如以前我们可以写一本中华民国史的教科书，建国后的现在就很难写，因为很多方面资料很多，但大都还没有研究到。不要说我们的研究者还很少，很有限，即使再多一些，面对这样多的材料，大家的精力和能够顾到的面，还是十分有限。

南都周刊：是不是意味着您建国后的研究切口也会更小一些？

杨奎松：现在难说，我个人努力的方向可能还是跟我以前对建国前的研究比较接近，比较关注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以及整个政策的来龙去脉，跟政治史关系比较大吧。但新的资料类型也决定了，所有这些新的研究都会涉及到基层。比如说研究大跃进，以前的研究多是着眼于中央的政策，如何形成、起到什么作用，特别是毛讲了什么话，起了什么作用，但从大量已经看到的资料情况可知，毛泽东的作用是两方面的，导致毛错误估计形势的因素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他个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制度使然。很多事情毛泽东是被蒙在鼓里的，他不少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包括后来他自己承认错误，他也没有真正弄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儿了，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说明什么？说明从基层到省里到中央，一层一层的干部在讲假话。比如从基层报到省里，再报到中央，最后到毛那里，人人都在讲

假话。有的确实不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有的知道但不敢说，还压迫下面不许说。因此，毛泽东看到的東西、听到的東西，其实也是两面的，既有让他怀疑的，也有让他兴奋的。当然，下面层层压力根源来自毛的推动，就像后来出了事各地調查报告中基层干部讲的，我之所以讲假话，是因为上面给的压力，我没办法，只能讲假话，只能去逼迫农民、挤压农民。现在我们最震惊的就是，讲假话的干部会这么多，包括生活在最基层，还要参加生产劳动的大队，甚至是生产队的干部，许多也在强行挤压农民。而且不光是县上的干部，就连当时相当多数公社的领导干部，对农民生活、口粮的情况，也是一问三不知。很显然，那个时候的干群关系就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了。如果连相当多的公社干部都与农民发生了隔膜，高处不胜寒的毛泽东又如何能掌握到下面的实情呢？因此，共和国史的一大挑战，就是要上下打通来做研究。光研究上层不研究基层，不研究上下互动和互相作用的过程与关系情况，许多大问题就说小清楚。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共和国史面临的最大问题。

多问几个怎么了、为什么？ [2]

吴海云：当我向人提起您的时候，一个很常见的反应就是：“杨奎松，做党史，不容易！”说“不容易”，自然和中国的政治环境有关。因此我首先想请问的是，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中共党史”这个研究领域？

杨奎松：最初我没有选择这个方向。77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是政治经济学，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搞经济的，经过文革以后，那个时候大概也没有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去研究什么政治，更不必说当时没有谁会把中共党史看成是可以研究的一门学问了。我学中共党史，纯粹是因为考分不够理想，第二拨录取时被分了过去。我对这个专业本身不感兴趣，进去学了以后，觉得更不行。所以我没有去继续读研究生，宁可自己去学、去做研究。幸运的是，我分配到了中央党校，成了党史研究的编辑，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新材料。而80年代那段时间，又是改革开放之后新一波的思想解放时期，视野一下子开放很多，资料条件也变得非常有利，这是我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当然，能坚持这么几十年，是因为这个研究有助于解决我心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

吴海云：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杨奎松：中国究竟怎么了？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革命总会吞噬自己的儿女？今天中国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又会向哪里去？……这些问题，不止是我一个人在想，在问，在那个时代，实际上从文革后期开始，很多人都在这样想，在这样问。记得林彪事件发生后，北京许多干部子弟都在读理论书，西方的、马列的，什么都读。大家都在反思，都在问：共产党到底怎么了？毛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等等。很多疑问是我当年就已经总是在问，却总也解答不了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严格说来是需要学术研究的背景的。因为它们事关文化，事关传统，事关理论，尤其是需要有历史研究做基础。因此，能有机会、有条件从事历史研究，能够去研究我所关心的共产党历史的问题，至少在我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它的确非常困难，影响我们客观研究和讨论的因素太多、太大，但是，我还是心存感激之心，毕竟30年来中国政治进程再曲折，总的还是在进步，在开放，因此，我的研究总体上也一直在向前走。

吴海云：许多历史学者在做研究时，喜欢选择一个断代、比如文革，或是某个历史人物、比如陈独秀，做那种比较具体的微观研究。而您做的是那种跟着时代走的宏观研究，为什么？

杨奎松：我之所以没有读研究生，除了当时比较狂妄，不认为有哪个党史教授值得我去跟他读学位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能够从头开始系统地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来一步一步地具体弄清楚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不喜欢那种一上来就钻到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思想中去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我们研究的历史通常不过是人类社会的某一部分沿着时间线索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要搞清楚任何一段历史，哪怕是一个人的某一段历史，在弄清楚这段历史的具体史实经过以外，特别需要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我们要解释清楚任何一段历史，哪怕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历史事件，不把前面的各种影响因子梳理清楚，不了解构成事件各方的具体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和各自的动因，我们可能连具体解读说明这个事件的微观过程都有困难。因此，我从大学出来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想要从我所关心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从农业国的中国人为何会对超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感兴趣这个问题入手，来考察了解为什么连资本主义大工厂几乎都还没有的落后中国，何以会产生出一个宣称代表产业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换句话说，我个人更喜欢追根溯源做研究，想问题。

你刚刚提到了“文革”。确实，从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很多学者，包括民间历史爱好者，都对研究文革史感兴趣。但是，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它其实和整个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相关。如果你把它放在中共党史的整个进程中来看，文革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独特的事件，更不是毛泽东在晚年脑子一热突发奇想的东西。举个例子：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就一度发生过内讧。因为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大家互相揭发、批判、贴小字报，向苏联安全部门检举告密，靠外力介入抓“反革命”等等，当年就整了好多人，后来还因此弄死了一些人。这件事跟毛泽东毫无关系，甚至跟苏联人也没什么关系。事实是，无论有毛泽东，没毛泽东，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历史上一直在发生。像苏维埃时期的中共肃反，除了富田事变和毛泽东有关外，其他根据地的肃反同样死了很多自己人，都不是毛泽东在起作用，当时斯大林也没有搞大清洗，也不是苏联人在那里瞎指挥闹的。这说明，我们中国人自己其实是有问题的，并不简单的是哪个人的问题。如果不更深入地去考察、了解、弄清楚历史上的、社会文化上的种种原因，单纯做文革史研究，我们就只好围绕着大量微观史实来下功夫，回答不了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那样惨烈的一场自我相残的政治大动乱何以会发生？

吴海云：但这样一步步地往下走，很慢啊！

杨奎松：哈哈，是很慢。我研究了30年，做到今天，才从20世纪初做到1950年代，还没到1960年代。我一直希望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但现在看，即使中国的政治进程不会发生严重倒退，我怕我还没做到“文革”，人就不在了。

吴海云：做中共党史的研究，会不会受到很多制约？

杨奎松：还好。我说过，中国的政治环境整体上其实一直是在进步的，当然，30年里会时松时紧，时进时退。但做学问的人只要注意不要太过超前，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生存下来的。事实上，做到我们

这种程度以后，已经不像青年教师、青年学者那样生存压力那样大了。我们不会为了发表文章去做很多违心的事情，青年人要养家糊口，要评职称保饭碗，就很难做得到。从我研究历史的经验看，改革开放后最好的一点就是，无论今天政治上多么保守，学者们总还是有一定的研究空间的。有时候限制得太严了，大家埋下头来做一段基础的研究就好了，这种时候总是会过去的。很多问题，1980年代不能谈，到了1990年代就不是问题了。总的来说，作为历史学者，我对历史进步是持乐观态度的。

吴海云：听您说的，似乎别人心目中您因为做“中共党史”而遭遇到的种种困难，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杨奎松：确实，那些政治上的禁忌想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国那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地方不让发东西，还有那个地方可以发；今天不能发，明天总可以发。做历史的人关键是要把史料研究的基础打扎实，有了新成果，总有能发的时候。我觉得我碰到的主要难题，还是历史研究本身的困难。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一点，你必须既能深入于历史之中，又能超然于历史之外。

所谓深入于历史之中，就是要能够像陈寅恪先生所讲的那样，即要能够“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要学会换位思考，即要设身处地地站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场景之中，按照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和当事人特定身份、地位、教育、知识等所决定的立场情感背景，来具体地理解历史当事人所思所想。所谓要超然于历史之外，就是要努力摆脱历史条件小身的束缚，不受一家、一族、一党、一派、甚至一国的感情立场及其意识形态的左右，尽可能用比较科学的发展的眼光，从今天的历史高度，基于人性的立场，来看待历史上的种种恩怨与是非。而要真正做到并坚持住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吴海云：那让我们回到您的研究——“革命”——上。我想请问，在做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后，您对革命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杨奎松：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革命，无论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专制统治或腐败政府的造反行动，还是以武装反抗的形式改变本民族屈辱地位的激烈行为，都不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二十世纪的特殊产物。我赞同汉娜·阿伦特对革命的阐释，即

“只有在现代，而不是在现代之前，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现代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平等自由意识的觉醒及其由此产生的对压迫平等自由的反抗心理。只要这个问题存在，无论是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受到过度压迫，还是经济上的平等自由受到过度压迫，革命的爆发都是不可避免的。你没有办法去“告别”过去，也未必阻止得了今后的革命。我对“革命”的基本态度？我想我赞同美国《独立宣言》里面讲的一个观点，这也是当年各国共产党人革命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即“人人生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吴海云：革命当然不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但问题在于，中国的革命有很大的特殊性。

杨奎松：当然，这也是我一直在探讨的。中国革命大致可分为两类：国民党式的和共产党式的。而无论是哪一种中国革命，外因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苏联及美国的影响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即便是最具权力与决断力的领导人——不管是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必须学会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苏联革命，中国革命可能是一个孙中山引导的革命，由于它受到较多美国

式的革命观念的影响，由于国民党的成员中更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精英，因此，现代中国将变成一个保留更多传统文化的、比较美式、而不是俄式的国家。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中国无法离开苏联的作用与影响，以致最终走上了一条“阶级斗争”的俄式革命之路，这就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条件下的中国特色了。

吴海云：问题在于，革命虽然有暴力、血腥的一面，但也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公正、自由与进步。且不说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就说不久前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不仅很少受到谴责，甚至还占据国际政治道德舆论的制高点。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对革命都有一种“告别”的情绪。在您看来，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

杨奎松：首先，我想指出，国人中对革命的“告别”情绪多半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生长起来的。至少，在毛时代，“革命”还是许多中国人以为骄傲的一种政治符号：那里面既包含着一种“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民族主义自豪感，也包含着对中国可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能够实践平民政治的制度体制的政治自豪感。上世纪60年代末的几年里，中国这种革命理念甚至一度曾经风靡世界，1968年遍及全球的“红色五月风暴”就是一个证明，如今一些人对于毛时代的怀念多半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想象。

任何历史的发生都有其相对的逻辑和原因，中国革命也是一样。问题在于，如果革命没有一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普世的价值观作为支撑，打破旧制度之后，不能建立起一套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基本制度，这种革命带来的未必是历史的进步，反而可能造成严重的历史反复。因为，就像马克思讲过的，泼脏水是对，但把澡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就过犹不及了。

具体来说，任何社会文化，都是精英文化在起着主导作用，并规范着社会上一切人的言行举止。旧的制度文化确有束缚人性的，甚至

是“吃人”的一面，但也有其总结人类几千年历史经验所由形成的维系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革命自有打破旧制度、旧文化的功效。但是，破旧未必能立新。特别是依靠民众造反的底层革命，一旦把旧的制度文化打破，把原有的阶级关系摧毁掉，那种底层的、原始的、人性丑陋野蛮的东西就会抬头。如果这种革命不是顺应历史发展步伐而来，新的法律制度、道德文化没有能够在旧社会中自然生成并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新社会势必会被更落后的制度文化所统治。

吴海云：人性都是自私的吧？这恐怕不是中国人独有的。

杨奎松：人性本身都有自私的一面，但不同的民族，其民族性及其国民性其实很不同。民族中人的性格特点多半是受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乃至环境影响作用形成的。中国人，或者我们说汉人的性格特征就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条件。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小农经济的社会，自耕农多，小地主多，大地主少，最重要的是农民和地主，和土地，都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这和西欧、日本的古代社会完全不同。欧洲、日本的庄园地主经济因为农民与贵族或地主休戚与共，贵族、地主不仅经济要靠农奴，保卫庄园，乃至与外部关系，包括出粮、出丁、出兵、打仗，也都要靠农奴。农民因为依附于贵族或庄园主及其土地，他们的命运也与之息息相关，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庄园地主经济很容易造就出一个内聚力较强的民族来。而中国式小农经济恰恰相反，农民本身没有依附性，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人可以自由迁徙，甚至多数农民自有少量土地，可以维持基本生存，这种经济制度很容易造就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散漫个体。从早年孙中山，一直到今天海外华人中的知识精英，几乎无不感叹国人的这种特性，即一盘散沙，且内斗不止。

所以，中国人特别爱讲“平等”，甚至于要讲“均平”，但出发点却多半是着眼于自私的目的。中国人讲的“平等”和西方概念中的“平等”不完全是一回事儿。西方从庄园地主经济的角度，必须要讲

个人主义，因为不处理解决好“公”与“私”的关系，就会带来整个依附关系很强的庄园经济体的解体；中国小农经济中因为很少个体“私”对“公”依附关系，多半只有“大私”和“小私”的问题，所以很容易形成人人“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主义。中国汉人通常个人生存能力很强，群体意识及团结力却很弱，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吴海云：您刚刚还提到了阶级斗争……

杨奎松：是，那是中共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但是，它也是今天的中国最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表面上，阶级斗争是有利于集体主义习惯和理念形成的，对克服国人自私自利的国民性有好处。实际上，中国人自引入阶级斗争以来，从来就不是严格按阶级划线的。并不是你是工人，你就是革命的；你是地主，你就是反动的。几十年来，中共的阶级政策一直在左右摇摆，今天讲斗争，明天讲团结。讲斗争的时候，你是知识分子都可能要被划入另册；讲团结的时候，你是地主也可以变成统一战线的对象。不仅如此，农民中间也是要分阶级的，工人中间同样要查异己分子，要分左、中、右。无论俄国，还是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共产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表现在根本无法简单地依据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占有的有无多少来划阶级，通常要看一个人的政治言论、行为、情感、立场，甚至要看他的社会关系，看他的家庭出身，看他以往的历史，包括读书上学的经历，来认定他的敌我属性。因此，哪怕你昨天还是共产党员，今天就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由此可知，中国的阶级斗争并不能真正推动国人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反而容易更进一步强化国人不顾是非善恶，唯上唯权，从众跟风，落井下石的利己心理。

这种情况也很好理解。因为阶级斗争是敌我斗争，敌我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因此碰到这种问题必须选边站，站对了就万事大吉，站错了就万劫不复，有几个国人还敢独立思考，去判断什么对错是非呢？

改革开放了，今天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但是，我们今天政治观念及其处理问题的方法仍旧是阶级斗争式的，还是非我即敌，你死我活式的。凡被视为敌对者，不管确否，一定要被看成是坏的、恶的、反动的，在政治上必须仇恨、防范，甚至于打击和消灭之。影响到大部分人今天在看问题时，也仍旧摆脱不掉非黑即白的极端立场，很少能有个人的独立思考，更谈不到保持客观态度了。

吴海云：我发现，虽然您是个历史学者，但很注重现实的关怀

杨奎松：那当然，我之所以研究历史，就因为我关心我们今天的这种状况是怎么来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是，离开了真实、客观、全面的历史史实的研究与披露，任何讨论和看法都只能是望风扑影的空谈空论。而还原史实，非要历史学家出来做这方面的基础工作不可。

吴海云：那作为一个现实的关注者，您在系统地梳理中国革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抱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杨奎松：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我既是宿命论者，也是乐观主义者。从历史的长程来看，任何国家、民族都在发展中前行。何况，就我们生活的这几十年来看，中国的进步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比如，在八十年代，“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还遭到批判；而今天，主张人权、尊重人性、弘扬人道主义，固然习惯于敌我思维的国人的接受和认识程度还不一致，但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了。今天连对猫啊、狗啊，都要讲兽道，更何况对人呢！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对人、对人的生命和权利是否高度重视与尊重。古代社会之所以野蛮，根本上就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兽性，不懂得，也不知道人生而平等的道理；不懂得，也不知道要善待一切生命，要保障每个人应得的权利。西方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进步，就是让欧洲人越来越多地认识了人性

的价值，从而使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人权平等的意义。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也一定会从对人权平等和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变化上逐渐体现出来。

当然，今天还有几亿农民的中国社会进步得再快，也还是存在太多的问题。尤其是社会文化意识方面的进步，远不是靠多建几个工厂，多几亿农民进城务工，就能够改变过来的。人类文明进步从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任何人为想要一步达到所谓超资本主义文明的程度的努力，结果一定会跌回到中世纪野蛮文明的水平，甚至更惨。

举一个例子。人类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人吃人的记述。但是，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步，这种情况已越来越难见到。中国的情况固有不同，而史书记载为复仇食人之事至少在清史稿中已不复见到了，为食补而食人的记载也鲜能见到了。想不到，历史发展到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因为在农村用阶级斗争观念搞土改和镇反，底层农民中又都再度发生了并非因饥饿而食人的怪现象。这种情况，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在落后地区打击所谓反革命敌人的过程中，竟又一度死灰复燃。仅此一点即说明，以中国底层文化之落后，城乡文明差距之大，要让历史文明倒退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要让历史文明进步，则难上加难。

历史发展的趋势当然是不可逆转的，无非是快与慢的问题。但是，任何能马上靠主观力量强加给这个社会的东西，再好都会变质！我们背负着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社会的沉重历史遗产，又经历了俄式阶级革命的历史反复，这注定了我们国家的文明进程势必会走得比理想中慢得多。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马上提升全国民众的文明道德水准，这不是靠十年、二十年的宣传、教育、树榜样能起作用的。我们今天其实最应该做的，是普及人权意识，强化人权观念，谴责任何反人性、不人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也就是应该做反对野蛮文化的思想启蒙工作。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这种工作的意义，愿

意自觉地帮助推进文明的进步，哪怕大家只是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方面多做一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讲人性、重人权的事情，中国的社会进步也都可能会加快一点。

[社会发展中的“阿凡达”式困惑 \[3\]](#)

《世界博览》：GDP攀升、生活富足，抛开社会表面这层光鲜的现代化外衣后，人类文明进步的实质是什么？

杨奎松：这个问题太大，也复杂，我们今天讲的文明和进步，其实多半都是“现代”的。换言之，就是以人类今天最现代的生活和最现代的思维为标准的。就像我们今天说张三的某种行为不文明，说李四的某种观念太陈旧，不进步，我们多半都是拿我们今天生活的现代工业社会已经公认的某种标准在做比较。而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基于现代工业社会所产生的一切标准，是否就是唯一正确的，或文明的、进步的呢？

作为一个拼命在搞现代化，一心想要挤进现代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今天真正感受到这种问题的吊诡性的人，还很少。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还在追求最现代的，或是比较现代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为目标。但是，在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在那些早已不为稻粱谋，甚至对过度的物质消费已毫无兴趣，因而开始怀念或幻想大自然的无穷魅力的人们来说，对人类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了。在这方面近年来最能给人以视觉和情感冲击的，应该就是最近在热播的美国大片《阿凡达》了。导演卡梅隆几乎调动了一切技术手段成功地展示出了一个宛如仙境般，人和物都纯净得可以让人窒息的神话世界。他制造这一梦境的目的很清楚，一个如此美妙无比的大自然，我们怎么能忍心为了人类自己的现代生活而去毁坏它？！

看过这部影片的国人很多，但是，在场面上、技术上受到震撼的人很多，在思想上、情感上受到冲击的人却很少。中国导演陆川因为坦率地讲出了他看过这部影片后在心灵和情感上受到的冲击，甚至还遭到不少网民的怒斥。

《世界博览》：为何国人不认同陆川的看法？

杨奎松：其实，国人认识上的这种差距，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大家审美眼光不同造成的。这就像有的人痴迷于大自然的美，就想住在人烟罕见的自然环境中间，远离繁华喧嚣的现代城市，而更多的人则离不开物质生活的享受和舒适。我们只要看一看陆川所拍的《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注意一下他电影里对自然、生命和人性的关注，就不难了解他对《阿凡达》的看法为何会与许多国人不大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这个曾经被半殖民化，遭受过帝国主义严重侵略和欺凌的国度里，今天的人竟然已经现代化到很少会去关注卡梅隆这部影片的政治批判意识了。我注意到网上和报纸上都有不少人在批评卡梅隆“反人类”意识。在他们看来，影片只塑造了寥寥几个正面的人类形象，绝大多数影片中的人都写得面目可憎，这表现出了卡梅隆对人类的某种仇恨心理。

不错，这部影片明显地嘲讽了现代的人类。只可惜，这只是卡梅隆意淫现代人类的结果——土著的纳美人成功地赶走了入侵的文明人类。而在人类自己数百上千的历史事实当中，几乎从没有真正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想当年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凭借着他们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船舰和大炮，在亚、非、拉美各大洲到处移民、垦“荒”，驱赶、杀害地球上的各种“纳美”土著的时候，文明的现代人类终究会是战胜者。

比较一下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弱肉强食的历史，卡梅隆的后现代史观其实很值得我们中国人欢迎。因为他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发达国家中文化人，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批判的一个代表。那么，为什么有世界上大多数与土著“纳美”族人有着近似遭遇的中国人，今天却对卡梅隆的这种批判意识抱以反感呢？很显然，今天的国人实际上已经被现代化了，从物质生活到思想意识，都不再民

族，不再传统，甚至不再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太多感觉，自然也就不大会站在“纳美”族人的角度来看待电影中的现代人类了。

《世界博览》：那是不是可以说现代化就是民族性的反面呢？

杨奎松：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今天激烈批评卡梅隆和陆川的许多网民，本身往往也有着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从他们对陆川的批评中，常常可以看出他们那种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之所以他们忽而是民族的，忽而又是人类的，同样也是因为他们太现代了。因为中国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这让他们很民族，很自尊，对任何看起来像是对发达的美国卑躬屈膝的人都义愤填膺；因为中国如今也很现代，很进步，这又让他们很以中国能够被纳入到，甚至说不定哪天会引领这种现代的全球化进程而自豪，因此难以接受对人类文明力量的任何嘲讽与不屑。殊不知，现代的，其实就是西化的，通常也就不是民族的了。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最初发展阶段，就通过《共产党宣言》做过分析和说明。他的意思很明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飞速增长，最终将会以现代的形式，把适合于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观念和生活方式，扩展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而使一切民族都被吞噬、消融和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在我看来，根本上是一个生产和消费无限增长的过程。因为生产力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人口数量、对消费量和消费形式的要求等，也水涨船高，漫无止境。它在地球上最初造成的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种以生产力高低为条件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过程，是接连不断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逐渐地转变到更文明的方式，即通过经济和贸易的扩张，来取代过去弱肉强食的流血争夺。但结果并没有两样。

以中国为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一步步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从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方式，一直到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最基础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错，在和西方的

对抗中，中国像许多落后国家一样赢得了独立自主，但自1950年代以来它不是更民族了，而是更西化了。不仅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卫生、体育，乃至从衣着服饰、书写文字，一直到接人待物的礼俗方式，也都越来越远离了自己民族的传统与文化。今天的中国汉人到其他国家去，除非对方能够听懂你的汉语外，大概没有人能够认得出你是哪国人？而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它也同样开始运用其经济、贸易，甚至是各种手段，在世界各地四处去扩大和寻找原料与商品市场……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刺激生产和消费无限增长的另一个今天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的情况，就是对自然资源无止境的掠夺，和由此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空前的毁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争夺维持现代生产高速发展所需的各种自然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战争争夺的方式虽然停止了，但是，大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更大范围的现代化热潮兴起，资源的采掘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变得更加严重。如今，许多国家早就已经开始盯上了地球以外的星球，卡梅隆的电影不过就是把地球人过去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源掠夺的历史，照搬到他所设想的一个叫潘多拉的星球上去罢了。在他看来，人类继续如此无止境地追求现代化，即追求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化，最终势必要走上这样一条宇宙殖民主义的发展道路，把人类过去以发达国家侵略掠夺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到其他星球去重演一遍。

《世界博览》：那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吗？

杨奎松：我们理当注意到《阿凡达》这部影片提供给我们的另一层思考。这就是，人类今天这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真的就是最好的，或者如你们的问题所提的，是最“进步”的生活方式吗？卡梅隆塑造的这个叫“纳美”的土著民族，毫无疑问是一个虚幻的，因而也是被他理想化了的民族。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国人会用“小儿科”来

评论卡梅隆的剧情构思。他们很难理解，有什么人会放弃“文明”的生活方式，只为了与土著女人纯洁无瑕的爱情而甘愿去做原始人。

现代化的观念，本质上就是一种物质文明的观念。而中国汉人自古以来就很少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新中国建国后大陆人长期以来又一直受着唯物史观的熏陶和教育，因此，今天的年轻人要想理解卡梅隆的情感幻想，的确会十分困难。这就像我们今天许多汉人看阿拉伯人的着装（也包括对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的民族服装），总觉得怪怪的，认为不开化一样，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早已把西化视为正常，视为现代的标志，因而在内心里和思想上只会认同西式服装，很少会认同民族服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卡梅隆那样（包括陆川那样）的对自然和自然美的发自内心的向往和情感，因而完全无法设身处地或做换位思考。卡梅隆这部影片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是像过去许多影响那样，站在现代人类的角度，从同情和欣赏的角度，而是站在土著人的角度，来认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美，什么是它们所希望的“文明”。

这样一种思路其实是有助于我们了解很多问题的。比如，依照我们今天的观念，自建国以来，我们为少数民族做了很多事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援助，今天的边疆地区已经和过去焕然两样。在我们看来，这无疑是给少数民族送去了文明、进步和现代化。但是，为什么不少宗教意识较强的少数民族民众并不都能够认同我们的这种帮助呢？这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所谓现代化，与他们的宗教观和民俗观之间其实是存在着相当差距的。你不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感情上和宗教观上，你根本就理解不了他们内心里的幸福和文明是什么。

记得有一位外国来访者在某大学做讲演，讲到了欧美如何发达、进步。我们的一位陪同者当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是：欧美的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相信宗教迷信呢？把宗教视同迷信，这是

我们长期进行无神论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个问题即使在没有宗教信仰的西方学者看来，无疑也是很荒谬的。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在现代化的条件下，人和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有着多么大的文化差距与隔阂。

我们这里没有办法深入讨论文化的问题，但是，看了《阿凡达》的观众至少应当了解的是，生活在欧美现代社会，享受着远比我们绝大多数人充裕和奢华的高科技的物质生活的人，未必都感到幸福。像电影主人公杰克那样，迷恋大自然，信奉宗教，甚至愿意到艰苦环境下生活的人，并不在少数。

现代化最大的成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展了人类生存的空间和能力，创造了无尽的财富，改善了多数人的生命质量。但是，现代化也有极其严重的恶果，就是像马克思所说过的，它用生产力这一把尺子，把人类文化发展数千年来的结果一刀切了。凡是达不到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的民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统统被西方一种模式所代替了。与此同时，无限的生产和消费的结果，也严重毁坏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使地球越来越难以承受人类的存在了。按照近百年来人类生产力、资源采掘及环境破坏的发展速度，地球至多只能再维持如此巨大且还在飞速增长的生产消费需求上百年的时间。100年以后怎么办？最近的《阿凡达》、《2012》等几部美国影片，其实都在讲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最近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也是在关注这个问题。

《世界博览》：您对文明进步的看法是什么？

杨奎松：简单地说，肯定不是物质的满足，因为人的物质需求是永无止境的。这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问题，必须跳出物质生产力的标准，即不应当简单地拿所谓现代化的物质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明进步与否。既然我们讲的是人类的文明进步，就理当以人的感受为基本的考核点。物质的满足仅仅是一个方面，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和思想的满足，同样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幸福感。

比如，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穷，即使从国家或民族的总体上看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都提升了，但多数人感觉不到幸福，反而感受到不公不平，充满怨恨，自然不能认为是文明进步。同样的情况，多数人相信一种信仰，少数人不相信，却得不到选择信仰的权利，精神处于压抑状态，甚至自由权也受到限制，表面上这个国家或民族是和谐的，富足的，实际上也还是谈不到文明和进步。

我们今天讲文明，毫无疑问要以人为本。不是以少数人，或以多数人，而是要做到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我们今天讲进步，就要能够持续地不断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及其环境。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 \[4\]](#)

凡熟悉近20年抗日战争史研究发展状况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体验，那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史的研讨会，无论国内国际，大都较为客观冷静，即使是讨论日本侵华罪行的话题，通常也都较为学术。然而自90年代末以来，抗日战争史的研讨会日趋明显地出现了情绪化，甚至政治化的苗头。今天，在不少讨论抗日战争问题的学术会议上，常常能够看到一些学者言辞激烈地斥责日本民族的劣根性的情况。

导致部分学者的抗日战争研究逐渐情绪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日本自由主义思潮的泛起，和日本一些人在教科书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以及慰安妇等问题上，否认当年战争罪行的顽固态度。但是，无论是中日两国正式建交前，还是建交后，日本社会上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罪行的思潮和现象，为什么过去我们几乎从未见到有谁试图把学术研讨会变成深挖日本侵华罪行的声讨会和斥责日本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会呢？很显然，除去日本方面的原因，以及中国现实政治环境较以往为宽松等因素以外，中国学人心态的变化应当也是造成今天这种情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的国力日渐增强，国际地位极大提高，伴随而来的，则是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明显升温。这种情绪自然也波及学术界中来了。因为逐渐开始热衷于看到政府在国际关系当中对人说“不”，因此，日本政府及其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过去战争罪行的态度，难免会愈加激起部分学人情感上的愤怒。

学者也是人，人总有七情六欲。对历史上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深恶痛绝，对现实中日本政府和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抹杀甚至美化日本战争罪行的态度忿忿不平，这些也都在情理之中。但是，因为不理解日本人在过去战争期间的残暴和部分日本人始终不敢正视自己战

争罪行的态度，转而把这一切归结为日本民族的劣根性，甚至运用学术的手段来论证日本人天生残忍、虚伪，却明显地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使自己滑入了民族主义的泥潭。

民族主义有激励国民奋进的效用，但它同时也容易导致不能冷静客观地看待民族国家的矛盾，过分夸大他民族的缺点，甚至仇视他民族的倾向。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从事抗日战争研究的学者都有一些日本友人，我们深知这些友人的可爱与真诚。甚至，正如方军在《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即使是他随机采访的那些杀害过中国人的老日本鬼子，又有几个是残忍、虚伪的呢？他写道：“当年的老鬼子们不过是一群开机床的、种菜的、送信的、做木匠、开饭馆的、修铁路的、教书的、敲锤子的、当会计的普通劳动者，总之和你我一样都是平凡的人。”把他们变成魔鬼的，是战争，是战争环境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狂热政治煽动，并非是日本民族本身的特性使然。

战争会使人性扭曲，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了。不独日本人如此，德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不独日本人、德国人如此，中国人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远的秦军坑赵卒、清兵屠扬州不必说了，近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因攘权夺利，自相残杀战争就不在少数。国人所熟悉的名目繁多的刑讯逼供乃至坑杀异己的酷刑与惨剧，不少也发明和发生在这近百年生死予夺的政治军事斗争当中。因国民党的“清党”和共产党的“肃反”，死的人还少吗？即使举国军民一致抗日的八年期间，不也还是出现了诸如皖南事变、平江惨案等一系列同类相噬的悲惨事件吗？十分明显，只要在战争的环境下，只要摆在面前的是你死我活的选择，猜疑和仇恨的种子就必定会在原本善良的国民心中生根发芽和开花，直至结出罪恶的苦果。与其说它与日本民族的特性相关，倒不如说它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劣根性更准确。

今天，中日之间早已没有了战争，但是，在中日两国国民心中播种什么依然是一个极为现实且相当严峻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坚持批评日本当局对中学教科书问题的态度，正是希望能够在日本年轻一代的内心深处中，种下热爱和平的种子。但我很怀疑，在我们希望日本人能够让他们的下一代了解日本当年对中国犯下过战争罪行的同时，我们的一些学者却有意无意地在中国国民当中播种鄙视日本民族的种子，这能够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带来持久的和解与和睦吗？

中国有句俗话，叫“怨家宜解不宜结”。何况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更需要和日本等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因此，尽管今天有许多人对当年国共两党坚持用以德报怨的方法来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我相信，它还是有效果的。至少我们一直到今天都可以不断地听到那些感受到这一政策恩惠的日本军人充满感激的话语，看到他们由此所产生的对当年战争行为的由衷忏悔。而他们的现身说法，至今还在日本民间产生着巨大的宣传效力。试想，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亲历者的声音存在，自由主义历史观的鼓噪和影响，会不会更多更大呢？

日本不是德国，我们不能指望日本全国上下都能在短时期内勇敢地直面自己的历史。但是，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剂。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就已经不是过去的日本了。我们虽然依旧会发出警告，但今后的日本已经不可能脱出世界和平民主的轨道，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身为历史学工作者，我们理应具有历史的眼光，理应秉承理性和客观的精神来看待过去和现在，既不被民族主义情感所左右，更不以民族主义的情绪去影响国人。

[实事求是地总结抗战史的经验与教训 \[5\]](#)

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值得国人骄傲的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抗战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日渐为人们所重视，通过对抗战史，包括对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这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进行展示与宣传，必将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自豪感。

但是，应当看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仍旧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中间的一个环节。由于整部中国近代史包含着许多悲哀与遗憾，抗日战争史也绝难例外。实际上，我们今天对抗战史的研究与宣传，也仍在不断地受到这众多悲哀与遗憾的困扰。像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如何评价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如何准确地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都是多少年来国内外舆论以及相关学人无法取得共识的重大课题。它甚至影响到我们自己在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宣传上，表现得反反复复，令人无所适从。

人所共知，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说明自己的过去，这多半能够检验一个民族成熟与否。对战败国是如此，对战胜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虽为战胜国，并一度享有与苏、美、英等大国平起平坐的荣耀，但是，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并没有因此脱离弱小国家的行列。正如国际上几乎没有人把率先举国抵抗法西斯入侵的埃塞俄比亚列入二战英雄谱一样，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一本有关二战史的重要著作把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开始，几乎没有一部二战史的著作把中国战场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战场。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有些人把它看成是我们宣传和介绍不够，恐怕不十分准确。因为说到底，它并不是一个说理充分与否，或者鼓吹有力没

力的问题；它是一个观念问题，或者说，是实力问题。欧洲中心的观念怎么来的，是欧洲国家靠实力抢来的；区区一个战败国日本，何以能够不理睬受害国的谴责，拒不承认战争罪责？何以差点儿没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迫使美国为其投掷原子弹一事道歉？同样也是由于它有实力。

当然，实力问题也与事实问题相联系。苏、美、英之所以有足以载入世界战争史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北非战役、诺曼底登陆作战、中途岛战役、跳岛作战等一系列值得炫耀的战争纪录，它们之所以能够通过战争的方式大片大片地解放被占领土和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强盗最后无条件投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确实拥有强大的实力。反过来，中国抗战的最成功之处多半只在于它的持续抵抗和不屈服拖住了大批日军，它没有也无法通过大规模的进攻来收复失地，它甚至从未能成建制地歼灭过日军任何一个师团甚或旅团。正因为如此，1945年中国的最终胜利，不是直接在中国战场上取得的，而是日本在美国和苏联大举进攻下被迫投降的结果。

承认中国的弱国地位，正视中国的抗战远非尽如人意，是不是就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要振奋民族精神，是不是只有统计出庞大的歼敌人数和死伤人数，才能达到目的呢？未必。历史讲究的是具体的事实。本来，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大贫弱中国，又怎么可能在几年之间改变贫弱面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打败强国日本呢？抗战之伟大，原本在于近百年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倍受列强欺凌侵略的中华民族，终于有了举国一致奋起抵抗的一天；在于它凭借着十分落后的武器装备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日本人灭亡中国的迷梦；在于它以自己的流血牺牲赢得了它长期失去的尊严。尽管，它没有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侵略者赶出去，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胜利建立在他国胜利的基础上，

这多少是一种遗憾，一种悲哀，甚或一种耻辱，但是，坏事可以变好事。

我们中国人一向讲求实事求是。所谓“知耻近乎勇”，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都是前人主张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的经验之谈。回避我们历史上所存在的遗憾与悲哀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荣耀。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种遗憾与悲哀，能够实事求是地从这些遗憾和悲哀中汲取教训，我们是不是更能够以此来激励自己和后人奋发图强，更容易从中找到成功之“师”呢？试以抗战期间国人的团结御侮为例。如今国内有些抗战史的研究与宣传，往往热衷于谈论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如何成功，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说明第三次国共合作之可能与必须。他们全然忘记毛泽东当年如何表示“感谢”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当年接受中共“输诚”如何痛悔莫及；全然忘记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等令人发指的内部相残，似乎只要隐去“反共高潮”几个字，至今分裂的两党就能够取得共识。殊不知，此仅文字游戏尔，何足以服人？

其实，我们国力之弱，并不仅仅是经济上、武器上、外援上如何不济，它同样也在于当年我们国家政治与军事不能真正统一。抗日战争的坚持与成功，固然是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结成统一战线之结果；但抗日战争的遗憾与悲哀，又何尝不是与国共两党以及国内党派军队之间日益貌合神离相联系。抗战前期，团结御侮深入人心，统一战线比较稳固，于是就有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乃至淞沪会战等顽强的抵抗；抗战后期，党派、军队间磨擦冲突愈演愈烈，于是自然出现作战消极、保存实力，出现豫湘桂战役一溃千里之悲剧。外国史学家一谈到中国战场之“次要”地位，就要提到国共冲突之影响，这岂是毫无道理？中国本来就积贫积弱，国内党派军队又各有各的山头，各有各的利益，相互防范、磨擦、保存实力，乃至公开冲突，谁都担心拼命抗日会削弱了日后保护自己利益的实

力，抗战又如何能够不受影响？事实上，中国军队并非不能打仗。以国民党中央军入缅作战优于英印军的例子，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打疼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例子，有谁能说中国的军队就打不败日本侵略军？问题是，这需要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指挥。而抗战期间又不能达成真正的团结统一，党派利益始终影响着人们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理解。尤其是当政的国民党，始终顽固地坚持把一党私利视作国家民族利益，坚持用一党独裁的办法来压制和剥夺其他党派团体的民主权利，坚持要把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都统一到国民党一党政权的手里去，这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其他党派团体的各种形式的反抗，进而逐渐造成了党派利益至上的可悲局面。抗战期间抗日党派军队内部之间的种种对立冲突，何尝不是因此而来？一边打日本，一边想着如何保存自己那一党或一派的看家本钱，这仗又如何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

事实昭然，中国要强大，要能够不受强权欺凌，除了经济上一定要强，武器装备上一定要好以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要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了。没有真正的团结统一，中国也就很难真正强大起来；如果不能把党派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下，真正的团结统一也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试想，像这样实事求是地说明团结统一的历史必要性，是不是要比那种把不团结说成团结，把不统一说成统一的说法要更有说服力一些呢？

概括言之，实事求是地看待抗日战争的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抗战史中真正值得我们后人记取的经验教训，似乎应当是我们今后抗战史研究需要着重注意的一个问题。

[何谓民族主义及我们应该怎样爱国？ \[6\]](#)

问：200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关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讨论在一些人中相当热烈，并且也有很激烈的争论，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究竟怎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的，究竟怎样才算是爱国，不知道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的？

杨：我想，这种争论中国近代以来久已有之，不足为奇。不仅今天和过去会有争论，就是今后多少年内，也还是会成为一个很难统一认识的问题。问题的原因、由来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的问题。实际上，真的能够了解近代以来的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也好，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个人或政党，包括政府，都是有着与我们今天很不同的表现的。很难认为，爱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标准，并且是越激烈、越彻底就越真诚。

以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候的作为为例。没有人能够否认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但是，熟悉近代史的读者都知道，孙中山自走向革命道路之后所做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1895年的广州起义。问题是，1895年孙发动这次起义的背景是什么？是中国刚刚经历了中日战争史上第一次惨败、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而且，孙中山不仅选择这个时候发动起义，他还想要利用敌国日本的帮助，来实现推翻满清政府的设想。结果，这边日本正在北方进攻中国的海军和海防，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壮烈牺牲，那边孙中山却在广州几度秘密求见日本驻广州领事，要求日本给中国的革命者提供武器帮助。尽管日本政府这时没有理会孙中山的请求，孙所发动的起义没有成功，但是这件事无疑留给后人一个颇多困扰的问题：如果我们

相信那个时候邓世昌他们更爱国的话，那么，孙中山他们的行为又该如何理解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我们知道，1915年日本乘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占据了原本为德国所占据的中国的胶东半岛，并且利用袁世凯想要称帝因而需要得到列强支持的机会，向袁政府提出了变相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有资料显示，孙中山了解到日本政府的这一阴谋，曾力图抢在日本政府与袁政府达成条约之前，以日本帮助中国革命为前提，率先与日本达成一个类似的秘密盟约。围绕着这一事件的真伪，学界已经进行了长达40年的激烈争论。一些学者坚信孙中山不可能做出这种行为，因而认为这些资料不可信。但是，其实在这个时期，更重要的可能还不是这个没有签成的盟约的有无、真伪的问题，而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乘日军占领胶东半岛之机，在日控区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并且开始从日本占领区向当时中国政府所控制的山东其他地区发动进攻。要知道，日军占据胶东半岛这件事情，后来恰恰是爆发1919年全国范围的“五四”爱国反日运动的关键所在。然而，中华革命党这时却利用日军的占领，在日本军方的帮助下，建立起一支骨干为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级军官的革命党人的军队，试图以此来发动军事革命，推翻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如果我们不是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大概是不会把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的这种行动与“爱国”这两个字划上等号的。

当然，今天许多人还是深受阶级观念的洗礼。他们会强调说：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些革命组织，不过是些资产阶级的革命党；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从来就是不彻底的，他们爱国自然也不可能彻底。那么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共产党参与的例子。

1924年春天，正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双方却爆发了第一场公开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外蒙古的地位和前

途的问题。外蒙古这时还是在中国的主权范围之内。但是由于这个时候北京政府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顾不暇，因此已经失去了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苏联红军为解除退入外蒙古的白俄势力的困扰，乘机进入了外蒙古，并且在外蒙古扶植起一个人民党，还利用它建立起一个亲苏的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北京政府极力反对，并以此为由，拒绝与希望与中国建交的苏联政府发生外交关系。双方几度谈判，均不得结果。为牵制北京政府，苏联这时也和南方的孙中山进行积极的接触。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态度与北京政府略有不同，他与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一个联合宣言，宣布在苏联方面承认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赞同苏联红军可以暂驻外蒙古。对于这个问题，中共这时的态度又与孙中山和国民党不同。他们为了推动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协，公开主张对外蒙古的问题应当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行事。即应当允许外蒙古人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是继续保持与中国关系的现状，还是选择高度自治，亦或干脆独立出去。可以想象，中共的这一看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民党人的激烈批评。在这一事例中，究竟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更爱国，还是国民党人更爱国，抑或是共产党人更爱国呢？显然，今天大概没有人会说中共不爱国吧？那么，何以共产党当年对于维护中国在外蒙古主权问题上的态度，不仅不如北京政府彻底，而且还不如国民党坚定呢？

问：您提的这些事情真是让我很吃惊。实在是惭愧，我们也都学过历史，甚至很关心中国的近现代史，但对您谈的这些事情几乎是闻所未闻，即使偶尔看到了，也不会从您这个角度来考虑和比较。但是，我还是要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又该怎样来理解这些事情呢？

杨：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我在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时候，一上来通常都先要给同学们放一些投影，或留一个作业，让同学们看不同朝代的历史地图，比较不同时期古代中国的疆域和版

图有什么区别。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同学们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时候，脑子里先有一种历史感。就是要知道，中国近代以来的疆域和版图，并非古已有之。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的变动是非常大的，始终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到清末就停止了。严格地说，它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如果具体到每一条具体的边界的划定，某一小块土地或岛屿的归属，甚至延续到今天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最终的解决。试想，在这种并不确定的状态之下，我们又如何能够要求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在对领土主权等问题的认识上，一定要保持同一的观点甚或按照我们今人的认识来行事呢？即使到1949年以后，考虑到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有一些过去曾被许多人视为领土的地方划给了邻国，我们能否因此就断然指责主持划界的政府是在卖国呢？

问：逻辑上这似乎是不错的，但是，近代国人真的对领土主权没有一致的看法吗？就以东北地区而论，中俄之间也早就签订有《璦琿条约》等相关的界约啊？为什么东北的主权归属在近代以来还一直会受到挑战呢？

杨：这恰恰是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领土和疆域长期以来不能确定？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落后，因为中国近代化或我们今天讲的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得太晚。落后就会挨打的道理大家都了解。夏威夷距离美国本土四五千公里，美国人却用不着解释什么“自古以来”，原因也很简单。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国家，包括近代以来的中国，与古代的或中世纪的国家，是根本不同的。欧洲30年战争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主权和领土的观念，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确定的国家的概念。这个地方今天是你的，明天可能就是我的。直到这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战争实在打不下去了，1648年弄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于是渐渐地产生

出来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和建立国与国之间平等外交关系及其共同遵守公认的国际法之类的观念。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此以后弱肉强食的局面就改变了，尤其是对欧洲弱小国家和欧洲以外其他落后民族，这种情况其实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愈演愈烈了。近代的中国之所以会被列强瓜分来瓜分去，几度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就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

想当初，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就是因为根本不懂得国际法，又从没有过外交常识，因此才会把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拱手让出，并且主动与列强去协定关税的吗？在1840年以后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志士仁人第一位的目标就是要建国，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立统一的中国。至于这个国，究竟应当有多大，究竟能够包括哪些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国人之间自然也不会有很统一的看法。尤其是那些当年的革命者，多数以受满清统治为耻辱，公开以反满为号召，因此，他们最初的建国目标往往也不出“复明”的范围，即试图恢复明朝的疆土。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所提出的宗旨就能够明白。其宗旨总共16个字，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几个字，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当时意图建国的范围了。按照同盟会这时的建国设想，它自然是不包括关外，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东北地区的。其实，即使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孙中山他们当年信奉的，也多半只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观。他们反复宣传的，也都是要恢复和建立汉民族的国家。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就孙中山而言，甚至一直延续到20年代初。

问：但是，这样的主张，当时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够接受吗？

杨：当然有人不接受。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即使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个人和政党，对何为中国认识也不尽一致的一个例子。但问题

是，在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及其疆域范围这些问题上，当年主张“保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想法，远比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想法，要更符合我们今人的认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是站当时清政府的角度来认识国家民族问题的，和造反的革命党人不一样。他们除了相信光绪皇帝尚可为，值得信赖以外，因为以满清的国家为国家，故他们不愿看到因为孙中山等人的反满革命，而使中国已有的版图四分五裂。问题是，康有为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有多少代表性呢？我们要知道，在当年，一个国家落后，不仅仅会招致侵略，更重要的是会造成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的淡薄。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拿1895年的公车上书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略做比较，就可以明了其中原委。

我们知道，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的发生，与五四运动的发生，具有大致相同的背景，都是针对日本割占中国领土一事所进行的抗议，并且都是针对相关的正在签订中的条约。所不同的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使中国损失的是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而1919年的巴黎和约则使中国无法收回原本已租让给德国的胶东半岛。两相比较，马关条约的危害无疑要更加严重得多。今天有学者质疑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是否实际发生过，但也肯定当年确曾有过全国性的上书现象。问题是，当年的这种爱国举动，仅仅集中在文武官员和一些中心城市的举人中间，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几乎没有太多反响。不仅如此，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当时在广东，康有为、梁启超的老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在秘密联络日本领事，希望取得援助，乘机发动推翻朝廷的武装起义。这种情况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五四运动的爆发，全国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响应。其实际参与者，既有上层政府官员，更有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甚至还有相当多的普通市民，包括工人和店员卷入其中。不仅其参加人数超过公车上书运动不知多少倍，而且其影响也大得太多了。也正因为如此，公车上书运

动对政府签约几乎没有造成任何阻力，五四运动却能够迫使政府向列强各国表示了拒签的态度。

这两次目的大致相同的运动，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呢？这里面原因很多，但有一条值得注意，即1895年的中国，要远比1919年的中国更落后。

首先是信息传递的方式落后。1895年时，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工具基本上还是靠马和马车。靠这种工具传递信息，即使是发生了甲午战争，闹出了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这样的大乱子，稍远一些的城市要想听到消息，通常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时虽然已经开始使用西方的电报技术，但它多半也还只是官方通讯的一种特殊的手段，能够由此得到消息的人数非常有限。而由于电报技术不普及，自然也就没有报纸，普通人对于这类消息也只能靠道听途说，难以确认。再加上当时信息传播的方式还是用文言文，一般百姓也被隔绝在外。其对社会影响之微弱，可想而知。

其次是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由于1895年既未开始向欧美日本大批派遣留学生，在国内也还未开始办新学堂，众多莘莘学子还分散在乡村私塾里啃四书五经，城市作为教育和文化集散地的功能尚未形成，新式知识分子和接受新式教育的、自我感觉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学生群体也尚未出现。换言之，即使有割地赔款之类的消息传出，因为没有容易受到这类消息刺激的受众，也难以形成群众性的抗议浪潮。以康有为那时的热心，且又身在京城，能够组织数百上千举子进行公车上书，最后竟因顾及会试而不了了之，亦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了。

五四运动何以浩浩荡荡，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一，电报通行；第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巴黎和会的消息转瞬间即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乃至大街小巷；第三，新式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再加上青年学生齐集各大中城市，思想观念与1895年的举子秀才们根本不同，视爱

国为己任，极易受到此种消息的刺激，故而一呼百应；第四，帝国成了民国，民众观念上也大不同于晚清时的臣民思想，国家民族之事，在许多城市居民看来，也与自己息息相关，从而也就有了五四运动的群众性基础。

两次爱国运动，两种不同规模，影响到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大不相同。孙中山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时还可以在广州联络日本领事，而五四运动一发生，他连与日本进行秘密外交都不行了。史料记载，孙中山在“五四”之前还一直试图与日本谈判，取得其援助呢。其交换条件，主要就是表示愿意在其革命成功后，租让满蒙地区给日本用。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他此前十几年的言谈话语中，几乎找不到公开批评日本侵略的言论。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就不仅公开地批评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而且再也不曾和日本人谈论过用满蒙之类的权益来交换援助的事情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渐进及其效用，也由此可知一二。

问：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些不理解，即为什么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事实上辛亥革命已经创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和同盟会也已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观念了，为什么这之后他还曾一度尝试拿满蒙地区的权益来交换日本人的援助呢？

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先来谈论一下何谓民族国家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或民族，指的都是近代意义上的。而它是根本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国家的。其区别，除了有得到国际公认、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确定的边界和独立的主权以外，更重要的则是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古代的或中世纪的国家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朕即国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就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们所以不能同意说被清王朝玩弄于

股掌之中、以排外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是什么民族主义运动，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什么？是Nation State，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国家”，即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基础上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面，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共和国国民，不仅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权，而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可以定期通过选票来决定谁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和服务国民的权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因为，它是由那些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一个个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国民集合而成的。因此，我们今天所高唱的“爱国主义”的口号，不是诞生在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也不是诞生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而是诞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人民才会相信，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他们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也才会有所谓的“爱国主义”产生出来。如果当时的法国仍旧是路易十六的国家，法国人那时还会那样热血沸腾地去投身于爱国的战争吗？当然不会。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多少能够明白孙中山当年是怎样看待这种问题的了。很显然，他所以会那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满清皇帝统治下的中国，还是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都不是他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的国家。在他心目中，中国作为汉族国家的基本疆界是很清楚的。即使中华民国的最初建立，肯定了满蒙地区属于中国的版图范围，但是，第一，在孙中山等人看来，满蒙从来不在中国历代汉族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如今也仍旧鞭长莫及；第二，与其让满清皇帝或另一个汉族皇帝袁世凯长期统治下去，使中国人永远不能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不如暂时做出一些权益上的牺牲，创立真正的国民的国家。而类似这种观念，大凡革命党人都会有。当然，也不仅是革命党人，包括那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比如，杨天石教授就考证过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抗战爆发前与众不同的爱国态度。事实上，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胡适等人就对中日关系的继续恶化极其忧虑，深恐当时正在稳步开展的国家建设过程会因此中断。因此，他们在当时力主直接对日交涉，甚至力主承认伪满洲国，以交换日本保证不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华北地区。胡适甚至为此亲自上书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详细说明其理由。

再比如，关于对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和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看法问题，国共之间就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位，与当年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地位，正好换了个个儿。国民党执了政，共产党是革命党了。《苏日中立条约》因为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自然引起了当时主导国民政府的国民党人的抗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为苏联迫使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租借旅顺港和共管中东铁路，同样引起国民党人的不满。但是，对于这两个条约，中共当时却公开表示了欢迎的态度。这里面的原因其实也是一样，即共产党人相信，国民党一党统治的中国，不是人民自己的国家。而且这种暂时的领土和主权的牺牲，并不会影响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获得，反而会加速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旦它开始建立自己的全国政权，它就会想办法来收回这些权益。结果也是如此。国民党人当年没有办到的事情，共产党办到了，至少是相当部分办到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日”的相互指责，也就不难明了其中的关键所在了。至今仍倍受争议的毛泽东1964年对日本社会党人讲的那段“感谢”日本皇军的话，所反映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吗？

问：这是不是可以看成为是一种政治的谋略？问题是，一般民众恐怕很难理解。毕竟，国家民族的权益，在他们眼里是实实在在的。

杨：其实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和要求是非常不同的。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生活。即使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之

上，也有城市和农村，中心区域和边远地区，受过相当教育和很少受过教育等等的不同。由于民众的属性不同，利益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其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感受和主张也就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何况，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的认识也会变化。即使到了今天，对于国人津津乐道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对于民众的民族主义觉醒，包括爱国的程度，也仍旧有非常大的差异。一个我们和外国人提得最多的例子，就是中国抗战的同时，也是汉奸辈出的时候。当然，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断言：凡是与日本人合作过的，就一定是汉奸，凡是汉奸就罪不可赦。我想，应当有不少人都看过姜文导演的电影《鬼子来了》吧？那部影片所反映的是发生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庄的农民，抗战期间艰难地在日本人枪口下讨生活的情形。那里不算是中国最落后或最不发达的地区，但是情况却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许多农民从小到大没有进过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读过书报；他们一辈子都只是在和黄土地打交道，就连中国过去有过怎样的历史都不大清楚，你怎么要求他去爱国？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主士绅和地方官吏在租税关系中体会到的。因此，他们其实无法真正感觉到国家能够带给自己什么。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历史上可以为了生活而揭竿起义，却很少会像士大夫那样关心到底由谁来统治他们。在他们看来，哪个朝代的租税轻，哪个朝代的皇帝就是好皇帝。想一想历史上外族入侵时农民普遍表现出来的漠然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姜文电影中的农民没有我们通常在教科书中看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激情了。

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莫过于刘震云在《温故1942年》一书中所记述的抗战期间1944年发生在河南的事情了。当时已经到了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了，日本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横扫黄河以南的河南国民党守军时，当地的农民竟蜂拥而起帮助日本人打中国自己的军队。“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

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农民太痛恨国民政府驻守河南的将领汤恩伯及其军队了。由于守军的残酷压榨，导致那里的农民宁愿接受日本人，也不愿受自己人的统治。从这个例子中很容易看出当年民族主义在中国普及的程度如何。

当然，简单地认为这种事情只是发生在农村，也不公平。1947年底中共占领石家庄后，当时负责指导城市接收工作的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就发现，石家庄老百姓里普遍存在着一种“人心思汉

（奸）”的情况。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接收”变成“劫收”，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再加上国共战争不断，经济恶化，许多市民转而怀念日伪军统治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社会要更有秩序得多，生活也要更安定得多。同样，像东北这样的地方，苏军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关东军，结果因为其军纪不佳，再加上一度土匪横行，东北的老百姓中间也长时间流传着日本人比老毛子好的说法。而熟悉战后台湾史的人想必也知道，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后，因为国民党太过腐败，和日本占领时期形成巨大反差，在台湾不少民众中间自然也就发生了日本人比国民党好的心理。这种心理延续之久，甚至在国民党领导台湾经济起飞之后，也依旧无法消除。

我举上面的例子，其实只是想说明，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水平、环境及与国家的关系改善了，就简单地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甚或简单地去批评过去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如何如何薄弱，并轻易地指责别人是汉奸。我们必须理解，很多情况是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生长环境造成的。包括我们今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也都是在历史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成的。即使到今天，即使是在国家、民族这种问题上，这种历史的渐进也还是在继续其步伐的。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时，世界上只有60多个国家。经过60年后，如今的联合国已经达到200个国家，几乎是战后的三倍。换

句话来说，在这60年里，尽管已经不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不再有一个国家吞并另一国家的战争，国家的分裂，新的民族和国家的崛起，却仍旧在不断地发生着。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很庆幸，中国因为太大和有古老的历史，因此没有被列强所瓜分；中国因为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恰好赶上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历届政府或政党在外交上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因此才得以保有今天的领土和疆界。如果我们因为中国没有被瓜分，因为我们能够有今天，反而自我膨胀起来，相信应该去找历史的后账，甚至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如何如何，来看待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中国在世界政治当中的地位，那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注定要犯错误的。

问：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一种关系？

杨：中国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毫无疑问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正如我前面讲到过的，形成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至少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首先是它能够统一成一个民族，有独立、统一并且是稳固的政府，因而有得到国际公认的主权地位和领土疆域；其次是要有相当的民主，也就是说，国家不能是少数个人的，而应当是与多数国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即是多数人要认同这个国家，相信自己是可以行使主人的权利的。这样的条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显然不很具备。无论是晚清的皇权统治，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北京政府，抑或是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中央政府，几乎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无法实现第一个条件。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了20多年，连统一的问题和建立稳固的政治中心的问题都没有根本解决。其有效统治范围最大的时候，也不过内地的十几个省而已。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它始终没有能够改变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那种隔膜的状况。因此，中国作为近

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该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逐渐形成起来的。尽管这里面仍旧有一个渐进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但很显然，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才真正统一起来，它的疆域和政权也才真正稳固下来。同时，也只有共产党的统辖下，中国的民众才如此广泛地被动员起来，以至于变成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分，而且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氛围内，相当多的人甚至真心相信自己已经在当家作主了。这种感觉很容易让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得到满足。

我想，我们每一人应当很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建国前夕那句传遍中国而至今仍旧让人念念不忘的豪言壮语吧？即：“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理想，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此抛头洒血、前仆后继啊。但是，惟有共产党满足了中国许多忧民忧国者的这种民族主义诉求。这也就难怪，那样多原来寄希望于使中国更西方化和民主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包括大批工商企业人士，在国共两党最后的搏斗中，竟然会逐渐地倒向了共产党一边，欢欣鼓舞地一起欢呼一个统一的中国的诞生。傅国涌2005年出版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相当一批社会名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思想变化的情况，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当时的这种心态。他们未必了解共产党，更未必喜欢共产党，但是，他们发现，对于他们所追求的民族主义理想来说，共产党至少干得比国民党要好。在经历了几十年分裂的局面和持续不断的战争之后，这对他们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大的一种福音了。

问：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也很容易伤害到自己。您是不是认为离开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会使民族主义偏离积极的方向？

杨：的确如此。中国的问题很特殊，它在近代既是一个落后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因而很长时间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上国”。这种反差极大的情况，很容易造成国人强烈的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的存在，在国家危亡且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会起到动员民众和激励斗志的作用；而一旦国力上升，却依然受人轻视，甚至只是感觉受人轻视，都很容易反应过激。我写过一篇讨论建国初毛泽东访苏时中苏两党民族主义碰撞的论文，其中谈到的几则情况，就很反映问题。比如毛泽东动身前往苏联为斯大林祝寿这件事，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就颇多负面。武汉总商会会长以及其他一些工商界人士，就批评新中国领袖不应去外国给外国领导人祝寿。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历代皇帝都是接受别国的朝贡。即使学斯大林，也应该找一个边界地区，把别国的领导人请来会面，才足以显示新中国的自尊。再比如，新中国建立，急需发展经济、引进资金和技术，经国内地方领导人提议，中央批准，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成立了中苏经济合作的具体协定，准备由苏联提供资金和技术，在中国成立包括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四个合营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竟然引起包括北大、清华学生和教授在内的一些人的抗议游行，认为是便利苏联攫取中国经济权益的丧权之举。结果是，就连毛泽东回来后也认为应当彻底取消一切外资，才足以显示国家主权之独立。因此，不仅一切外资企业从此不复存在，随着斯大林去世，中苏合营公司也很快宣告取消。影响所及，当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时，主动提出中国南方剩余劳动力多，而苏联西伯利亚地广人稀，需要开发，正好可以互通有无，因此建议中国向苏联出口劳动力。对此，毛泽东当即反应道：苏方的这种提议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污辱，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是一样的。因为西方国家就是把中国看成是劳动力过剩而需要出口劳力来度日的贫困国

家。很显然，国人中这种看起来相当自负、实际上隐含自卑的矛盾心理，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也不无影响。不难想象，正是因为当年人们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来看待和处理对外事务，因此无论是在处理对苏关系上，还是在处理对美关系上，都很难摆正自己的地位，因而不断地发生问题。

问：您说的这种现象的确很值得注意。那么您是不是同意，说在落后国家，正确引导和教育国民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杨：中国既然是落后国家，它与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文化、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包括在政府管理与政治法律制度等许多方面，会存在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注定会导致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意识上存在着差距。正视这种差距，理解人们之间认识不同的由来，应该远比主观地引导和教育要现实得多。

那么，有意识地引导和教育是不是必要呢？当然有必要。我们不用举别的事例，只要比较一下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统治下农村地区落后农民民族意识的巨大差异就足够了。我们前面讲到过河南汤恩伯的军队被日本人进攻时，同时遭到当地农民围攻的情况。与此同时，抗战期间中共根据地里的农民，却明显地支持中共抗日。一位山西的农民当年就讲过：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喜欢八路军，小孩子们看到八路来了，都抢着去遛马；大人们也抢着去听差。为什么？因为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晋军强。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几乎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说：“迟早要当兵，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在八路军占领区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的农民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当然是和中共在政治上的组织、宣传、引导和教育分不开的。

当然，从上面的例子中其实也可以看出，中共及八路军当年能够把农民吸引过来、动员起来，教育其懂得为什么要救国，更多的也并不是靠讲什么民族主义的大道理，而是靠他们自身的言行和榜样，来使农民从比较中受到影响；用现实的利害关系，让农民了解保家保乡与卫国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

今天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与其批评指责别人不爱国，讲些大道理，倒不如从自己做起，特别是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台湾一位叫高振东的校长谈到过一件事。说的是广岛亚运会举行闭幕式，与会的数万日本观众离场后，体育场竟和开场前一样干净，找不到一片碎纸。天安门广场举行活动后，每每满地垃圾，需要十几辆卡车才能运完。相比之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引导和教育国人向日本人学习，处处注意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而自觉地为国争光呢？我想，他的这个说法很有些道理。以我个人的感想，当我们一些人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四面出击地指责他人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首先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问题呢？只有身正才不怕影斜，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反过来去指责他人，要求他人必须做到，那就不仅不足以服人，而且还很可能造成反效果。

正确引导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我看，最好是把那种对外的亢奋心态，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来。邓小平关于要“韬光养晦”的意见，恐怕不能轻易放弃。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并且做得不好的时候，说什么恐怕都是多余的。实际上，我们如今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我们要国人爱国，首先就要他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不熟悉、不喜欢，又怎么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祖国呢？

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受教育，而且从小就应当受到优良的传统文化的熏陶，绝不能空洞地强行去灌输一些完全不知从何而来的大道理。

要如此，又要首先使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裕，或者政府要能满足每一个家庭维持衣食住行和接受教育、医疗及养老的基本需要。因为“仓廩足”才能“知礼乐”；饭都吃不饱，又如何能够去学习爱国的道理？就是学了，又如何能够体会到国家对自己的好处？

还是那句话，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国民而言，更重要的还是现实生活的感受。所谓爱国的情感，理当是由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满足感，乃至从中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当然，“仓廩足”了，也不见得就一定能“知礼乐”。一方面，百姓要真正达到衣食无忧的境界，必须要确保礼乐不会崩坏；另一方面，没有相应的政治建设，国人越来越找不到当家作主的感觉，也就不会有对国家真正的忠诚与热爱。至于应当建设怎样的一种政治，在这里，我很愿意利用龙应台最近一篇文章中非常形象的说法，来畅想一下做一个对国家有自豪感的国民的感受：

他应当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发言批评，可以小担心被整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不会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会舞弊或不公；他进出政府大楼，不必经过卫兵盘查，不需要开介绍信；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各级政府和国营机构的年度开支，包括每一块钱的流向，不会轻易地被贪污和挪用，他可以随时举证要求调查；任何一届政府办事不公正或服务态度不好，他都有权用选票在下一届选举中来改变这种情况……

总之，一句话，与其高唱民族主义一致对外，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好我们面前急需要做的种种事情，让国人能早日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自豪。

（本文原载2005年7月28日《南方周末》，全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9期。）

[纪念抗战，反思自我 \[7\]](#)

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纪念抗战，缅怀历史，可以说不单单是因为那段历史的悲壮与惨烈。抗战仍跟今天和今天的时代相连。您怎么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对抗战胜利的纪念，重视那段历史？

杨：首先，自我记事以来，不要说每年，就是抗战胜利20周年、30周年、40周年纪念日时，都没有印象有过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大概一直到1985年才有了一次比较正式一点的纪念活动，而参加者也主要只是学术圈子里的人。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才真正算是有了一次由政府参与的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大会，出版的书多了一些，但也仅此而已。

为什么今年如此不同？毫无疑问是与政府的提倡和鼓励有关。为什么要提倡和鼓励？内在的原因也许很复杂，但有两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是国家的领导人亲身参加了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对俄国人的纪念活动及其规模印象深刻。而俄国从苏联时代起，每年都十分郑重地纪念他们卫国战争的胜利，逢十就更加隆重。类似这种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世界上许多当年参战的国家年年都会搞，我国许多人多少年来就主张我们应当向这些国家学习了。

另一个原因是大家都了解的，就是近年来，特别是从去年到今年，中日关系因为日本领导人不能正视战争责任问题，包括修改教科书问题，造成两国关系不正常，甚至引发了建国以来鲜见的全国性群众自发抗议游行活动。显然，隆重纪念抗战胜利，是显示政府重视民众情绪和声音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提醒日本政府要重视战争责任问题的一种方式。

至于我们自己为什么应当重视这段历史，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不可忘却的。因为它印证了一个道

理，即当一个国家的国民被广泛动员起来，具有了一定的民族主义觉悟之后，任何列强都不可能轻易地征服它。近百年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多少次，没有哪一次不是以割地赔款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为代价。而这一次所以不同，就是因为民众开始关心国家的生死存亡，并且有了影响政府的力量。从这一点出发，纪念这段历史，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尤其是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希望。

问：日本的这场侵华战争是不是具有必然性？该怎么理解这一必然性？有人说，日本侵华是因为中国在进入20世纪以后，由帝国转型民国，逐步走向现代化，日本惧怕中国会统一和复兴。您认为呢？

杨：日本为什么要发动这场侵华战争，不能仅仅从1937年“七七”事变谈起，也不能仅仅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谈起，我们甚至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日本这一个国家身上。有点奇怪的是，我们在其他问题的研究上，几乎都是随着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更广更深迈进，唯独在对日本侵华问题的研究上，近年来的言论有倒退的嫌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注意到，今天有不少人在谈论日本侵华的原因时，更多地谈论的只是日本的武士道传统、军国主义的发酵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所阐述的种种理由，还有人甚至把它归结为日本民族的所谓“劣根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尽管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有些人还是会大谈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和重新走上扩张侵略老路的必然性。

其实，要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应当回去看一点共产党人“老祖宗”的书。因为这种话题至少马克思和列宁都再三再四地谈到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里，反复地论述过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更是直截了当地论述了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世界市场，不得不走向战争的种种原

因。尽管他们没有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和变化，但是他们对他们所在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列强所以会不断地拓展和争夺殖民地，从而导致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出现，还是有相当精辟的论断的。作为那个时代后起的，同时又是资源紧缺的国家，日本当年自然也是一样按照帝国主义者的逻辑认识问题的。因此，它把毗邻的贫弱中国视为日本头号殖民地，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当时中国的近邻不是日本，换了其他列强，也一样会把中国看成自己在与其他列强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中的重要生命线。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时的那种心态，我相信他们未必会相信中国能够很快统一与复兴。他们倒是时时担心中国会 被其他列强所瓜分。因此，从便于日本入侵和反对其他列强干预的角度，日本的帝国主义者更乐于，并且鼓励中国分裂，这是事实。

问：按照有的日本老兵的说法，厉害的是八路，您觉得是什么使得共产党领导的力量逐步强大了起来？对共产党推进的农村社会改革在抗战中的意义，该怎么看待？

杨：我想，实事求是地讲，八路军有厉害的，国民党军也有打得好的。台儿庄不用讲了，南京大屠杀怎么来的？还不是国民党军在上海的抵抗把日本人打得太痛了，存心报复。还有昆仑关大捷，第三次长沙会战等，也都打得较出色。像衡阳保卫战，年仅39岁的方先觉军长，带领第十军，孤军死守衡阳城长达47天，创造了中日交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绩。战后，日军攻城部队的部分军官在世时都一直对方部的勇敢表示敬重。因此，对日本老兵的说法，也要具体分析。

当然，相比较而言，相当部分共产党士兵的政治觉悟和单兵素质确又在国民党士兵之上。和八路军作过战的日本兵会对八路军作战机动灵活，神出鬼没，一些士兵单兵作战战术熟练有深刻印象，也是可以想象的。这里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军队的征兵办法和政治工作与国民党军队有很大不同，即实现了全面政治化。在抗战期

间，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不是靠党在军队里派几个政工人员去解决问题，它的政治工作做到了家家户户，甚至做到了士兵个人。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都是从农村里来的，问题是国民党的兵大部分是强征，甚至是抓来的。而共产党很重视通过在农村中推进社会改革的措施和减租减息运动，给普通农民以实惠和利益，使农民切身感受到当兵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再加上共产党干部朴素廉洁，八路军亲民且纪律严格，凡军烈属不仅享受特殊待遇，其生产生活也有变工队帮助和照顾，这些都使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根据地的农民当中享有良好的口碑。共产党在宣传上也注意把当兵和保家卫国联系起来，和光荣模范挂起勾来，同时搞全民皆兵，在农民中组织民兵，在民兵之上建立地方武装。凡加入到正规部队中，村里必定敲锣打鼓，披红挂绿，使当兵变成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而且和家庭在全村的颜面联系起来。这些自然都使得八路军士兵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普遍高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士兵进入部队之后，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和思想熏陶跟得更紧，部队注重培养士兵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军官注意以身作则，老兵注意传帮带，同时注重精神鼓励。不少士兵进入部队之前早就在当民兵时或地方部队里面受过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到部队后，因为主要打游击战的缘故，休整的时间相对较为充裕，因此一些部队单兵作战的训练也能跟得上。原本八路军的武器就差，因此提高士兵的勇敢精神、单兵作战能力和加强部队的整体作战力都极为重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和多数国民党军队交手时，在武器装备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八路军的战斗力通常会显得强许多。而日军在敌后遇到的又基本上都是些国民党的杂牌军，和八路军比起来，日军士兵自然也会认为八路军要厉害些。

问：您提到了抗战中国共之间的冲突，您是否认为这是抗战历史中最为复杂，也是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问题？正如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所说，读懂抗战不容易，您觉得是否就是指的这方面的问题？

杨：系统地 and 全面地讲述抗战史实，是唯一能够改变目前读者头脑中对抗战史看法混乱的办法。讲抗战，不能只讲团结抗战，不讲磨擦冲突；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关公走麦城。而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讲抗战史，不能太过功利主义，绝不应当忽略当年存在的问题，否则怎么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应当让读者了解，为什么在这样一场全民族的对外战争中，特别是随着抗战时间的延长，中国人内部还是会表现出很深的裂痕？不仅有许多人投降于日本占领者，或与之合作，而且抗日的队伍中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与对抗。不仅国共两党有磨擦对立，就是国民党人内部，特别是中央系与地方实力派之间，也一样有勾心斗角、貌合神离的情况。要让读者了解，正是这些中国人自己的内讧和相互之间的防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抗战的力度，分散了抗日的力量，从而造成了中国必须要靠美国和苏联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军队，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遗憾。为什么读懂抗战不容易？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报纸上、展览中和电视上所宣传的，都是英勇抵抗、浴血奋战的英雄。但是，如果中国人真的都是像宣传的英雄们那样，哪怕只是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是像他们那样，并且能够团结一心，不要说一个日本，就是10个日本来侵略中国，也早就被打出去了。

问：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中，中国人自己之间确有过分裂，但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投降者或与日本合作者的问题。抗战中出现了太多的伪军，数量甚至超过了日本在华的军队。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他们是认同日本侵略者“解放”自己的意识形态，还是缺少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认同，抑或是保持自己生存质量的需要在诱使他们那样做呢？

杨：所谓汉奸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严格地说，这个问题在所有遭受侵略的国家中都有。在欧洲，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仅仅抵抗了几十天就宣告投降，进而成立了在纳粹德国控制之

下的贝当政府。法国的抵抗力量最初只有几千人，以后才逐渐扩大起来。苏联欧洲领土被德国占领时，一些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少数民族明显地支持了德军的占领。美属菲律宾除原自治政府总统逃亡美国外，其他政府成员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国内，听命于日本当局。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著称的缅甸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昂山，是带领他的独立军，于1942年随着日军打回缅甸的。泰国没有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占领，则是皇室和政府以与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向英美宣战，并服从于日本的调遣为代价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并非我们国家特别特殊。

具体到这许多国家，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有相当强大的抵抗运动，并最终由抵抗运动取代了战时与侵略国合作的政府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中国几乎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对法国的这些人通常要叫“法奸”，对苏联的要叫“俄奸”。而对于那些国内并无强大抵抗运动，战后也没有发生完全对立的政治更替的国家来说，这种问题几乎不被人所重视。如泰国、缅甸等国即是。包括那些有抵抗运动，并且在战后抵抗运动取代了旧政府的国家里，也有一些国家因为战后美苏爆发冷战，敌我阵营依照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重新排列，结果凡反共者，不论当年是否与侵略国合作过，都站到了同一战线上去，共同执政了。如韩国就是这种情况。中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如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收编了不少伪政权的军队，国民党收编的庞炳勋、孙殿英、郝鹏举等，共产党力争倒戈的吴化文等部都是。

上面列举的这些情况说明，造成与侵略者合作的情况相当复杂，既有国家认同的问题，也有政府认同的问题；既有生存所迫的问题，也有误判侵略者为解放者的问题，很难一概而论。也正因为这种情况十分复杂，我们会发现，各国民众对类似的现象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而且，现实政治的因素也时常在起作用，甚至左右民众的认识。因

此，只是简单地从爱国的角度来找启示，恐怕并不足以读懂如此复杂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仅仅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谈问题的话，我们必须强调国民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我们永远都不能排除有人会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与侵略者合作，甚或出卖国家利益。但是，如果大多数国民对国家事务拥有发言权，即孙中山所说的复决权和罢免权的话，那么，发生这样的情况就会少得多。同样，也只有当每一个国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并且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感到由衷自豪的时候，他们也才会认真地看待自己的言行与责任。

问：抗战最终使得中国实现了主权和疆域的完整，甚至使台湾也得以光复，抗战对中国疆域的影响是不是很大？您能不能讲述一下抗战对中国确定自己的疆域起了怎样的作用？

杨：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特别是它的领土范围，即疆域状况，根本上取决于其实力地位和现实的国际环境，而不取决于其政府有多少熟悉外交事务的专家，甚至也不会简单地取决于国民对国家疆域的看法如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其随后伪“满洲国”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争取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努力严重受挫。国民政府虽然从来没有承认过伪“满洲国”，但是一直到1940年，蒋介石等人一直对在暂时放弃收回东北主权的基础上与日本达成妥协，抱有幻想。具有类似情况的地区，当然不只一个东北。

这种情况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参战。由于美英等民主国家政府深信，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世界战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否认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两国领导人公开发表《大西洋宪章》，进而促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国家共同签署的《联合国宣言》的发表。这两个文件公开宣布各国均应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谋求领土扩张和变更别国的领土，支持丧失主权和自治的民族恢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由于中国是

最重要的反法西斯国家和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美英等国自然很快与中国签订了废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协定，并且通过《开罗宣言》等承认中国有权收回被日本占领的领土。1943年对于中国的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因为大批中国人追求了上百年的梦想，终于在这时实现了。

但是，说中国的疆域就此确定下来了，则为时过早。抗战结束，中国固然收回了东北及台湾的主权。由于中国当时的国力和整个国际环境的关系，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在抗战结束前夕却被迫放弃了，而且香港、九龙等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新疆的问题，也是到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之后，才在苏联的帮助下真正得以解决的。而看起来已经得到解决的台湾问题，竟然也因为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政府改变态度，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据此公开介入台湾海峡，干涉台海两岸关系，使之成为今天这种状况。

不难看出，抗战固然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争取到了主权独立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中国的疆域范围，但具体实现中国的主权与界定中国疆域的范围，却不是这个抗战所能决定的。

问：国民政府进行了十年的现代化努力被日本侵略战争打断了。有人说，抗日战争带来的人力物力的牺牲和消耗，推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半个世纪。但也有学者论证说，抗日战争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对此您怎么看？

杨：抗日战争是在中国的领土上打的，中国的损失自然十分巨大。国民政府从1928年以后在内战不断的情况下，依然全力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到1936年，国家的工农业产值达到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年的最高水平，其他各项现代化制度和教育、科研体制以及法制建设等等，也都初具雏形。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也就是差不多过去了20年时间，我国农业生产才恢复到那个水平，而其他一些制度性建设则长期滞后，不得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的

侵略战争打断了国民政府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努力，确实是损失巨大的。但是，说推迟了多少年，则很难严格计算。在有些方面，比如工业建设方面，肯定推迟了不到半个世纪，20年都没有。而在其它很多软件建设方面，推迟的则多半不止半个世纪。但这些却并不纯粹是由于日本侵略所造成的，还有很多我们自己方面的原因。

至于说抗日战争推进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则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只是由于日本的大举入侵和举国抗战体制的形成，才在当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统一。在此之前，中国虽然有过中央政府，但几乎总是不断地遭遇挑战。就是国民党人自己，也时常会挑战中央的权威，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这种情况直到抗战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还在不断发生。抗日战争的爆发，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中央政府的地位空前稳固，国人的民族意识也因此得以极大提升。当然，政府不等于就是国家，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不等于一定要认同某一个政府。但是，一个国家的统一，毕竟是建立在具有一个统一政府的前提之下的。而国家的统一，又恰恰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抗日战争使近百年饱受分裂之苦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了，增强了国民对国家认同的程度和对政府的监督程度，它自然也就促进了国民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心和参与，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问：有评论认为，今天日本对同是战胜国的美国、苏联（俄罗斯）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表现和国民情感，日本对苏联和美国从心底里感到恐惧，却一再对中韩耀武扬威，屡出狂言。这说明日本骨子里有那种崇尚强者的文化。对日本，除非中国当年能够自己打败它，或今后强大到美俄那样的程度，足以压服它，这种情况才会改变。对此，您怎么看？

杨：我认为，这种评论是不负责任而且错误的。说日本人骨子里有一种崇尚强者的文化，难道中国人骨子里就没有？至于狂人放话，

更是哪儿都存在。到网上去看看，中国网友豪气干云的人数恐怕只比日本多，不比日本少。何况，像石原慎太郎那样的日本人，不仅对中国和韩国口出狂言，同样也对美国桀骜小驯，很难认为他只是看不起中国人。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了解，那就是，石原也好，日本右翼也好，甚至像小泉首相也好，他们毕竟只是日本人中间的一小部分，他们并小就等于日本国民。他们的情感，自然也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日本国民的情感。要知道，在选举文化的背景下，政治家的许多过激言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目的地表演给他的选民看，为了政党或自己拉选票用的。而越是容易炒作，并且是越刺激的话题，也就越是容易被政治家们利用来影响民众，赢得支持。

战后中日两国的关系曲曲折折，但是，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日本实行的都是“以德报怨”的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取日本的国民。尤其是共产党，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到邓小平等，无不高度重视在中日两国民众中间，包括在大批中日青年中间培植友谊与信任。尽管对他们当年的一些政策或作法，在今天一些人可能不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他们当政的时代，中日两国民间的交流不仅十分活跃，而且相当广泛和深入。今天许多深刻反省日本战争罪责的老兵，恰恰就是受到了中国当年政策的积极影响，才得以根本转变观念的。

由于当时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比较融洽，影响到日本政坛，原本反共、反华的一些老政治家，也都逐渐改变了态度。那个时候也有过日本教科书问题，也发生过右翼势力公开挑衅的情况，但在当时那样一种中日友好的大氛围中，右翼的鼓噪并不能造成日本国民对中国情感的恶化。

十分明显，中日关系渐趋紧张，以至中日两国国民互生恶感，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力渐强，中国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迅速发

展引起了日本右翼及一些政客的高度戒备和不满。事实上，破坏中日友好关系，恶化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进而牵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恰恰是日本右翼势力由来已久的政治意图。而我们对此如果毫无认识，并且刻意针对日本右翼的挑衅行为煽动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之对抗，便利日本右翼挑唆、恶化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这就等于是自己往日本右翼的圈套里钻。

我们必须了解，无论是从世界和平民主发展的大趋势，还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而言，强化对抗，鼓动与日本国民为敌的心态和作法，都不值得推崇。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根本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建设富强。大概今天还没有人会幼稚到认为中国已经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教育等各个重要方面，发展到可以和日本看齐的水平了吧？既然如此，我们应当知道今天中国需要些什么。而要想让自己强大起来，在外交上就必须要坚持邓小平所提出的“韬光养晦”的策略。这倒并不是主张先卧薪尝胆，然后再去打什么旗帜，逞什么威风，而是希望中国能认清自己目前的主攻方向和最大的外交挑战来自何方，知道为加速发展和改革需要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不能四面树敌；希望中国人能习惯于成为更有内涵的国民，不仅有自知之明，分得清先后主次，轻重缓急，而且深谋远虑，踏实苦干，小事张扬。

问：抗战激起了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努力建设一个强大且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们在纪念和反思抗战胜利的时候，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还没有完成。我们应该如何汲取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推进这一建设事业呢？

杨：今天总结抗日战争史的经验教训，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可能有三条：

第一是要团结。抗战所以能打起来，国共团结，各派团结，大家服从一个抗日的目标，至为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条，只靠政府去打，大家都各自保存实力，甚至乘机抢夺地盘，抗战就打不起来了。中共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政府名下的国民革命军，也正是因为必须要服从于这个前提，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但是，中国的抗战，所以不能有效地抗击日本的推进，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除了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不如人以外，也与相互防范，互相磨擦，各派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许多时候保存实力，以致在军事上无法形成全国一盘棋，实现有效的统一指挥，从而在战役行动上难以达成预期目的有关。

第二是政府要能够赢得国民的认同。要对日抗战，根本上在于广大国民有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中国能坚持八年抗战不投降、不瓦解，没有国民和各派势力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认同，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有对国家的一致认同，没有对一个统一政府的认同感，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还是统一不起来。国民政府所以能够在抗战中成为中国统一的中心，根本上就是因为它自1927年以来经过不断努力，已经逐渐取得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而迫使各派势力都不得不承认其权威性。但是，到了抗战后期，其权威之所以再度受到挑战，国共两党重新冲突起来，甚至直接影响到战后内战爆发，也恰恰是国民政府渐失信用，以及和当时的共产党政权比起来，显得既独裁又腐败所造成的。因此，国家要想迅速发展，仅仅要求国民爱国是不够的，政府的廉洁自律、民主公正，真正造福于民，取信于民，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是要培养国民素质。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国民素质有直接的关系。中日战争，两军对抗，通常一个日本兵可以顶七八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一个日本步兵大队可以对抗国民党军一个上万人的陆军师，并不全是武器先进的问题，也与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有关。日本国民的素质当时为什么一般会远高于中国国民的素质？其中一个原

因，就是日本历届政府对国民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影响到日本普通国民的文化程度和对国家民族的认识水平，远高于中国的普通民众。日本战后，生活水平与当时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相当，可谓穷困已极。然而它仍旧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不仅学杂全免，并且在一些学生回家不便的地方，还免费为学生提供膳食。日本战后迅速崛起，与此也不无关联。与日本相比，我们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甚至还要靠海外和民众捐款来救助失学儿童。几十年来，口口声声最重教育的我们，国家的教育投入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例，始终在世界上排在倒数几位。甚至免费提供的义务教育，还赶不上世界上最贫困的一些非洲国家。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否则，当年抗战中发生过怎样的不幸，将来一样还会困扰我们自己。

（本文原载2005年9月3日《新京报》，采访人系该报时事访谈员张传文）

近代以来，中国打开国门之后，民族主义的声音就一直没有断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局部地区出现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对此，有识之士表示忧虑。《瞭望东方周刊》就此采访了杨奎松教授。

杨教授说，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民族主义都起过相当革命的作用，因而是民族国家形成的一种重要精神支柱。但是，民族主义历来是和民族悲情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高唱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强大而有自信的国家，它注定只能是落后封闭的国家，或者是自我感觉备受压抑的民族。

问：您认为极端民族主义适应今天的世界吗？

杨：在世界日益全球化和走向地球村的大趋势下，人类相互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密，甚至欧洲发达国家开始从经济共同体，大步迈向了政治共同体，国家民族的界限在那里像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那样，逐渐变得不特别重要了。其原因显而易见，就是这些国家间发达的经济联系已经日益超越了它们之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与隔阂。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今天日渐活跃、发达，绝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它恰恰证明了我们国家的部分国民还处在一种相对落后的，甚至是半封闭的悲情意识极强的状态。

问：请问您怎么评价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一些行为？

杨：我想没有人小懂得这个道理，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小可能小出现矛盾和冲突。一旦出了问题怎么办？那就要把握住理智，依据相应的法律，通过必要的程序来解决问题，而不能轻率地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许多犯罪行为，最后害人害己，都是当事人单方面行事以至失去理性惹的祸。人和人的相处是如此，国与国的关系更是如此。不顾对方的立场情感，不理睬国际公法和相关协调机制的

作用，单方面采用非理性的方式来挑起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小妥协地把本应冷处理或搁置争议的历史遗留问题弄到双方剑拔弩张的程度，小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往往还会造成南辕北辙的效果。

希特勒当年怎么上台？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割地赔款，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扬，希特勒及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借机煽动民族复仇，结果两相适应，取得了政权。希特勒上台后的种种举措和他在收复领土名义下的扩张，也确实一度给深受战败困扰的德国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和自尊感。但是，一旦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得到肯定，并促成了德国人的民族虚荣心，进一步的后果就不是德国人民所能控制的了。坦率地说，与其说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误导了德国，不如说是德国民众中日渐发酵的非理性的民族复仇主义，将德国推入了近乎毁灭的历史深渊。这种历史教训值得每一个带着民族悲情意识高唱民族主义的青年记取。

问：在1985年出现的建国以来第一次民族主义运动中，当时就有评论将其指称为“义和团精神”，而今经常有人将民族主义者（愤青）们比作是“义和团”，对于这个比喻，您认为恰当吗？

杨：我认为这种比喻并不恰当。义和团把洋人视为乱伦所生，视铁路为妖术，扶乩打卦，迷信“刀枪不入”，今天显然不会有任何一个“愤青”如此愚昧。而更为重要的是，义和团严格说来并无民族主义思想，他们除了能够在朝廷鼓动下扛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帮助巩固满清皇帝的统治地位以外，对何谓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甚至对中国的领土几何，其实都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两者就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今天有些人把二者相提并论，也并非毫无根据可寻。至少有一点两者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就是盲目排外。不论义和团迷信几何，其行动的突出特点就是排外，一切外国人、外国物，恨不能统统抛到爪哇国里去。而今有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网络上也或多或少

地表现出这种四面出击，任谁都认为是敌人，都想要通过对抗来解决问题的极端心态。照他们的主张发展下去，四面树敌，的确可能走上盲目排外的道路。

问：那么，政府、舆论应当怎样引导当今的民族主义思潮呢？

杨：凡落后封闭或有受压抑感的国家，就不免会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严格说来并不奇怪，也不值得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但是，相对于有些国家而言，如俄国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或日本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固然也会因为不满自己国家的境遇和国际上的地位，常常口出狂言，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十分极端，但他们毕竟自恃国力强大，不会去抬出历史上的张三李四来证明弱国也可以强硬对外。而我们的一些激进网民，却好像对自己国家的状况一无所知，盲目乐观，甚至相信当年毛泽东既然可以四面出击，何以今天我们对有领土争议的邻邦要忍气吞声？他们好像完全不清楚，即使强硬如毛泽东者，无论是在边境划界问题上，还是在对抗主要敌国的问题上，也都不能不为了合纵连横，做了许多退让和妥协。比较一下抗美援朝前后和1970年代中国在对美政策问题上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不同尺度，就不难了解，台湾问题会有今天这样复杂的情况，正是毛1970年代为了联美抗苏留下的一种后遗症。

由此也可以看出，今天相当一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出现，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以往中学、大学教育，特别是政治宣传长期误导出来的一种结果。首先是没有实事求是地讲述历史，把爱国问题简单化、概念化；其次是忽视了对学生世界眼光和和平、民主思想及其人道主义精神的培养与熏陶；第三是过分强调了“斗争哲学”的威力，过分渲染了武力威胁、诉诸战争解决问题的作用，以至于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年轻网民依旧津津乐道于建国以来运用暴力，甚至是用战争解决内外部冲突和国与国纠纷的事例，并以此来作为评价当今政府处理对外事务能力的一种标准。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过多地强调“斗争哲学”的结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部分国民心态的扭曲。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美国“9.11”恐怖袭击案发生之后，中国不少年轻网民的第一反应，不是为恐怖分子撞击纽约双塔会造成成千上万平民伤亡而担心和愤怒，反而是为不可一世的美国受到如此惩罚而欢欣鼓舞。甚至有网民公开在网上调查，以此次袭击后的第一反应如何，来衡量其他网民爱国与否。注意到诸多年轻网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乃至现实政治中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的重大事件，态度异常冷漠，甚至视为当然的种种讨论，就不难看出我们国家网民的极端民族主义心态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要想正确引导国人的民族主义，别无他法，第一要加强人性的教育，要全社会都来关心人，关心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推崇人道主义和人性至上的精神，真正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要彻底扫除以政党、阶级或国家划线，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极端心理；第二要引导国人树立“和为贵”的思想，造成一个真正热爱和平的社会氛围，坚持反对任何打着正义的旗号，滥用暴力和战争解决问题的作法。第三要实事求是的讲述历史，要让年轻人清楚地了解暴力和战争的两面性，特别是其残酷性，了解国与国关系的复杂性，了解前人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曾经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并熟悉其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性原因，等等。

总之，要让大家都了解，一个过分自我中心，一味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不惜动辄扬言斥诸武力，不关心他人死活，甚至不在乎自己同胞感受的人，注定了只能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不会对社会、对人类，有任何建设性的贡献。包括对他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的这种态度，也注定了只能是好心帮倒忙，很难真正起到有益的作用。

（本文原载《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44期。采访人为涂释文。）

[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9\]](#)

一、国共两党具有民族主义的共性

自从1922年秋中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李大钊等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国民党，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国共两党始终分分合合，打打谈谈。如果计算两党分合的时间段，我们会发觉，双方谈判或合作的时间，甚至比双方战争的时间还要长。当然，除了二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以外，两党间纵使有过合作，相互也甚少互信，不乏大敌当前兄弟阋墙之举。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对立，并没有妨碍它们在一定条件和一定基础上，长期保持和平的甚至是合作的关系，这表明，两党间仍旧存在着某种共性的东西。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究竟相互间存在着哪些带有共性的东西，当然不是今天这一短时间所能讨论清楚的问题。比如双方对民权自由的理解，对民生平等的赞同，特别是把1948~1950年间国民党内部大批党员干部自我批判及检讨的文字，与共产党各种言论和政策加以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确有许多可以相通之处[\[10\]](#)。但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还是双方所共有的民族主义特质。

长期以来，国民党断言共产党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工具，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双方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是真爱国。事实上，当年孙中山也好，蒋介石也好，陈独秀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成立或参加国民党（包括兴中会、同盟会及中华革命党）或共产党，多半都不是基于均贫富的冲动，其最初的动机反而大都是不满于国家和民族遭受列强压迫欺凌的现状，必欲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复兴。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能够实现党内合作，一个重要的条件也是双方在“打倒列强”，即实现民族革命和解放这一关键性的政治目标上有着几乎一致的看法。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再度建立统一战线，还是因为双方都把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同样

的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尽管明明力所不及，它上来首先着手进行的一件事，就是推行所谓“革命外交”，力图通过谈判尽快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而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也照样首先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列入到自己的议事日程当中。并且由于他们这时的实力远超过当年的南京政府，因而态度上更彻底更激烈。它不仅公开宣布废除一切旧有条约，坚持暂不与欧美列强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还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归还外蒙和放弃其1945年通过条约形式在中国东北取得的一切特殊权益，如此等等[11]。

很明显，尽管国共两党各自追求的理想有所不同，依据的理念区别甚多，借助的社会力量差别很大，所走的道路以及采取的革命手段也大相径庭，尽管它们都强烈地怀疑对手的民族性，曾经使用过许多极端的语言来抹黑对方，但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中谁也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像对方所斥责的那样，心甘情愿地成为列强的附庸。看一看蒋介石笔下对美国干预自己内部事务的强烈不满，注意一下毛泽东对俄国不惜破裂关系的强硬态度，可以说，国共两党，包括它们的最高领导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这一点上，基本的诉求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别。双方之所以坚持指责对方，除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所导致的分析模式和政治立场的影响以外，籍用蒋永敬教授之言，多半也是操之在谁的问题。“操之在我”，一切都对；操之在人，则一切皆非[12]。熟悉当今政治角力和政治话语者，对此当不会感到太过陌生。

二、民族主义优先，还是意识形态优先？

谈到历史上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和特点，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在此必须回答：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它们通常是把意识形态的考虑放在首位呢，还是会把民族利益的考量放在首位？或者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把民族利

益放在首位，什么情况下会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这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民族主义肯定可以成为连结国共两党的纽带。毕竟，国共双方之所以始终缺少互信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区别乃至对立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操之在我”，政治上就是以我划线。而以我划线的背后，意识形态的作用至为关键。

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受到某种特定观念左右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政策模式和政治目标。不难想象的是，当人们的思维方式固定化以后，他们通常很难不站在某种特定的立场，透过某种特殊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对手的思想与行为。抗日战争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国共两党基于抗日的共同愿望而妥协与合作，但它们却经常怀疑对手抗日的真诚性，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共产党说国民党“消极抗日”。结果是你疑我，我疑你，进而你防我，我防你，磨擦冲突愈演愈烈。导致它们无法信任对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彻底的捍卫者。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同他们各自所特有的观念意识是分不开的。从国民党的理念出发，共产党本来就是国际性的组织，是受苏俄指挥，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共产党人当然不爱国；而从共产党的理论出发，国民党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它不是依赖于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依赖于那个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列强妥协投降则是理所当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国民党极力防制、打击甚至试图根本取消共产党，共产党坚持壮大自己的力量，努力争取取代国民党，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既然观念上把对方看成是自己革命的敌人，为什么双方又能够妥协甚至合作呢？换言之，如果双方根本就不相信对方是民族主义者，它们又如何能感觉到自己需要与对方妥协或合作呢？其实，就历史上的国共两党而言，它们在一些情况下确实不是简单地因为认识到大家

具有共同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联合在一起的。但不论它们各自如何看待对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标和共同敌人仍然是双方重要的妥协基础。所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离开了两党的成员都是中国人这个基本的要件，它们很难会从内斗迅速转向外战。当然，直接促使国共两党做出这种选择的，还另有原因，这就是实力本身的局限性和来自外部的现实压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所以会选择妥协，通常都是由于它们在整个中国的政治角力场中深切地感受到自身实力严重不足，甚至面临危机，同时受到外部压力，因而必须要基于某种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来区分主次敌人和制定灵活的策略。如果对自己的实力有十足的把握，相信对手已微不足道，对不妥协、不合作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没有重大担心，即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同样强烈，也未必会掉转枪口，跳进同一条战壕[\[13\]](#)。

在此，我们仍以两度国共妥协的起因略作分析。

从1922年秋天中共领导人加入国民党，或国民党接纳共产党员，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最终确定容纳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国共两党都有相当现实的利益考量。在共产党方面，由于它的人数太少，需要借助国民党走向群众，实现掀动民族革命的计划；在国民党方面，由于它的组织长年涣散，又连续遭受失败，也存在着利用共产青年来推进党务，增添活力，使自己变成名副其实的群众性的革命党的某种现实需要。不仅如此，它们双方的合作也还带有满足苏联和共产国际愿望的现实考量。因为它们都必须得到莫斯科的援助。只有两党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变得生机勃勃和充满革命的气息，进而赢得莫斯科的高度重视。

同样，1936年的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一举扑灭燃烧了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的战火，也并非只是由于蒋介石的一念之差。当时的国民党、共产党事实上都面临危机。一方面，日本步步进逼，华北随时可能重蹈东北覆辙，南京政府退无可退，战争迫在眉睫，蒋介石从一年

前，即华北事变发生之日起，就已经在秘密地寻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途径了。另一方面，共产党战争失利，军事形势恶劣，临近华北前线，它也面临日本入侵的直接威胁，因此也早就表明了愿意和解的意图。双方没有能够及早地从秘密接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双方的政策目标都还不是十分清晰，沟通上也颇多问题，蒋介石更顾虑妥协后苏联的作用，共产党则在很长时间里事实上只是以反蒋派作为统战对象。随着西安事变爆发，蒋清楚地看到十几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存在着转向红军的严重危险，同时他也看清了苏联的态度，得到了周恩来拥蒋抗日、愿受指挥的亲口承诺，再加上有日本入侵威胁和国内社会各界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渴望，因此，权衡利害得失，蒋介石这个时候下决心和共，共产党这个时候转而全面挺蒋，也是水到渠成。

分析国共两度妥协与合作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即使在长期对立的国共两党之间，意识形态有时也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双方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去，民族主义是基础，实力不足是条件，外部的压力和各自现实的利益需要是基本的动力。正是由于在中国政治的角力场上，双方都不具备决胜的把握，甚至面临严重的危机，民族主义的目标才不期然地成为它们现实政治利益需要与考量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的目标则不得而被暂时束之高阁。

三、以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变化为例

要深入了解历史上国共两党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在事实上把民族主义置于优先地位的情况，20世纪40年代国共美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和恶化，是1939~1940年以后的事情。而美苏开始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包括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共斗争，也都是在40年代这段时间。按照毛泽东当年的概括，这一段时间的基本态势是“国共反映美苏”，即国共两党这时的一举一

动，都与美苏对华政策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连。照理说，国民党的背后是美国，共产党的背后则是苏联。而当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确实都强烈地指责对方受到了列强的支持。共产党严厉批判“美蒋反动派”，断言国民党之所以坚持戡乱内战，是因为美国企图控制中国，而不惜大量向国民党提供军援和经援；国民党最著名的是在联合国搞了一个“控苏案”，蒋介石又写了一本《苏俄在中国》，坚持国民党不是败于共产党，而是败于中共背后苏联的阴谋。但事实上，40年代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和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恰恰处于相当矛盾和吊诡的境地，与当年双方的说法颇多差距。

就共产党而言，从1940年秋天起，毛泽东就开始与莫斯科之间发生磨擦。所有这些政治上的磨擦，大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利益冲突。只不过蒋介石把自己等同国家，毛泽东则是把中共的利益直接视同民族的利益。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毛两度拒绝莫斯科出兵牵制日军的要求，断言如果中共被打垮，不仅不利于中国革命，而且也不利于苏联，这件事再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中共与苏联利益的不同。正是由于与莫斯科之间的这种分歧，毛泽东于1941年秋到1942年春开始发动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毫不留情地清除了党内“国际派”的影响力，此举更清楚地展现出毛小受苏联控制的决心。斯大林等人对毛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满，也因此而强烈地表现出来，在他们1942年以后对美国人的许多谈话当中，都可以看到对中共的批评。一个最典型的批评，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些“人造黄油式的共产主义者”。言外之意，莫斯科相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罢了。

令人称奇的是，几乎就在俄国人怀疑中共的共产党性质的同时，与共产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美国人却在对延安发生好感。而他们发生好感的原因，又恰好印证了俄国人的猜疑。1941年皖南事变后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时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最高当局对中国共产

党的评价。罗斯福说：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其实不过是一些社会改革的推动者。与此同时，相当一批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派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人员在和共产党人接触，他们不断地向国内发回各种赞美中共的报道和报告，也明显地同情共产党人。他们确信，延安比重庆更值得美国人重视，特别是从战后美苏关系变动的前景看，真正能够有助于美国确保其在东亚地区利益的，可能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就国民党方面来说，这个时候的情况其实也相差不多。40年代初期，美国虽然给了国民党极大的援助，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旧表现得相当强烈。发生在国美军事合作热络期的史迪威事件，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蒋并没有因为罗斯福及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经援助和在外交上的大力提携，而容忍美国将军凌驾于自己之上。同样，美国政府也并不因为国民党更接近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就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美国部分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对共产党高度同情和赞赏的现象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并且在赫尔利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很快有所改变，但美国对国民党的批评，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双方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就有所削弱。甚至在战后美苏冷战格局形成，意识形态的对抗开始成为左右美苏政策的基本政治考量之时，国民党也仍旧被排斥在美国战略盟友的大门以外。从马歇尔到艾奇逊，美国国务院的领导人宁愿在中国培植第三势力，宁愿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一步步接近胜利，也不愿意下大力气拯救国民党。来自美国的援助，正是由于美国的这种态度而时断时续，完全达不到国民党方面的要求，致使蒋介石对美国政府的反感与不满与日俱增。他之所以未能公开与美国人翻脸，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处境的日趋恶劣，使他不能不在公开场合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罢了。

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在处理同苏美两国的关系上，民族

主义的情感明显地占据支配的地位，意识形态的作用反在其次。这是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在和美国人或苏联人打交道时，都无法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来掩盖由于民族差异而存在的利益分歧。同样，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它们所关心的，根本上也是它们各自的利益。美国的外交官们当年之所以看中中共，一是美国军方出于对日本本土作战的需要，急于借助中共在沿海地区的根据地和军队，配合美军登陆作战；一是美国政府的决策部门高度关心战后美国同苏联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的力量抗衡，他们相信，以国共力量发展的趋势，内战势不可免，如果中共倒向苏联，那么不仅中国大陆可能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就连整个东亚乃至东南亚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赫尔利后来之所以能够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向，同样是基于其现实利益的考量。因为首先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成功地实现了跳岛作战，美国军方已经不需要借助中国大陆来进攻日本本岛了。其次，欧洲战争即将结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成定局，美国已经准备对苏联就两国战后在东亚地区的相互利益问题达成某种妥协，相反，美国更需要利用蒋介石的支持来安排战后世界的其它一些重大问题。战后美国之所以对国民党逐渐抱定了离弃的态度，其实也是由于它不能不把自己的战略重心放在欧洲，放在近东，结果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可以用于中国大陆，不管共产党的背后有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本上它的对华政策是以自己的利害得失为考量，而不是以所谓道德、信义和意识形态的亲疏为基础。

战后的莫斯科同美国一样，它所关心的也是自身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大国政治格局，导致了著名的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成为美苏制定各自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所谓苏联一开始就蓄意违反雅尔塔协定以及中苏条约，秘密支持中共向国民党挑战的情况其实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俄国人战后在远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确保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只要能够保证它在东北的权益，它并不在

意美国把中国大陆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同它处理欧洲的问题一样，对于其势力范围以内的国家和地区，它毫不退让，强硬到底。对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则拱手交出，毫不顾惜。正因为如此，对于东欧国家，它坚持要全面控制，没有共产党也要扶起一个共产党来，不许美英干涉。而对共产党势力本来较强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反倒抱以相当温和的态度，听任英美等国为所欲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斯大林在战后给毛泽东发的第一封电报，就是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和平，希望毛泽东也能同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交出武装，到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去当部长。因为他相信，中国不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毛泽东不应当制造麻烦，破坏美苏之间已经达成的妥协。在斯大林的这种态度里面，我们同样看出有多少意识形态的色彩。

重庆谈判期间，苏联的上述态度确曾一度发生过变化。但这同样是基于保护其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的考量。导致莫斯科产生这种严重担心的，是1945年9月美军在未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贸然派遣海军陆战队大举登陆华北，并公然协助国民党军队强行打通陆路交通，开入东北。美军登陆华北，对东北苏军造成极大刺激。为阻止国民党把美国的势力引入东北，苏方一度不顾中苏条约的相关规定，开始有意把共产党的军队引入东北。但随着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同时考虑到自己与美国在欧洲和近东的种种纠纷，苏联很快又回到了中苏条约的立场上来，把共产党的军队统统赶出重要城市和工业区，并逼使他们远离交通要道，重新开始与国民党进行交涉，试图通过经济合作的谈判，使国民党同意不让苏联以外的第三国染指东北。如果不是蒋介石坚持拒绝苏方的合作要求，很难想象苏联会违反中苏条约放手支持共产党在东北发展。正是由于国民党太过明显的亲美态度，终于促使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开始制造麻烦，共产党也因而得到了大批日军装备。

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莫斯科已经相信了毛泽东。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一致性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利益上相互需要的结果。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是，随着1947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与苏联闹翻，苏联重又开始怀疑与铁托同样强势的毛泽东，公开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此后，苏联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的情况下，令其驻华武官和大使在南京积极活动，推动各国外交官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和平；在毛泽东反复提出要求访问苏联的情况下，再三拖延甚至寻找各种藉口不让毛泽东成行；斯大林相信中共中央内部有人会随时向西方透露机密消息，他派在毛泽东身边的私人代表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反映中共领导人中存在着亲美派……凡此种种，在在表现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结果是，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愿意帮助拯救国民党的失败，另一方面是苏联也不热心推动共产党的胜利。具体到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简要地讲述这段历史，只是要说明，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能根本决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美苏的亲疏远近。蒋不满美国也好，后来仍不得不依靠美国也好，毛反感斯大林也好，后来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也好，最主要的还是在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上权衡现实利益得失的结果。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也同样小纯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选择盟友的，它们的实用主义特点同样不亚于中国人。

四、几点结论

由上面简略的分析，我们应当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区别国共两党，并且是导致它们长期对立冲突的基本要件。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通常是透过不同的政治利益及政权关系表现出来的。而意识形态从来不是构成一个政党或政权的现实政治利益的全部要素。换言之，不论国民党还

是共产党，当它们不得不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来考量和决定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时候，通常很难单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于一个生长在特定民族土壤中的政党或政权来说，与意识形态作为一面规定政党或政权政治性质及其政治理想的旗帜相比较，它的民族主义基础对于它的生存与发展，明显地更为重要。

其二，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其他什么主义者。换言之，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民族主义的悲情意识，及其对外来干预和歧视的逆反心理，几乎是半殖民地中国给他们打下的毕生的烙印。实际上，他们相信某种意识形态，首先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实现其民族主义等诉求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其自身民族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都可能不惜一切，包括与自己意识形态的对手进行妥协，来达到争取和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虽然，就自身现实的政治利益着想，基于不同的政治地位，他们对这类情况所做出的反应往往差别很大。但这种差别更多的往往只是一个操之在谁的问题。

其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只能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对现实利益及其政策调整目标的评估，通常是和政党或政权的实力评估成反比的。实力评估越强，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小，结果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少；实力评估越差，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强，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大。与此相联系，实力评估越强，对意识形态的诉求就会越发升高，其争取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也就容易趋于激烈；实力评估越弱，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就越会趋于节制，其民族主义情感也相对地比较容易保持理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角力场上的这种实力评估通常是以当政者的自我判断为主的，特别是遇到外来的或内部的压力过大时，这种判断就更容易发生偏差。

最后，民族主义这种情感，不仅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有，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和从来高唱国际主义的苏联人同样也有。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问题上，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从来都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寄希望于外部的扶持与援助，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同与接近，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毕竟，所谓外交实质上就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而任何一种利益交换，又都必须基于等价的原则。因此，当美国或苏联感觉到自己的付出远远多于它所能得到的时候，它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而当它们发现自己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收益，设法免除这种无休止的麻烦与负担的想法，就会导致其很快改变自身政策的现实目标。因此，国共两党虽然长期以来背后都有美苏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要靠它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注释：

[\[1\]指201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奎松著《革命》。](#)

[\[2\]原文刊于《凤凰周刊》总第455期，2012年12月12日，题为《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3\]《世界博览》对话录](#)

[\[4\]——《抗日战争研究》座谈会书面发言](#)

[\[5\]——《抗日战争研究》座谈会发言](#)

[\[6\]——《南方周末》访谈录](#)

[\[7\]——《新京报》访谈录](#)

[\[8\]——《瞭望东方周刊》访谈](#)

[9]——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演讲

[10]如1948年8月举行的有400多党内中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务座谈会，许多发言人都指出：国民党失败，败在脱离工农贫苦大众，只有上层，没有下层，只注重争取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民生平等毫未实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多数人民不仅不得温饱，而且还要受党政军的压迫。他们因而主张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将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统统驱逐出党，使党能够代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农工和进步知识分子，同时考虑在经济制度上选择社会主义方式，以便实行民生主义的革命。国民党在台湾的领导人一度积极推行所谓英国式的社会主义，即与此种教训之总结有相当的关连。

[11]实际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央政权建立伊始都不具备公开向列强挑战的实力。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最终难以继续，毛泽东1949年底1950年初赴莫斯科谈判之所以未能达到彻底取消苏联特殊地位的目标，都与他们当时的实力不足有关。但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刺激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12]“操之在我”，蒋永敬教授2000年6月15日在“中研院”近史所对余敏玲文章评论中的用语。

[13]这里可以提到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蒋介石1936年11月对于陈立夫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谈判时的指示，当时蒋刚刚取得了红军在甘肃黄河沿岸作战的胜利，把红军主力逼到了甘北一隅，因而提出的妥协条件一度十分苛刻，坚持红军只能保留三千人，其余统统遣散或由中央军收编。另一个是毛泽东在1948年底1949年初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的大部分主力部队之后，面对国民党和谈的要求所开出的条件，如1949年1月14日的八项条

件和4月15日的《和平协定草案》，同样如同一纸降书，毫无商量的余地。

第三编 书序谈史录

在这套集子中辑录的4种专著，围绕的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即20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中国革命。《“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着重讨论的是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受到俄国革命，亦即受到强邻苏联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问题。前者侧重于宏观线索的梳理与解读，后者侧重于说明毛泽东个人在其中的经历与作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着重讨论的是中国近代两大革命党，即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大陆近30年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的问题。前者侧重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总体变化的解读，后者侧重于国共关系史中影响重大的事件说明。

正如李泽厚所言：“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只不过，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这种革命，无论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专制统治或腐败政府的造反行动，还是以武装反抗的形式改变本民族屈辱地位的激烈行为，都不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二十世纪这100年的特殊产物。注意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国家依然持续出现，不仅很少受到谴责，甚至还会占据国际政治道德舆论的制高点，我们就更是不能不承认，任何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讨论革命必要与必然与否的问题，其意义本身就大可质疑。

革命之所以会引起争议，关键在于其暴力形式造成的人身财产伤害，以及以暴易暴的严重危险。但是，专制与反抗，同样暴力，同样血腥，同样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两害相权，孰能证明哪种破坏更大，为害更深？何况，当局者的感受又如何能够达到旁观者希望的水平？年轻的毛泽东当年参加中共时讲过他的一个理由，就颇能反映历史中人的思维逻辑。他说：“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若干倍，假定

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只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本辑各书虽已分别就各主题所涉及的史实与问题多有研究，但对中国革命这一中心问题并未能有总体的讨论。为避免读者分别阅读后对作者的“革命史观”难于把握，甚至产生歧义，以下特就作者对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背景、原因与内在逻辑，做一扼要论说，以供读者参考。

现代革命的暴力与血腥

人类社会在从中世纪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系列重要的革命。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等。这些革命激烈程度不同，暴力形式各异，但它们在破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都不能不沾染血腥。这当然不是现代革命本身所特有的问题，欧洲中世纪本来就是一个野蛮的时代，上千年的历史，其暴力、血腥、黑暗，对人类社会进步，乃至人身财产的伤害，无疑远甚于英国革命，哪怕是法国革命所造成的破坏。革命能不能不流血或少些暴力？历史地看问题，至少在最初要想摆脱那个黑暗时代的英、法等国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是被后人称赞相对温和的英国的所谓“光荣革命”，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前前后后也花了几百年，死了很多人，流了不少血，才成就了君主立宪。与英国自上而下的革命比起来，自下而上的法国革命就更要惨烈得多。它在革命的很短一段时间里，就以革命的名义处决了至少1.7万人，这也是后人认定由下至上的革命会以暴易暴，造成更多伤害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欧洲的这种革命浪潮进入十九世纪后仍旧表现得汹涌澎湃，但就像彼得·卡特佛特指出的，这些频发于十九世纪欧洲国家的革命，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没有可以与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法革命相比

拟的。十九世纪以德国为代表的一系列欧洲国家迈向工业化的社会变革虽然也有很重大的意义，但它们多半都在当政者的主导之下，以较少暴力、流血，较少引发社会剧烈震荡的情况下，只通过渐进的演变就实现了。

以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为职任的现代革命的发生，根本上是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活方式在全世界迅速扩张的推动与刺激而成的。这种制度的变革具体会采取什么形式，除了与环境的挤压和执政者的觉悟有关外，往往还要取决于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与发展水平。尽管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把人从专制和等级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但颇为吊诡的是，以“自由”、“平等”为号召的资本主义，在全面挑战和摧毁专制帝国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社会平等与民族平等的审判席上。

资本主义刚刚诞生即成为新一轮革命的目标，是生产力急速发展刺激资本对利润狂热追逐的一种结果。残酷的生产扩张和资源掠夺带来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也摧毁了一切传统的生产关系与分工形式，把大批小私有者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它用坚船利炮把它的廉价商品及其制度文化强行推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一切还笼罩着道德和情感光环的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民族关系、社会关系及家庭关系，也制造了更加赤裸裸的新的社会不平等。但是，资本主义在制造新的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时候，也把它所由产生的自由、平等的观念传播到全世界的几乎各个角落，从而帮助一切感受到不自由、不平等的人生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意识。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最遭人诟病的，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在自由竞争原则下生产的无政府，却不时地会因为生产过剩导致整个经济陷入周期性的严重危机之中。正是这种极度不合理的现象和坚信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使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马克思、恩格斯认定资本主义已无可救药，完全可以采用一种合理的制度取而代之，从而消除贫富差异乃至分工的局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而他们当时能够想到的办法，也是革命，而且是暴力的革命。他们相信，运用阶级暴力与阶级专政的手段，推动产业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就可以根本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先进、也是最公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从马克思主义盛极一时的重要背景中，汉娜·阿伦特发现，构成现代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贫富差别造成的社会问题。她指出：“只有在现代，而不是在现代之前，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比较英、法革命惨烈程度的不同可以看出，越是有那些意图打破贫富壁垒的理想家或穷人直接卷入的革命，越是容易充满暴力和血腥。

与由上而下的英国革命相比，几乎发生在同时，且具有同样历史地位的美国革命，应该比法国革命更具可比性。这个更加理性，更少暴力的美国革命，也是最多被后来的思想家、理论家拿来为例证的。托克维尔相信，美国革命之所以优于法国革命，根本上在于美国没有像法国那样形成一种盲目一致的观念；苏珊·邓恩则相信，美国革命的领袖们面对的原本就是与法国不同的社会，那里的人们主要关注的不是民族国家问题，而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与权利。

不论我们如何看待美国革命的理性程度，作为一个刚刚由五花八门的欧洲各国和不同族群移民而来拼凑成的新社会，它当时的革命诉求的确与法国人完全不同。它的革命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暴力，归根到底还是和它不存在法国那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然而，即使没有发生法国那样的底层革命，也并不意味着就不会使用暴力。美国革命首先是建立在反对英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基础上的，不为独立而战也就轮不到美国人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制定各种法案。同样的情况，进一步奠定了美国特有的现代制度和理念的另一场战争，即十九世纪

中叶美国政府发动的争取黑奴解放的内战，就更是要诉诸暴力了。这场战争更是流了不少血，死了很多人。

落后国家革命的多重使命

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因反抗满人统治和改革清廷政治遭遇失败的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都辗转逃出中国，先后流亡到了欧美日本。几年之后，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开始对他们曾经寄予希望的欧美资本主义抱以了某种怀疑和批判的观点。梁启超是第一个公开扬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是中国第一个致力于撰述人类共产主义远景的思想家。孙中山更是兼具理想家与实行家的双重特质，他在1905年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公开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的革命组织，并且宣布了一个综合现代各种革命任务的政治纲领，合称为“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相信，这是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顺应世界现代潮流的三大革命目标。故实行三民主义，就是要进行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所谓民族革命，就是要推翻中国的异族统治，即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所谓民权革命，就是要实现民主共和，“创立合众政府”；所谓民生革命，就是要照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使社会分配公平，避免和消除资本主义弊病。孙中山又时常强调，他主张的三民主义，就是以达成美国总统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为历史使命的。

不难看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多半是以美国革命的目标为其蓝本的。与此同时，注意到欧美资本主义阶级分化、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的弊病，孙中山也特别注意汲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各种有助于校正资本主义弊病的思想观点。他显然相信，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制度选择。孙中山对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雄心之大，在他1905年开始全力推进中国革命之初，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

当年专门去到欧洲社会党国际总部去告诉其领导人说：中国革命成功之日，也将会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建立之时。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努力，一度使落后的中国得以成就了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中看上去最为成功的一场革命。1911年，革命党人不仅步法国革命之后尘，推翻了帝制，创立了共和，而且实现了美国式的民族自决，达成了原定民族革命的目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满族统治者极端孤立，多数汉族官员都站到了革命阵营一边，这场革命几乎没有流血。然而，也正是因为满族统治及其帝制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因此，这场革命没能解决中国任何一个实质上的问题。随着汉族权贵与革命党人关系破裂，没有了中央集权的帝制，中国近两千来的大一统格局几近土崩瓦解，不仅边缘区域或先或后地脱离了中央政权的控制，就连内陆十八省事实上也四分五裂。革命党追求民族自决、国家独立、社会改良未成，反而又多出一个非用强力不能达成的统一国家的紧迫任务来了。

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东方落后国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革命，发生在欧洲最东部的两个国家。先是俄国，后是土耳其，它们都通过战争和暴力成就了革命党人所追求的革命事业。土耳其军事将领凯末尔（又译为基马尔）以民族独立为号召，依靠社会中上阶层，不仅成功挫败了协约国的殖民企图，成就了民族革命，而且推倒了君主制，创立了共和国，进而开启了社会改革的进程。列宁及布尔什维克走的则是典型的由下至上的法国式的革命道路，它也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确保了民族独立。但是它更进了一步，即按照马克思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办法，用强力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不难看出，二十世纪落后国家大都面临着三重革命选择，即民族独立、共和民主，以及社会改造。有些落后国家的革命者会选择走土耳其那样的革命道路，以民族独立为最高追求，辅之以共和政体和社

会改良的目标；有些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则希望学俄国革命的榜样，一步到位地走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然而，就像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讲过的那样，二十世纪本身就是充满了血腥的世纪。作为20世纪最早揭旗革命的落后国家，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俄国，它们的革命不仅会斥诸于暴力，而且没有哪一个选择了欧美的政治理念和民主模式。依靠军事力量，或靠暴动夺权的土、俄两国，虽然所走道路，两者靠强力达成政治与国家意志统一的目的毫无二致。因此，它们表面上实行的是共和制，实际上却都选择了一党专政的统治办法。两者的最大区别仅仅在于，革命后的土耳其虽也用强力压制反对派，并展开种种社会改良，它始终还是受到社会精英阶层的指导，因而延续着传统社会的固有秩序；俄国革命却是典型的所谓平民革命，革命后的俄国不得不破旧布新，重新建立新的阶级统治关系。因此，同是一党专政，俄国革命的暴烈程度就远比土耳其革命要高得多。

土耳其模式在中国的夭折

1920年代，东方落后国家的两大革命趋向在中国有了鲜明的表现。继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之后，中国有了一个新的革命党，即受到毗邻的苏俄共产党扶助的中国共产党。地理上与革命的俄国毗邻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共产革命就会成功。土耳其同样毗邻俄国，土耳其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也是在俄共的帮助下组织起来的，它比中共还早诞生了将近一年时间。但是，由于凯末尔手握军权，其民族独立的斗争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因此，他不用过多地求助于苏俄的援助，可以对土共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直到凯末尔去世之后很长时间，虽然有苏俄及其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土耳其，共产党始终都没能发展起来。

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土耳其的关键之点，在于孙中山不是一位有显赫声望的军事将领，国民党也没有一支自己的军事武装。久困难抒的

孙中山国民党，最终只能求助于苏俄，以便获得革命必须具有的一切条件。为此，孙中山也就不得不付出相应的代价，即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意他们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工作。

不过，孙中山固然不是军事将领，他却具有中国凯末尔的高度政治威望，他和凯末尔一样强势独裁，也像凯末尔那样坚决反对中国走俄国革命的路。孙中山敢于联俄容共，就在于他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力，他对于共产党借助国民党壮大自己力量的可能性并不那么担心。客观上，共产党人也很少可能挑战孙中山的个人威权地位。换言之，只要孙中山活着，中国革命多半也只有一种发展可能，即与土耳其革命的模式和前途相近，断难走到俄国革命的路上去。然而，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初见起色，孙中山却因肝癌病发突然离世，中国革命随之会发生道路之争也就难以避免了。

1925年以前的中国已经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之中，1925年以后的中国依然还是一个强人林立、群雄纷争的局面。继孙中山之后挑起国民党大梁的蒋介石表面上更像中国的凯末尔。因为蒋也是一介军人，孙在世时已做到国民党第一所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校长，培养出一批年轻军官，因而得以成为国民党新建成的军事力量的最高领导人。但是，蒋介石却全无凯末尔那样的威望。无论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国内外，其资历、影响，以及知识和经验，既不能和孙中山相提并论，也难望凯末尔之项背。

蒋介石之能够被孙中山看中，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甚至不是因为蒋有出色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鲜有军事人才。蒋作为孙几乎唯一信得过的军事参谋，在国民党军事崛起之际正逢其时，他对孙中山的忠诚，以及他的政治意识，都足堪胜任。但是，蒋为孙中山工作总共不过八九年时间，在国民党内根基甚浅。在孙中山去世后，蒋能够迅速窜起，靠的还是苏联顾问的大力提

携与帮助。即使如此，蒋能够用以支撑起自身实力者，也只有黄埔生指挥的少数武装；他实际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仅限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周边的地区。如此浅显的资历和有限的实力，使蒋介石必须一方面自诩正统，极力排斥异己，巩固自身地位，占据革命道德和权力的制高点；一方面又不能不用机会主义的手法，纵横捭阖，以应对各种矛盾冲突，伺机削弱各派力量，蚕食地方势力，以求逐渐达成一统权力之目的。

靠纵横捭阖之策，并施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政治手腕，的确增强了蒋介石在党内和国内的权力地位，但太过机会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也因倍受争议有损于蒋个人道德形象与威权地位的建立。由此导致的结果显而易见，国民党军队内部并没有因为蒋的权力逐渐增强、中央地位日臻巩固，而使蒋拥有孙中山那样一言九鼎的地位，或像凯末尔那样拥有国父般的崇高威望。因为无力彻底改变军事指挥、组织、后勤及兵员补给系统，越来越多的军阀武装变成国民革命军甚或并入中央军的结果，不仅使国民革命军，而且使蒋系中央军内部也日渐发生分化。无论内战外战，这支名义上的“党军”，一旦遭遇强敌，经常都会有内讧和被分化的危险。

蒋介石人生事业最显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1930年代中期。当时的蒋年富力强，一一挫败党内对手，并征服了各种反蒋的军事联盟，还把共产党在城里的组织消灭殆尽，把共产党在农村的根据地几乎全部铲平，把剩下的中共武装赶至西南、西北偏远荒蛮之地。1936年10月底，蒋介石正值知天命之时，各地贺电频频，甚至献机祝寿，也显示威望上升。而中共这时全部军队又集中到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甘肃北部，更是给蒋介石提供了在军事上彻底解决共党问题，最后成就全国大一统的极佳机遇。

然而，表面辉煌的背后依旧是重重隐患与危机。仅仅一个月之后，蒋介石携众多军政高官齐集西安，踌躇满志地准备一举完成剿共

军事。不意其副手——西北剿总代司令张学良，联合西北地方实力派将领杨虎城等人，于12月12日突然发动兵变，一举破碎了蒋介石的统一大梦。国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机会，就此失去。必须先行解决西北反叛武装问题的蒋介石，反而不得不委曲求全地给红军提供粮饷，并与共产党商谈“改制”、“改编”的条件。等到西北张、杨两部问题解决后，中日战争竟然打响，“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蒋连苛刻条件都坚持不了了。国民党至此再无可能解决所谓共产党问题了。

俄国革命模式在中国的挫败

中国之成不了土耳其，就一定能成苏俄吗？也未必。

中国多数期盼变革的知识精英，对俄国革命从来都是羡慕与恐惧交夹。俄国人建成第一个平民政府，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集举国之力实现工业化……。凡此种种，都让国人羡慕不已。但是，俄国的暴力革命、一党独裁、阶级压迫、政治清洗……，也让众多国人触目惊心。因此，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凡加入共产党者，无不需要挑战自己刚刚在人性解放思潮洗礼中形成的人道主义关怀。

1920年12月毛泽东决心加入共产党。在认定只能走俄国人的路时，他曾对自己的选择做过具体的说明。他说，用渐进改良的和平办法改造社会一直是他的志向，但实践的结果证明，要想渐进改良，只能从教育入手，教育的办法至少需要经过几代人之久，我们能否忍受得了资本家鱼肉如此之久？且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现在世界，这一切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人是欲望的动物，历史上专制主义、帝国主义，没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资本家又如何能回心向善？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法律，有政府执行法律，有军队与警察保障其利益，有学校和报馆帮助其进行宣传教育，在资本家统治下

如何能施行反资本家的教育？他的结论是：“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一年前还公开反对暴力、流血，两个月前还在积极推动渐进改良，这时思想转变，当然没有那样彻底，内心亦承认俄式革命确是恐怖的方法，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同情俄国革命，进而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观点，不消几年，他就已经自觉地依据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始认识中国与世界，认定“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切有产阶级分子，不是敌人也离敌人不远，只有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力量。

但是，简单地运用这种俄国式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并没有把共产党人引向胜利。

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但现代社会条件下阶级的差别，更多地是经济方面的差异决定的。由于经济利益的不同，不同阶级的人会有不同的政治考量。但人毕竟是社会的人，种种环境的影响下，同一阶级的人未必会有同一想法或追求。尤其是在现实政治中，经济状况相近的张三、李四常常看法不同、立场不同，参加的党派团体不同。这就迫使共产党人判断敌友往往只能着眼于政治态度，顺我者赤，逆我者黑。

早期制定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时，共产党人的判断是，其政治上反列强、反军阀，和中共部分主张接近，因而可为盟友。但国民党内围绕着联苏容共问题又意见分歧，因而共产党人认定国民党内含有不同阶级。其中，反对联苏容共政策的分子，就是资产阶级右翼，定为右派；态度中立犹疑者，应属资产阶级左翼，定为中派；支持联苏容共者，可视同小资产阶级，定为左派。于是，总体政策上对国民党是

统战，要团结，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内部掌握上却要贯彻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原则，要把国民党看成是竞争对手，或是分化对象，发展左派，中立中派，打击右派。如此统战，结果如何实不难想象。

孙中山去世后，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很快分裂。1925年分裂出去的国民党人，被共产党人定性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视为政治上的敌人。1926年初蒋介石又与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因而被共产党人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视为新右派，要又斗争又团结。斗争的结果，是1927年4月蒋干脆发动了反共政变，并与得到苏联和共产党支持的武汉国民党人翻了脸，基于这一情况，共产党断定整个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不料仅仅三个月后，武汉的国民党人也废止了联苏容共政策，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共产党人认定小资产阶级也退出了革命阵营。不得已，共产党人公开举起了俄式革命的“苏维埃”旗号，废止了统一战线政策，宣布中国革命进入更高层次的“工农革命”了。

上述这种政治认识的逻辑和政策变动，实际上都是基于俄国革命的经验，由中共上级指导机关，即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推动形成的。依照俄国革命模式，凡落后国家，都要经历这种从联合战线式的多阶级革命，革命阵营不断缩小，敌对阵营不断扩大的过程。革命最后一定会分化到只剩下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单独革命的程度。问题是，俄国革命从20世纪初开始，最终走到一个阶级革命和专政，至少经历了十几年时间，即使是1917年十月革命，也还是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斗争实现的。它到1921年才最后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赶出了政府，实现了一党独裁。而中共革命从1923年实施统战开始，到1925年就部分地赶走了资产阶级，到1927年更是接连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全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前后才用了不过4年时间。而它不仅没有政权，连军队都没有，结果无异于自我放逐。

一切从阶级眼光看问题，非黑即白，你死我活，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另一个同样致命的后果，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

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其实就是看不见具体的人，只看到阶级的人。从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角度，认定凡是敌对阶级的人，一定都是坏的、恶的、反动的，必须仇恨、防范甚至消灭。尤其是在军事斗争条件下，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惨重失败，因而，高度戒备，大胆怀疑，宁错勿纵，就成了政治信条。在苏维埃革命期间，因为这种思维方式而造成的自我戕害，实在不胜枚举。

两个各具典型意义的例子：一是1927年秋冬，因国共关系破裂，认定小资产阶级已经反动，因而得出“不要顾惜小资产阶级”的认识，影响到各地一度肆行烧杀，凡有房屋财产者即难逃厄运。因为不相信任何小资产阶级分子，就连广东大批还在党内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也不能信任，大部被遣去当兵，死伤殆尽。一是从1930年底开始，因党和军队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指导机关上纲上线，怀疑地主富农作祟和有阶级敌人渗透，中共各苏区先后发起肃反斗争，导致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和军官惨死于自己人之手。

1927年共产党人举起工农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就已经陷入到自我孤立的境地。他们曾经试图坚持城市中心，不过三四年时间，就丧失了工人在工人中间的影响，被迫全面退去农村。利用1927-1930年间国民党北伐和南京中央与各地方实力派持续混战的机会，共产党人曾经在几省交界、交通不便的地区创立过一些根据地，发展起自己的武装力量，1931年11月还利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占东北三省的机会，在江西瑞金一带宣告成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一旦南京国民党逐渐取得了对各地方实力派的优势地位，暂时稳定住中日关系，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共产党之后，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1933-1934年南方各农村苏维埃根据地接连失败，红军被迫退往西南、西北，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曾将这一失败的原因直接归结为阶级政策上的“关门主义”，并把共产党当时自我孤立的作法，形象地比喻为“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孤家寡人政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极端政策哪怕再延续一年时间，当1936年底中共红军陷于险境时，是断不会有张学良、杨虎城来冒死伸出援手的。那样的话，在国共两党的较量中，最后失败的，也就不会是蒋介石国民党了。

中国现代革命的戏剧性转折

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逆转，形式上可以归因于1936年的西安事变，实质上却决定于1935年共产国际新政策的提出与在中国的实施。不仅西安事变乃由此而成，整个抗战八年，中共由二三万军队和党员，一举发展到战争结束时的110万军队和120万党员，靠的也是这一新政策。

这一新政策所以能发挥巨大威力的原因何在呢？胡绳生前有过一种总结。他的看法是：“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

胡绳的这一说法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认识。但是，这毕竟是半个多世纪后少数共产党人才可能得出的认识。对于“百分之百”地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和经验来思维的共产党人，当年哪怕是这样想一下，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如果没有1935-1936年间一连串看似偶然的情况凑在了一起，戏剧性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共革命未必能够走上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1935-1936年发生的对中共革命最具决定意义的偶然事件，就是共产国际政策的意外改变。

说它意外，是因为这一政策转变，甚至也不是共产国际自己决定的，更不必说，中共对此完全是一无所知了。

共产国际被要求转变政策的基本动因，是苏联的外交安全考量。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对苏联的远东构成了威胁，但最初苏联并没有要求共产国际改变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策。1933年1月，因为德国法西斯上台，进而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沆瀣一气，公开反苏反共，苏联政府才意识到安全可虑，被迫改变它自身的外交政策，开始向国联，特别是向欧洲各国提议缔结所谓“集体安全条约”，力图联合各国政府共同对付德国。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才下决心改变共产国际过去的关门主义政策，要求各国党改行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国社会民主党，一同来推动欧洲各国政府赞同苏联的提议。由于这一政策转变异常重大，共产国际花了一年多时间才于1935年夏通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式，宣告改行新的统一战线的政策。

共产国际改取新政策，并不就能导致中共很快改变政策。这是因为，中共这时在城市中已经毫无力量，且丧失了几乎所有的农村根据地。剩下的几万红军和中共中央，正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退至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可以达到的边远的川两地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已没有任何联系沟通的条件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与统率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围绕着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的问题，发生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张国焘四方面军枪多人多，中共中央并不能说服张同意北上中苏边境地区去。如果迁就了张国焘的意见，中共中央及全部红军就将进一步南下转去更偏僻的川康地区，不仅更加联系不到共产国际，无从改行新的政策，就是自行改变政策，也接触不到一年后能够用武力停止蒋介石剿共计划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完全没有条件及时间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

巧就巧在一方面共产国际制定了新的统战政策，允许中共实行统战；一方面，中共中央里面有个毛泽东，几个月前又刚好取得了中央常委的资格，可以参与核心决策。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北上问题上的坚

持和劝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才敢于冒着分裂红军的罪名，只率一部中央红军乘夜出逃，脱离了四方面军的左右，不顾一切开向中苏（蒙）边境，力图接通苏联，取得援助。

毛泽东的这一选择其实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一年后四方面军北上，以相当于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3倍的兵力组成西路军，试图接通苏联，最终仍全军覆没。中共中央及所率红军总共只有六七千人，还带有大批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在既无后方根据地，又完全不熟悉地形民情的情况下，贸然北上硬闯人迹罕见的戈壁滩，其后果可想而知。巧的是，中共中央原本径直向北挺进，无意在进入甘南之后，读到报纸，得知在北上附近的陕北，还有一部红军和一块根据地。中共中央因而改变了原定计划，转去陕北落了脚。

更巧的是，共产国际因知道陕北根据地的存在，还在召开七大期间就专门派联络员从外蒙潜来陕北，试图接通中共，传达新政策的要求。就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苏区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共产国际联络员张浩历经数月，也辗转抵达了那里。结果，中共中央也就顺利地共产国际新政策提出4个月后便得到了指示，从而全面改变了过去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极端政策。

光有一个统战政策还不够，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仍旧解决不了中共和红军的生存发展前途问题。再巧不过的是，蒋介石恰在这个时候把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调到陕甘地区来了。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负责统率包括杨虎城在内的四五部西北地方武装，共同围剿红军。但张及东北军官兵、家属合共二三十万人，背井离乡已4年之久，四处漂泊，苦不堪言，一心只想能回东北，根本不想打内战。和土生土长，生怕红军抢夺其地盘的西北地方武装不同，张学良和东北军恰恰是中共实施新的统战工作的最佳对象。而只要成功争取了张学良东北军，西北地方武装，包括杨虎城等部的工作，就容易做通了。一旦分化了张、杨与蒋介石中央政府的关系，红军就在陕甘两省获得

了相当的生存空间。万一蒋介石中央军非要剿共不可，弄出西安事变之类的兵变来，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争取到张、杨，引发了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剿共计划，一时间缓和了中共和红军所受到的严重威胁，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就转危为安了。也不是。西安事变之初，中共中央仍旧把蒋介石看成是反动头子，顽固不化，因而设想只能除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然而，除蒋的结果，中国必定会陷于混乱和内战。就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国内外陷于极端孤立的情势，以及当时东北军、十七路军战力薄弱的情况看，可知发生战乱未必就会对中共有利。

同样巧得很，莫斯科并不喜欢张学良，从推动中国抗日的角度，它反而认定中国统一抗日非靠蒋介石不可。因此，事变发生后，苏联很快即出面干预，中共因此改唱红脸，最后的结果虽然使张、杨做出重大牺牲，却避免了内乱，并拯救了中共和红军。中共中央随后宣布承认蒋介石国民党主导的中央政府地位，接受“改制”、“改编”，转而实行温和的改良政策，促成了国内和平。表面上前面的革命失败了，实际上中共却因祸得福，使自己的政策适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时代的需要。随着日本入侵，抗战爆发，中共代表及其军队得以走出陕北一隅之地，前所未有地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大的活动空间和政治舞台，为10年后战胜国民党赢得了—个极其有利的物质基础。

中共革命的成功与必然

相比较而言，蒋介石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和各种资源，它用来争取中间势力的条件要优于中共不知多少倍。读蒋介石日记亦可知，南京政府初建不久，他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因此不断提醒自己：

“怀柔敌党，收罗人才，当亟图之”。光是为笼络中间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蒋就做了许多努力。不仅极力网罗有意从政者担任各种行政职务，而且礼贤下士，聘请知名教授单独授课或面谈，还为事业上有困难者慷慨提供经费援助或其他帮助。“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

更是不断组织各种全国性会议，主动问策于名流学者。抗战一爆发，它还特别成立了具有定期咨询和议政性质的国民参政会，不分左、右，将众多社会精英人士聘为可以领取较丰厚薪水的参政员。

但奇怪的是，抗战开始4年后，刚刚从山沟里走出来，能够在大后方公开活动的人手极其有限，鲜有资源可加运用的中共，却成功地与各主要中间党派和不少地方实力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成为各派力量与国民党政府抗争的重要支持者。到抗战结束前夕，中共事实上已经成了中间党派向国民党提出强硬政治诉求的主要代言人。战后不久，当国共两党关系再度面临破裂时，多数中间党派则公开选择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内战打响，两军决战之际，多数过去还游移在两党之间的中间派人士和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响应中共组建联合政府的号召，干脆集体投奔了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

1936年以前长期排斥中间派，抗战期间也很少有条件对全国范围的各种中间势力做工作的共产党，靠什么“把中间势力拉过来”，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国民党又是因为什么越来越多地丧失了中间势力的同情的呢？

所谓中间势力，按照胡绳的观点，其实是包括社会上大多数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人，既有深感对社会和国家负有责任的知识名流和青年学生，也有那些对政治毫不关心，却厌恶权贵、痛恨不公的芸芸众生。蒋介石国民党之所以会从唐德刚所说的“如日中天”的声望中跌落下来，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批评，根本上还是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执政理念、统治手法问题多多，导致党政军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官僚阶层专横腐败，与社会基层严重隔膜。

国民党的悲剧命运在抗战后期就已显露无遗了。战争最后两年里，政府、军队中丑闻恶行已层出不穷，战后接收时中央政府巧取豪夺，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更是把自己推到了社会舆论的对立面。而面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烈批评与要求开放政权的强烈呼声，

控制在军人和党部人员手中的地方政权，动辄便施以武力镇压，包括公开殴打，甚至不惜杀害教授和学生。国民党政治形象早已是一落千丈，身居统帅之位的蒋介石毫无自知之明，反而坚持要诉诸武力来击败共产党。殊不知八年抗战后，国家早已是百孔千疮，战争只能进一步恶化形势，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把民生推到水深火热的地步。民不聊生的结果，不仅会使民怨沸腾，而且会直接撼动原本就厌战的军人的意志。国民党之走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动辄便被共产党所离间，被多数中间势力所遗弃，说到底还是身为独裁领袖的蒋介石长期以来统治无方的结果。

正如胡绳所说，所谓中间势力，绝大多数既不倾向国民党，也不倾向共产党。不仅如此，中间势力中的大多数精英分子，多半都是受英美政治文化熏陶教育成长起来，无论政治上、观念上，还是历史上，他们照理都更接近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

《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直到1947年3月国共两党全面开打后，还在告诫国人：“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他们实际上非常清楚，在国民党统治下至少比在共产党下会更多些自由的可能。

然而，就是这个储安平，一年多之后，却响应中共号召，北上参加新政协，站到共产党一边去了。把储安平这样的知识分子逼走的原因可想而知，国民党已经发展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接连不断地查封党派团体和报纸杂志，使储安平这种人不仅没有了言论的空间，而且随时可能丢掉性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来主张专政独裁的共产党，却一直尖锐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与专制，力倡民主政治，甚至公开提议各党派共同协商，合组联合政府。

一方面是国民党越走越极端，一方面是共产党展现出高度民主的姿态，大批热切希望另起炉灶的中间人士和知识分子，又如何会不对共产党寄予厚望呢。

共产党所以能够吸引到中间势力，也并不仅仅在于共产党打出了民主的旗帜。储安平看得很清楚：“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而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既然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储安平们为何还会倒向共产党呢？这即是因为，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除了对自由的追求以外，他们像苏珊·邓恩所说的法国革命中的那些知识精英们一样，往往把国家民族的前途，看得比捍卫自由的原则要重得多。他们对辛亥以来长期战乱、分裂，早已哀怨丛生；好不容易盼到国民党北伐统一，想不到又来了一个十年内战和八年外战；总算熬到抗战胜利，国民党又再度把中国投入到战火之中，而且社会经济也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面对于此，他们如何还能对国民党抱以丝毫的幻想呢。

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共产党人，一个重要原因也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让他们极其看重的那种朝气。共产党虽然是一个穷人党，不仅意识形态上强调“向穷就好”，党员干部的基本成份也基本是穷苦人出身，但久居农村的共产党干部普遍艰苦朴素，作风廉洁，官民平等，且纪律严明，这些中国社会久违了的清新之气，显然让许多把国家民族命运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的社会中间分子更看好共产党。

多数中间派人士寄希望于共产党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均平观念与提升国力作用的强烈好奇与向往。中国多数知识精英都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训，他们对资本主义在财富分配上的弊病心知肚明。他们害怕社会主义，纯粹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独裁与专制。然而，自从苏联政府利用社会主义集权体制，调动全国资源，一举将一个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强国之

后，中国知识阶层中相当多数的人就已经对社会主义刮目相看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多半成了政治上希望学英美，经济上希望学苏联的折衷派。很显然，如果共产党能够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并一扫社会贫富悬殊的危险，为什么不可以牺牲一点自由，来和它一起创造这个奇迹呢？

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究竟有没有人心向背的问题呢？当然有。只是，人心向背所反映的，是战后中国两个左右中国政治的大党中哪一个更让人失望，哪一个更让人希望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并不能决定两者之间的成败。导致人心向背发生变化的原因，才是国共两种革命力量争斗胜负之所在。如果统治的国民党无可救药，革命的共产党看起来比国民党清廉得多，能干得多，还民主得多，共产党自身又不再犯过去那样极端的错误，它又如何能不胜利呢。

所谓败者自败，成者天成，理也，势也，命也。

[我为什么研究西安事变？ \[2\]](#)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多半是在1980年，至迟不超过1981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件资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1936年4月27日和30日刘鼎给李克农的报告，以及5月初朱理治和曾钟圣两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几件资料清楚地表明，还在1936年4月底5月初，张学良就已经开始做反蒋的准备了。不过，那个时候西安事变对于我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课题，这些资料还不可能使我对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兴趣。

毕业以后，由于从事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安事变的研究。象吴天威先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申伯纯先生的《西安事变纪实》，李云峰先生的《西安事变史实》，乃至李云汉先生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大致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拜读的。使我感到好生奇怪的是，包括海外的著作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那次颇为著名的延安会谈时，都一口咬定，张学良当时力主“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并且说得周恩来口服心服，最后就连中共中央也确信张学良是对的。因此在延安会谈结束后不久，即4月底5月初中共就改行了“逼蒋抗日”的策略。同是一个4月底5月初，我们的研究者们竟得出了如此不同的结论！

也许，这些西安事变的研究者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那几件资料？1987年，我试着鼓动两位朋友利用有关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88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也许是人微言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唯一提到这篇文章的一位学者，还在他的论文里把这个观点好好地批评一通。可想而知，在1989、1990、1991年西安

事变研究硕果累累的几年里，我们众多的研究者们照旧人云亦云，把过去那个说法抄来抄去。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刘鼎先生自己：他竟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刘鼎先生的说法公开发表在1989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连载了一篇题为《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长文。传主刘鼎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驻在张学良身边，并且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当时发生在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重大事件，以后并作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这篇文章的基本资料，恰恰就是刘鼎先生自己在1975年所做的追忆笔记。而介绍刘鼎这段经历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是继刘鼎之后担任过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在西安事变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张魁堂先生。其份量可见一般。

既然是刘鼎先生自己所做的追忆笔记，按道理刘鼎先生应当对当时事情的大致经过有所记忆，更应当记得自己当年所写的报告。即使是忘了，他也应该看过留存下来的那几份已经不再神秘的历史资料。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者勿宁说在刘鼎的笔记里，不仅关于报告及当时朱理治、曾钟圣两人的电报内容一句也没有提到，而且竟然也人云亦云地大谈张学良在延安是怎样说服周恩来赞成联蒋抗日的。文章中居然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写给张学良的信里的一句主张反蒋的话，即“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也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的表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刘鼎先生的回忆并不否认张学良曾经有过准备反蒋的事实。可是，照文章中所记，这段史实被安排到1936年7月去了。结果事情的经过就变成了一个怪圈，即在4月间延安会谈期间刚刚劝说中共联蒋的张学良转而反蒋，而刚刚在延安会谈时劝说张学良反蒋的中共中央，这时却又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应当联蒋。呜呼哀哉！堂堂当事人，又是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都这样记述历史，难怪在此之后陆续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东北

军传》、《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传》，包括海外学者所作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说。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事实。

在以往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是事实，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呢？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说，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重新再来系统讨论西安变变的史实经过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研究过有关的著作之后，我发觉，尽管不少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安事变的发生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但却没有一本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或者说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甚至，当许多读者从近几年公开发表的报刊杂志上已经知道张学良曾经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却很少有人进一步就此提出疑问：在那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张学良，与我们通常在西安事变史书上所看到的那个力主联蒋的张学良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当然，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已经听说了太多的有关“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大联合”……这些曾经风行于当年大西北的、明显的带有反蒋色彩的政治词汇，可又有谁具体地研究过它们同张学良，特别是同西安事变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有关西安事变史的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是，说以往的研究已经完全解开了西安事变留存于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怕是言过其实。自张学良先生完全实现了人身自由之后，新闻界以及历史学界之所以频频重提西安事变的问题，正好说明了有关西安事变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至少，在笔者看来，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关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问题还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而前此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围绕着张学良个人经历以及他和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来进行的，多数

研究者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些描写往往还是简单地建立在诸多当事人真假难辨的回忆录的基础上的。

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的回忆史料十分丰富。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像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过多地依靠回忆史料来描述史实，也成了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翻开有关西安事变史的著作，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唯一根据的情况可以说司空见惯。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书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很可靠的。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像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

当然，以前的研究者之所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回忆材料来进行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确曾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记得在十二年前，当时我刚刚开始做编辑，我的上司曾经提示过我有关的宣传纪律，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的问题。据说此前上面曾经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提醒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到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注意到张学良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的情况，不要给张学良先生带来意外的麻烦。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

心地回避那些在西安事变研究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但事实上，还在1985年以后，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1985年《文献和研究》公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方针的一组文电”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开始，直到1994年《毛泽东文集》（第一、二卷）和《毛泽东年谱》相继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大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文献。被公布的文献不仅涉及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策略方针的演变、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西北大联合计划、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与张杨谈判交涉（包括张学良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及杨虎城与张文彬的西安会谈等）的大量报告，而且还包括了西安事变发生期间中共中央与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之间的各种来往电报。在这些文献中间，有些资料在过去无疑是属于高度保密的。比如象关于张学良要求入党及被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主张一旦西安被围，就应对蒋“取最后手段”，张学良也表示赞同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历史档案公布得最多的，正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段时期的档案。粗略计算下来，光是这一年前后的文件，至少就公布了近二百件之多。这还不算在那些尚未正式公开，但已经在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的数量更多的与西安事变相关的文件。

事实昭然，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研究西安事变，这也许不错。但如果说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西安事变，那就大谬不然了。可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即使在张学良先生已经完全恢复自由多年之后，我们至今还

是看不到这样的研究著作，它更多地利用的是这些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而不是那些明显地不那么可靠的回忆录。也许，有些研究者会解释说，所有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当时还只是“内部”的。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不要说这些所谓“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大量流传国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即使是在国内，利用这些已经在“内部”公开的文献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俯拾皆是，为什么偏偏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不能或很少利用它们呢？（况且，从两年前开始，《党的文献》，即《文献和研究》，和《中共党史资料》等过去限制在国内发行的刊物已经公开发行，前此的刊物也因此全部对外公开出售。）其实，说到底，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即人们对于过去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多半严重地忽略了那些新公布的文献中所揭示的各种新的事实。甚至，一方面有关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档案大量公开，另一方面诸多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著作文章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否定中共曾经直接对张学良发生过重要影响。有人公开宣称，中共当时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不仅在整个事变中，过去有关周恩来的作用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而且在整个事变的形成过程中，张学良也始终是居于支配的、决定的地位，完全凭据自我意志行事，与其说是中共影响了张学良，倒不如说是张学良帮了中共的忙。因为，张学良不仅帮助中共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逼蒋抗日”的政策，而且还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共的命。

很可惜，我从来不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也很少对西安事变的问题作个案的研究，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只是站在旁观的角度来评头品足。我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他将解开许多仍旧谜一样的问题，并且告诉那些关心西安事变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的读者，过去写在书里面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则需要重新去了解。在1993年在莫斯科看到了俄国人已经解密的一些相当重要的档案以后，特别是读了台湾蒋永敬教授的书评以后，我相信我应当把这个工作做下去。我

很感谢侯样祥先生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们约我来写一部有关西安事变的书。尽管我很清楚，这对我本人很可能是“越俎代庖”了，但我仍旧相信，我所选择的区别于前人的独特角度，将使我能够做得比以前的一些研究者要好些。因为，我始终认为，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主要利用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其结果通常总是更可靠的和更重要的。

不论我在这本书里提供的新的解释能否为多数读者所承认，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缺少了这种角度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那些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读者注意到我书中所介绍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新的史实，关于这些情况，我曾经在1991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在今天的这本书里，我终于有机会把它完整地并且是相当细致地描绘出来了。我唯一想请读者原谅的只是，为了使那些十分珍贵，却长期被人忽视的历史文献重新为人所重视，我在书中对于某些我认为有助于说明历史事实的文献资料，作了较详尽的引证。当然，它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我相信，无论我的这本书的读者是否愿意详细地研究这些资料，在读过这本书之后，都会对当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留下与前不同的印象。

为了这本书，我还要感谢台北的蒋永敬教授。我们虽然相识的时间并不很长，但蒋教授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关心使我深为感动。本来，我对于写这本书一直相当犹豫，正是蒋教授的鼓励和他为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所写的书评，促使我下决心完成这样一本书。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韦斯塔博士和俄国社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舍维廖夫教授。由于韦斯塔博士的帮助，使我有机会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文献；而舍维廖夫教授则帮助我克服了在阅读资料方面所遇到的许多语言上的困难。

中国革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有多大？ [3]

中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但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又是如何向前伸延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最初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故乡，如果我们还记得最早的中共党组织只有几十个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在28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几乎始终处于强大敌人的压迫之下，我们就应当想到，中共革命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毕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败与牺牲。同时，也正是在这许许多多的失败与牺牲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才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明确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对世界的特殊影响。

中国革命的成功，正如它所经历过的种种失败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多少年来，学者们反复探讨了它的内部原因，分析说明了国内社会、阶级、党派集团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都是一定的国际环境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中国革命的任何一种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我们可以试问：为什么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很快为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初要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确立自己的政策？为什么中国革命者会主动接受来自外国的共产党人的资助和指导？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出自一个外国人的主张，而整个合作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也由外国顾问和代表

人物来规划和设计？为什么中国革命会一度提出一个对中国革命者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苏维埃”革命口号？为什么共产党人为之奋斗几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的革命形式竟会被永远地放弃？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在抗战期间既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存在矛盾，而又明确地把它们看成是世界革命的“总司令”？为什么共产党要把政治民主化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并且一度把资本主义的“总司令”美国看成是自己实现这一目标的助力，而它最终又为什么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与此相关联，我们似乎更应当试问：这样一种状况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条件下，究竟对中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共的策略方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与此相呼应的？而40年代中共与共产国际及其国际无产阶级领导中心苏联关系若即若离之际，中共的理论观念又发生过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和政策？换句话说，中国革命的策略，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环境支配的？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我们多半都相信，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但是，历史的辩证法还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至少都存在两个方面，它们往往也互为因果，即内因往往也要通过外因才能发生作用。比如，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也不能孵出小鸡来，而鸡蛋距离热源的远近，热源本身的变化，以及整个气候条件对于热源温度的作用等等，都可能对鸡蛋的孵化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比如，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距离苏联较近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多，而距离苏联较远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少。同样，在革命和战争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多，而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少。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外部原因确实在发生作用。

中国之所以会不断发生革命，这无疑是由中国社会的内部原因决定的。但中国革命究竟将要达到何种目的，这又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的

形势和条件密不可分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从20年代而不是从1905年开始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艰难道路，显然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密切关系的。毛泽东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高度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它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方向而言，都是得益于俄国革命性质的影响和规定的。恰恰是由于中国革命及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指导，由于后者对于前者的援助乃至干预，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才走上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条旨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

当然，笔者并非外因决定论者。何况，中共革命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干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而不能由共产国际那些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办。事实证明，完全依照苏联人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关系，多半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革命最初的十几年里，共产党所经历的种种挫折无疑都与这种办事方式有密切关联。但结果，不论苏联在中国革命身上投入了多少心血和精力，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并没有完全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去发展自己，从主张世界革命，主张保卫苏联，主张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问题，以致提出“中间地带革命”的思想，他们曲折地却又是勇敢地走出了比较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尽管如此，失败还是成功之母，成功中也依旧包含着失败，外因也仍旧通过内因在起作用，历史总还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历史联系来看，在整个国际大气候、大环境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它考虑和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因素就越复杂，其成功与失败的机会也会同时存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依旧充满了荆棘。

从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及其策略变化，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如果我的这种研究能够使人增加对于中国革命曲折程度以及艰难程度的了解，并注意到中共领导的革命产生和发展的极其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它们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因果关系，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本书中因为我自身的水平和对问题的理解程度而存在的各种不足之处，还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专家的谅解和指正。

[从中共建党谈起 \[4\]](#)

研究中国现代史，不可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共产党，不可不研究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毛泽东曾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来形容双方关系的先后主次及其密切程度。所谓十月革命，就是指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即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以后改称共产党）在彼得堡发动的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这次暴动的成功，不仅创造了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号召的苏维埃俄国（后称苏联），而且应运而生了一个以组织发动世界革命为职任的共产国际，从而在许多国家推进了共产党的产生和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与俄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共同边界线的中国，在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掀起的这股热潮的冲击方面，自然更是首当其冲。

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之产生，同俄国人有关。甚至，还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试图组织中国的共产党了。当时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旅俄华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刘泽荣（又名刘绍周）等即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出席了大会。会后，俄国人更进一步提议，将这个旅俄华工联合会内原有的共产党支部扩大到各个分会，并将它们统统“改组成共产党党团”。一年之后，在俄共指导下，旅俄华工中共产党代表召开会议，终于宣告成立了旅俄中国共产党。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旅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在中国组织无产阶级，实行社会革命，中央组织局“将来须移至中国”[\[5\]](#)。由此，足以见俄国人早有向中国输出革命的设计。

但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类的组织，并不只是这些俄国人的想法。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又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既然那个时代进步的中国人大都在苦苦探寻救国方策，而邻近的俄国人又神话般地创

造了一个据说是反强权、反压迫、奉行平等、正义的新社会、新国家，他们所凭借的种种“武器”，自然会引起许多中国志士仁人的向往与效仿。因此，并非是靠俄国人的鼓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一些中国人自己就在那里高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不用说了，就是孙中山旗下的《民国日报》，不也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社论，称颂“中国似宜取以为法”的俄国革命，高呼“民生主义当拔帜以兴”吗？[\[6\]](#) 这也就难怪，在而今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中，经常能够见到当年中共建立之初，孙中山麾下的戴季陶曾积极参与筹划的记述。其实，若从可以查证的历史文献来看，在中国最早卷入所谓“共产党”活动的人，并不是陈独秀、李大钊一派人，却真是张继、戴季陶这些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干将呢。还在1919年6月，俄国那边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产生出来，汉口警察厅以及江苏督军公署参谋处就接连有报告说，孙中山等人与俄国及美国社会党人来往密切，“目下共产党在沪，秘密结社，积极进行。张继、戴天仇等均为该党首领，即旧国会议员亦有受运动者。”[\[7\]](#) 如此看来，孙中山后来讲：因为他对中国民众有很大影响，因此列宁当初曾要他来组建中国共产党，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8\]](#)。

目前已经很难考证清楚继俄国革命之后，在中国自发涌现出来的“共产党”究竟有多少家了。但已经找到有史料记载的“共产党”至少也有五、六家之多。最早在1919年就试图组织，却未能成功的是所谓“无政府共产党”，它的“告失败书”记述了它所作过的努力[\[9\]](#)。其次是此后不久出现的四川重庆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它在1921年初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书说明，它“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曾经发展到大约100位成员[\[10\]](#)。再次是大约几个月之后，由“五四”期间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姚作宾等人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同样有几件共产国际的档案记录了这个组织曾经存在的点滴情况。我们因此知道

这个姚作宾在1920年五月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俄国人援助中国革命，得到承诺后即回国秘密组织共产党，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11]。下面一个是与姚作宾的“共产党”几乎同时出现的一个所谓“社会共产党”。有关这个曾经在上海昙花一现的小组织的痕迹，是在它的参加者俞秀松保留下来的日记中透露出来的。俞在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说：“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12]通过这句话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此前他曾和友人一度组织过一个“社会共产党”，终因“茫无头绪”而放弃了。再下来要算是由当时相当有名的国会议员胡鄂公（即胡南湖）等人创立起来的那个“共产主义同志会”了。前文所述北洋政府官文中提到的所谓“旧国会议员亦有受运动者”，不知是否就指的是他。他们早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公开出版《今日》杂志以为宣传机关。而后他们又组织了这个叫作“共产主义同志会”的“共产党”组织。他们的代表当年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这个组织正式成立于1922年2月1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即为胡鄂公，正式会员有10000人之多，遍及全国9个省市12个地区，其最终目标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及世界共产主义共和国”。迄今仍然保存在莫斯科汉学图书馆的“共产主义同志会”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月刊，清楚地显示出了它的性质与实力[13]。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由旅法中国学生组织起来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在四川由前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人建立起来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关于这两个共产党组织的存在，也有不少的文献可以证实[14]。

在现今的中共党史著作当中，大概没有哪一本书提到过这许多昙花一现的“共产党”。中国现代政治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及其与莫斯科关系史当中的许多问题过去都被简单化，甚至概念化了。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在文章中提到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织的时候，立即就有两位

学者公开撰文批评我不该“仅仅根据它（们）‘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这一点，就断定它（们）是‘共产党’组织”，那意思是说，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代表中国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它和已经“钦定”了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应一概否定或免谈，即使是打着引号来谈也不行，否则势必会造成人们观念上的混淆 [15]。于是，几年过去了，仍旧没有人关心这些小组的命运和它们存在过的意义。而事实上，只要结合这些小组的存在，认真地读一下近年来公开的共产国际历史书案，我们会发觉，1920年出现的那个“共产主义小组” [16]，与国内自发出现的那些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其实也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按照以往的说法，中共的产生过程十分简单。即1920年4月奉派来华的俄共党员维经斯基（Voitinsky）等人开始与“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取得联络，5月陈独秀等人即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与指导之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然后分别联络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激进知识分子，组建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至1921年7月，他们最终召开代表会议，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新的文献资料告诉我们的情况却复杂得多。综合新的历史资料，可知1920年4月受俄共远东局外国处派遣，前来中国的俄共工作人员是维经斯基、季托夫（Titov）和谢列布里亚科夫

（Selipliakov）三人。他们清楚地了解，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激进小组。而他们最初的计划，也仅仅是想把中国同情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统统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同情苏俄的革命势力。维经斯基来华仅3个月，就成功地在7月19日召集了这样一个联合大会，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统一战线组织，并且亲自组建了以他和陈独秀、李汉俊等五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工作机关

——上海“革命局”，同时在鲍立维（Boliev）、斯托扬诺维奇（Steyarovky）、马迈也夫（Mamaev）等人的参加下，分别在北京、广州、汉口等地建立了相应的地方“革命局”[\[17\]](#)。正是这些“革命局”如今被各种中共党史著作描述成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而实际上，由于这些“革命局”最初所具有的统一战线性质，因此，它的成员开始时相当复杂。戴季陶、张东荪以及大批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加筹备酝酿，甚至加入其中的，其实就是这些“革命局”[\[18\]](#)。这也就是为什么，1920年参加这些组织的成员，一年以后当中共正式成立时，绝大多数都不在其中的缘故。

那么，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革命局”，又是如何变成中共早期组织的呢？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维经斯基当时的领导者——威连斯基。还在维经斯基计划召开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大会的时候，威连斯基就明确主张应当乘机把这个大会变成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在大会召开前的7月初，威连斯基为此专门在北京召集维经斯基等在中国的俄共工作人员开会，提出了这一任务[\[19\]](#)。但是，当维经斯基等人在联合大会上提出这一议题之后，相当一部分与会者不能接受“共产党”的名称，会议只能在“社会党”名义下达成妥协。因此，会后，作为上海“革命局”负责人的陈独秀，一度只能以“社会党”人自居[\[20\]](#)。鉴于这一统一战线式的组织成分复杂、意见分歧，与理想中的共产党相距甚远，威连斯基等不久即再度明确提出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于是，在俄国人的帮助与指导之下，陈独秀等开始致力于把“革命局”进一步转变为共产党。从1920年11月维经斯基代为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宣告“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之日起，直到1921年3月拥护成立俄国共产党的代表召开会议，正式宣布不承认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一切党派为“同志”，“革命局”遂告寿终正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

党终于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最终成为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全力支持和扶助的对象[21]。

弄清楚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当中的一些重要细节，澄清以往说法中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也许是当今的研究者们应当下功夫去做的一件事情。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大陆有关档案的解密，许多涉及中共与莫斯科关系问题的新资料涌现出来，它们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探究过去的历史提供了大量闻所未闻的史实和极其重要的线索。就像1920年中共最初形成的背景和经过一样，即使是这样一件看上去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重新考察的结果，也有利于启发我们的思路，深化我们对两者关系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了解与理解。

比如，了解到当时诸多共产主义小组织形成和存在的事实，我们就可以对那种简单地把中共的出现归结为“俄人移植”的说法提出疑义。事情很清楚，在中国出现共产主义团体或政党，在当时那种国际国内环境之下，无论有无俄国人的帮助与指导，都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又比如，注意到当时中国各种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小组织都极力与俄共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寻求支持，而其它一切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正式支持的共产主义小组织，最终都未能生存下来，可知中共的产生固然不需要俄国人来“移植”，但若无俄共和共产国际在旁援手，要想顺利发展，也绝非易事。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莫斯科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有条件的依存关系。中共之所以需要莫斯科，从根本上说，是其基础过于薄弱的缘故。不惟社会基础薄弱，主义训练不足，实践经验欠缺，初时几乎每一步均有赖于共产国际手把手教，而且物质上、经济上尤须仰赖于俄国人的援助。从目前所知的情况看，当年姚作宾、胡鄂公，以及自称中国社会党领袖的江亢虎等

之所以极力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一个重要目的都是想要得到后者在经济上的帮助。而陈独秀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存在下来，并且迅速地发展起来，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能够定期得到共产国际在经济上的资助。毕竟，建立一个政党，宣传、组织等等费用极大，远非陈独秀等少数知识分子靠教书、写文章的微薄收入所能应付者。何况自共产党建立之始，他们中大部分人便转而成为职业革命家，再无薪奉可拿，不靠莫斯科，维系一个小组织恐怕都不可能。这也就难怪，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中国，中共立即“经费无着”，不仅各种宣传工作暂告停顿，书刊出版被迫中断，原计划中的对工人的启蒙教育工作“不得不停止”，就连派人南下汇报工作的区区10余元路费一时竟也拿不出来了。[\[22\]](#)。

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对中共的生存发展究竟具有何种作用，我们只要看一看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提到的几个简单数字，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清晰的印象。报告说：

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元，其他约二千余元。[\[23\]](#)。

这个时候中共国内党员总计约170人，且多数尚有社会职业，故所费甚少，以“其他约二千余元”为党员消费计，人均尚不足13元，并且还可“自行募捐一千元”。但由此已可看出，党的经费约94%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仅各地工人运动一项就占去了大约60%的费用，其党员自筹款只够召开一次劳动大会而已。很显然，中共成立以后之所以能很快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发挥作用，并逐渐成为中国工运中之举足轻重的指导力量，这是同共产国际为其大力提供经费帮助，同时它又将这笔钱大量投入工运分不开的。

不过，随着中共组织逐渐发展，职业革命家日渐增多，党的各种开销日渐加大，自筹经费部分却更加减少了。尽管中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24]，实际上自筹款数越来越少。据陈独秀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称：1922年“二大”以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1923年头8个月，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一万五千”[25]。由于自1923年起党的经费与工人运动的经费已经分开，由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分别提供，因此1923年用于党组织本身活动的费用的绝对数明显增多。党的经费的增加，一个直接的作用，就是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力，并且在组织上也有益于其发展。1923年国民党之所以不得不同意以“容共”的方式来同中共进行合作，自然与其日渐活跃的发展势头不无关系。

有关共产国际在经济上的援助对中共发展的意义，我们不妨以1921—1927年的数字制一张简表，给读者提供更宏观一些的印象：

年代	1921.10 - 1922.6	1923.1 - 8	1924	1925	1926	1927.1 - 7
党费总数	0.66 万元	1.5 万元	3.5 万元	4 万元	约 12 万元	18 万元
党员总数	约 170 人	约 380 人	约 700 人	约 980 人	约 1 万人	约 5.8 万人
人均开支	约 40 元	约 40 元	约 50 元	约 40 元	约 12 元	约 4 元

由上表可知，共产国际提供的党费与中共的发展呈同步递增态势，后者对前者

的依存关系显而易见。不过，从趋势上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的增长赶不上中共组织的发展。在1926年中共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以后，共产国际所提供的党费数渐成缩减之势。尽管到1927年，中共自筹党费数仍不足3000元，而这一年来自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等，总计几有近百万元之多，显示中共对共产国际在经济上财政上的需要仍然相当之大。然而，此后不论中共如何要求，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总数始终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下而没有明显增加，致使中共常常感到经济窘迫，影响其活动和发展甚为明显。到了1932—1933年中共活动基本转入农村，中共中央也迁往江西苏区，共产国际向中共固定提供活动经费的历史更告中断，中共遂不得不转入自我发展时期。1930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国际虽然也根据中共的要求，时有大数额经费接济，但对中共的生存发展已不起决定作用。如此一来，中共对莫斯科依存的条件遂逐渐消失。中共既然已有自己的军队、政权、地盘和多年实践之经验，不必再依靠莫斯科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而生存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在1930年代后期逐渐改变，就是一种不可免的结果了。研究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史，似乎不能不注意到这种情况。

探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许多关键事件的关键档案都被尘封在大陆和俄国的档案馆里。值得庆幸

是，自从我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以来，总是不断有新的资料和档案能够被发掘和被公开，它使我的研究相对地变得容易了许多，也使我在接连做了十几年的研究之后，至今仍然有可能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向读者介绍那些长期以来被遗忘、被忽略、被误解，甚至可能是被掩盖了的历史事实。

在此我必须感谢蒋永敬教授和张玉法教授，如同《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一书一样，本书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又是与他们的鼓励和提携分不开的。

[应该相信记忆，还是应该从档案文献出发？ \[26\]](#)

如今在国内国外，写毛泽东的书，已是汗牛充栋，多得不可胜数了。但专门谈论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书，迄今为止，国内的出版物中还只有个别当事人的片断回忆[27]，和根据这些片断回忆大胆想象、浓墨重彩地铺陈出来的几本纪实文学作品[28]，称得上专门研究的著作几乎没有[29]。

是这个问题不重要吗？毛泽东作为一代豪杰，左右了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命运，不要说他的那些丰功伟绩，就连他的喜怒哀乐、生活趣闻，都成了文人墨客笔下生花的重要题材，被一遍遍地写进书里，更何况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一生的他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呢！

为什么写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著作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文献资料欠缺。因为资料欠缺，以反映历史真实为己任的历史学家敢于大胆涉足这一课题者自然少。于是它就成了那些稍有文采，又喜欢演义的文学爱好者纵横驰骋的天地。只可惜，那些绘声绘色地描写毛泽东如何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斗智斗勇的纪实文学作品，造成了一个让所有历史学家都深感头痛的问题，即这些一遍遍重复着那几本原来就不是十分可靠的当事人的片断回忆，并加上自己大量主观想象的纪实文学作品，使得本来就有些扑朔迷离的历史事实本身，变得更加面目不清，给历史学家澄清历史，说明真相，增加了更多的困扰。

近年来，历史档案的解密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的有关机构先后公布和发表了相当一批十分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其中就有大量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问题的电报、指示和谈话录等。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俄国相关档案的大批公开，更使研究中苏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当中渐渐变成一门“显”学，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了。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研究，竟开始成为许多国外学者关心的课题之一。

从国外近年来接连出版的几本谈论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的专著来看，国外学者积极利用新披露的资料，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30]。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显然已经落在了后面。充分掌握这些新的资料，对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做出我们自己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说明，无疑也应当是中国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当然，研究毛泽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许多情况还没有搞得太清楚。但是，作为一代领袖人物，他的一生早已盖棺论定，包括他的几乎所有政治活动，不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也似乎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要想写出新意，同时又让读者相信你讲的确有根据、确有道理，很难。

目前研究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也确实还有一些明显的困难，最主要的是因为档案资料的公开还存在着一些盲点，要想清楚连贯地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讲清楚毛泽东一生中 with 莫斯科发生关系的全部情况，也还有相当的难度。但是，能不能等到一切条件全都具备，等到所有档案资料全部公开以后再写这段历史呢？我以为不能。

考虑到种种困难，本书的叙述虽然严格按照历史的顺序，但却主要是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正是围绕着这些历史上分歧最多、也是读者最关心的事件，各方面公布的书案资料最多，研究和叙述起来比较容易做到言之有据。

探讨那些直接关系到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历史恩怨的重要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毛泽东自己的一些说法。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有过长达40年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既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毛泽东，只是按照莫斯科的计划、经验和需要来进行中国革命的话，共产党人大概绝不会有1949年的胜利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经常抱怨莫斯科的重要原因所在。但这是否

意味着，我们今天认识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就只能依据他自己的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回忆和解释呢？

毛泽东对他与莫斯科关系历史的说法，长期以来被我们当作金科玉律，并据此来说明当年发生过的许多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毕竟，对于毛泽东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自己的说法理应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工作者都清楚，对于当事人的回忆，必须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它们来描述历史，就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回忆也不能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即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样一个严肃的官方研究机构，也注定是要根据确凿的史实，而不会主要依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来书写有关他的历史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在1936年向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口述自己的历史，其中谈到1920年他在北京期间读了三本书，正是这三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31\]](#)。许多年来，谈论毛泽东早年经历的书籍都无一例外地照此说明。可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发现，毛泽东谈到的这三本书，当时其实并未出版。很显然，毛泽东的记忆也一样有不准确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写《毛泽东传》时，就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这段回忆来说明当时的历史[\[32\]](#)。

每个人的记忆力都是有限的，每个人即使对亲身经历的事件的了解和认识也必定是片面的。人类之所以需要历史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从多方面入手，利用一切可能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对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以便能够对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事情发生的时间、经过及其结果，做出尽可能少带个人主观色彩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那些可能会“误人子弟”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影响，本书在写法上尽量做到通俗易懂。但不可否认，本书仍是一本带有学术研究性的著作，它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解释也还只是一家之言。笔者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对大量新披露的资料的分析和研究，使我们今天人的认识能够比较地接近于历史真实。

本书的部分内容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陆续在《百年潮》杂志上以“青石”的笔名公开发表并连载，引起了许多读者的热烈反响，并被一些报刊摘登或转载。但不少读者都表示过某种程度的遗憾，即因为限于篇幅，在《百年潮》杂志刊载的内容，没有能够将文中引述的重要论据的资料出处一一标注出来。他们担心这会影晌文章的说服力。比如，不止一个读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你提出的这些新的说法，是否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是否只是片面地使用了俄国的档案而没有利用到我们自己的资料？本书的出版无疑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回答读者的这些疑问，并且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满足那些格外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进一步推敲和研究的愿望。

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发现，与已经连载过的内容相比，本书在某些章节中做了一些增删和修改。这一方面是得益于那些热心读者的意见的启发，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的指点。金教授为了给本书写序，在百忙中逐字逐句地反复审读拙稿，订正了原稿中一些明显的失误，并且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在本书定稿过程中，我已尽可能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本书成稿过程中，承蒙《百年潮》杂志社长郑惠先生、主编杨天石教授、副主编郑海天先生，或审读原稿，或提出宝贵意见；另外，《百年潮》杂志徐庆全亦主动承担了为本书配图的工作，在此特一并致谢。

一些读者曾经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不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这样的书名，担心它可能会使人误以为本书讨论的只是毛泽

东与莫斯科之间的个人感情问题。其实，只要读过本书之后，相信大多数读者都能了解，尽管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感情好恶对党和国家关系确实存在着重要影响，但我在本书中通常是在党和国家关系这个更大的范围内谈论它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的，我丝毫没有把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领导人个人感情纠葛的意思。考虑到这个标题已经为相当多的读者所接受，我在此只好请那些对此有过建议的读者谅解了。

[对中共革命成功原因的一点思考 \[33\]](#)

说起来，这是一本旧书，尽管读过旧书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它已面目一新。

本书断断续续写作于1988-1989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出版于1991年那个更为特殊的时期。起因是1987年秋我从中共中央党校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人在中外关系教研室，要给研究生上课，又因为实在感觉到传统的中共党史离开了国际背景讲成功，太不真实，想要给研究生们讲授一点新的东西，于是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题目。但讲稿只写了个大概，1988年春季的课也没有讲完，人就因为去成都开会，到松潘等红军长征路上考察，染上了急性肝炎，一病好几个月。等到体力渐渐恢复起来，就赶上了那场风波。结果，这门课在人大再没有上过了。因为随后的一两年里在人大已经不可能自由开课了，我也知趣地马上闪人，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了。

重新开始把讲稿的草稿变成书稿，是1989年底。那边人大仍在热火朝天地搞运动，我则利用不用上课的条件，买了一台PC机，一边啃DOS，学五笔，一边开始写这本书。记得当时还没有硬盘的概念，电脑的内存只有256M，所有的内容都要存在一张5吋的软盘里。但这本书大体成形时，我的录入速度和修理电脑的能力，至少在当时的老师们中间，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了。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大学老师都还没有用过电脑，更不要说每半年为电脑升一次级了。就连出版社都还不接受电子书稿，非要你打印出来不可。

能够在1991年，也就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一年前把这本书印出来，也还是沾了中央党校的光。因为我在党校工作了5年时间，又和出版社的朋友比较熟，再加上党校当年的地位不同一般，党校许多教员，包括学校的领导层，思想反而比人大这种学校要开放与活跃得多。因此，即使是在那个政治氛围仍旧相对紧张的时候，我的书稿一

经提交出来，还是很快就通过了相应的审查，并在很短的时间就正式出书了。

不过，这本书当年的发行却很不顺利。半年多后编辑告诉我，他们印了两千册，发出去的只有一半，其他都压在库里了。我因此把剩下的书全都拉到家里去了，没承想傍晚时分搬到三楼的楼道里暂时堆起来，准备第二天把屋子收拾一下再把书搬进屋里去，第二天一早却发现头天下午在楼道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书，一包不剩地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想来是被那些专门在深夜里做“废品收购”的人打劫了。

一方面书很少发出去，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学生和读者知道这本书后向我了解哪里有卖，自然就勾起了我想要再版的念头。而需要再版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年出版的机会来得太偶然，因此赶得太急，注释做得很不规范，最后一章也是草草收尾，再加上编辑校对的工作做得也很粗糙，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错误实在很多。何况那以后历史研究的条件、形势，包括学术的标准，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求远比那个时候严格得多了，因此再版修订几乎是必须的。非常感谢尚红科先生，帮我了了这样一个心愿。

我之所以坚持要再版此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虽然时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历史资料和史实有了更多的研究和发现，因此可以补充的细节很多，但我当年写这本书时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却并无改变，因此，我还是把这本书看成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希望它能够在技术上和细节上得到完善。

本书修订中最大的问题是注释引文的查找。当年研究中共史的条件较差，特别是许多档案资料没有开放和出版。在中央党校工作多年的好处，是有近水楼台之便，只要有心，就能够发现很多在其他单位工作看不到的文献史料。但那个年头，中共党史研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大家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利用到这类史料，都只能转述，

不能直接引用。记得我在《党史研究》杂志做编辑时，我们已经发现这样发表的文章，在国际学术界引起的歧义很多，甚至有不少学者直言批评。因此，我们逐渐开始要求作者注意学术研究的通行作法，尽可能使引文注释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多数党史研究的文章没有注释或很少注释的情况。但是，有一点还是很难改变，就是因为中共党史学者看到的文献史料多半来自于“内部”，无论是档案馆的，还是单位藏的印刷品，总之都有一定的密级限制，个人没有直接标注出处的权力和可能。我们后来最大的突破，就是尽可能标注出文件标题和日期，使读者知道作者确有所凭，但读者想要知道作者所引来自何处，就爱莫能助了。这也是我当年写作这本书时的一个重要背景。

由于已经过了20多年，当年许多不能注明出处的文献史料今天已经公开发表，或可以在相关的档案馆看到，并可以引注出处了。但也因为过了20多年，而且因为还是有一些文献史料不能注明出处，而自己又早就离开了中央党校，故今天要想找到当年引用的全部资料引文的出处并加以核对，就成了一件超级困难的事情了。此书修订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想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好在，除了极个别的引文没有查到出处，做了删除或改写以外，其他引文基本上都找到并做过了核对。

修订中另一个麻烦的问题是史实的核对和补充。由于原书写于20年前，当时我对有些历史情况还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年来资料开放的程度远较当时高得多，而且海外获得资料的余地也大得多，因此现在要弄清楚过去弄不大清楚的许多历史细节，相对比过去就容易得多了。因此，即使是旧书修订，也需要把这些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进展尽可能地反映进去。多少值得欣慰的是，原书在基本史实的研究叙述上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史实的补充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修订中另一项自找麻烦的工作，是我为原书过长的段落增加了一些小标题和为每章增加了一个小结。这主要是因为，原书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中共究竟是怎样走到它的1949年来的？而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中共早年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失败，为什么内部纷争不断，为什么每次失败都和莫斯科的指导失误有关，而每次崛起也都离不开莫斯科的扶持和帮助？明明暗助中共，莫斯科又为什么忽而重视国民党，忽而重视共产党？中共为什么明知莫斯科的一些指示或作法对自己未必有利，却还是一味拥护执行？如果说莫斯科纯粹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利用中共，它为什么又一直从政治、组织、军事、经费、特工及干部培养训练等方面，大力指导和扶助弱小的中共，几度出手挽救中共于险境，并且不惜冒着与中国政府乃至和列强冲突对抗的风险，公开或暗中站在中共一边？同样，即使是毛泽东执掌权力，用延安整风清除了党内的教条风气，他为什么依然高度重视用莫斯科的“本本”来教育训练党的各级干部，为什么依旧钟情于世界革命，为什么始终相信苏联援助“一定会来”……？要想回答清楚这些问题，都不能不考察说明莫斯科和中共，包括中共党这一派人和那一派人到底在想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或那样想？因而也就不能不对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逻辑等等，依照具体史实，加以具体的解读与说明。因此，这本书不同于我其他着重研究事件或人物的具体史实的书，对包括苏联共产党和中共在内的共产党人的理论、思想、言论，及其政策策略内容的说明明显较多，一般读者读起来有时可能会感觉有点沉闷。多加一些小标题，就是为了让不习惯这类阅读的读者读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也便于读者依照小标题的提示有选择地阅读他们感兴趣的内容。

这本书的最大阅读价值，就在于它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唯一一本系统讲述影响中共革命成败的外部条件的书。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与朝鲜、越南，以及许许多多落后国家和民族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解放的经过，有着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内因当然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但是，离开了适合的外部条件，再好、再有利的内因也产生不了革命家们理想的结果。

具体到中国，除了战后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关系转变的影响外，还离不开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再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

中共能够走到它的1949年，既有赖于外部苏联的作用，又有赖于内部毛泽东的作用，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和中国毗邻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毛泽东再机敏睿智长袖善舞，也绝不可能实现1949年的成功。同样，即使有苏联毗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不论是陈独秀，还是王明，不论是张闻天，还是刘少奇，我们也都很难设想它能够顺利地走到它的1949年。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斯大林两度直截了当地承认苏共错估了中共的实力，曾经误以为中共革命不会成功，反对中共与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干扰了中共革命。这清楚地说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力持己见，独立自主，中共很可能和战后法共、意共一样，早就被引导到与国民党妥协的道路上去，成为执政的国民党的附庸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苏联就近的指导和援助，中共能否在1921年成立起来，成立起来后能否制定出有益的政策，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一个群众性的党，都颇成问题。即使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如果没有莫斯科再三干预和劝阻，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行事，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怕是在抗战中期就结束了。中共在日蒋两大敌人的夹击之下，能否顺利发展起来，也颇成问题。

如此一来，有一个问题也就产生了。这就是，中共革命的成功，究竟是毗邻的苏联的作用更大些呢，还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更大些

呢？要就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很清楚，既然斯大林都承认他在中共革命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说苏联的作用最大，当然是不准确的。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没有苏联这个近邻——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一直在许多关键的时候扶助中共的成长，包括阻止中共采取一些明显错误的行动，和在国际上牵制美国……，中国再有几个毛泽东，大概也解决不了问题。

一句话，历史的演进实在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有时，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即在任何一个革命时代，偶然性永远都会起着戏剧性的作用，并因此成为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而无法理解了。[\[34\]](#)。

这本书讲述的一切可以让读者了解，历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实在是太过幸运了。在那样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步踏错，或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或发生得太早或太晚，历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结局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会酿成历史的悲剧了。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问题之必要 \[3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概念，差不多是在55年之前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首先提出来的，并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以摆脱苏联人控制，决心根据中国革命利益的实际需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一面旗帜。毫无疑问，这样的口号是不可能得到长期垄断着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苏联共产党人的赞同的。于是，当新中国建立之初，在苏联人帮助修订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消失了，曾经显得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口号，被“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样一种四平八稳的提法所取代了。在此之后，几乎是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多数中国人看来也都相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提法。

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然性，多半是在中共领导人再度意识到他们必须重新寻找适合于自己国家特殊条件的独特发展道路之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再度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了。历史似乎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它原来的起跑线上来了。

当然，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人，在重新认识中共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时，肯定会受到远比当时人要深刻得多的历史性启示，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历史将不会再走回头路了呢？事情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简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面政治旗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历来是共产党人用来划分敌我的一道分水岭，但它同时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们进行创造性的思维。然而创造性的思维，恰恰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因而也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生命力所在。可是时至今日，对于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和理论的不同解释或修正，在人们的思

想当中仍旧是一件相当困难的甚至是充满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当今从事着前人所未从事过的改革事业的时候，种种政治上的顾忌甚至不可避免地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许多问题及其后果的看法，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前国家的改革决心与进程。没有必要讳言历史发展本身的复杂性与曲折性。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了解，当今所面临的一切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早在几十年前，中共就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过苏联人所设置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禁区”，走自己的路，取得了成功。尽管，在今天，在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题目的时候，有必要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其实并不因为毛泽东的出现就“天堑变通途”，中国革命主客观环境及其条件的复杂与特殊，决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不能不表现出同样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但可以肯定，正是这种复杂与曲折，也决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决策过程不能不总是具有鲜明的实践特点。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来形象地比喻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探索与实践，它其实也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切。了解这一切，真正理解它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实践应该不无教益。

研究历史上中共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过程，毫无疑问是有它的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尽管，成功的意义在这里远不意味着正确无误。恰恰相反，事实上，中共通向政权的每一步都是极为艰难的，任何一种错误的政策选择，都可能给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历史提供给共产党人进行正确选择的条件又是十分欠缺的。对于中共而言，他们显然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很难设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会有中国共产党；同样也不能设想，没

有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作依据，共产党人能够找到最终战胜国民党的社会力量。

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就是灵丹妙药，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由于不能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共在几十年里曾经几度大吃其苦头。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幸运，其实还在于他们必须而且能够把他们奉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即“中国化”。之所以“必须”，是因为他们曾经始终是在强大敌人的围攻和压迫之下，不能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尽可能实事求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注意经常调整变化自己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而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模式，甚至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义。之所以“能够”，是因为他们中有着像毛泽东这样典型地习惯于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语言系统来理解、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并且习惯于从中国革命实际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领导人；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与努力，“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它的俄国形式，经过不断的修正和改造，在实践中逐渐建立起一种适合于在中国生长的独特形式。“变则通，不变则亡”。这句老话对于中共也同样适用。正如笔者在本书最后一章所总结的那样：“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从而不能不决定着人们思想和主义的某些内容也要相应地有所改变。……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变化是正常的，相反，不变化却是不正常的。时间在变，世界在变，环境和条件都在不断地改变，把自己的思想、主义固定起来，僵化起来，不能怀疑、不能修正和创新，其结果只能是在变化的大千世界面前失去应变的能力，从而丧失自己的生命。”看来，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后来坐稳了江山，这一逻辑的客观力量表现得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了，因此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不再像战争时代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36\]](#)

。经验转而成为不可逾越的教条，历史在这里又走了回头路。尽管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真的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了。然而，在战争年代里，面对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任何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作法，都可能迅速把他们引上绝路；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过程看上去却像钝刀子割肉那样，致人死亡要缓慢得多。然而，正因为其来得缓慢，正因为其容易使人感到麻木，当它为害之际，往往危害更甚，以至难以补救。

历史向来都是无情的。它从来不以主观动机论英雄，它所看重的只是客观的效果。因此，任何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都有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中国共产党人过去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他们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武器，因而他们敢于根据斗争的实际需要修正它和发展它，而并不是把它视为一种教条。本书从一个方面深入考察了中共当年是如何把他们从俄国人和共产国际那里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当中来的。从本书所说明的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以及政策的不断变化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去认识中国革命、规定不同时期与不同条件下的斗争目标，特别是要找到并认可一种灵活适时的斗争策略，曾经是多么的困难，又是多么的必要。在这里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斗争的条件和环境都在不断地改变着，因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具体的斗争目标、政策策略、行为规范，也统统都在不断的变化和修正中，统统要根据实际斗争的各种不同条件和需要来改变。任何“经验”、“成熟”、“完善”之类的字眼儿，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毛泽东在革命期间的长处，多半也就在于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注重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能够更主动地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方法，来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策略尽可能接近于不断变化的

斗争实际。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纯洁性”，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教条化，而且还要把自己也变成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本书并不试图对自己所说明的每一个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评论，尽管这里有些可能确实曾经是中共革命的成功经验所在，而有些在今天人们的观念看来其实很值得讨论。但是，笔者历来认为，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有必然的甚至可能是合理的一面。一个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其实首先在于他能否让后来的人们知道过去发生过什么和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在于他能否让人们看到历史上真实的一面，使他们能够真正了解过去。因此，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首先并不在于它成功地使读者接受了什么样的结论和观点，而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多少新的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这多半也就是本书写作的目的。

要深入地而且是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上中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政治主张以及复杂的政策和策略的形成变化过程，在今天还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说明和再现历史，笔者在这里严格遵循了历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原则，即必须保证自己所研究和介绍的所有重要历史事实有可靠的尽可能是第一手的史料以为依据。正是由于笔者大量地并且是系统地利用了第一手的档案文献资料来研究和说明历史，本书才得以“披露了”——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当然，它们只不过是今天人们应该了解的历史的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可能面面俱到。由于篇幅的原因，以及由于某些资料欠缺的缘故，有些可能是应该谈到的问题很遗憾没有能够在本书中加以研究说明。特别是关于1949年以后，共产党人怎样具体地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中国社会实际的关系，笔者暂时还无力做如此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和解说。另外，由于笔者在研究功力上的不足，也由于笔者对某些史实的说明未必符合一些同行对这些问题的认

识，本书可能还存在着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凡此种种，笔者只能深表遗憾，并望读者海涵。

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既远又近。说远，是因为哪怕是昨天发生的各种事件，只要我们不是亲身经历并直接参与决策全过程，就未必能够说得清楚，因此今人和过去未免越来越隔膜；说近，是因为今天永远是昨天的继续，过去发生的一切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今天，甚至对明天产生影响、发生作用，想躲也躲不过。

中国有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也许，今天来探讨半坡村文化或炎黄二帝如何影响我们现如今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多少有点感觉遥远。但是，自从有中共以来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却距离我们很近很近。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回过头去重新认识一下曾经血雨腥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深入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关注一下“革命”给我们今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种体制以及思想文化观念留下了怎样的一些烙印，也许能让我们活得更明白些。

看革命的历史，要离开革命的那个时代。所谓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就是强调要有一定的距离感。以红海洋中红卫兵的那颗赤热的红心来感觉那个红彤彤的世界，是一种感觉；用丰富的历史对比和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向的深邃理解，来冷静地俯视过去，所得到的则是另一种感觉。后一种感觉无疑会比前一种感觉，更可靠，更真实。

距离对历史研究会带来很多遗憾，距离过远，今人关心的热度也越低，反过来对历史研究的推动力也越小。而且距离远了，史料，包括活的史料（当事人）和死的史料（文献档案等）损耗越大。但距离对研究近现代历史，比如中国革命之类，却也有相当好处。除了可以获得更多理智和冷静的判断力以外，还因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文献档案30年解密制度。也就是说，有许多引人注目

的近现代历史之谜，差不多都要到事情过去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根据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来深入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距离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止于档案开放。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都清楚，即使在十几年前，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文章著作，只是凭借某个讲话、指示、社论和本本上的精神就来解释过去。而随着时间的远去，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随着人们历史敏感度的降低，要客观地研究和说明半个世纪以前的许多问题，如今应该不再是一件很受束缚的事情了。

当然，有了这许多足以让前人羡慕的条件，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写出震聋发聩、启迪新知的历史文章。研究历史，贵在求真。求也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努力探索之谓也。既为探索，就难免要对过去的研究和定论有所问、有所思、有所辩。而问也罢，思也罢，辩也罢，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非要有全面深入的史料搜集功夫、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和清晰有力的逻辑判断不可。正因为如此，由于个人心态不同，社会及教育环境不同，知识积累不同，对史料的掌握和理解各异，历史学家的研究心得有时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提供的知识和新意也未必一样。时至今日，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仍会有这样或那样不尽一致的解释，实难完全避免。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就没有真实可言了呢？当然不是。尽管存在着种种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局限，努力探求历史真相，争取让读者更加贴近历史真实，仍旧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反映了笔者个人在这方面的部分努力，它选择了一些可能引起读者关心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讨论的重点，并尽可能用大家能够理解的语言，以期引起读者对这段历史的重视与共鸣。当然，以笔者个人的观点，来对一些传统说法做出新的解释与说明，是否真正实现了更加贴近历史真实的目的，最终还是需要让读者认可，特别是还要经过历史本身的检验。不过，笔者

可以确信的是，本集所呈现给读者的研究成果，至少能够将已有的研究向前推进，并提供给读者一些新的经验和新的思考。

实事才能求是。只有当我们真正贴近了历史真实时，我们才可能对我们的昨天和今天有更加透彻的认识，才有可能触摸到历史发展的脉搏。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社会发展到今天，由于缺乏对历史的深刻检讨，无视历史的教训，看不清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曾经走过太多的弯路。但愿我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能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既用来照人，更用来照己。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指望历史研究者来做出努力。因为只有造出的镜子质量高，镜子中的影像才不会扭曲和失真，照镜子的人才可能不被假象所误导和欺骗。

[避免重犯文革错误的关键所在 \[38\]](#)

1980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

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甚至，“文革”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生财之道了，从“文革”像章、“文革”歌曲、“文革”中的样板戏，直到以“文革”为题材的书籍……但是，那位意大利记者提出的，也是当年我们许许多多冥思苦想的问题，即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问题，解决了吗？

“文革”是怎么发生的？直至今日，人们更多强调的仍旧是毛泽东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些人看到种种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腐化官僚横行一方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怀念毛泽东，甚至怀念“文革”。他们往往会口出惊人之语：“真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幻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来杜绝各种社会腐败现象，这未免有点像天方夜谭。所谓“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一次规模大些的运动吗？建国以来，这样的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

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其实，“文革”搞了几年之后，毛泽东自己就意识到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了。只不过，他老人家的思想已成定式，钻进“阶级斗争为纲”的死胡同出不来了。无可奈何之余，他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毛泽东讲这话时，已是垂垂老矣。人老多健忘，从1952年到1957年，从1957年到1959年，从1959年到1963年，从1963年到1966年，他亲自发动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隔最短者不足两年，最长者也不过五年，“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如何使得？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辑录这些亲历记的目的，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暴露所谓的“阴暗面”。事实上，具体到某一个运动本身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而言，人们今天的评价也不尽一致。并且，即使这些运动的亲历者，不少人也不否认毛泽东当初发动运动时具有良好的动机。问题是，靠运动，或者用“文革”这种令人发指的“打倒一切”的方式，能够达到目的吗？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还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这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文革”过去了二十多年，为什么仍然有人会赞赏“文革”，主张再搞运动呢？除了那些“文革”中的受益者，和少数思想极端偏执者外，多数普通人的一个基本心态，就是对社会腐败现象强烈不满，但又看不出解决的出路何在。

是不是真的没有解决问题的出路呢？当然不是。几乎所有国家在走向经济富裕的过程中，都经历过社会腐败现象严重这样的问题，但很多国家都度过了这样的难关，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因为他当时就已经很明确地讲，我们的有些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这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改革制度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律制裁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社会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已经在不少地方造成了如同朱镕基总理在本届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民怨沸腾”的局面，并导致不少人得出了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糊涂观念。

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搞不行了。党的十五大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体制改革的光明前景：不是没有办法。我们编辑这部集子，更是希望所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够了解：搞运动不是出路，中国决不能再搞运动。无论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搞运动都有百弊而无一利。

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摈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避免重犯“文革”错误在于此，恢复人民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在于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在于此。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机会，它可以使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双方，在一种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合作的局面呢？毫无疑问，不论过去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也不论今天的人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过去的历史，这样的机会确实存在过。有谁能够否认，自有中国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时为止，在这28年的时间里，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相互战争的时间丝毫不比他们“和平共处”的时间长。（计算自有中国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这28年的历史，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总计有1927~1936(9年)和1947~1949(3年)共12年左右的时间，而两党合作或处于非战争状态下的时间，却有1921~1927(6年)和1937~1946(10年)共16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双方战争的时间应少于合作的和“和平共处”的时间。

当然，过去的和今天的政治家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这种“和平共处”始终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之所以选择“和平共处”而不是选择战争，这毕竟是一种妥协，并且是相互间的而绝不是单方面的妥协。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疑，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是否还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从另外的角度想一想，为什么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就在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如果张学良不是了解到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的情况，如果他不是相信共产党有蒋介石也无法消灭的力量，他是否会与共产党结盟，是否会冒险发动西安事变？进而言之，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如果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蒋何以要留这无穷的隐患，而与之和平谈判？如果共产党数万兵力无足轻重，蒋又何以在谈判条件上一让再让，最终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保有事实上独立的军权和政权？试比较一下1949年的国共谈判，蒋尚有半壁江山和数百万军队，只因共产党人不想与之妥协，结

果竟想要保有部分的政权和军权而不可得。事实昭然，妥协总是双方面的，而双方面的妥协不论形式如何，又何尝不是一种“合作”？在1937年到1946年这10年的时间里，恐怕再没有什么字眼儿比“国共合作”这个字眼儿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了。它里面既有友爱，也有仇恨；既有团结，也有对立；既象征着平等，也象征着不平等；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战争，他们却始终在努力维持着他们之间的统一战线。从1936年国共两党谈判政治解决两党关系开始，到1946年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为止，他们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11年之久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谈判。这些谈判的内容固然每每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固然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之所以谈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达成和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与合作。

然而，截然不同的观念形态、政治地位和社会基础，使得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而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最终导致国共两党总是难以找到共同的妥协基础与谅解方式，真正意义上的妥协——国共双方互不诉诸武力——几乎没有可能。

当然，妥协的机会总是有的，无论是1937年，1938年，1942年，1944年，还是1945年和1946年，我们事实上都能够发现这样的机会。但是，机会总是有条件的。它们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客观环境、力量对比和一方甚或双方的妥协意愿所使然。也正因为如此，机会总是不能保持永远。任何一种环境的改变，力量对比的变化，乃至谈判条件的调整，都可能使本来存在过的机会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注意一下1942年和1944年上半年的两党谈判情况，就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恰恰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似乎有必要注意到两党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可以肯定，在国共关系史中，两党谈判的历史是最能够集中反映双方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了。在1936~1946年间，国共两党几乎所有重大的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要诉诸并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

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其它方面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甚至，如果我们把国共双方的历史性较量概括为一种“斗智斗勇”的话，那么，谈判本身实际上也是双方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有人说，谈判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果我们只是就其复杂并极具技巧性的这一特点而言，我们的确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一种“斗争艺术”。在抗日战争前后，国共双方实际上也正是把谈判当成是一种斗争的重要手段的，它甚至远比那些真刀真枪的磨擦和冲突更加具有威胁性，更加惊心动魄。本书的目的，在于努力研究并说明在国共关系史中最复杂也最富戏剧性的两党谈判的情况。也许，人们今天可以从中得出某些有益的教训和启示。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了解国共关系的尝试 \[40\]](#)

在大陆，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至少应当在十几部以上。但是，翻遍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同一角度，即站在中共角度所做的研究。与其叫国共关系史研究，不如叫国共关系史研究要准确些。

为什么说已有的研究著作几乎都是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研究国共关系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这些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所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中共方面的，很少至少是较少利用到国民党方面的史料。

主要利用中共方面的史料来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有什么不足吗？有。从中共保存下来的大量史料出发，来研究它与国民党关系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共在两党关系问题上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及其推行贯彻这些政策策略的过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它便于我们理解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中共的认识、感受和它在处理两党关系问题上所依据的逻辑。但就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而言，这却是不够的。较少利用和了解国民党方面据以形成其政策策略，包括记述两党关系问题的种种史料，就不大容易理解国民党当时许多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及其推行的过程与结果。甚至还可能误把一方当年在不明了对方真实感受和意图情况下所做出的某些政治判断，简单地当成自己立论的基础。

笔者还在1991年就写过一本叫《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当》的书，因为研究写作时还很少可能利用到台湾方面保存和出版的书案史料，因此也就决定了该书也只能是以中共方面保存和出版的相关史料为分析的依据与线索。尽管，书出一年后即靠脱销，加印时临时核对或补充了一些当时已经可以找到的台湾方面出版的史料，但整体上仍旧没有多大变化。

当然，就国共两党谈判史而言，既使在过去了十多年，有机会大量查阅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各种文献史料之后，笔者也没有发现有更多的依据两方面史料来研究这一历史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与国民党的谈判关系着中共及其武装的生存与发展，是中共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而也就决定了中共中央及其相关部门，不能不集中主要精力和干部以应付和谋划，留下了各种形式的大量历史记录。相反，除在极个别情况下之外，国民党方面几乎从来不重视与中共的谈判问题。大多数的谈判几乎都是蒋介石直接授命个别人员秘密进行的，并不与党内高层协商办法。因此，要想在国民党保存下来的史料当中找到比较完整且有系统的涉及到两党谈判的资料，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从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角度，笔者在写作战时国共谈判史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过多地利用单方面史料的严重不足了。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由于中共方面的资料相对丰富，国民党方面资料极度欠缺，笔者通常可以很容易根据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或电报来往的情况，具体了解中共方面谈判意图以及谈判方案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却往往无法准确判断作为国民党方面谈判的唯一主导者，蒋介石是从怎样的渠道，得到了怎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又怎样影响了他的认识，他出于怎样的目的制定了怎样的应对方案，尤其是他在谈判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改变谈判目的及计划的原因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研究，其容易理解共产党，而不容易理解国民党，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该书出版后，尽管它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国共两党谈判史的著作，且首次详尽披露了历次两党谈判的具体文献，对了解和研究战时国共谈判的经过，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台湾几乎是唯一的中共史专家陈永发却当面批评笔者的这一研究不够客观。严格地说，这也是笔者的一种遗憾。陈寅恪先生有云：研究历史，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

心孤诣，表一种同情”。笔者始终深信此言乃做历史研究者必备之精神。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对共产党当如是，对国民党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正是因为注意到上述缺憾，笔者在出版了《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之后，仍旧高度关注着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和相关资料的发掘与利用，并且尽一切可能在海内外继续搜集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史料和回忆口述史料，力图有朝一日能写一本着重从国民党史料出发的整体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的著作，以弥补这一缺憾。只是，因为笔者同时还关心并致力于其他课题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计划一直拖到今天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无论如何，本书写成可以说最大限度地完成了笔者的一个心愿。研究历史，犹如破案。当一个个谜一样的事件只因研究者锲而不舍的追问和对种种蛛丝马迹穷根究底的考据而最终真相大白的时候，其收获的喜悦常常令人陶醉。但研究中国现代的历史，又犹如医生治病。越是有相当医术又具有良好医德的医生，就越是不能满足于揭示那些导致多数人头疼脑热的病根，他们常常会因为眼见种种恶疾永无止境地吞噬着病人的钱财和生命，自己却无能为力而嗟叹不已。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的历史的过程，也正是笔者感触于这两方面刺激的过程。

国共两党为什么时分时合，为什么经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两党之间固然有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但同时两党众多成员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同是中国人，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和共同的祖先，而且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救国救民的理想追求上，其实也有许多非常相近，甚至是一致的愿望。就本质而言，意识形态对于他们更多的其实只是一种实现其理想追求的手段或者工具。验证此一工具的有效性，靠的还是其应用后的效果是否达到或者接近于他们所期待的目

标。而在长期研究了共产党之后，再来研究国民党，这种感触不能不变得更强烈。因为，仔细对照国共两党，包括他们众多成员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在各种公开或私下场合中所表达的愿景，我们都会发现，它们竟然常常是那样相似，甚或是一致。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推行激进政策，一个坚持改良主张；一个植根于社会底层，一个立足于有恒产者阶层而已。一旦共产党修正其激进政策，双方之间即会出现妥协合作的基础；一旦国民党的改良主张让人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就会有許多国民党人或明或暗地倾向于，甚至干脆转向激进的共产党。然而，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独一性和排他性，国共两党不能不为了“操之在我”和验证“唯我独革”，你死我活地相互拼杀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直接或间接地死于国共斗争的中国人，何止百万千万！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国家民族在主权、领土、财产、生命，包括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机遇上所受到的损失，更是不可以数字或金钱计。然而，如果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福祉，为了众生平等和幸福，难道意识形态的分歧真的不能逾越，而必须要以牺牲无数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来验证其正确吗？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各掌政权，曲折验证的结果，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领悟到这其中的道理了呢？

言归正传，本书虽告完成，笔者却仍旧不能满足。这是因为笔者虽然在现有条件下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本书距离笔者想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实还有相当距离。其原因：

第一是因为现有的，以笔者所能找到的史料，在个别阶段仍旧不能充分解释国民党人政策策略形成的幕后原因，甚至无法清楚描述其对某些重大事件认识和处置的经过情形。在实在无法较充分地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来分析其政策策略动因和形成实施过程的情况下，笔者有时仍旧不能不借助于中共方面或其他相关史料，来做分析立论的

依据。这自然无助于完整全面地解读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形成和变化的历史。

第二是因为本书的体例和相关史料的局限性，使本书叙事的角度与重点前后会有些许差异。即前三分之一部分较多地以国民党内核心人物为中心来展开，而后面的部分则较多地侧重于事件经过的分析与说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史料的保存前后侧重不同，前三分之一时期有关事件史的资料保存欠缺较多，因而就使得有关核心人物个人方面的资料价值得以突显出来。而以后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有关事件史的资料保存很多，有关核心人物个人方面的资料虽多，却大量被加工修改，利用价值大大降低。当然，这里面也有体例限制的影响。尽管笔者更乐于突出人物研究，但本书毕竟是一部研究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史和关系史的著作，除非在史料不能支持的情况下，否则，太多地着墨于个别领袖人物的意志及其作用的描写研究，与本书的体例会太过偏离。

第三是因为受到笔者的兴趣点、对事件意义的个人判断，以及受到史料掌握情况等因素的影响，本书章节没有完全依循多数读者可能已经习惯的历史阶段划分或事件重要程度来设计。比如，笔者就没有用太多笔墨去分析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战争的经过，对决定国共最后成败的“三大战役”更是完全没有做军事史的分析说明，同时却以一整章的篇幅分析描写了1946年国共两党在争取东北过程中的一次规模不是很大的四平战役。这纯粹是因为要在一部几十万字的通史性著作中面面俱到地展示国共两党关系的所有重大历史环节，是不可能的。因此，笔者更乐于把自己认为的历史转折点做一些个案的解剖，以求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个案解剖，来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

第四是因为本书仍有个别章节会涉及到两党谈判的问题，在实在无法回避不谈，又缺少更多新资料的情况下，笔者只能利用上一本书中利用过的一些基础史料。对此，凡可能重新研究处，笔者均尽量重

新做过研究。但是，即便如此，在个别章节中，读过笔者前一本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的读者，仍难免会有某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第五是本书虽然名为“国共关系史”，笔者也尽可能在一些章节中努力尝试较全面地反映国民党内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情形及其政策策略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但实际上，本书目前的写法仍旧较多地停留在上层政治史的层面上，未能充分展现国民党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在国共两党关系史当中的表现和作用。这其实主要还是笔者时间有限，在资料搜集上用功不够所造成的。

第六是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笔者虽然试图尽量客观地去分析和描述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问题上的复杂心理及其情感变化，但在某些相关概念的使用上，因为无法找到或不便使用更为准确的表达方式，难免仍会沿袭以往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政治用语。另外，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及其思维角度，很难完全抹去其生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影响的痕迹。以笔者的生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在分析研究1949年以前国共关系历史的问题上，要想做到与绝大多数研究这一问题的台湾学者，完全把握到同一尺度，也并不现实。对此，笔者亦有自知之明。

最后要重申的是，对于本书，笔者是努力尝试了用陈寅恪先生关于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的这样一种态度来研究的。如果说这样一种努力在某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到位，那仅仅是笔者的能力所限，而绝非笔者的本意之所在。之所在。

[从共产党人的角度来看国共关系 \[41\]](#)

这是一本旧书，却还是一本新书。说它“旧”，是因为它写于1991年初，距今已经有将近15个年头，不可谓不久。说它“新”，是因为过去了差不多15年，这期间赶着潮流写“国共关系史”，放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书出了不知凡几，还没见有一部扎扎实实地从史料出发的。因此，即使是经历了十几年被人抄来抄去的劫难，好在这只是一本具体研究和记述战时两党谈判经过的著作。它所披露的个别文献可以被人抄，但是，离开了它所整理的系统的谈判史料及其背景分析，个别文献的历史意义通常并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何况凡这类“文抄公”多半没有研究基础，只求多快好省，即使抄来的东西，也往往是错误百出[42]。更不必说那些往往打着国家重点课题或国家社科基金头衔的大部分头著作，基本上千人一面，观点要不就过于陈旧，要不就太趋时髦。时间一长，情势一变，读起来不是味同嚼蜡，就是让人不知所云，甚至哭笑不得。

一本好的历史书，要能够常读常新。本书过了将近15年，读起来仍旧会让人觉得有些新意，而不会让读者有思想落伍之感，关键就在于它是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而无意为现实的某些政治目标服务。为什么笔者总是强调要做史料研究？这是因为，笔者从来认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当我们尽可能地依照事情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的时候，其实很多重要的启示也就蕴含在其中了。这比太过追求做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要来得稳妥和实在得多。

就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这一目的而言，本书并不是笔者很满意的一部著作。笔者的不满意，倒不是像有的大陆或台湾朋友那样，遗憾其思想性不强。本书写作时，恰值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笔者初涉国民党问题的研究，尚不知水深水浅，因而没有采取边叙边议的分析式写法，只是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摆事实的写法。这注定是许

多读者读起来不那么解渴的原因。但这种纪实性的写法，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倾向性，不会让一部分读者喜欢，一部分读者不满。像国共关系这样掺杂了太多历史和感情纠葛，至今两岸读者的看法还极为对立的话题，也许把基本的文献史料发掘出来，系统地予以全面的介绍，给读者更多的自我判断和自我思考的空间，比强调笔者个人的看法，会更有价值一些。

笔者对本书的遗憾，更多的是因为史料的问题。这本书写于十多年以前，那时笔者还没有去过台湾，甚至还没有蹲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本书写的是国共谈判的历史，事实上其中利用的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史料，少之又少。除了个别史料是后来加印时根据台湾出版的档案文献资料校订并加注的以外，本书绝大部分涉及国民党方面的种种谈判文件及其往来信件，差不多都是来自于中共方面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因为这种情况，再加上十几年前笔者的写作还不够老道，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自己虽然想要尽量客观，行文却还是可能会流露出一些倾向性，即在有的事情或有的叙述上，显得并不很客观。

笔者这次承蒙知识产权出版社邀约重印，自然要对太过明显的错误和倾向性太过明显的文字加以修订。但是，笔者却并不试图在史料的平衡上乘机做一些功夫。这一方面是因为按照有关方面的规定，重印之书必须基本保持原书的内容，只允许有10%-20%的修订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早已接受了另写一本国共关系史的邀约，已不必再靠大力修改本书来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了。而更为重要的其实也许是，当笔者重读本书时，还是相信，保持原有的叙事方式和写法，也还有其必要性。

何以说呢？

本书引用的两党谈判草案、提案、谈话录以及各自开具的初步谈判条件等等，数以百件计。而直接或间接利用到的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

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录之类，更是可以以千数计。这些档案、回忆史料固然多为共产党方面所保存，但据笔者此后十余年来利用五六次在台湾讲学、研究的机会，遍查其党史馆、国史馆所存档案，发现其保存下来的涉及两党谈判问题的相关文献，还不及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百分之一。加上对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的查阅，情况也大致如此。

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是国民党方面对两党谈判的问题不是颇多避讳，就是不很重视。这是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在对共产党问题上就抱有老大心态，不愿也不能把中共视为平等的谈判竞争对手。结果每逢必须与中共接触或谈判时，或者是蒋介石秘密指派人员个别行事，不事张扬；或者虽有党政军情各单位负责人与蒋开会确定原则，指派谈判人员具体操作，也因只视之作为一种策略手段，或是宣传手段，而很少做具体的文案工作。即使是幕后的指导，也鲜留下文字的记录。再加上国共谈判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与中共谈判代表必须电报甚或信函往还传送谈判指示和汇报谈判情况，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只要去蒋介石官邸当面汇报和领受机宜即可。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保存下来的谈判文献自然也就要远远多于国民党了。而这意味着，研究国共谈判的历史，要想对称地利用两方面的档案史料，根本就不可能。

其二，由于国民党方面很少保存有关两党谈判问题的档案文献，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这些谈判档案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在无法通过国民党方面的档案来具体了解国共两党每一次重大谈判的经过情形时，就非要借重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这些档案史料不可。而从本书出版后这十多年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来看，除本书所披露的这些史料之外，几乎再未见有新的研究成果在本书所涉及的这些重大的国共谈判问题上，发掘出更新的文献史料，亦可知本书所发掘和披露的这些文献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确信，在

没有一本完整收录国共谈判文件的历史文献集出版之前，本书目前这种尽可能完整地披露两党谈判方案及其相关文献的纪实写法，仍旧是有相当意义的。而据笔者所知，这样一种出版计划在相当时期内都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有笔者当年的条件，耗时数年来做此工作，而且是因为如今早已失去了出版这种资料集的环境和条件。

当然，正如前述，过多地利用一方的史料来研究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肯定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危险性。一个最大的局限，就是并非所有中共代表报告中关于国民党一方的要求或条件，都一定能够得到验证是准确无误的。除了电报本身可能出现的技术上的问题以外，发电人或报告人带有强烈主观倾向的理解和转述是否完全准确，就可能是一个问题。更不要说大量使用单方史料——在特定的立场、态度，甚至情绪影响下形成的指示、报告或其他文件——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倾向性的印象。利用重印的机会，尽可能地全面的引述资料，进行相应的文字处理，避免由此带来误读，自是一件应做的事情。

不过，即便如此，笔者还是想要说明：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较多地借助于单方史料进行研究，也未必一定就是一种缺陷。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既然是不同人之间发生关系，那么从甲的角度看问题，和从乙的角度看问题，注定会有差别。更何况是两个利害各异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呢？有差别，就可能造成对对方意图的误读；有误读，就会加剧原本就立场对立的双方之间的恶感。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势必会把对立一方妖魔化，从而使这种误读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历史已经如此，我们后来者如果仍旧被当事双方的这种误读所误导，岂不可悲！

以1937年的国共妥协为例，当时的妥协是以中共中央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做出“四项保证”，即停止推翻

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直接受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导；实施普选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为前提的。由于抗战爆发以后不久，国共两党就开始发生磨擦，再加上中共日益自行其事，部队成倍成倍地扩展壮大，以至于本来就怀疑共产党的蒋介石国民党，更是怀疑中共当初的承诺不过是骗人的幌子。其后又有所谓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某连支部书记李法卿报称：临上前线时毛泽东、朱德曾训示工作方针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于是国民党人更加认定，中共当初的妥协就是一个重大阴谋[43]。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中可谓代代相传，根深蒂固，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具体考察过中共中央1936-1937年在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的种种政策和策略转变的复杂经过，具体了解了他们当时争取的目标是什么，坚守的底线是怎样的，国民党方面态度变化对他们构成怎样的刺激，他们如何获知和看待国民党以及国民党提出的种种条件，他们中间在抗日和处理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有着怎样的顾虑和分歧，他们实际上的形势估计和应对方法一步步发生过怎样的改变，以及当时条件下的中日关系，包括共苏关系，对他们与国民党的谈判方针有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就能够了解，中共的妥协以及在谈判中的种种作法，不过是在自身状况和整个形势不断变动的影 响下，包括在适应国民党态度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变化而来的。所谓“阴谋”之说，不仅是太

我们常常自勉：研究历史，要学陈寅恪。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要想在对立的历史当事人中间扮演一个客观中立、对双方都能够同情的理解的观察者，更难。故本书若能够在共产党方面的研究上帮助读者理解其当年“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即足矣。

[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 \[44\]](#)

本书修订，主要基于四个原因。首先当然是出版社的安排和建议。其次则是因为本书出版时，因当时条件所限，个别章节内容未能收入其中，使本书内容上不尽完整。如今时过境迁，能将删去的内容补入，也算了却笔者的一大心愿。再次则是因为本书最初是面向最普通的读者，为杂志连载而写的，因此在引文注释方面尽量精简。在经过了几年几万册的销售之后，相信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有机会能够从学术角度对本书的引文注释加以完善，是笔者求之不得之事。最后，自本书出版后，有关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因俄国档案的进一步披露又有了相当的拓展和深入。学者们在中苏经济关系、军事关系，和在抗美援朝问题上，以及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与磨擦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45]。对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做出回应，并且适当补充本书的论据，自然更为笔者所乐见。只可惜，因修订时笔者人在香港，资料欠缺，增补注释的工作完成得并不理想。而尽管笔者有所努力，由于篇幅及体例所限，再加上受到本书主题和原有叙说形式的制约，一些由于新史料和新研究的出现而提出的颇为重要的话题，也并未能被吸纳和论述于本书之中。

笔者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严格说来并不在于发现历史。笔者自信，本书不过是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深入这段历史，通过有针对性的思考，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历史叙事而已。事实上，对于许多亲身经历过或熟悉那段中苏两党关系历史的学者和读者来说，本书中所叙述的历史事件有多少是他们过去毫无所知的呢？问题仅仅在于，拘泥于传统的认识逻辑或研究思路，人们过去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而无法了解事情的其他侧面。本书不过满足了读者了解历史的其他侧面的一种愿望。因此，从这一点出发，笔者所以想要回应新的发掘和研究，并不是对于进一步在书中发现或重建新

的历史史实有兴趣，而是对新近的研究尚有种种不能满足之处，因而会有进一步阐述自己看法的冲动。不过，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笔者也还是略感宽慰。因为，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充其量也只是印证了本书的基本论点。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什么？简而言之，是强调具有独特性格、特殊成长背景、自我情感经历，以及特有的政治经验和意识形态追求的领袖个人，在中苏两党和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支配性作用。

笔者一向认为，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离开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全方位的把握和理解，仅仅从被赋予了太多形式化内容的文本、概念，或被抽象化了的群（党、阶级、民族、国家等等）乃至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是很难使我们贴近历史真实的。我们之所以需要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特殊性，是因为它实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一般的党与党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复杂性远不是拿我们今天一般的国家关系所能比拟的。它们之间既有利益相左的民族关系，又有利害相同的盟友关系；既有亲密的兄弟关系，又有竞争的对手关系；既有意识形态一致的同志关系，又有容易引起情感纠葛的师徒甚或父子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相信中苏两党两国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文化差异，或者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或简单地认为它主要起因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或起因于这种特殊的关系结构所引发的利益磨擦和冲突，却可能会有失偏颇。一个最简单的也是被人们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中国党内作主的当时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或周恩来，情况还会如此吗？或者人们能够按照1960年代初王稼祥等人的主张来处理对外关系上的问题，中苏关系会有那样的发展吗？何况，如果当初莫斯科支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情况又会如何？这里面的答案应当是可想而知的。

今天的多数学者，往往习惯于从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问题，相信这才是具有普遍性的国家间矛盾冲突的关节点。笔者并不否认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理当是所有国家政治领袖心之所系。但是，历史研究与一般社会科学之不同，恰恰在于它更注重特质的，而非一般的研究。欧美国际政治学研究之所以会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国家关系变动的重要研究依据，是基于一般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运行的规律，和在此基础上正常的国家关系来说的。相对于具有特殊政治运行方式的党国体制和领袖专断的国家来说，这种研究的方法明显地有其缺陷。这是因为，在西方民主国家，政治领袖（总统或首相之类）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判断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不仅要综合各个方面的相关报告和意见，而且领袖个人的意志和倾向必须要服从于党内乃至国内主流势力的意志，很少敢独断专行。个中原因，就是因为其无论党内还是国内，实行的都是选票政治。个人专断一旦造成重大过失，不仅要被全党群起而攻之，而且其代表的政党也必须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在党国体制下，领袖的权威一旦树立起来，其个人的判断和意志往往就是决定一切，不受监督的。即使错了，因为没有批评的机制，也绝不会受到惩罚。况且，在这种体制之下，任何这种判断都不可避免地会是先党而后国，即首先是建立在其政党利益的基础上，而它又必定是要从其意识形态的逻辑出发的。建立在如此复杂的前提之下，其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判断，准确性会受到局限，甚至可能会被扭曲，也就很难避免了。

换言之，在今天我们按照西方标准来看可能是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東西，却未必是当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在今天我们看来可能无关宏旨的东西，在毛泽东当年看来却可能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举出1962年王稼祥与毛泽东的分歧就足够了。十分明显，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看出

当年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关系和少去援助各国激进组织的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但是，毛泽东不仅不以为然，且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外交政策。说毛泽东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自然是不准确的。但是，毛泽东当时心目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显然不是王稼祥心目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多半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笔者并不否认在共产党国家关系中存在着民族隔阂、利益冲突，包括存在着结构方面的致命弱点。这也正是冷战时期共产党国家之间往往较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磨擦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第一，民族间的、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是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是存在于共产党国家关系中的特殊结构的问题，在冷战背景下，作为对立一方的美国阵营中也未必完全没有[\[46\]](#)，但是，它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当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二，也并不是所有共产党国家之间都发生了类似中苏之间那样严重的冲突与对立，除了中苏之外，苏联与大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与朝鲜和越南劳动党之间，特别是其他小党小国相互之间的关系，一般也并未发生太大的问题；第三，即使存在或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往往最终也能够得到缓和或化解，这也包括曾经极端对立的苏联与南斯拉夫党的关系；第四，如果说中苏之间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间的冲突，是苏联必欲控制中国，而中国反抗苏联控制的问题，那么，中国与反修的日本党、兄弟的越南党、最知己的阿尔巴尼亚党也相继闹翻，又是为何呢？

很显然，中苏之间在民族、国家以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矛盾，固然可能造成双方关系的复杂微妙和在某种情况下的隔阂与紧张，但并不足以导致双方关系的根本破裂，更不会走到刀兵相见，你死我活的地步。中苏关系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还是双方领袖政治

追求和个性冲突的一种反映，是“一山不容二虎”，即毛泽东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等必欲捍卫其正统的逻辑发展结果。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通常相信，如果换了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或者王稼祥，中苏之间可能不会出现那样一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所在吧。

当然，有读者因为注意到笔者强调领袖个人的作用，就简单地认为笔者是在强调毛泽东个性或性格的作用，这也并非十分准确。任何一个成功的喜欢独断专行的政治领导人，毫无疑问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但是，任何领袖人物突出个性的表现，也都是有条件的。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不到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领袖人物个性的作用。

笔者修订书稿之际，恰值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热播之时。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宝国在演绎汉武帝从最初登基倍受内外挤压，到内削藩王，外平匈奴过程中心态及性格上的明显变化。其实，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古今中外众多历史领袖人物中，类似的情况可谓俯拾皆是。人的性格或个性固然可以从“三岁看到老”，但是，后天成长的经历，特别是政治生活的环境所造成的心态上的改变，才可能将其发挥到极致。毛泽东的个性发展，同样也是与其后天的成长环境分不开的。比如，他在不断成功中所得到的那种强烈的满足感和使命感，以及制度所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带来的强烈自尊感，与现实国际政治环境中中国因落后而被歧视、被孤立之间的巨大落差，都足以导致其个性的极致发展。在研究毛泽东与1958年台海危机的问题时，笔者就注意到了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情况。

通常人们解释毛泽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这段历史时，较多谈到的都是毛泽东想要以此来声援当时的中东事件，帮助中东人民牵制美帝国主义。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太具宣传色彩了。但即使换一种角度来解释，比如强调当时福建前线军民强烈要求收复金门、马祖，军方压

力较大，毛泽东亦受此触动之类，与以后的结果相对比，也显得太过牵强。事实上，人们大多忽略了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美国有意中止与中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跃进对毛泽东心态上转趋亢奋的影响。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关系就始终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台湾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以及美国的经济封锁，都使毛泽东成就一个统一、独立和强大的中国的愿望倍受打击。通过1954年第一次炮击金门，毛泽东终于成功地迫使美国人坐到谈判桌上来了。然而，美国政府对此毫无兴趣，勉强应付到1957年底，竟单方面宣布要将其谈判代表由大使级降低到代办级。此举无疑又是对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巨大的挑衅。但此时，恰逢毛泽东对建国以来国内形势的发展极度乐观，因而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几个月后，“大跃进”又随即如其所愿地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效，各地到处大放“卫星”，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毛泽东因此倍受鼓舞，又进一步发动了在其看来是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所必需的大炼钢铁运动。结果钢铁产量的指标也是节节上升，一发而不可遏止。于是乎，从《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宣布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47]，到5月份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已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的15年奋斗目标了[48]。6月，他进一步估计超过英国两年即可[49]。再到9月初，他已经在兴奋地要求党的领导人“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了[50]。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心态上明显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对美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的愤怒可想而知。

1958年炮击金门是怎么来的？基本上就是毛泽东必欲给美国人以颜色。中国外交部接连受命发出声明要求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在美国拒不理睬的情况下，更进一步于6月30日发出了最后通牒，限美国15天之内给予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美国承担。在仍旧得不到美国答复

的情况下，7月14日，即最后通牒限期的几乎最后一天，彭德怀等即受命具体研究落实了炮击金门，给美国人以教训的军事计划。之所以后来与中东事件挂上了勾，是因为恰好在14日这一天伊拉克发生了政变，政变者宣布退出美国组织的反共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第二天美国因害怕连锁反应，出兵黎巴嫩，以支持亲美的黎巴嫩政权。毛泽东据此才把炮击金门的计划与声援中东事件联系起来。

事实上，足以说明毛泽东此时心态上极为敏感和亢奋的，还有本书中所提到的7月21-22日为长波电台问题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大发雷霆一事。毛泽东之所以突然震怒，原因也是一个，就是认为俄国人不愿把技术给中国，必欲与中国合营，是看不起中国人^[51]。这两件事接连发生，且都是直接涉及民族自尊心问题，自然不是偶然的。今天学者们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分别孤立地来解释它们，很少注意到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及其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关系，显然是有欠周延的。事情很清楚，毛泽东此前在与苏联关系上所感受到的类似的刺激可谓比比皆是，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自称把自己关在莫斯科的屋子里几天闭门不出，背地里骂娘，但也仅此而已。1958年毛泽东的反应之所以大为不同。当然是另有背景。

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时在对美、对苏问题上的种种决策，固然有其强烈个性的因素，但这种个性的张扬明显地是和当时的国内“大跃进”形势所带来的亢奋心态密切相关的。由于其在处理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存在着压抑感和屈辱感，“大跃进”成就的取得，显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一种空前的释放，由衷地获得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由此，其对来自美国和苏联的轻视，甚或仅仅是以为轻视的反应，才会变得如此敏感和激烈。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以后虽然也明白“大跃进”的种种成就多为浮夸虚报所致，却始终异常抵触地不许他人置喙。看不到这里面的种种复杂情

形，不了解毛泽东作为新中国领袖在争取美国承认和处理与苏联关系上的种种曲折背景与是非恩怨，也就无法理解和解释曾经明察秋毫、运筹帷幄如毛泽东者，何以竟会被一个弄虚作假的“大跃进”所迷惑、所激动，以至于心态大变，个性张扬无忌的个中原因。

为便于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本书主旨所在，故利用修订之便，特再做如上引言。

自从在《百年潮》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下简称《恩怨》）一书的部分章节以来，听到了两种相当不同的反响。多数读者叫好，但也有少数读者提出批评。无论是叫好的，还是批评的，引起读者高度关注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即这本书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做出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解释。

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科学的生命就在于创新，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持续发掘和深入的研究，不断推出具有新史实、新观点的历史著作，这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也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问有其存在价值的最重要的证明。《恩怨》一书因为史实和观点新而引起关注，包括引起一些批评的意见，应该说是好事。

我研究中共党史问题已有多多年，出版的专著也有七八种之多了，自恃不少都深具新意。但像《恩怨》一书引起读者如此多的反响，却还是头一遭。想来一是写法取巧，如比较通俗易懂，标题有了一些包装等；二是本书的内容和题目容易引起多数读者的关心。毕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对不少读者有吸引力。

说实话，《恩怨》一书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我都不是第一次谈到了。但是，以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真正了解它们的只是少数同行，而且还是那些在学术研究上比较敏锐和勤奋的同行。换句话说，不论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多么重要，由于缺少有效的沟通渠道，它们不仅经常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很多时候甚至连许多搞历史这个行当的教授、研究生也不甚了了。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不少同行在那里“炒冷饭”，写“假大空”的应景文章，而大批读者却在那些专事“揭秘”的“地摊史学”和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港台政治历史类盗版书中，苦苦寻找他们所关心的历史问题的答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学家们辛辛苦苦发掘来的史料和研究的心得，有时反倒是靠那些

以“剪刀加糨糊”生财的书商们，打着纪实的名义，缺胳膊缺腿地给推到社会上去了。

历史研究有必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这似乎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历史学家不能总是搞一些佶屈聱牙、高深莫测的东西，没人读没人看，只为了评职称，否则这个社会要历史学家干什么？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几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搞成通俗易懂的形式。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的成果都适合于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身在象牙塔尖的人，往往也不敢轻易把脚伸到地面上来，因为那很可能遭人诟病。记得我的一位搞民国史的同事，只因为越界搞了一部电影史，就好受了一顿批评，并且影响了评职称，更何况要把原本是庙堂之上的研究通俗化。不难想见，要使我们的研究保持相当的学术水准，同时又能够成为众多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东西，着实要冒一点风险。

写这样的题目，会触动的还不只是历史学界的神经。1990年代以来，俄国档案的大量公开，对中苏关系史，乃至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恩怨》一书所以能够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提出许多新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但利用俄国档案研究有时也会引起麻烦。两年前刚开始发表书中有关朝鲜战争的章节时，就听到一个意见，说是文中太多的依据了俄国档案。有权威机构的专家甚至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别谈了“如何看待和运用俄罗斯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问题”，说俄国公开档案是有倾向、有选择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应当多利用中国方面的档案。

研究历史，特别是涉及到与核心政治有关的历史，最大的困难就是利用档案文献资料的不便。任何国家开放档案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会有倾向性，这是不必讳言的。问题是，美国等欧美国家的档案公开有法可依，除被认为事关国家安全的个别档案要适当延长保密年限外，一般30年一过就自动解密。自九十年代开始，俄国档案也基本上

照此办理了。不过，由于那里改换了朝代，新政府对公开旧政府的许多秘密，有时反而更彻底。台湾方面公开档案的情况也大致相似。目前，最困难的反倒是查阅我们自己的档案。我们开放档案的时间按理说不比俄国和台湾晚，而且我们在八十年代就颁布了《档案法》，也规定了30年解密的时间界限。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开放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还只是一种形式，即由政府委托的部门负责在大量档案中筛选出极少数加以整理和刊布，不要说一般人，就是相关学者也很少能直接前往有关档案馆调阅查档。在这种情况下，把我方已经公布的档案资料与有关国家已经开放的档案资料参照起来进行研究，实际上不可避免。

应当说，历史研究是没有国界的，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去研究，人家也会去研究。利用本国档案，与利用外国档案，在研究者本身并无多少分别。何况，《恩怨》一书其实还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内方面公布的档案的。不论海外有关国家和地区在开放档案时有无倾向和选择，两相参照，相信是完全可以得出客观的判断的。

当然，利用近年来大量新公开的档案文献来重新探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最主要的还是会让研究中共历史的专家们感到不那么自在。因为此问题肯定会牵涉到中共党史上的一些传统的说法和观点。由于中共党史研究曾长期脱离历史学的范畴，被提升到政治理论宣传的高度，成了政治运动的风向标和宣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直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重心以后，它才渐渐复归本行，有了从学术角度来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可能。但凡事积重难返，并不是所有人都习惯于在这个领域里听到不同声音的。

记得在《百年潮》杂志初发《恩怨》一书第一章的内容，旨在对于我们过去所熟知的一个观点，即“共产国际始终压制毛泽东”提出不同看法，强调：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擢升，除了其主观的因素以外，莫斯科的态度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此，有人表示难以接

受，批评说，人人都知道共产国际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思想，并支持王明路线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仅以斯大林或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直接地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这个现象为根据，来证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这种说法是不是太肤浅、也太没有说服力了？”

其实，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是有变化的，而毛泽东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共产国际主席的高度赞扬，因领导红军和成功创立根据地被莫斯科批准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政治领袖，进而被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颂扬为“伟大旗手”，又是印讲话小册子，又是出个人选集，最后当王明争权时，国际领导人更明确表态支持毛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包括

“左”倾中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背后虽然有国际“进攻路线”的错误影响，但莫斯科反对排斥打击毛泽东，并且坚持要利用毛泽东的丰富经验，要宣传和提升毛泽东，也有大量文献可以证实。历史有时是很复杂的，有分歧不见得没有共同利益，有联系不见得就思想一致。

也许有必要指出，对于一部历史著作来说，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它的政治批判力如何强，而是要看它能不能充分占有史料，并依据可靠的史料，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描述清楚。对错谁属，责任大小，并不是一部历史书必须要讨论的问题。要做到实事求是，“客观”两个字非常重要。如果研究者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和感情色彩，基于鲜明的政治功利主义，着眼于批判的目的，其研究就难以做到实事求是，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甚至根本就搞不清楚。以往关于中苏关系，特别是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研究的文章著作，之所以很多不尽如人意，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检讨的原因。

这里有个很简单的例子。70年代苏联出版了早年曾经到中国来充当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达林的一本回忆录。其中引述了他在1923年写

给共产国际另一位代表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信中明确批评毛泽东右倾，说毛作为中央代表，在青年团中央全会上却主张加强对官员和乡绅的工作，宣称在贫苦农民中间工作很难有什么作为，实际上是在农民问题上放弃了阶级路线。按照我们通常所得到的印象，毛泽东生来就是站在左派一边的，在中共党内更是历来代表农民讲话，因此，尽管80年代这本回忆录在中国出版了，却没有人重视这则资料，甚至有些研究者公开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其实，这封信确实是存在的，90年代我们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里就亲眼见到了这封信的原件。很明显，由于不重视，甚至有意忽视这样的史料，对毛泽东早年生平的研究就缺少了一段很重要的环节，就不可能完整和系统地说明毛泽东早年思想发展的轨迹。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党史的研究当中是很多的。

容易先入为主是传统的党史教育留给我们的一个相当负面的影响。它使我们对复杂历史的理解往往会趋于简单化和概念化。凡事非此即彼，不是黑就是白。因为断定毛泽东从来都是革命路线的代表，因此任何反映毛泽东当年可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革命”的史料一概不予置信；因为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因此认定莫斯科必定支持当时的“左”倾中央压制毛、打击毛，根本否认莫斯科曾经器重毛、宣传毛；因为强调中国革命是“毛主席独立自主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因此一切以1935年遵义会议划线，过去统统错误，以后统统正确，坚称中共中央此后各项政策策略的制定再与共产国际无关，中国革命不仅再未得到莫斯科的任何帮助，而且是在抵制莫斯科错误干扰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但是，历史真是如此泾渭分明吗？非也。读一读《恩怨》，读者会发现，这段历史实在复杂。毛泽东的受压与崛起，中国革命的失败与成功，很难说哪一方面与莫斯科没有关系。

除了传统党史教育的影响以外，还容易给读者，甚至给我们许多研究者造成极大困扰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当事人对历史的评

说与回忆。中国社会，凡一统天下之时，都要搞“定于一”。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盛行，自然更是“一句顶一万句”。改革开放以后，否定了“两个凡是”，又强调实事求是，历史学家才有了思想的可能，但有些人也还是习惯用“尊者”之言来衡量一切，从而使任何试图对传统说法提出异议的研究都有越雷池之险。

但是，在摒除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之后，继续搞“定于一”是否有些有违历史大潮呢？仅以历史研究而论，其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当事人的观点和回忆一般不能被简单地用来说明历史，因为事过多年，再加上当事人通常都带有很强的主观倾向性和感情色彩，其评论和回忆难免会有失实失真的地方。至尊如毛泽东者，也不例外。例如，毛泽东在1936年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己的历史，其中谈到1920年他在北京期间读了三本书，说正是这三本书促使他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们已经发现，这三本书，即毛泽东提到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这一年并未翻译出版。也就是说，不懂外语的毛泽东这一年不可能看到他说的这三本书。而将这一点考证清楚，以往关于毛泽东1920年春夏开始转变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说法，也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了。对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做深入研究之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以往谈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通常都是以毛泽东的看法为准绳的。因此，《恩怨》一书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从对毛泽东许多充满感情色彩的言论和回忆的深入考证与辨析入手，来展开这一纷繁复杂、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的。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从写作的技巧上考虑，层层设置悬念，以便引人入胜，也是为了避免大量重复那些人所共知，可以忽略的事实经过，以便对这一问题多少有些知识的读者能够直接切入主题，引发思考。

引发更多读者思考，可以说是《恩怨》一书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除了让读者深入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以及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变化经过以外，笔者希望众多读者能够读懂的意思之一就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1949年以后犯过重大错误的毛泽东是如此，1949年以前常常过五关斩六将的毛泽东也同样如此。既然是人，他就有成功，也有失败；靠能力，也靠机遇；可能“高瞻远瞩”，也不能不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心中不满，却不得不借力于莫斯科。虽然破釜沉舟，登高而呼，到头来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经纵横驰骋，就倒装葫芦，断定毛泽东从来都有未卜先知、百战百胜的神机妙算；同样，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曾经翻云覆雨，就认为毛泽东总是一步步不露声色地设计好了将对手一网打尽的政治陷阱。

可以肯定，有不少读者对毛泽东还是抱有某种神秘感的。寄希望从那些名为请下神坛，实为再塑金身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去体会其“平凡”，大概是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经常听到人们谈论毛如何深谋远虑，其实，看看《恩怨》一书讲述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相信不少读者都会发现，毛泽东与我们大家严格地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甚至他所犯的许多错误，也与我们日常所犯的错误大同小异。只不过，到了他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小的错误积累起来都会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而在缺少制衡和监督机制的体制之下，他的错误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其自身难以发现和克服的。不要说聪明如毛泽东，换了其他人，也不会两样。

人活着就应该活得明白。希望这部旨在引发思考的《恩怨》可以让多数读者在这方面得到一些满足。

[在毛泽东“革命外交”的背后 \[53\]](#)

由于落后国家的革命通常是以统一夺权在先，再继之以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在后，故这些国家的革命党，每每通过革命的方式获得了政权之后，紧接着的对外政策也会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落后国家革命党的革命性及其理念未必相同，影响到它们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继续“革命”的程度和方式，也往往会有很大区别。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中国近百年曾经经历过两度革命成功。一度是在1928年，那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宣告大功告成。一度就是1949年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两次革命成功后，新生政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程度，就相差甚远。国民党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后，其南京政府虽然也大力推动“革命外交”，力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却是在承认过去的北京政府既有外交关系和承认各种外交条约协定继续有效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利用各种曲折委婉的外交手段，来迫使列强各国放弃在华特权，从而逐渐达成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革命性目标。这样一种“革命”，也难怪后人通常要把它打上引号，或者直接称之为“修约外交”了。以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自身的力量和有效统治的局限性，既不想完全得罪各国列强，又要想通过外交谈判来求得列强同意废约或修约，其难度之大，最终弄得虎头蛇尾，实效寥寥，也就可想而知了。

共产党就完全不同了。还在其军事革命胜利在望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三项外交方针。第一，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旧政府同外国政府所建立的外交关系及其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任何国家必须在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断绝与国民党政权外交来往的基础上，重新与新政府进行建交谈判。第二，是“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就是不急于取得资本主义各国的外交承认，要争取在肃清一切内外威胁和各

种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及影响后，再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谈建交问题，以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会用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办法，在新中国内部来捣乱。第三，是“一边倒”。就是在美苏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下，在政治及外交方面，坚决采取与苏联一致的政策和作法，绝不因眼前利益在美苏之间做骑墙派和墙头草。依据这样一种方针，共产党的新中国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以美国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从而长时间被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但与此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废除了旧中国残留下来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得以把在中国有着极大影响的西方势力一朝清除净尽，极大地满足了众多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促使新中国采取如此彻底的革命外交的方针的，根本上在于共产党人有着完全不同于国民党人的意识形态。尽管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共产党人还是阶级斗争论者。共产党人不仅相信国内的人群是按阶级来划分的，而且相信在国际社会中间，也一样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当新中国的桅杆刚刚伸出东方地平线之际，毛泽东就已经认定：帝国主义恨死中国革命了，它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颠覆中国新生的革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的外交选择，带有鲜明的阶级革命的色彩，即使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也就自然会波澜起伏，险象环生。从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新政府拘禁起诉美国总领事，到中共中央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公开鼓动各国人民进行武装革命，到在北方大举出兵援朝抗美，在南方倾力实行援越抗法，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台海关系，二三十年间常常擦枪走火，呈现出高度紧张的态势。

然而，本书并不准备把新中国的外交与革命简单地混为一谈。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人很难纯粹基于意识形态和他们追求世界大同的革命冲动来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证就

是，今天被高度评价为中国和平外交标志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恰恰就形成于建国初共产党人还颇多革命热情的那几年。

不难了解的是，作为当年美苏冷战格局下落后国家的一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新中国在外交及国际关系上能够选择的空间原本就极为狭小。从后来的种种事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即使在中共新政权建立之初，莫斯科其实未必就是北京最好的合作伙伴。纯粹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和美国同样僵化的外交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强烈地刺激了有着极强的民族悲情意识和逆反心理的毛泽东，才使得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很长时间里几乎别无选择的余地。换言之，如果当年的美国政府不曾，或者中途改变其僵化的不承认政策，改取尼克松后来的作法，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会否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也未可知。毕竟，毛泽东既是阶级斗争论者，也是民族主义者，如果能够一举成就其民族主义目标，并在国际关系上感受不到过于严重的威胁，他会不会更多地转向从民族主义，而非从阶级斗争的立场来看国际政治关系，也未可知。至少，有事实证明，他对于美苏两个大国，最看重的还是美国。

毛泽东的私人护士吴旭君和毛的表侄孙女王海蓉等人对毛当年决策缓和中美关系的回忆，最能够反映出这位自尊心极强，又被世人视为最伟大的反帝领袖，在内心里对改善中美关系其实是如何的渴望……

她们回忆称：在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濒于战争边缘之后，毛泽东改变了向来不肯向美示弱的态度，批准了中方代表主动恢复对美接触，以促成更高级会谈的对美外交方针。本来，这一过程到1970年初已基本实现，双方已同意进行比大使级会谈更高级别的外交接触。而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向中方公开示好，让毛更加迫切地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

不料，这一年的3月间，受到中国支持的柬埔寨发生政变，美军从越南出兵支持了政变方，此举使原定中美更高层接触的计划难以迅速

落实了。毛泽东随后还不得已于5月20日亲自出席了支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合法政府的群众反美誓师大会，发表了著名的“五二〇声明”。但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毛此举不过是“重复过去的革命言辞”而已，并无实质性意义。当美军很快撤出后，为公开向美示出善意，周恩来像往常关键时刻一样，马上就把毛泽东最信赖的美国朋友，前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到北京来。

10月1号上午，照例举行国庆群众集会和阅兵式，但毛泽东却显得格外兴奋。吴旭君等帮他穿衣服时，他一再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观礼过程中，周恩来特意把斯诺夫妇从侧台领到毛泽东的身边来，双方握手寒暄，然后就是专门安排的摄影师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拍下来，次日公布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实际上两人也并没有进行交谈。用毛泽东事后对吴的说法：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此事过去之后，毛泽东一直在等美国方面的反映。直到12月13日读到《参考资料》上编译的斯诺的文章，注意到斯诺把毛反美的“五二〇声明”解释成中国并不排除与美国人联合反对帝国主义，毛颇为高兴。他当时虽然在感冒中，却紧急召见了还在睡梦里的斯诺，还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中间，他更喜欢敢作敢为的右翼的共和党人，提出很欢迎尼克松总统能来华访问。谈话之后，周恩来再度安排《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布了这一消息，并配以“毛主席语录：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纪录，经外交部相关人员整理后，专门提供给了斯诺一份。但斯诺结合自己的笔记整理的文章，因种种原因，迟至1971年4月才得以发表在美国的《生活》周刊上。而这时，毛泽东已经等不及了。

1971年3月，中国于文革后首次派乒乓球队参加日本名古屋的世乒赛。毛泽东高度重视，常常“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天天催要相关信息和报告，想了解信息。

由于美国政府这时也在设法向中方示意，因此，在美国政府的暗示和推动下，美国乒乓球队主动提出了访华要求。不了解情况的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报告，主张不邀请美国队访华。周恩来也不认为此时邀请美国队访华是适宜的，因此于4月4日也批示“同意”，并转呈毛泽东。反复考虑两天后，毛泽东也批示同意，退回外交部办理。但报告退回后毛思来想去，总觉得机不可失。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他当时已经吃了安眠药，在昏昏欲睡中突然对吴旭君说起话来：“打电话——王海容——美国队——访华！”

美国队成功访华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及其助手黑格亦先后访华，确定并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由于黑格在转达美方口信时，突出强调了在中苏冲突问题上，美方愿意“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的态度，让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大发脾气。因而，不仅周恩来等当面严辞反驳了黑格，上海地区的领导人更是马上通知黑格一行准备去的上海、杭州等地的相关接待单位：要马上“降温”，“脸无好脸，菜无好菜”，且“糖果减半”。可是愤怒归愤怒，毛泽东还是不愿意因此使中美缓和的进程受损。故得知上海方面的态度后，他当即要求一切照旧，不许降温，还要上海方面要设法挽回不良影响。他甚至亲自批示称：“糖果不能减，照送。”

终于，1972年2月21日，迎来了美国总统访华的日子。就在尼克松到来之前，泽东2月1日会见过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之后，刚刚患了一场大病。病虽初愈，但自2月中旬以来十天左右时间他都一直躺在床上，连起床和在床头久坐的时间都很少有，身体状况十分虚弱。毛自己也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缺少把握。因此，外交部门也一直没有确定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的时间。然而，从尼克松的专机到达上海后，毛泽东就一直有点心神不宁，犹豫要不要马上见这群美国人。他时不时就会询问身边工作人员，尼克松的飞机到了什么地方。终于，就在尼克松的专机将要在首都机场着陆时，他再也躺不住了。他艰难地欠起身来，告诉吴旭君：“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

吴旭君等劝说无用，赶快通知了相关人员，然后小心地把老人扶起来，帮他一件一件穿上衣服，并请来理发师将近20天没有梳理过的毛泽东理发刮脸。由于对毛的身体状况毫无把握，吴等极度担心。叫人准备了食品，防止毛谈话中发生低血糖现象。叫医护人员准备好了所有必要的医疗器械和急救药品，连强心剂都抽到针管里，随时准备应急。

结果，人逢喜事精神爽。原定15分钟的会面，毛泽东一高当，和尼克松、基辛格海阔天空地聊了65分钟。

尼克松走后，毛泽东仍意犹未尽，毫不感觉疲劳。他兴奋地告诉吴说：看来中美可以建交了。“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由此不难了解，在毛泽东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反帝革命主张的背后，还有一颗同样极强的自尊心。基于这种强烈的自尊心，他在内心深处实际上对美国的外交承认及其中美关系，极其重视，对长期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和受制于美国而无法成就中国的统一大业，极感沮丧和不满。新中国建立20年里激烈反美反帝，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深受这一现实刺激和困扰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透露出任何善意的信息，毛泽东都高度看重。一旦认准了有缓和两国关系的机会，虽然深知放弃反帝旗帜代价极大，他也必定会知难而进，义无反顾。他显然相信，只有得到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先进的美国的承认，他及其在

他领导下的中国，才算是真正踏上了受人尊敬的通往国际政治舞台的红地毯，诸如联合国席位及其统一台湾之类的问题也才有机会“迎刃而解”。对中国来说，面对遥不可及的世界革命的前景，这也许才是最现实的一种选择。

古语云：“开卷有益”。此话听了几十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古人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老夫子当年对此还有过一番解释，说是我们对孔老先生整理过的经典尚且不可尽信，更何况其它呢？在这方面，孟子最好的继承者，大概莫过于毛泽东。因为自孔孟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多半早忘了孟子的这一教诲，不仅死读书，而且每每将前人的言论语录集为经典，自己天天读不说，还要求后代顶礼膜拜，一生奉读，以从中体味其微言大义，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武器。在无数代中国人中间，好不容易才熬出了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不仅经常重申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而且主张：凡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读书尤应如此。他本人甚至还专门写过一本《反对本本主义》的小册子，并且终其一生都在向权威挑战。只可惜，等到毛泽东自己成为无上权威之后，他老人家一不小心，中国竟重又滑回到过去“读经”的时代去了。

改革开放之后，“读经”的时代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但是，随着信息爆炸的时代到来，出版物特别是网络信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汹涌澎湃，读书在中国竟然越来越变成为一种奢侈。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限的范围内，有选择的读书，对于多数还想读书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了。而因为相对于铺天盖地般的信息洪水，每个人读书的范围都只能变得十分狭窄有限，人们自然也就少了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鉴别的种种可能。再受到先入为主和主观情感因素等等先验经验的左右，“死读书”、“读死书”、“以为上了（某些）书的就是对的”等等好似早已过时的现象，重又死灰复燃。以至于读书人中间分化对立，各执一端，不相调和乃至相互攻讦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当今许多读书人所面临的一大困惑了。

围绕着刚刚过去，在各场合中反复咀嚼议论于国人中间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或外交的历史，自然就更加容易被读者自身先验的经验所牵制了。上面所说读书人分化对立、各执一端的情况，有相当部分就发生在喜欢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读者之中。说起来，这里既有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各种观念的刺激；也有因为民族、党派、地域、阶层以及家庭不同而在历史或现实中的感受不同，所带来的立场情感上的差距与隔阂的作用；更有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想当然地把自己看成半个历史当事人的某种自以为是。

既然上帝造出的人每个人都互不相同，人们相互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会有歧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是，每一个受过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总不免希望自己的客观研究，也能够被客观的读者客观地去看待和了解，从而提供给读者多一种认识和思考历史的角度与渠道，不至于仅仅因为读者的主观好恶，或被捧到九天之上，或被抛于九地之下，或者干脆因为自己对某些历史“生而知之”，就认定了凡是近现代历史研究，都只是故弄玄虚，根本就无所谓客观，故不读也罢。

毫无疑问，人之所以为人，都有七情六欲，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有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但是，把历史看成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定每个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只是服从于其个人好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断乎不能成立。不管实际上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任何太过明显地带有情感立场倾向的历史著作，至少在学术领域内，都是难以得到多数历史学研究者的认同的，也是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

当然，话虽如此，要想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仍旧是困难重重。想当年参观韩国的历史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不期然发现那里所讲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大部分都是讲述朝鲜民族对中国和日本的抗争史。影响所及，韩国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古代高句丽，乃至渤海国，就是古代朝鲜的一部分。结果，2003年6月24日中国《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牵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集体撰写的文章，因为一改过去承认古代高句丽属朝鲜历史一部分的观点，认定其应为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在韩国学术界、舆论界乃至部分民众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中韩两国关系也几乎受到了影响。进一步联系到由前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提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牵头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立项与结项工作同样在国际学术界所引起的广泛质疑，均不难看出，中国的历史研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何等尴尬的境地。

古代史尚且如此，近现代史更不必论。

上个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一本《中国近代史》，得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喝彩，蒋也因此声名远播，官运亨通。不过，60年后，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溃》，却被人狠狠地砸了顿板砖，差点儿弄得连教授都当不成。两人所讲的观点其实十分相近，只不过一个提纲挈领，广而论之；一个解剖麻雀，具体说明。其间的差别，说起来不过是因为时代不同，读者心态各异，以至于两人的境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罢了。

同样的情况，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大都了解，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的研究相对较为学术，学者的研究也多就事论事，很少与现实政治扯上关系。之后的情况则大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声讨谴责日本战争罪行和批判日本当局顽固态度的政治斗争的行列中去了，以往客观冷静的学术研讨反而不大看得见了。说起来，日本当局

在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其实长期以来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大陆学者态度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乃至国防外交环境与形势的变化所使然。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它们都包涵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人们在看事物时，只有保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再加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时间上越近，政治上的掣肘和顾忌越多。不仅许多档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难无所顾忌地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直言不讳。凡此种种，都使得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读者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多问一些为什么，而不宜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取“拿来主义”，以至于更加深我们主观武断的倾向，被太多的“清癯”们误引到非历史的道路上去了。

清癯，想来也是深以中华民族为自豪的一位作家（如果不是历史学家的话！）。他曾写过一篇叫《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短文，大谈成吉思汗征战欧俄之经过，称之为“吾国战史上最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其说辞颇有点像今天各种电视剧中对“我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乃至雍正之辈的颂扬。只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的元朝还要更胜清朝一筹，因为“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

对此，鲁迅却评论称：“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过得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莫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鲁迅说：“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即1934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即俄罗斯—引者），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下面这段话，也是鲁迅讲的：“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很奇怪的是，鲁迅上面的话，就好像是写在今天一样。

这即是本书题名“开卷有疑”的一个初衷，也是笔者读书时一向坚持的态度。

只不过，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涉及的读书范围，仅限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旁及外交和军事史的个别方面或片断历史，而且所评之书多半还是当前史书中的佼佼者。因此，就本书所提及的问题而言，还远不足以让读者充分了解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乐趣与意义的重要。但是，只要能够在带着问题读书方面提供给读者一些帮助，哪怕只能起到很少的一点作用，在笔者就已经是很大的一种满足了。

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 [55]

新中国的建立，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如果我们过去更多看到的，还只是无数革命者为之抛头洒血，前赴后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更有必要了解，这样一个新中国，是在怎样一种条件和环境下实现其政治秩序的建构的，而这种条件和环境的复杂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新的秩序的合理性。

古人常言，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主张凡以强力“逆取者”，当以仁义“顺守之”。就是靠武力夺并天下之人，一定要重“君子之治”，即要“行仁义，法先圣”，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但是，对于主张阶级革命的共产党人而言，这一条却未必是天经地义。毛泽东说得好：“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巨，更伟大。”这是因为，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共产党人就不能从马上下来。此亦即毛泽东所谓“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保天下”的意思所在。

“保天下”，在这里求的是要确保过去保护富人的国家机器，今后能够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从而能够持续达成改天换地的革命目标，让新中国能够按照共产党人的意志来建设和发展。黄巢有一首诗最能反映此种豪气与气概。其诗云：“待到来年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用革命的逻辑来建构新秩序新国家，不仅要分左、中、右，而且要分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斗争不可。故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我花开后百花杀”，实属革命、进步之必要与必然。毛泽东有段话讲得十分形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经历了剿匪反霸、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各种斗争和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一度甚至出现了两千年前孔子所追求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盗窃乱贼而不作”的奇特景象。

然而，在严刑峻法和政治高压下成就的社会改造，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种种伤害与遗憾。古语有谓：“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而简单地按阶级划线的结果，注定会形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认识逻辑。其所造成的打击面之大，自难避免。

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到前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的一段回忆。它清楚地显示了在那个红旗漫卷的时代里，像杨敏之这样的千千万万激进青年，是如何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在经历着种种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灵魂洗礼的同时，家庭出身的原罪感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几十年挥之不去的梦魇。仅仅因为父母被划成为富农，在以阶级划线的革命伦理观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抛弃了一切传统的人伦孝悌、骨肉亲情、养育之恩，生生把父母看成了“敌人”。直到30多年后，当阶级斗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再悬在头顶之上，而父母也被摘去富农的帽子，他才终于发自内心地对生他养他的亲生母亲又喊出了“妈妈”两个字。

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杨敏之如下的反思很值得一读：

今天回想起来，历史对她（们）是不公正的，我也跟着走进了这个历史的误区。因为世界上任何人一生下来都必须在现存的制度下生活，出身不能选择，时代不能超越。把出身看成一种原罪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伟大的土地改革必须充分肯定，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是不是完美无缺呢？有没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在土改中推行了一条“左”的政策，并且产生了不良后果。这条“左”的政策不只是在土改中曾经一度出现的乱打乱杀（我们党后来纠正了这一倾向），而是在剥夺地主富农过多占有土地这一特权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人

权。把地主富农分子不加分析地都划入敌人的范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株连他们的家属子女，把他们的阶级出身看成一种原罪，从而剥夺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而且长达近30年。……我不反对对黄世仁、南霸天这样的恶霸地主实施镇压，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应该把一般地主富农与他们区别开来。因为剥削虽然是罪恶，但这种罪恶首先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个人是在顺应这种制度的情况下才催生了罪恶。而且，只有当剥削者像黄世仁、南霸天这样贪婪成性、心地歹毒、为富不仁，其罪恶才变得更彰显、更深重，更令人痛恨。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阶级斗争已成陈迹的今日农村，一些在旧社会生活过的老农言及当年的地主富农时，他们也承认天下“乌鸦”并不都“一般黑”，老农们当年也并不是个个都苦大仇深。

其实，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好，中共的相当多领导人也未必就没有杨敏之一样的情感。他们中许多人不仅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而且都曾对同为地主或富农的父母，有过充满理解和温情的回忆。他们并不因为父母的地主或富农身份，就相信父母的发家充满了罪恶与齷齪。恰恰相反，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父母的人品和道德，而且深信他们多半都是靠着勤劳、节俭和能力发家致富。

很显然，新中国建国后，中共领导人之所以更加强调“天下乌鸦一般黑”，很大程度上恐怕只是基于“打天下”所得的经验，而用之于“保天下”的目标。在他们看来，从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的角度着想，为了他们的革命及其利益的需要，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这多半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这种惯性的作用几乎不可避免。不论今人怎样看待当年的“阶级斗争”及其代价，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划分阶级，鼓动、领导贫苦阶级与富裕阶级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仅推翻了过去的统治者，而且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他们也确是用同样的方法在建国初成功地巩固了这个政权。毛泽东所以越到晚年越相信“阶级斗争，一抓

就灵”，不是别的，也的确是他的经验之谈。只不过，这个经验，即使对于毛泽东和中共的目标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过多地依靠和使用它的结果，固然压制了对手，同时却也割伤了自己。

[如何从党史研究转向历史研究 \[56\]](#)

第一次听到国芳的名字和见到国芳本人，是在2002年春季博士生考试面试的时候。叫到他名字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进门的他竟高出其他多数考生将近一头，理成寸头的头顶上已经依稀能够看到星星点点的白发，堆着笑容的脸黝黑黝黑的，除了可能有点怯场的紧张以外，丝毫看不到长期埋头书堆，不见阳光的“白弱”病态。如果不是脸上还架了一副眼镜，放到街上，大概不会有谁会把他和“博士”这一头衔联系起来。

当时面试的考生，基本上都有历史学本科学习和研读历史学硕士生的经历，而且多数都是硕士毕业直接考博，他是唯一本科学政教，硕士改学历史，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工作的。由于缺少本科四年的基础训练，尽管他读了三年硕士，思维习惯和读书范围，仍基本上局限在中共党史的范围内。从面试的结果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他阅读和训练的功底，确较一些一直学历史的面试生有差距。由于当时我否决了考我的另一位考生，因此，面试小组几位教授虽然并不认为他可以录取，但还是把要不要录取他的决定权丢给了我。

我下决心录取国芳，理由很简单。第一，其虽一脸憨厚，但从他面试的问答中，可以看出他有一种外粗内秀、虚心踏实的气质。学做历史，这是重要的优点。第二，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善于实证研究，解剖麻雀，但也容易存在一种缺陷，即因为很少系统的理论学习经历，缺乏理论思维的训练，多不善于察微知著，以小见大，抽象概括，宏观思维。相反，有过政教学习经历，只要思想不僵化，这方面反而有其长处。何况，我自己就不是历史学本科出身。

在接下来的学习和交流过程中，国芳的表现证实了我当初的判断。在选题问题上，他最初的想法还是很难脱开过去从政教学习中得来的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总是想研究诸如1960年代中期中苏

论战之类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国芳改行到历史系来学习，非做一篇实证研究的论文不可，以便从头到尾经历一遍从搜集原始档案文献，到整理分析各种史料，最终归纳成文的史学研究过程。

针对国芳等同学有入史学研究之门的问题，我先通过专题课，要求几个同学一组完成某一事件的大事记，考察他们对史料的感觉，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掌握搜集整理史料的基本方法。而针对他们作业中暴露出来的概念使用的随意性和读书不求甚解的问题，又接连开了研究综述课、文本解读课和读书课。记得有同学抱怨我是搞“魔鬼训练”，但国芳一直非常认真地按照我的要求参加每一次讨论课，并完成每一份作业。而对我针对他及其他同学每次上课或作业中暴露的问题所做的评语，他都能够用心消化吸收。因此，经过了一年多来各种课程的学习训练和阅读之后，他的作业比他刚开始学习时有了质的提升。很明显，他已经开始摆脱了传统党史的思维方式，逐渐习惯了用史学研究的方法来思考和写作了。

当然，最重要的训练还是靠博士论文的写作。由于注意到国芳当时很难自己选定合适的博士论文研究题目，因此，我给了他一个建议，就是他最好去研究一下1947-1949年中共占领石家庄的问题。因为，石家庄是新中国建立前中共第一个正式决定要牢牢占住加以建设的重要城市，它曾经为此后中共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中来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而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人具体地研究过这方面的情况。

让国芳做这样一个题目，并非我对当时档案史料开放的情况有了十分的把握。我的想法只是，国芳过去的学习基础主要是中共党史，要他改做其他方面的研究，时间上来不及。同时，他家住石家庄，长年在那里上学工作，相对而言研究当地的问题，在查找文献档案和接触各种其他史料及当事人方面，会有很多便利条件。

十分幸运的是，河北省，尤其是石家庄市档案开放的情况相对比较正常。这样，国芳作为本地高校教师的优势就充分显示出来了。而

他朴实谦虚，踏实稳重的性格更便利了他与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的交往。前后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终于把保存在该市档案馆内中共占领石家庄初期的各种相关档案，全部查阅了一遍，并按照我的要求，整理成了初步的大事记。这一工作最终奠定了他成就这篇论文的最基本的史料基础。

我看过他的大事记后，曾在信中（2003年10月20日）告诉他，他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

至少两个方面的资料已经可以大致构成论文的线索了，一个是从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角度开展的蒋伪登记和清查的工作；一个是从建立政权、发挥各级政府机构正常职能的角度建立薪资制度，稳定旧职员队伍和设立新的街区的工作。但即使就这两个方面来说，目前的资料缺口还是很大，主要是缺少较为具体和生动的案例。前者还必须要尽可能多地搜集中共进城以后镇压及除奸的情况，你的材料里也偶尔提到有这种事情，但没有详细的资料。后者更需要找到较为具体的录用旧职员的数量，一些主要部门的建立和人员构成的情况，以便了解进城后哪些机构是新设立的，哪些是沿用旧的，它们中新旧职员录用情况如何，效果如何，关系如何，以及旧职员和以前相比社会地位及其生活状况如何，等。你的大事记里还缺少部队进城时的相关情况，因为你必须要从夺取石市开始写起，不仅要说明是哪些部队占的石市，而且要说明这些部队第一次进城以后的表现如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各级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还缺少对石市城市阶层、行业等社会关系和社会状况的考察资料，因石市毕竟当时也只是个中小城市，它与其他大城市相区别的特点必须要交待出来，人们必须要了解那里有多少家工厂，规模多大，石市主要的经济行业和经营行业是什么，工人所占比例有多大，店员有多少，他们中对中共入城的态度怎样，中共对他们的工作如何，何时才开始组织工会等穷人的阶级斗争组织，为什么，效果如何，如此等等。总之，中共进入石市后，整

个的社会生活、经济生产，以及人与人关系，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好在哪，不好在哪，什么人赞成，什么人反对。其经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能从石家庄深入发掘出更具体的资料来。我意既然已经搜集到这种程度，不妨下决心再挖下去。到石市或河北省的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报纸刊物和文史资料中再去弄出更全面的东西来。

当然，随着论文写作的进展，档案史料的搜集仍旧不可避免地还要继续。但对国芳而言，当时条件下最大的问题，还是他一方面欠缺系统的史学研究的训练，另一方面因为岁数的关系，他非常希望能够在第三年按时毕业。而恰在他入学后，北大历史系在牛大勇主任的主导下，加强了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要求，已经连续有几名博士毕业生的论文被否决。因此，要想按照当时规定的三年学制的时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对任何一名博士生，都是极大的挑战。记得在高他一届的中国现代史专业博士生预答辩中，就发生了四人的论文有两人被当堂否决的情况。而在同一天，近代史预答辩的博士生论文却全数通过。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旁听的现代史研究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少同学认为关键是有个别老师太过挑剔。国芳自然也很紧张，他当天就写信给我反映了同学们的看法。我曾为此专门回信谈了我的意见。

我在信中（2004年3月17日）写道：

那天确如你所说，差点只X老师一人勉强过关。这种情况事前其实已经确定，并非只是L老师一人的意见。F老师和O老师事先都认为他们各自的一个学生论文不行，故特意请L老师帮助审阅，实际上已经认为二人很难过关。当然，G的论文也有很大问题，在我看来可能还不如F老师学生的论文，只可惜我不大懂（F老师学生研究的）那个问题，没办法讲话。像那天那种情况以前极少碰到，包括X老师的论文问题也很

大，虽然X老师同意按照我们的意见把文章一分为二，但要在一个月之内将一个问题梳理清楚，将文章整个改写，也并不容易。

从这次预答辩你应当能够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即四个人的选题基本上都属于史论而非史实的研究，且完全没有在可能做到的史实考订和研究上去下功夫。近代史教研室那天所以能一下子过四人，选题上贴近史实而非史论，同样关键。

学生们对那天的结果感到诧异，表示不满，我能理解。但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多数同学大概都没有看过他们的论文，并不清楚论文的水平究竟如何。二是大家已经习惯了过去那种得过且过的方式，抬头不见低头见，都认为老师应当留有情面。

你说有人讲开题的班子和预答辩的班子成员不同，因此要求不同。这完全是不了解情况的瞎说。在那天会上你也清楚地听到了，我是参加了开题的，o也是参加了的，我在开题时对o两个学生的题目当时就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并具体地提出了建议，开题小组当时也是同意的。但o很快出国一年，对此没有严加督导，他的两个学生也全没把我们的意见当回事，继续照自己的计划去做。这与两套班子没有多少关系。对于这一点你自己要有判断，不要人云亦云。

至于要不要留情面给出路的问题，我想这种想法首先就成问题。大家为什么要来考北大？当然是因为它的牌子好。它为什么牌子好？首先就在于它的水平高。如果北大历史系的要求也和其他一般大学历史系的要求一样，北大的牌子又怎么能好得了？既然考入北大历史系，就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即北大历史系对博士论文的要求理应会比其他学校历史系的要求高一些。过去在这方面北大历史系曾经随波逐流，降低过自己的水准。这两三年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在牛大勇等老师的坚持下发生了改变。两年前教研室通过的几篇博士和硕士论文，就已经被系的学术委员会否决掉了。这两年F老师、M老师等都自动地将他们博士生的答辩推迟了一年甚至两年。去年N老师力主将他的

一个明显跟不上要求的博士生做了退学的处理。所有这些都是L老师来到系里之前发生的，并非L老师个人标准太高。你在博士生中间岁数较长一些，且又负有一点责任，我希望你不仅要清楚这里面的问题所在，高标准要求自己，而且应当能在同学中间做些解释和劝导的工作，让多数同学明白，作为北大的博士生，理应想办法从学问好的老师那里学会做学问的方法，而不是总想着如何让老师高抬贵手，放学生过关。老师要求一严，就大发雷霆，甚至于公开骂娘。这种学生根本就不配在北大历史系读书。

.....

按照三年毕业的计划，国芳查找资料和确定题目的时间准备都很仓促，因此，在做开题报告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老师们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因此，开题后他也同样有过烦恼的情况，我在信中还是鼓励他要从善如流，多看到自己的不足。我在信中（2004年4月15日）说：

开题时近代史方面老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路，这是关键。做学问要有独立见解并能够坚持己见，但做学问的另外一条则是要海纳百川，从善如流，要善于从别人的东西和意见里面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改正之。

不错，历史着重于还原，但历史毕竟有太多的细节和枝蔓，不可能完全复原，因此还原的方法非常重要。中共是按照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经验来构建自己的城市政权的，但正如我那天所说，你的提纲对政权的管理职能及中共管理下的城市生存和运行的情况缺少重视，老师们的意见恰恰有助于你及时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没有人要你完全推翻原提纲另外根据施坚雅的模式去拟定一个新的提纲，但是你完全可以也应该在大量阅读了他们的相关著作之后，仔细地思考一下涉及到一个城市正常运行所必须的条件与建构有哪些，中共在努力创造一个足以确立自身统治的阶级政权的同时，它对它所反感的旧政

权进行了哪些扬弃，以便来维持一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因此，老师们要你注意近代城市的特点及其功能等等，包括房老师要你注意共产党抗战结束后为何能够那样容易地取代国民党等等，其实都是要提醒你在写一个新政权建立过程时，应当注意与旧的东西进行对比。这一点很重要。一方面，没有对比，就无法清楚地显示新的东西的特点所在；另一方面，你原来的资料准备也还略显单薄，增加了这样的内容之后论文自然会显得较前要充实得多。

不要怕麻烦，更不要怕困难，一篇好的论文必须要经过这样的反复。要想写出新意，且令人耳目一新，几易其稿也是常事，更何况一个提纲。能够通过考试和开题，以你那天的答辩情况，已经是太走运的事情了。要知道现代史老师们在这方面的要求，不会比近代史的老教师们低。

提纲修改之后请牛大勇和金冲及老师提意见，自无不可。但你也要有所准备，因为他们一来太忙，未必有时间仔细审读你的提纲，二来他们若不对你当面质询，也无法完全了解你提纲中的思想和内容。结果，或者他们不会提出多少具体的修改意见，或者提得不很具体，使你无从下手去修改，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故千万不要以为，反正以后主要是对现代史的老教师们做答辩，只要听现代史老师们的意见就可以了。博士论文不是单纯用来通过答辩的，它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显示你的研究水平的，过去的提纲只能反映出你在已有的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有所推进，却无法显示你作为历史系学生在历史研究上有所贡献。而且，一篇好的博士论文，也绝不可能出现现代史老师们说好，而近代史的老教师们认为水平不高的情况。

我意你大可不必在这方面费心，还是一心把该补上的知识抓紧补上，细心地梳理出城市接管和管理的研究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然后赶紧查找相应资料，以便早日开始修改已有的提纲。

由上可知，北大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这时的内部环境，对国芳既是很大的压力，但同时也给了他很大的推动与帮助。

国芳的论文写作过程虽然十分紧张，但总的进展还比较顺利，没有发生过颠覆性的反复。当时我具体看过几遍，动手修改过几稿，因为没有保留，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四五次应该是有的。这足以说明，他的论文从写作开始，一直是在反复磨合修改提高的过程之中。对于论文写作开始阶段出现过的问题，从我保存在电脑里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此信（2005年1月10日）虽长，也不妨引述如下，因为它最能反映国芳在最初研究写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后来的进步：

三章发来后已粗略读过一遍，感觉问题还较多。好的地方是，三章单独看某一个部分，即单独看某一节，都还可以，至少已大致上各成各的体系了。但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就发生了是否抓住了重点，理清了头绪，和是否自成逻辑的问题。

从你目前所拟三章的标题即可看出，你自己对各章所论的重心和内容，都还没有一个较有条理和有完整逻辑架构的思考。“忙乱与彷徨”、“考验与拓展”、“努力与创新”，这几个题目都是虚词，放在哪里都可以用（同样，各节标题中“前奏”、“溯源”之类的题目也不得要领）。你所以要用这样虚的标题，就是因为你所论各章之下的各节的内容，相互多不具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第一章前三部分尚可相互联系，第四节即已开始出现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在恢复经济的问题里面列入改革教育的内容？二是为什么要在建政研究的论文中一上来就谈论教育问题？三是第一章的重心究竟何在，恢复经济的问题如何与本章的重心相联系？为什么不把它归入第二章第三节一并叙述？第二、三章的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第二章第三节，第一节讲的是当时不稳定的形势及其影响，第二节讲的是中共公开及其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第三节讲的是经济政策的调整及税收问题，三个部分互不相关。第三章第三节，一个讲议政方式的变革，一个讲城市区以下基层政

权组织形式的探索，一个讲城市职员及工人的收入问题，同样是互不相关。要把这些看似发生在一个时间段里的事情统统拢在“建政”这一概念之下，让读者自己从中得出一个头绪清晰的印象，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你的论文目前最大问题，是简单地跟着资料走。哪部分资料多，就写得具体些，甚至与论文主题关联不大的情况，也要铺开笔墨去详细叙说一番（如中共公开、教育改革和收入分配问题的展开就全无必要）；哪部分资料少，就写得简单些，明明该多花笔墨去写的东西也只是点到为止（如干部纯洁问题、队伍本土化的情况及其作用和旧职员的利用等问题）；哪部分没有资料，就干脆不去触及。再加上自己的头绪不清楚，缺少宏观架构上的把握，就成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情況。你意在做石市建政史，却连何谓“建政”都未厘清。我对确定论文题目以及论说对象的问题，在许多场合都再三提醒过，首先要把自己的概念厘清。如果你认为“建政”这个概念人们能够接受的话，你自己也首先要把它的内容梳理清楚，并明白地讲出来。有理有据，取得读者的认可，至少做到自成一说。按照我的理解，你要讲清楚中共“建政”的问题，关键要讲清楚三点：一是中共如何处理与旧政权的关系；二是中共如何处理与多数城市居民的关系；三是中共如何破旧立新，自成体系。而这里面特别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对来自农村的共产党人来说，还必须要解决好按照城市特有的规律从技术角度管理好城市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即中共如何处理与旧政权的关系问题这一点，你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都有涉及。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处理与多数城市居民的关系问题，你也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都有涉及。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破旧立新的问题，你在三章中都略有涉及。但是所有这些涉及，在你都还不是有意识的和自成系统的，且这种涉及因为无系统、无意识，因此相互交叉或重复，那些为完整叙述需要交待的众多关联问题，更鲜有涉及。

至于最为重要的按照城市特有的规律从技术角度解决好管理城市的问题，你在论文当中更是几乎没有论说。

从论文现有的情况来看，最省力的办法，是按照我在上面提到的情况，先把三章的各节重新归类。第一章……重心在研究中共刚入城时面临的形势及其解决问题的措施。第二章第二节两目合并，党公开问题略写，党的本土化问题及角色定位问题与干部队伍建设放在一起写，列为第二节。应加写第一节，重心在研究中共党员和干部从农村中来的适应与不适应的问题，和部分逃跑及变质的原因问题。另外把第三章第一、二节移到第二章来。全章重心在研究中共城市各级政权建立的过程。第三章除把第一、二章的经济问题（第三章分配问题略写并入）做为一节外，应另外新写两节与城市政权特质有关的问题。如居民管理、旧的城市管理职能与机构的存废、旧职员及旧管理人员的利用与改造（最好有他们在城市水电煤交建及税收银行公安当中作用与问题的研究），以及工青团妇等各种基层组织在城市政权建设和巩固中的作用，新机构的设置及其原因的研究，等等。

目前论文的写作中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即是宏观的理性思考的问题。我再三讲过，我们今天研究建国史之类的历史，绝不仅仅是为了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必须要有一种批判性的反思。事实上，如果没有宏观的理性思考，没有对现实的关怀，不了解今天政治和社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来自于过去，要想在杂乱无章的历史乱象中梳理出清晰的历史线索，使读者有所知并有所思，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你目前的论文给人思考的提示实在是太少了。这是因为你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本来就缺少理性的反思，只是满足于把各种杂乱的资料拼接起来，使之构成一幅看起来多少有些影像的拼图。你的很多叙述，完全是在做很机械的串接各种引文的工作，几乎没有独立的判断和细致的背景的分析。不少地方的文字，甚至无法弄清楚究竟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你在转述引文的意思。这种情况非常糟糕。

我想，你不会不了解，中共新政权的建立过程，其实带有相当机械的程式。其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的方式，造成了许多问题，和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也造成了许多反复。石市新政权政策的左右摇摆，都与这种情况有关。而你因为对当时整个大背景把握不够，因此在叙述这些政策摇摆时，往往缺乏深入的有纵深感的分析与交待，更缺少对这些政策摇摆所带来的问题的理性的思考。以至于许多地方就事论事，讲了前面，忘了后面，竟至叙述中自相矛盾。比如你在谈到中共对工人的政策时，开始时强调中共入城后满腔热情地拥抱工人，坚持工人当家的口号；随后又讲贫民会其实是以城市贫民和小商人为重点；之后进一步谈到工人中相当多参加了国民党，因此干部们大都看不起工人；最后则强调1948年7月以前中共事实上忽视工人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如此等等，明显地相互矛盾。

最后还要提醒你的是，你的文字总体上还是通顺的，但是句子还是经常会出问题。一是时常会少主语，二是不知道如何断句，常常一个句子有一二百字之多。

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我上面的意见，并抓紧补充资料和加强理性思维，特别要注意在引用引文时交待清楚相关的背景，使读者不会产生误读的现象。

应该肯定的是，国芳前期的学习、教学和研究经历，虽离历史学研究较远，但仍让他受到了较好的写作训练。这使他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很快地根据老师的意见一步步完成对论文的加工修改。尽管，我对他最后提交的答辩稿不很满意，时间上当时也来不及再做深入的修改加工了，但我很清楚，他的论文应该已经能够获得通过了。

对国芳论文答辩稿的优点，我的看法可见“学术评语”表，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的研究正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它对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由农村转入城市的自我调适的过程，对于了解中国人民

共和国建国的特点及其随后的政治发展趋向，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共在石家庄建立政权与尝试着进行城市管理和建设的过程，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建国初期所遇到种种复杂的问题，和它解决这些问题的作法与过程，因而颇具典型性。本文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共占领石家庄之后围绕该市建政和管理所形成的各种重要的档案文献，并且注意到同一时期中共在占领其他城市过程中所形成的政策性文献资料，为其研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史料基础。

本文是近年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的成果中较有新意和深度的学术成果，其突出特点是史料扎实，研究具体，深入地分析和描述了中共最初进行城市建政工作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其写作比较规范，史料运用合理，逻辑基本严谨，文字亦属流畅。

对预答辩稿中存在的不足，我也在信中（2005年3月22日）告诉了国芳：

……

一篇论文的好坏，不在是否研究的是中共党史，我也做中共党史，历史学界不也一样承认和接受吗？好的论文关键要有思想，要能发现新的问题，能给人以启发，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你的论文最大的缺点就是缺少思考，没有太多思想性的东西。包括结论部分，也没有能够提出可以让人们读后有所启发的东西。

而事实上，从农村到城市，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通过中共干部进入石家庄从不适应到适应的一系列挫折和转变，可以给人很多思考：中共究竟带给中国的城市些什么，它自身又被迫改变了些什么？它对城市的建设、管理和国民党有哪些不同，又有哪些相同？不同是为什么，相同又是为什么？究竟哪些相同的东西是作为城市自身特质所必须的，而这些必须的共产党被迫接受了的东西，包括管理模式等等，是不是真的符合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所要求的那些基本的原则呢？再比较一下进城最初几年的情况和后来毛泽东的种种改造的尝

试，以及今天城市政权与管理上的种种变动与回归，共产党当年想在城市中创造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那些尝试，哪些是被延续下来的，哪些早就被抛弃掉了？特别是作为共产党人理论最应当反对的传统官僚体制，在城市政权建设当中是否被注意到了？或者干脆就是在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选择？如此等等，如果你想要思考，你可以找出许多问题来在你的这一个案研究当中来进行考察和思辨。既解答你自己思想中的一些疑团，也便于读者在读了你的论文后能够有所收获。

当然，你现在论文的好处是，至少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可供思考的素材。而这又恰恰是历史系论文的一个特点。因此，并不妨碍你论文的通过。

2005年6月，国芳终于如愿通过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进而获得了他所渴望的博士学位，并且成功地留在北京，进入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继续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了。记得当时我曾去信祝贺并鼓励他：希望他能再接再厉，以更加勤奋和实干的精神来追求他人生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我当然希望他到中央党校后能进一步搜集档案，扩充和修改论文，争取早日出版成书。

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经过一稿又一稿的修改充实，国芳终于拿出一篇面貌一新的论文来了。相比较而言，现在的这部书稿较当年的毕业论文，有了很大的进步，尽管按我的想法，它理当来还能更上层楼，但因晋升职称时间所限，他实在没有条件再做修改加工了。

本书的出版，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中共城市建政研究上的空白点。历来，人们高度重视中共如何在农村中扎根闹革命，无论中外，成果累累，但对于中共如何从农村进到城市中来，如何从简单地套用农村的经验，到被迫按照城市特有的环境及条件，为适应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一步步调整、改变自己的城市政策，迄今为止，还鲜有像样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像国芳这样解剖麻雀式的个案

研究。透过石家庄这一个案，国芳不仅已经把中共当年“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条线索及其状态，比较清楚地交待了出来，而且让读者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了中共从农村到城市的种种转变的复杂性。与此同时，这本书的出版，也将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用规范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共历史，即使在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这条路也是走得通的。这对于国芳坚定今后的研究道路很重要，对于那些同样在中共党史或国史研究部门工作，愿意用史学方法研究中共历史，取得研究突破的青年学者，应该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建平是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做特聘教授后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记得第一次面试见到他，脸白白净净，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说话时还会有些腼腆。如果不是注意到他话音中会带出一丝关中方言的味道，并问到他的家乡，真不会想到他是陕西农村里出来的孩子。

建平过去侧重的是民国时期的陕西地方史，因为写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军与苏联关系的论文，读过我不少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以及早期国共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他最初设想的博士研究题目也是想往中苏关系史方面靠。我来华师着重想要开拓中共建国史这个方向，他又对当时较热的中外关系史，特别是前苏联档案解密较多的中苏关系史感兴趣，于是便一度尝试着想要去做1950年代中苏友协问题的研究。

对学生的选题，我们当老师的一般总是会先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选择。但是，任何选题至少都有两道关要过，一是学术史，即前人研究的情况如何，有无突破的可能；二是资料状况，即再好的题目和想法，做历史研究也必须要量入为出，能找到足够的第一手资料，才敢动手研究。做中苏友协这种题目我不看好，一是在上海没有资料条件，二是这种话题和内容的研究，开拓和发展空间不大。日后想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者，做论文一定要为日后的发展着想。

我当时也正在开拓建国史研究领域，满世界跑着去查档案找资料。因为涉及到建国史的内容有太多空白需要填补，我当然希望建平能够在某个方向上有所作为。因此，当他也意识到中苏友协问题研究搜集资料困难太大时，我便建议他考虑转到同样属于中外关系话题范畴的建国前后中共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上来。

做中共与基督教关系问题研究的可行性，主要是在资料上。根据我在各地跑档案馆、图书馆了解的情况，这方面的资料数量不小，而研究成果却十分可怜且几乎没有实证性的基础研究，就连中共及新政权对基督教政策演变的过程，都没有研究者严格依据史料做过系统的梳理和交待。因此，建平如果勇于深入这一课题，研究的空间一定很大。

但另一方面，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建平而言又有较大的风险。一是建平以往的训练和研究，基本上偏重传统的政治史，硕士毕业后又做了两三年政治课教师，不要说他的相关知识与外语能力存在很大欠缺，要想转换研究角度，调整研究视野，做到的对历史上冲突双方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又能保持一定批判性思考，也难度很大。二是这项研究的政治敏感度较高，虽然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开放度，真正实证的和有批判反思的研究成果，在大陆公开发表、出版，也还是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建平很想日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现行体制下，不能在大陆范围内保持一定数量和水平的发表出版量，势必会影响到他日后的提职晋升，进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

我特别高兴的是，建平最终接受了我的建议，勇敢地尝试着来研究中共与基督教的关系史，而且他已经开始趟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了。当然，作为老师，我还是不免有些心存歉意。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条件至今仍旧比较艰难，主要是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在内地仍会受到一些限制，为了评职晋升，他平时甚至还不得不多付出一些额外的劳动。

（二）

和建平今天已经取得的研究进展相比，目前的这部论文主要还只是反映了他三年前毕业时的研究水准。但可以肯定的是，和目前国内已有的考察中共建国前后对基督教政策变化及影响同类著作相

比，这部论文应该还是最好的一本。而对于我来说，看到建平通过这部论文的写作在研究上和观念上所发生的变化与进步，则是最感欣慰的。

为了完成建平交给我的写序的任务，我翻看了2005年到2008年建平读博期间我们之间的来往信件。虽然大多数通信已经找不到了，但围绕着他修改论文时的几次来往信件有幸还残留在我的信箱里。以下摘录几则我对他的过程稿所提的意见，这里面的批评不见得都十分贴切和准确，但我相信对建平的论文修改是有帮助的。而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相信也有助于一些读者了解，在大陆，年轻学者踏上这一研究方向时往往需要经历一些怎样的磨练和转变。

2007年2月，建平交来论文初稿，我详细批注后读后回了他一封不长的信：

文章收到，可以说基本上不成功，必须大改才行。整个文章的逻辑基本是建立在官方教科书的历史解读上，连文字都带有人民日报的色彩，给人印象，好像当年的这场革新运动主要都是中国宗教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必须，是基督教天主教爱国人士自发自觉地进行的，中共只是适时地予以了坚决的支持和推动而已。我让你看《十字架》这一记录片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你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能够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及其传统政治教育的影响，尽可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多方的角度来认识当年所发生过的这些事情，从而不仅自己，而且能够让读者了解事情的极端复杂性和政治干预背后的种种背景。可惜你或者没有看，或者完全不能从同情的角度来理解那些宗教信徒的感情与需要。这让我很失望。希望你能认真地按照我对你文章所作的批语，一一尝试着改变你现在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态度，真正发现你目前的问题之所在。

《十字架》是当时网上流传的一部由独立制版人制作的反映当今大陆农村一些地区基督教徒生存状态的纪录片，真实感人。研究基督

教方面的问题，我要求建平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他去读《圣经》，读基督教历史方面的书籍，特别要求他通过看与基督教在华传播和大陆基督教徒现实生存状况有关的资料，来改变自己以往基于无神论的一些片面的观念，培养自己对基督信众作为人的基本的同情和理解。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客观研究中共建国前后宗教政策与基督信众冲突关系必须要有的第一步基本训练。而《十字架》一片，在我看来，是最容易让许多不了解基督教徒的执着的人，从基本人性的角度去发生同情的活教材。可惜，建平最初似乎并没有被片子所打动，他的初稿丝毫没能表现出对那段历史中受冲击一方的人的同情理解的态度。

经过几个月交换意见和修改之后，建平交来了第二稿。这一稿较前一稿虽然有些改进，但上一稿中的问题仍然存在。其实，我对建平的研究，特别主张他要多从社会史的角度入手，把眼光向下，而不是他目前所做的这种政策考察。我即使同意他考察政策变动，也是希望他能着眼于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尤其是发生作用于普通人身上，影响他们人生命运的情况。可惜，他的努力距离我的要求仍旧很远。因此，我这次很有点丧气，基本上没有再和他讨论他的稿子的内容，更多的只是就他写作方面提了一些意见。我在信里写道：

二稿较一稿有了不少进步，但问题仍很多，特别是在概念使用和资料处理上仍旧不够细心，很少用脑子。写文章的目的，是要人懂，要人懂，首先就要自己懂，自己不懂不明的不要写。要人懂，其次就要把概念和史实交待清楚，任何头一次出现的新词新事，都要特别注意加以说明。要人懂，还要特别注意夹叙夹议，即要特别注意让事例说话，减少不必要的长篇大论和晦涩的引文，更要避免使用生僻的用词和解释必须要使用的今人不熟悉的词汇。你现在的稿子虽然较一稿减少了不少教科书式的语言，但是在很多地方还是表现出思想上受教科书观念影响过深的痕迹，这最典型地反映出你对历史不敏感，且缺

少同情心。受此影响，你的论文主题思想非常模糊，对读者很少触动，自己也难以归纳总结写出有深度的结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你论文现有的最后部分，几乎没有加以修改和给出批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8年初，我曾因建平论文稿的结论部分很严厉地批评过他。当时的那个结论，也反映了他整个论文当时的基调。问题是，他这时其实已经补充了很多基层的材料，并且考察介绍了许多来自基督徒方面的遭遇和情况。这足以显现出他当时的思想正处在一种新旧交织的很矛盾的状态中。我在信中说：

我刚抽时间扫了一眼你的结论部分，发现它竟荒唐至极。……

你研究了那么长时间中共对西方宗教政策及其后果，何以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来呢？你真的不知道中共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切断一切可能危害其稳固的异己势力的内外联系，用以巩固其新生政权吗？……不错，它确在反帝，但为何？因为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帝国主义当年是它最大的威胁，因而也是它最大的敌人。如果美国不是最直接的威胁了，或者虽然仍是威胁，但同时还是可以通过外交等各种方式来化解其严重性的话，如同1970年到今天，它还会那样反帝吗？同样，如果真有信仰自由，你那些王明道何以会被打成反革命？不错，新政权并不禁止那些普通教徒继续保持宗教信仰，尤其是对佛道等信徒更是如此。但为什么，你不明白吗？就是因为当时中共基于自身的理念，相信这些普通信徒不过是些封建迷信者，只是信神信鬼而已，只要控制住其首领，他们对政权并不直接构成威胁，可以通过限制之类的办法，即如你所谓“缩小市场”的办法，逐渐地使他们失去散播迷信的渠道与可能。为何不搞一刀切？因为中共领导人当时相信这种人数庞大，又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如此而已。

注意到建平要写好这篇论文，需要有较大的环境的刺激与改变，我一度曾经想要他延期毕业，帮他争取一年的交换出国学习的机会。

这是因为，我一方面担心他长期在国内环境下思想局限性不易改变过来，一方面也认为他研究基督教史的问题，即使从找资料和接触相关研究者的角度，也必须要出国去走一走。因此，我曾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

我想让你出去一年，是因为希望你能设法留在上海，最好是能留在华东师大。留华师，一是留近现代，一是留冷战中心，但无论留哪里，你都必须有出国研修的经历和较流利的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另外就是你所研究的宗教政策问题，所欠缺的一些资料，如被逐洋教士的回忆或日记，以及被判刑后出国的黎培理等人的资料，可能都有必要到外面去找一找。更重要的是你今后的研究方向，仅仅局限在中共的宗教政策上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把它扩展开来，变成双向的研究，既能研究中共的政策演变及其原因，又能研究在中共政权下的西方宗教的遭遇与生存状况问题。从你昨天谈到的情况来看，你的研究还是太过着重于中共政策变动的一面，这种研究还是太过表面化和程式化。如何能够深入到被中共政策所左右甚或伤害的西方宗教信众的当中去，体会和研究他们的感受与境遇，并且努力揭示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为关键。应该使读者真正了解绝大多数宗教信众及其传教者的心理和意愿，了解当年新政权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以内外形势的判断，和当时条件下集权化的需要，难以容忍偏离其意志，特别是有外国势力支持的团体存在，才造成了后来的那样一种结果。事实上，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像我过去和你再三讲的，你必须要能够切身体会那些虔诚的教徒们的平实追求与愿望，同情他们生存的艰辛和困苦。仅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你有时很难感同身受去理解他们。也许，出去一年，在不同的社会氛围里生活一年，更多地接触一下西方社会的环境，去教堂里体验体验，读更多的相关人及其研究者的著作，会对你的思想有所触动和改变。也只有发

生了这种改变，你的论文才可能写出深度来，也才可能打动系里的一些教授，从而便于你留下来。希望你能够同意我的意见。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因为建平想要留在上海，当时恰好赶上有留校工作的机会，他没有能够出去学习进修。在2008年4月，他又改出了一稿。因为临近毕业时间，他非常担心离我的要求差得太远，但是注意到他已经从社会史的角度也做了相当多的史实的补充，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发生较大的转换，我却认为他关于中共建国初基督教政策变化影响的考察，应该告一段落了。

我批改过后这次给他的意见，更多地反而是提醒他要注意另一个方面的客观性了：

论文粗略读过，作为初稿应该说基础还不错，不必重新来过。我现在只是对你的目录做了一些文字和内容上的调整，一是为了使表述准确，二是为了校正一些不妥的写法，三是为了在标题上尽可能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你在社会史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就内容而言，你确已做了一些社会史的研究，但在目录标题上目前还完全反映不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此，我特意加写了一个第五章（内容及题目写法你根据自己资料的情况来确定即可），以便能突显这方面的内容。

除了论文目前目录章节安排太过政治史以外，现在论文最大的一个不足之处，是你在概念把握上很不严谨，缺少深思熟虑。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对“中共”这一概念的使用太过随意和轻率。不要说这样做不够妥当，就是从学术角度来看，如此不加分析地到处贴标签式的用法，也是不适宜的。中共建国前，因为它在实际上仅具政党地位，在一些情况下简单概括称之尚说得过去。但在中共建国后，它常常既是党，又是国，又是政府，又是中央，又是地方，又是毛，又是基层干部，你在文中却常常一概以“中共”称之，这显然极不准确。这种写法，通常只是一些港台学者才会去用，你作为大陆学者，必须尽量避免犯此错误。何况，即使从政治稳妥性考虑，你也需要在

使用这样的概念时严格把关，努力分清状况，用最合适最准确的概念来称呼，必要时甚至还应使用更中性或更正面的词语，如“共产党人”之类的用法相称。实际上，如果你特别留意在“中共”背后的那些不同人物或部门的区别的话，你其实还能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不少值得更深入考察分析的问题。总之，你的论文当然需要有一种批判精神，但这绝不能通过谈论各种过错时泛用“中共”这种给人略带贬意印象的词语来表现。你既要理解当时条件下以中共的意识形态，加之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其不得不然的种种原由，也要高度同情那些原本并无“反革命”意识的教徒和普通神职人员纯粹基于信仰而不得不抗拒中共改造的种种出发点。这两种理解和同情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篇论文也只有在你通过行文充分表现出这种双重的理解和同情，进而高度概括地点出问题之所在之后，才可能让众多评阅人说不出太多否定的意见来。

关于要理解中共新政权当时政策变动的原因与考虑方面，我似乎还给他去过不止一次信提醒他注意。还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回信对论文内容的归纳大致是对的，但同时也要注意一点，即同情地理解教徒一方面，也要同情地理解中共一方面。这就要求你在论述当年这种错误政策及其严重后果的同时，也要深入但概要地去研究分析中共为什么要这么想、这么做。要说明它的思想基础怎样，对宗教认识怎样，对未来的追求怎样，对自身所处形势的了解怎样，对威胁自己的种种力量的判断怎样，其习惯性的经验认识与工作方式怎样，……如此等等。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而不是一般的着眼于说明一个观点的报刊文章，必须要注意立场客观和分析全面，任何简单地基于对一方面的同情和理解所得出的结论，都肯定是片面的，也一定缺乏说服力。你已经注意到，我给你改的文章通常既能够表达出你应当表达的观点，同时也能够照顾到方方面面，既不特别尖锐，也不模棱两可，其原因大部分就在这里。请务必注意此点。

（三）

建平最终改定的论文和今天这本书，没有很大的改动，基本上保持了原貌。坦率地说，《红旗下的十字架》这个主标题我很喜欢，然而全书目前更多地反映的，还是“红旗”漫卷的过程，对被“红旗”席卷下的那个本应作为主要描述对象的“十字架”，着墨和用力都还不够充分。我曾建议建平对论文做较大的改动，但我没有坚持我的意见，因为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就本书的副标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基督教政策演变及其影响”来说，现在的书稿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它的考察研究的目的，并且已经领国内外同题研究之先了。它的出版，至少对人们比较全面系统了解中共建国初在这方面的政策作为及其影响问题，会有一种比较大的帮助。这也就够了。

建平目前的研究，看来更趋向于个案，因而也更实证、更向下、更社会了。比如他这两年撰写或发表的有关育婴堂事件、王明道事件，以及辅仁大学事件的研究论文，都表明他在向个案研究努力。政治史，包括政策史的研究不是不重要，但是，好的上层政治史或政策史的研究，一定要有社会层面的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做基础，并且把政治或政策的具体作用，尤其是对社会人群的影响放在首位，才是最可靠、最贴近人性的研究方向。

希望刘建平能够向着这个方向继续下去。

[探求历史真实需要专业精神和技能 \[58\]](#)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历史”，一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种是后来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知。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也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同样也就存在着历史学者努力探求、考据和通过研究向今人呈现历史真实的可能性。这是历史研究存在的最重要的学理基础和学术意义。

但是，今人和过去的时空区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两个麻烦。一是过去种种条件、环境和相关因素作用的复杂性几乎是无法重现和复制的，因此，后人多半没有可能把过去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事情发生的种种背景情况描述得分毫不差。二是受时空环境，或情感立场的影响，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对过去的人和事难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隔阂或联系，而有不同的感悟和评价。因此，即使在大家都同样尊重历史真实的条件下，也不等于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一定能够得出相同的认知。

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也只有先弄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大家再来讨论其是非对错或经验教训，也才有可靠的事实基础。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先入为主的事实判断或刻意歪曲的事实宣传，常常会导致人的错误认识。比如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误导过几代人对苏联历史的看法。而一旦事情的真相被揭示出来，世人的观点看法很快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此就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不首先弄清历史真实的话，那么，

任何观点、看法，以及任何我们相信可以总结来比照我们现实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之类的东西，不仅是不足凭的，而且还可以带来很糟糕的作用和后果。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今各级官僚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因此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不少人主张再搞1950年代初的“三反”运动，一扫贪腐之风。毛泽东时代官员贪腐现象是不是比现在少？这个历史事实是很容易得到肯定性的回答的。但是，造成那个时代贪腐现象少的原因是因为1951底到1952年初毛泽东领导了几个月时间的“三反”运动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和肯定的了。何况，不要说“三反”运动本身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光是看一下运动之后的情况，就会发现，寄希望一次运动能怎样了。实际上，“三反”运动结束后不久，新的干部贪污现象就再度死灰复燃，中共中央很快又在一些地方再搞反贪污斗争和反贪污教育。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又再度发动城乡“三反”运动，主要矛头又一度指向了干部官员的贪污问题。直到文革中期，变相的干部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又有抬头，中共中央为此又搞“一打三反”斗争。到文革后期，“走后门”等化公为私或以权谋私的变相贪腐问题重又出现，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集中教育整治。仅此简单的一个历史情况，就可看出，毛泽东时代官员贪腐现象相对较轻，并不是靠1950年代初那次几个月的“三反”运动取得的，其中当另有原因。在当今权力已经高度市场化的复杂条件下，又如何能够设想靠运动能解决当今贪腐问题呢？

很可悲的是，我们今天社会上大多数人其实很少懂得获得对历史真实了解的价值与作用。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几乎从来不教学生发现、尊重历史真实的方法和意义。我们的历史教育，如果有的话，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除了大学历史专业以外），教给学生们的几乎都是用于死记硬背的政治教条。这种历史教育的结果，或是使从小喜欢

历史的孩子们早早就厌烦了对历史真相探求的热情；或是让大多数受教育者以为，历史本来就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真实与否无所谓。结果，今天社会上很多人都以为，研究历史最容易，谁还不能找出几条史料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呢。记得几年前有位大学校长就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搞历史的，不就是把旧报纸上的东西抄来抄去吗？

中国有句俗话，叫隔行如隔山。在现代科学条件下，不要说理工科和人文科学之间跨越起来非常困难，哪怕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要想自由穿越，也很少可能了。特别是由于科学方法在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影响到今天的人文学科内部，哪怕就是历史学科内部，不同专业之间或不同研究门类之间的沟通如今都变得很困难了。做中国古代的和做中国现代的，甚至是做现代政治史的和做现代社会史的，做现代经济史的和做现代文化史的研究者之间，往往都会有很多相互隔膜不通之处。像古近社会那样，可以在不同学科，如文理之间，或文史哲之间，自如游走，且有成就者，已不大能见到了。由于今天的学问家基本上都变成了各专业的“工匠”和“技师”，每个人只有条件专在自己专业的那个小圈子里，因此，很少人不承认，今后中国再没有所谓“大家”了。这不是因为现代人比古近的人笨了，而是因为今天的学术研究环境和条件完全改变了。我最近批评了一位研究时政和战略问题的学者跨界来大谈中共历史的书，想要突出强调的一点也正是在此：还是谨守自己的专业好，免得乱点鸳鸯谱以至误人误己误社会。

这本集子里收了子组文章，有旧文，有新文。把它们集合在一个集子里面，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借这样三组文章让喜欢读史的读者了解一下，今天做历史研究，哪怕像我这样，只是着重做中国现代政治、外交史研究，都是很不容易的。我这里所说的不容易，指是考察追寻历史真相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和麻烦的事情。不是下了力气去研

究的，就一定能够得到让大家满意的答案。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往往是由许许多多很具体的历史人物、很微观的历史事件组合而成的。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往往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段，就一个方向上去做研究，就需要花费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更遑论去研究更大范围、更长时段的问题了。

放在第一组里面的五篇文章，除了谈新中国革命外交的由来问题那篇以外，都是一些很具体，甚至很琐碎的史实研究。前两篇文章尤其微观。也许读者读了这两篇文章，只是了解了两个很小的，且在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历史当中从来都很少会提到的事情的一些来龙去脉。但是，如果读者看过《停战以后》的故事片，或了解中共土改的基本政策方针，就会发现，这两篇文章所给出的纵使只是很孤立的两个历史小片断，却可以反映出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我们后人认知历史的复杂性。它们同时也可以由这些复杂性当中促使我们多去想一些为什么。

我在这一组中还收入了考察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文章、介绍1936年苏联尝试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经过的文章。同时，我在下一组商榷文章中也收录了我讨论战后苏联军事援助和早些年谈论苏援对中共早期发展作用的文章。我这样集中地把它们搜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前流行的一种观点或说法。

今天，由于研究中苏关系史的诸多学者近二十年的努力，过去绝不承认中共革命接受过外援的官方学者，如今都已经认同这样的援助确实存在了。这是历史研究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不过，承认这种援助的存在，并不等于大家如今都能正视这一历史了。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发现，许多人一面承认这种援助确实存在，一面却极力告诉读者：苏联的援助如何少得可怜或“有限”。他们强调说，苏联援助主要都给了国民党，并列举数字来说明苏联援助国共两党时如何厚彼薄此。有学者甚至声称：这种援助不仅“有限”，还“给中国共

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我不知道这样的研究者有没有最起码的历史观点。我这里讲的历史观点，就是讲我们研究历史起码要做到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起来，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都是苏联党领导的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之一，一直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和经费支持。不论这些指导帮助是否都那么正确或适当，一个最初不过几十人的中国共产党仅仅几年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政党之一是基本的事实。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援助固然比不了它同时期给国民党的经费及军事援助，但这样的差异能够简单地用苏联厚彼薄此来说明吗？究竟共产党苏联骨子里是亲共还是亲国，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什么。我要说的一点是，经费或其他武器装备援助的多与少，除了苏联自身外交利益的需要作用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和当年两党的政治地位、体积，乃至可能受援的条件限制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中共建国后苏联一度倾其国力帮助中国援建基础工业设施，其规模之大、技术提供之多，远超过美国同时期给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就不难有所了解了。

其实，我一直在讲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即当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在批评当年莫斯科给中共的援助如何如何少，动机如何如何自私的时候，我们理应反省一下中共建国后与一些受援党或受援国之间关系中几乎如出一辙的情况。比如，只要考察一下中共建国后和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党和国家的关系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发生在今天中国人对前苏联援助力度和援助动机的指责，也同样曾经发生在中国与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受援党和受援国之间。只不过，被批评的对象是中国。换言之，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援助国和被援助对象之间常常在重复着同样的现象：援助国花了大力气援助了落后国家的党，帮助了这些党和国家的革命或建设，结果多半都会受到指责，即被援助者最后反而会批评援助一方援助的力度有限、动机

自私，甚或指责援助者意在控制受援方，等等。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援助的历史会那么难？如果历史上受援各国共产党的研究者都这样来认识援助国共产党的作用，不是很可悲吗？

本书第二组文章收入的是我所涉及的几篇问题讨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讨论的，严格说来都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无论是针对概念使用的问题，还是针对一个微观或宏观政策形成或实施原因的问题，抑或是针对某些具体的历史现象存在与否、作用大小的问题，都可能形成不同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解读，进而在学者之间产生不同意见的讨论或者是争论。这种讨论或是争论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学者们在相互讨论或是争论之中能够发现各自研究中的不足，带动研究的热情，激发问题意识，从而推动资料发掘与历史研究的一步步拓展与深入。

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特别收录了刘统教授批评我的文章，是因为我认为刘教授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和启发相当大。在此之前，我虽然注意到战后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军事援助问题，也在战后东北国共冲突的文章中提到过，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做过资料发掘和搜集，包括对苏联方面宣布的援助数据，也没有做过研究分析。1997-1998年，我在《百年潮》杂志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时，讨论到苏联援助作用问题，就因此出了纰漏。其实，我不是不了解苏联方面公布的战后在东北提交给中共的武器装备数字不十分可靠，因此，我在正文里很清楚地表明了观点，即我认为苏联提供的援助只是大大缩短了中共在东北军事斗争中成功的时间。但是，因为我尚未做过具体的东北苏援问题的研究，为了强调苏援的作用，当时很轻易地未加任何说明地把苏联方面公布的援助数字就放进了注释里面，结果引发了不少读者的质疑。相对于一些网友的批评，刘统教授的争论文章是唯一从学术角度对我书中这一注释资料进行讨论的。我虽然并不十分同意刘教授的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和解读，刘教授的文章却让我获得很多知

识，也清楚地了解到了我的问题所在。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看出，我正是在刘教授批评文章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我对东北苏援问题上档案的发掘与微观史实的研究的。尽管，无论是从战后中共东北军事工业不同阶段成长状况及其实际能力方面，还是从战后苏方不同时期提供援助的具体经过、数量、规模和种类等方面，刘教授和我都还缺乏能够说服对方的更加充分的证据，但是，通过这次讨论，至少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本书第三组文章名为“评论”，其实我想着重说明的是评两位金先生的文章。收入他们，除了两文在报上发表时都受到版面的局限，未能刊完全文，如此可以记录文章全貌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批评别人的著作。

金冲及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师长辈的学者，他的研究一向都非常严谨和充满智慧。但他的《中国二十世纪史纲》这本书，却让我感到失望。以身为学生辈的我来评金先生的书，其实并非我所愿。记得当年大家都力推黄仁宇的《黄河青山》一书时，我写过一篇有不同意见的书评，个别朋友就曾劝告过我，对师长辈学人不宜过严苛责。因此，出版社安排我做金先生新书的评论时，我当时就表示了拒绝的态度。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只讲好话，不提意见。尤其是在美国读到书稿后，我发现书中很多地方的观点论述，乃至史实解读，不是我赞同的，因此我更是专门写信说明了我的顾虑。我甚至通过中间人转达我的一些意见，并且表示说，我希望金先生能够再磨上半年一年，将书中有明显疑问的问题再做细致研究修订后，再来推出。可惜，因为当时书稿已经正式排版，除个别硬伤外，已无法再做大范围的研究修订了。考虑到金书几乎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安排给他的，其影响一定会很大，而金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史述确有商榷之必要，在征求了金先生本人的意见，金先生明确表示愿意看到我的批评后，我才下决心写了这篇批评性书评。

另一位金先生原非同行，事先并不了解。他写的《苦难辉煌》一书只是纪实文学类图书，从没有想去读，更不要说评论或批评了。但是，五六月间，注意到太多记者编辑和媒介中人，乃至专业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都开始把该书当成“还历史真实面目”的历史著作来读，不能不能让我深感问题之大。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水准日渐提高，读者阅读水平和阅读品味也在逐渐提升，纪实文学的影响力本来已经明显下降了。不期然今年官方媒介忽然齐刷刷力推起《苦难辉煌》一书来了，该书既非史书，作者也非史家，如此力推的结果，使书中大量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叙述广为流传，客观准确的历史研究结论反而陷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我对金书的批评比较尖刻，个别话也讲得比较重，原因是我相信，如果没有人出头对这本书提出尖锐批评，以这本书被热炒和受推崇的情况，一定会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类似不顾历史真实的所谓历史作品跟风而起。这注定会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使真正的史学研究成果变成这些故作惊人之论的文学作品的垫脚石。

有读者认为我之所以批评金书，主要就是因为金书剽窃了我的一篇文章。此说其实不准确。我在动笔写这篇批评文章时，甚至连金书都没有仔细读过。我只知道该书有不少明显的史实错误，包括生造史实的情况，却完全不知道它还会有大段大段抄袭剽窃的情况。包括边读边写的过程中，最初注意到有关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那些文字时，我都没有想到过去核对我自己的文章。毕竟，我那篇被抄的文章是在20年前发表的，那篇文章写得还很稚嫩，既不严谨，也不深入，只是讲述了研究中的一些心得而已。（可参见第二编附录）我何尝还能记得里面的文字具体是怎么写的。回过头去查找这篇文章，除了书中提到早年党费援助人均可达四五十元的数字一望而知是我计算出来的以外，最主要还是作者抄出一个路费“15余元”的概念，让我莫名所

以，只好找来老文章仔细核对，看看是不是自己当年写错了数字。如此才会注意到金书中大段大段文字与我那篇旧文章完全相同的情况。

老实说，金书即使没有大段大段抄袭我旧文章的情况，该书很多地方“不做适当说明地将他人的思想、方法、研究结果占有己有”，不做适当注释说明直接抄袭他人著作措辞、句子、段落和引文以为己用的做法，也都大量构成了对其他著作人的知识产权侵害了。即使是文学作品，网上很容易查到《美国语文学会研究论文写作指南》和其他相关国际通行的规范性文件，里面对如何利用他人文字成果都有很清楚的说明。去年发生在中国学术界中并在报刊网络上热议的抄袭门事件，也再度给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敲了警钟。我不希望学界多少年来刚刚开始形成的有关学术规范的共识，仅仅由于金书这种作法不受批评地广为流行，再度土崩瓦解。

最后要说的是，我对两位金书作者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十分肯定。中国现代许多历史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之间并没有隔着高山大海，它们只不过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人大都会关心我们今后可能会随着这条历史河流漂向何处，但说实话，我们主要可以用来判断未来走向的，多半无法依赖我们向更下游远处未知情况眺望的目力，而要依赖我们对过去已经经过的航道、水流、地质和水质的了解，特别是已有过的经验和教训。

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资格来讨论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无论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先把历史真实弄清楚。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

为什么要编这个集子？下面这件事可以让读者明白我的动机。

前不久，我接到一位电视台编导的电话，希望我能参加他们台里一个电视片的策划讨论会，对中央电视台某编剧提交的创作策划书提些意见。我请他把策划书的稿子发给我看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是否有必要去参加。

读过这个策划书稿后，我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当即回信给该编导，告诉他：去跟这种对历史无知到极点的编剧提意见，还不够生气的呢。

为什么说这个编剧对历史极端无知呢？请看他在策划书里写的几段文字：

“辛亥革命，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反帝反封建。”

“孙中山因为他的文化基因是华侨，他出生在美国，他不是所谓儒学正统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他是属于异类。他推翻异族异种的满清，发动辛亥革命，是因为他对满清是没有感情的。后来之所以被袁世凯打败，也是因为他是外支。”

“北伐到上海……共产党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共产党就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准备争夺上海的主导权，抢占这块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大本营。但是蒋介石看到共产党的行动，他率领着北伐军拒绝进入上海，不给工人起义提供支持和援助。工人起义遭到工部局的镇压，引发了五卅惨案。”“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是真心的拥护，是真心的相助，一直以为能够找到共同的相处之道。从四·一二之后才彻底决裂，只有这个时候天真纯洁的共产党人才真正的吃了大亏了，与国民党结下了血海深仇”。

“共产国际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他们的成员实际上都是国际盲流，是欧洲的所谓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游离者，有着暴力倾向和暴力

情绪的人。他们和帝国主义在骨子里面都是一丘之貉，在骨子里他们对东方民族都带着傲慢与偏见。”

“如果你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一定要和当权者对话。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一生都想访问华盛顿的原因。因为他知道非当权者解决不了问题。”

老实说，这个策划书还只是一个讨论稿，外人可以不必求全责备。但是，作者并非普通人，而是著名编剧，把这样一个错误百出、近乎胡说八道的历史叙说拿来给专家们讨论，说明作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历史知识等于零，而是颇为自信。这就不能不让人要对之评头品足了。

说辛亥革命是的“反帝反封建”；说孙中山出生在美国，是“异类”，发动革命是因为对满清“没有感情”，失败也是因为他是“外支”；说北伐到上海，中共为抢夺上海的控制权发动工人起义，蒋介石及北伐军不支持，导致工部局镇压，引发五卅惨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作者连普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没有读过。

如果说上面的胡说还只是知识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作者斥责共产国际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其成员“实际上都是国际盲流”，是些“有暴力倾向和暴力情绪的人”，骨子里和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云云，那就不只是在斥责共产国际，而是直接在斥责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而成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斥责像宋庆龄、陈翰笙等一大批当年共产国际直接发展的党员的人格了。这和作者所称，要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有理想、有管理能力、管理经验、有执政能力的一群人”，只有他们有能力荡涤帝国主义、封建残余、军阀黑帮等一切黑恶势力和污泥浊水，国民政府等等都注定是短命的、要被放逐的之类的策划书主旨，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真不知这位获奖无数的著名编剧在想什么？！

这位编剧所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除了历史知识欠缺外，显然受了某些纪实文学作品的误导。我没有去查作者对辛亥革命、对孙中山、对五卅、对北伐等近乎无知的荒唐说法是从什么书里抄来的，但他对共产国际的看法显然一多半都是从金一南先生的书里来的。作者甚至在策划书里直截了当地讲了他读金书的心得体会。说：“《苦难辉煌》是金一南先生的著作，也是当代党史研究重要的新突破。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国革命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美学标准。”他表示，他的整个策划和创作，其实都是围绕着金书的内容和主题来展开的。

我在报纸上公开批评过金书，全文已收在《读史求实》一书里了。我批金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担心许多不研究历史的读者，许多研究历史不研究党史的读者，甚至许多研究党史却不知道用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读者，把金一南纯粹只是当做文学来创作的一本书，当成是什么“当代党史研究重要的新突破”，然后口口相传，甚至以讹传论地写到自己的书里，再去误导更多的人。有读者不理解我一个历史研究学者，去跟一本纪实文学叫什么劲？原因就在这里。写纪实，搞创作，甚至抄错写错，那也是人家文学评论家的事，只要他别像过去那些剪刀加糨糊以挣钱为目的的有组织的“写手”，大段大段地搞抄袭大搬家，研究学问的人确实没必要去和他们叫真儿。但有时候情况不是这样。十几年前，我就两度批评过纪实文学作家。头一次是批评黎汝清，原因是因为黎先生写小说，写纪实，却跨界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批评党史学界读不懂历史，实际上黎先生自己也没有读明白。第二次是批评叶永烈，原因是当代所的程中原先生批评叶书中的史实错误，叶居然把程先生告上法院，要程赔偿100万元，我也撰一短文，指出叶书中几处重要的硬伤，是为打抱不平，替程先生撑腰。

批评金书有点不同，我在文章中讲得很清楚，纯粹是因为金书突然间被炒作起来，竟然被许多人当成历史书来读、来抄、来信了。什

么叫“三人成虎”？金一南先生初始动机未必有错，但后面人一个跟一个以假为真，再层出不穷地帮着越传越假就麻烦大了。要知道，虽然我没有读完金书，但是，就我读过的几章，金一南先生固然对共产国际颇多微词和不满，但似乎还没有直截了当地把共产国际及其成员视为“国际盲流”、“有暴力倾向和暴力情绪的人”，似乎也没有说过共产国际的人和帝国主义分子一样是“一丘之貉”。如果我的印象是对的，那就说明，以讹传讹是会成虎成龙的，其后果不堪设想，历史学者很难听之任之。

想当年，郑惠先生邀我一起创办《百年潮》杂志，我们当时的出发点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担心：太多的地摊文学或曰纪实文学作品，会不会把本来就假说太多的党史、革命史，推向另一个极端，这会让真正以求真为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加不受重视，历史的真相势必将更加难见天日了。我在《百年潮》杂志做了将近4年的时间，做了不少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为通俗历史文字的工作，因此也愈加珍惜许多志同道合者共同打开来的今天这一小片求实求真的天地。今天读者的层次已经明显地高于当年了，我们已经不用太多做这样转化的工作了。但是，金书成虎成龙这件事再度提醒我们，今天依旧还有许多读者还不习惯阅读未经转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所辑文字，都是这两年我为报刊所撰或为普罗大众讲演整理发表出来的谈论中共党史或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通俗文字。除最后附录的一篇外，没那么学术，没多少考据，也没讲什么深奥的学理，当然也不会特别严谨，可能有不准确，特别是思考不周全的地方。但是，对于普及性的传授宏观史实真相和介绍个人的历史思考，还是有些价值和意义的。做这些文字或参与这些活动，对我们这些做学问，还要上课，还要带学生的老师来说，要耽误很多时间。这期间就影响了我两本专著的写作。但我相信，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应该要做。因为，今天能系统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人本来就少，能用史学

方法来研究的人就更少，如果仅有的这么几个人再不出来把我们的研究转化成普通读者或听众能懂的文字讲出来，社会难保不会又会回到我们创办《百年潮》前那种读者被半真半假的纪实文学所吸引、所控制的局面中去。今年金书几乎人手一册的情况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这不是不可能的。

注释：

[1]——[《杨奎松著作集》代序](#)

[2]——[《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新探》台湾版序](#)

[3]——[《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序](#)

[4]——[《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书序](#)

[5]转见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6]见1918年5月27日，6月25—26, 28—30日[《民国日报》（社论）](#)。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9页。

[8] [《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会议记录》](#)，1924年10月4日。

[9]前引[《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29—30页。

[10] [《关于四川重庆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

[11]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献，1920—1925》，莫斯科1994年12月版，第49页。《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1921年9月28日）；并见王觉源：《中国党派史》，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94页。

[12] 《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

[13] 参见《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报告书》（1922年）；《共产主义》（月刊），第1期，1922年。

[14] 前者据说由张申府串连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发起，属于青年团性质。后者据吴玉章回忆叫“中国青年共产党”，初时参加者均以英文缩写为“CY”，后见《赤心评论》第1期，知其不久又改为“YC”。性质不明。见《共产主义小组》（下），第884—886.895—899页；《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15] 参见拙作：《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

[16] 台北出版的中共党史著作往往将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称之为中共“临时中央”与各地“支部”，显然不妥。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央图书供应社1978年增订版，第29～34页。

[17]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27～32页。

[18]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27,31页。

[19]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38～39页。

[20] 见陈独秀9月发表的《对时局的我见》，转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21] 参见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50页。

[22]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中共“一大”前后》（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页。

[23]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7页。

[24]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98页。

[25]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

[26]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书序

[27] 毛泽东早年的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当：《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大概是少数几本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回忆录中比较好的一种，因为它的整理者李海文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利用了保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的重要书案资料，对师哲的回忆加以核实

与补充。当然，凡资料欠缺之处，本书仍有不少错误之处。同时，作者在毛身边工作过的日子有限，不少问题还未涉及。毛泽东50年代另一位俄文翻译李越然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与其说是回忆当，不如说更像纪实文学。这是因为他的整理者是纪实文学作者权延赤。他在整理过程中完全没有利用书案文献对回忆者的回忆加以核实与补充的条件，相反，他更多地发挥了他的文学想象的天赋，为本书增加了许多具体的细节。另外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回忆当还有前新华社社长并兼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的回忆：《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赫鲁晓夫的回忆当：《赫鲁晓夫回忆当》（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和《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28]如闽力等的《毛泽东斯大林莫斯科会晤前后》（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三豆村、曹志为的《毛泽东两次苏联之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杰诚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权延赤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9]周文琪著《谁主沉浮-毛泽东与共产国际》是唯一可以称得上是与本问题有关的一本研究著作，不过严格地说，它其实还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缩写，并非真的是讨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其内容也过于简略。

[30]在这类著作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和Micheal M.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1]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32] 引人注目的是，1993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虽然对毛泽东的这段回忆已经有所疑问，但在叙述到这段历史时，还在注释中引述了毛泽东的这段回忆，只是特别加注了一条罗章龙的回忆，以委婉的方式说明，毛泽东当时虽然可能没有看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但很可能是看到了罗章龙等翻译并油印的《共产党宣言》。但三年后，当1996年同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出版时，已经不再提及毛泽东的这段回忆了。见该书第56～60页。

[33]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看下中共成功之道》再版序

[34] 参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17页。

[3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序

[36] 其实，在战争年代里，每当中共实力足够强大或自我感觉足够强大时，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放大斗争目标和跨越革命阶段的情形。

[37] ——《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书序

[38]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书序

[39] ——《失去的机会？》书序

[40] ——《国共两党关系史》书序

[41]——《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当》再版前言

[42]除本书之外，唯一一部以国共谈判史为内容的著作出版于1996年。该书中的抄手大段大段地照抄了本书的一些文献档案史料及笔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多数并未注明出处。且抄者不该删处删，不该加处加，不该并者并，还常有看不懂文字擅改以至于大错，和明明笔者已经考证辨伪，抄者却只为多抄几家以免抄痕太重而胡乱拼凑在一起，弄得矛盾百出者。至于因抄录过程粗心而出错者，更随处可见。

[43]《八路军中共支部书记李法卿揭述中共在抗战期中整个阴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357~358页。过简单化，而且还多少是一种误读。

[44]——《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修订版前言

[45]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沈志华、李丹慧两人的研究最为突出，有关他们的成果可见于他们的个人网站：www.shenzhijhua.net。另外像戴超武的《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和牛军的《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起源》（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等，也都是较新的研究成果。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版后，笔者在这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问世，如《美苏冷战的起源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研究》2003年11~12期。在国际学术界方面，前挪威学者，现在英国

伦敦的文安立教授和德国学者海因茨基教授等也都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

[46]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美国阵营内部同样激烈存在。美英干涉苏伊士运河、干涉中东事件，包括美国后来出兵格林纳达等等，无一不反映了这种情况。

[47] 《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1月1日。

[48] 《八大第二次会议各代表团活动情况》第十四号，1958年5月21日。

[49]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

[50] 毛泽东：《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1958年9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68页。

[51]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24页。

[52]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书后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外交卷）》书序

[54] ——《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书序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政治卷）》书序

[56] ——《新中国建政之初》书序

[\[57\] 《红旗下的十字架》书序](#)

[\[58\] 《读史求实》书序](#)

[\[59\] 《谈往阅今》书序](#)

第四编 我和现代史研究

狱友命运的启示

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已显出苍老的面孔和略带佝偻的身躯却总是会浮到我的眼前来。

记得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觉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付猥琐的样子。他当时毕恭毕敬地面对牢门，冲着狱警，满脸堆笑，活脱脱像个老犯人。

那天我刚刚从一个看守所拉回工厂去批斗了才拉过来，连东南西北都没弄清楚，看到他，马上就想到电影里见过的那些坏人，因此，当狱警在我身后把牢门哐当一声锁上后，摸不清状况的我并没有想要搭理他的意思。

没想到，狱警的脚步声刚从门口离开，他就一步跨到用高低不平的十几根光溜溜的半圆木拼成的床铺上，从我手里夺过狱警给我的一床薄薄的、里面的棉絮满是窟窿的被子，帮我叠好放在一边的床头。并告诉我，我刚进来，肯定还不习惯这个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经习惯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点的那边让给我睡。同时一一告诉我牢房里“政府”一一他总是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上一一定的各种规矩，如平时起床要叠好被子放在床里头，人要下床面对门坐在床头以便让警察看到；床头的塑料桶是马桶，一定要盖严，否则屋里味道太大；每天几点会放人出去倒马桶，必须在几分钟内抓紧倒净洗完返回号里，否则会被罚；一周有几次放风，每次放风会放多长时间，经过楼道下楼时千万不要停下来，也不要东张西望，……如此等等。

同屋还有一个比我稍小些的犯人。当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天安门事件进来的。他是在4月4日当晚下夜班后没事，陪着师傅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意外地被抄了进来。一直关到这个时候，只被审了几次，就再也没人理他了。一提到他的师傅和他的家里人，他就会扑簌簌地掉眼泪。

我刚进来的那些日子，几乎天天被押去审问。一审就几个小时。每次被提出牢房后，他们两人都会偷偷地扒着窗户，透过油漆剥落的玻璃缝隙，看我被穿便衣的警察从一楼侧门押着走出去的情形。每次回来，牢门刚一关上，老犯人都会马上把已经凉了的饭菜递到我的手上，催着我把饭吃完。

监狱里的饭千篇一律。每顿一个馒头或一个窝头，一碗菜汤，菜汤面上会有几片闪着亮光的明油。我的饭量不大，关在狱里又不运动，一个馒头也还凑合。但那个才19岁的徒工就不行了，因此，我进来后发现，几乎每顿饭，老犯人都会把他的馒头或窝头分一半给他。

老犯人在牢房里最拿手的余兴节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错，虽然不敢让狱警听到，声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声哼唱的那些我听也没听过的各种中外歌曲，还是会让我觉得即使在牢里，日子有时候过得也还算得上心旷神怡。我也因此从他那里学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其实，还在被关进这里几天后，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经历。先是小犯人告诉我他是小偷，然后是他主动告诉了我他从十几岁开始，因偷窃，几次被教养，到被判刑的经过。说起来，我和父亲去干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门买棉衣等。就在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偷去了全部准备买衣服的钱和积攒了将近一年的布票、棉票。因此，对小偷，我曾经十分反感和愤恨。可是，当老犯人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之后，对他我却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

说来奇怪，我过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穷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书香门第。其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母亲还是北京市某名牌小学的校长。家里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从小就学过弹琴，会识五线谱，很喜欢音乐，而且看了很多闲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因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连着两天没回家，跟一个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东西被抓，母亲因为觉得有辱家门，坚持不去领他，后来经父母同意，把他送进了工读学校。从此他就和更多

的坏孩子走在了一起，学了更多的偷窃手法，因而再也改不掉偷窃的习惯了。

当然，每次被抓到后，他都想过要改掉偷窃的毛病。但他告诉我说，染上这个毛病后，人就像是吸了鸦片上了瘾似的，一有机会在眼前手就痒得不得了。终于，他在15岁时赶上“严打”，被送去劳教了几年。出来后，因为生活无着，家里也不理他，再度偷窃，再度被抓，又赶上了“严打”，作为屡犯，又超过了法定年龄，因此被判了7年刑。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将近30岁了，既无工作经历，又没有单位接收，城里几乎无处立脚，于是街道上一纸报告，把他定为“四类分子”，送去延庆山村里交贫下中农实行管制劳动。

这个时候，我已经大致弄清了关押我的这个地方。这是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又叫半步桥监狱。这里有两座过去日本人留下来的关押犯人的牢房，一个从空中看上去像个K字，因此叫K字楼，有4个甬道，上下4层。一个从空中看上去有五个爪，像个王八，故犯人都叫它王八楼，有5个甬道，上下两层。据说K字楼里有一些刑事犯人，而王八楼里则基本上都是政治犯。因此，老犯人的自述还是让我多少有些纳闷：他怎么会住到这个主要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来了呢？

1976年7月，我入狱两三周后的一天半夜，突然间天摇地动，把我们全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满楼道里犯人们大呼小叫，砸门哭闹，恐慌至极。但是，因为共产党的监狱把牢房的门统统换了包有厚厚铁皮的沉重木门，只在齐眉高的地方为方便狱警监视犯人的动静，从外面开了一扇小铁窗，必须从外面拉开才能打开。对外的窗户，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们几乎无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况。尽管所有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极剧烈的地震，因狱警全无声息，犯人们声音再大，也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

我们号里的小犯人喊哑了嗓子，兀自坐在铺边哭泣。老犯人虽然搂着小犯人的肩头未吭一声，但是牢房每震颤一次，他都会神经质地

嘟囔一次“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直到余震消失。

记得在那个白天，老犯人一反往常笑嘻嘻的一脸轻松相，一声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发呆。我当时试图和他讲话，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两声而已。直到晚上熄灯之后，他才突然在我耳边小声地问我：“你想你家里人吗？”我记得我应了一声。又过了一会儿，他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妈今年60岁了。”

整整一个晚上，他把自己的头包在被子里面没有出来。我分明听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过了一个多月，因为没有报纸，没有广播，除了白天黑夜，我们谁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天。只知道清晨突然间听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续不断地响起震耳的哀乐声，我们当即猜测是毛主席去世了。又过了一周多时间，小犯人意外地被释放了。那天老犯人也显得十分激动。他悄悄地告诉我，按照他所了解的各国的惯例，他估计新的领导人应该会实行大赦。但是，他似乎对自己的前途似乎并不乐观。他问我：

“如果实行大赦，是不是应该所有犯人都能赦免呢？”我当时有点不以为然。因为小犯人的释放，并不像是得到了特赦令的样子，也听不到甬道里有更多犯人被释放的声音。但是我还是告诉他，如果真有什么大赦，他这种小偷小摸的犯罪，应该都会被赦免。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对我讲了实话。原来，他这次并不是因为偷东西进来的，而是因为“反革命”！

一个小偷成了反革命，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却是真的。

他的变化原因很简单。他被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作为“四类分子”，在农村中就是劣等种姓，像麻风病人一样，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被赶起来打扫村里的街道，天亮以后再被赶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来，大部分时间都被人看着。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烂，经常吃不饱饭，离村还要打报告，节假日别人放假他们照样要劳动。至于年轻人想娶媳妇，则连门儿也

没有。被管制了几年之后，他和另外一个年轻的四类分子终于觉得生不如死，下决心逃跑了。没想到，两人没经验，以为到城里找钱容易，想着一路从各城市南下跑出境去。却不料城里的革命群众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几天后就给抓了回来。这回更惨，两个人被接二连三地斗争不说，还被吊在房梁上打得死去活来。

此事之后，两人老实了一段时间。但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渠道听到了台湾“自由中国”电台的广播，里面说得天花乱坠，说是只要给香港某信箱写信，就可以得到经费，反抗压迫。于是，这两个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为真，想着写封信就能拿到钱，然后再往境外跑。老犯人于是自封为什么“燕北支队参谋长”，然后按照广播中的地址给香港这个信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自然落到了公安机关的手里，他们两人也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听了老犯人讲的情况，我半晌没说话。我怀疑共产党会不会宽宥他们这种人。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我有没有得到特赦的可能，但也没有把握认定他的罪状会比我的轻，他却明显地充满了幻想。他始终认为，他并没有反对政府的意思，实在是因为在农村作为“四类分子”，活不下去，想用这个办法逃到国外去而已。并且他认为他实际上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他会吸取这次的教训，政府应当能够宽恕他。

我在一个月后被换到另一个号子，然后在1977年1月初被无罪释放，以后随着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得到彻底平反，从此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听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这一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杀人布告，赫然看到了被打上了红×的他的名字。尽管我这还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但他名下的罪状，分明可以锁定是他无疑。罪状的大意是讲他阴谋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蓄谋秘密组织反革命

武装，自封燕北支队参谋长，意图推翻共产党。最后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

布告张贴出来之际，他已经被处决了。

当时的我，和被捕之前一样，不过是个工人。我的确不能从法律的角度来判断他该不该杀。但他的被杀，还是让我感到由衷的悲哀和困惑。

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相处几个月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本质上并不是个坏人。至少，他和那些造成严重伤害、思想极端对抗的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即使不考虑他投靠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动机，只从其投靠的事实来看，其罪充其量也只是未遂的反革命意图而已。既是意图，且行动未遂，自然也就没有和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有行动固然可以定罪，但无严重后果则罪不至死，当属至理。

这位年不过30多岁的“老犯人”的悲剧命运，让我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样轻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抛弃了？为什么一个犯了错误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样的方法来惩治，以至于近朱近墨，愈陷愈深，无以自拔？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者逐出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惨命运呢？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几十年，始终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标准，动辄要靠脱离法律程序的所谓“严打”来惩治犯罪？为什么《惩治反革命条例》不区分意图与行动、已遂与未遂、仅凭思想言论即可入罪，仅凭意图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即可判处无期或死刑？更重要的是，和他的相处，使我彻底动摇了过去从书本和电影里得来的那种观念，即凡是“反革命”就一定是坏人。因此，我不能不开始质疑，有没有可能有些“反革命”是被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或一些让人难以承受的压力诱迫出来的呢？如

果一个本质上不坏的好人同时又是“反革命”的，我们又应当怎样来看待呢？

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后，这个社会上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四类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连“反革命”也已经不能入人之罪了。过去被视之为反动的“人性”、“人道”以及“人权”等等观念和意识，也开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语言当中了。换言之，如果老犯人能够活到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他应当不会为他当年冲动和愚蠢的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了。甚至，如果他再晚生10年、20年，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因为偷窃而被“严打”去劳改，不会被定为“四类分子”，不会被送去农村管制劳动，因而也就不会因无法忍受非人的待遇铤而走险，去做逃亡的尝试，以至惹上杀身之祸。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过去那些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或者说，我们先辈的流血牺牲难道就是为了推翻一座阶级压迫的机器，另造一座阶级压迫的机器，而完全不在乎作为阶级、民族、国家构成基本要素的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承认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人道”和“人权”的观念，而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或“反革命”，或划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

我是幸运的，赶上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因而不仅没有成为当年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和所谓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而且有幸读了大学，并且竟然做起了学问。但是，如果毛泽东没有去世，如果“四人帮”没有被打倒，如果天安事件没有被平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谁又知道我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即使有了如此机会，又有多少人因为过去时代所刻下的烙印而不能像我这样幸

运呢？而当年那些共同在干校、在工厂劳动的兄弟们，有不少比我聪明和能干，他们理当接受更好的教育，找得更好的出路，却未能如愿。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因文化程度和所在企业效益差下岗或早退，经济窘困，生活大不如前。每想及此，又怎能不让人感叹世道的不公呢？

因此，我很庆幸我有机会从事了现代历史的研究，它让我能够利用我所学的专业，回过头去努力澄清我内心中多得不可胜数的疑问，去替许许多多蒙冤者找到一个他们一生都想得到的解释，去思考这个社会用什么方法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再被恐惧的阴霾所笼罩，过上平静的生活？

不错，对于众多学者来说，这可能有点不务正业。因为他们更喜欢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更认同高雅和专业。但是，面对历史上和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却无论如何也高雅不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学养问题，而且是因为我的经历、性格和对所剩时间的紧迫感，因为我无法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构成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的命运来思考问题。

而且，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换言之，我从不认为，学问之道，求的是研究怎样学术，学识如何广博。我不相信，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学问，是因为学问家必须要不识人间烟火。恰恰相反，我认为，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中国亚圣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用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

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认定此道，“虽千万人，吾往矣”。

记者手记

在见到杨奎松之前，我听到过他的学生们对他的评价：“杨老师讲课；没有多余的词儿，都是真材实料，顶多加几个字的评价，也不过是‘厉害’或者‘真厉害’。”听完这话之后的几个小时，我见到了杨奎松。

在我跟他聊天的两个小时之内，我终于见识到了什么是把力量蕴藏在平淡之后的叙述。

杨奎松的经历，在他的讲述里平平淡淡，但是却包含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杨奎松的讲述让我觉得，原来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可以用这种平淡的方式来叙述，也可以平淡得如此有力量。听完他的讲述，仔细品味，竟然都是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里面没有“我觉得如何如何”，全都是充满细节的故事。杨奎松这个人如何？通过这样的讲述，已经跃然纸上，至于读者怎么评判，杨奎松是不打算干涉的。

这种讲述的风格一如杨奎松研究的风格，通过我的阅读经验，杨奎松的著作几乎都是这样：不轻下断语，所有的论断都建立在大量扎实的材料之上。关于研究方法，杨奎松写过一篇《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那大概也可以看作杨奎松研究方式的夫子自道，其中的方式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从“放牛娃”到“工人理论家”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上中学的了。

但不论上学与否，那几年的生活如今的孩子恐怕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如果你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会知道，当年所谓大院里的孩子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成群结伙地到处玩，并且成群结伙地打群架，上了中学也没什么分别。况且那时候学生的出路不是上山下乡，就是留城进工厂，也没有几个学生会太认真地学习。

我上了一年多学之后，就赶上父亲下放，跟着父亲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我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被编为青年班，开始是下农田干活，后来我和一个朋友被抽去离连队很远的一个丘陵上做小放羊倌。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把羊群赶到很远的一个水库坝区吃草。中午就啃冷馒头，晚上天黑才能回来。

这个活儿虽然比下田劳动要轻松许多，但孤寂得很，整天没有人说话。

1970年12月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因为开始中学毕业分配了。我们那一届和之后的七一届是当时北京惟一两届留城没下乡的。连续几年把学生都弄到乡下去，城里工工人店员都不够了，需要增加新的人，我们这两届正好赶上了。我回到北京后马上就被分配到北京第二机床厂。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大概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工厂了。

那时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够进到厂里办的“七二一”大学去学习一下。在“文革”那样一种环境下，能够留在城里，并且能做工人“老大哥”，已经很不错了。

在干校放羊的时候，因为闲极无聊，我自己看了一些书。在那种地方也没有什么别的书可看，就读《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之类的。结果慢慢地对理论的东西有了一些兴趣。到了工厂之后，因为车间里经常开会学习，读书念报，其他小年青儿大部分都没有学过这些东西，报都念不利索，更别说懂得那些名词了。车间的支部书记觉得我这个小小伙子还算不错，也慢慢地让我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最后还让我参加过一段厂里的什么理论小组，见识过知识分子和工人理论小组怎么共同写理论文章。

因为那个时候学的都是些理论的东西，自然也就对时事政治非常关心。当时恰好开始在内部翻译出版一些西方的理论书，包括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著作，看了以后想的问题自然也就更复杂了一些，

对于“文革”等很多问题，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们在工厂外面有不少读书的朋友，不仅相互交流读书笔记，而且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些观点。

想学经济考上党史专业

1977年有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没有学过数理化，语文历史地理之类也没有学过科班的东西，何况还要上班，因此虽然父母极力主张我参加高考，自己却毫无把握。当时不过是临时抱佛脚，东找点书两找点书自己看，完全不知道考什么和怎么考。

所以一考下来自己就知道考得不好，首先数学就没考好，第一批当取时，自然没有录取到我。想不到第二批录取时，我的成绩刚好在分数线之内，就被录取上了。只是，当时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专业。因为父母都是学经济的，所以我的前两个志愿报的都是当时惟一跟经济沾点边的政治经济学，只留了一个专业报的是自己多少有点兴趣的历史专业。

得到消息后，我很犹豫，不大想上。当时还特别回家去和父母商量。显然，当时如果能确定高考还会继续进行的话，他们也多半会要我再等半年，再考一次的。我妹妹也是和我一起考的，这一批没录上，半年之后就如愿考上人大工业经济专业了。

但是，那个时候“文革”刚过，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又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商量的结果，家里人还是鼓励我先上了再说。就这样，我就从一名工人，成了大学生，只是自己当时并不喜欢这个专业。

人民大学里的“坏学生”

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专业其实并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而是人民大学的。因为人大“文革”中被取消，校址被二炮占了，“文革”后复校较晚，没有赶上列入招生名单，因此临时用北师大的名义和校园恢复招生办校。等于我们招进去时是北师大的学生，半年

以后才回人大校址。而那个时候，学校连学生宿舍都没有，好在招的都是北京的学生，大家基本上都是走读。

进入人大党史系算是我跨进历史研究这个行当的一个起点。但是中共党史专业当时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划在法学的门类之中，因此，教学太过强调理论，除个别老师外，通常很少传授历史学的知识和进行史学研究的训练。我刚开始学习时最感兴趣的就是人大历史系讲中国通史的老教授郑昌淦先生的课，郑先生是尚钺先生的学生。虽然我并不特别喜欢古代史，但是为了听郑先生的课，我还是不止一次地专门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以便和郑先生讨论。

在人大时另一门我喜欢读的课是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读这方面的马列著作较多，另一方面是当时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于老师思想很开放，也乐于与我们进行交流和讨论。在人大上的其他的课程，我都没有太多的印象，多半都还给老师了。

说老实话，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包括对考试，自己也常常不按老师的要求去答。记得一次考试，我认为教科书和老师提供的答案是错误的，就按照自己的看法进行了论述，结果被判为不及格。后来还是因为这种情况会影响全班的成绩，班长和课代表专门去找任课老师进行疏通，最后才勉强给了我一个及格。

当然，人大中共党史系里也还是有学问上不错的老师的，像彭明老师写的《五四运动史》，就花了不少功夫，做了大量的考证。另外教思想史的林茂生老师，也是很有才气的一位老师，和他讨论交流是一种享受，只可惜他写的东西不多，也不像和他聊天那样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中央档案馆里最年轻的人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考研究生。当时一个想法是觉得当了八年工人，又上了四年学，再读下去，时间浪费太多了，必须要赶紧开始

干事情了。另外也是因为自己觉得中共党史这个行当里，没有老师能够指导我。我宁肯自己去看书案、看资料，自己去钻研。

我至今也不后悔自己异初的这一选择。正是因为我没有去读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做编辑。在那里不但能够看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因为在党校，还能够看到当时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档案。所以进入党校之后对于我深入地“钻进去”影响特别大。

在中央党校里，印象最深的是《党史研究》编辑部主编何明先生对我的放手和信任。照理，我是新来的大学生。按照以往的习惯，新来的大学生通常都是从事一些打杂的事情，包括打水、抄稿子，帮助教授们查资料之类。

至于发文章，更是想都不要想。但是，我到编辑部之后，很快就开始正式承担编辑业务，处理稿件，并且何明先生也从不反对我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到党校不过三年，就接连出了不少东西，被破格评了讲师。

自然，这种情况也必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记得1984年《档案法》通过后，我打报告要求去中央档案馆查看档案，没想到副校长竟批了。我也因此成为当时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最年轻和级别最低的研究人员。我们教研室里个别老先生就看不惯了。记得其中一位先生特别告诉中央档案馆中央处的负责人，要他们对我特别注意。结果弄得档案馆中有的负责人对我像防贼似的，甚至趁我不在时偷偷去检查我的书包等衣物，怀疑我会夹带什么东西。有一年美加历史学会主持者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年会，有位老先生马上就告诉中央档案馆说不应该再允许我看档案了，因为我要出国，要小心我会把档案透露到国外去。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虽然在中央档案馆里断断续续查阅了几年时间，摘抄了许多东西，最后大部分都被扣下没有允许我带出来。

不过尽管许多资料被扣，许多心血白费，但是能有机会仔细阅读那么多至今尚未完全开放的档案，就已经使我获益匪浅了。这以后我之所以能够写出许多专著和论文，揭示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史实，提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看法，其实恰恰是得益于我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的档案。即使我不能直接引用它们，但是我依旧可以以它们为线索，找到其他更多被淹没的历史痕迹。

问：您原来学习的好像是中共党史，为什么会转而从事了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

杨：这和在大学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吧。在学校的时候，专门讲授中共党史的老师不大容易受到学生们的敬重，原因很简单，他们讲的东西我们从其他书上大都可以看到，而我们从其他途径听到和看到的东西，他们或不知道，或不接受。老师们讲不出多少新的东西，我们就认为这些老师要么是没本事，要么是不求甚解，思想僵化。到中央党校和编辑部工作后，我才发现，事情原来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当年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的老师在全国有好几万人，但是，多少年来，不仅研究上禁区重重，而且档案文献始终不对学者和教师开放，能够被利用来进行研究的中共党史资料，在“文革”前充其量只有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下发的三批资料，完全没有做学术研究的可能。“文革”结束后，人大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以及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意识到资料问题的重要，曾分头致力于搜集编辑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可是他们利用当时的特殊条件搜集起来的资料，相对于保存在档案馆里的档案，也还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要想做深入一些的研究，还是很少可能。

既没有研究上的自由，又无法占据足够的史料，仅仅责怪老师不好是不公平的。其实，很多老师还是有研究功底的。记得北大的向青老师，利用掌握英语的长处，转而利用海外的英美著作和资料，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很快就成了名。指导我毕业论文的老师杨云若也是这种情况。后来，研究讲授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等相继开放，大批中共党史教师纷纷转行，不少转行早的都做出了成绩。这里还可以提到章开沅教授，他在史学研究上的成就今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但可能很少有人了解，他当年在高校也曾经讲授过中共党史。他

告诉我说，他当年就是实在研究不下去了，所以才转了行。而这一转，就海阔天空了。

问：您转去研究中国现代史，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不过，我发现虽然研究中共党史很困难，您好像至今也没有完全离开对中共历史的研究。

杨：当然会有这种考虑，但也不仅仅如此。因为要研究中共历史，仅仅局限于中共自身的组织、人事和思想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中共生长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社会的大环境之中，不研究中国现代的历史与社会，不研究当时条件下世界与中国关系变动的情况，也就不可能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获得对中共历史的客观了解。这也是毛泽东自己所提倡过的古今中外法。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共历史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史，不研究中共的历史，我们也不可能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脉络做出基本准确的梳理，甚至无法解释那些让世人长期困惑的历史之谜。像我写的《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一文和《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一书，讨论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大家都非常关心，却又总是找不出有说服力的答案的问题。其实这些答案就在大量中共历史档案文献及其相关的史料里面，不去深入研究中共的历史，就不会想到要去系统地搜集、梳理和研究这些资料，结果就只能是在外围兜圈子，进入不到问题的核心中去。至于说研究中共历史困难，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早先看起来敏感的事情，过上一些年就不会那么敏感了。档案的开放总是循序渐进，有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今天不开放的档案，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开放了；这里不开放的档案，那里却未必不能查阅；中国还没有开放的档案，外国却可能已经开放了。

问：您能不能以《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一文来解释一下您的这一观点？

杨：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都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不少学者也都尝试着做过解释。但是，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主要只是着眼于毛对1952年形势的估计，多半强调毛原本是真心实意想搞上很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只是因为看到当时条件下工农业生产中的矛盾和问题，以为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一切即可迎刃而解，因此过急过快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这些解释大都忽略了对新民主主义主张形成的历史背景的考察。这就好比张三想要搞一个大屋顶的建筑，最初按照常规的工程建设步骤，又是设计，又是挖地基，立墙垛，刚把地基挖出个样子，就因为下雨影响施工，决心打破常规，一步到位，只挖了几个深坑，立上几根柱子，就把大屋顶支起来了。雨是淋不到了，人们在漂亮的大屋顶下可以做许多事情。但天气渐冷之后才发现，只有一个漂亮的大屋顶太不实用，于是又不得不重新开始挖地基建墙垛，把房子建起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只是去强调张三当初太过急于求成是不够的。没有人不想早点看到漂亮的大屋顶造出来，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张三敢于走捷径，不按常理办事？这里面的原因就很复杂了，必须要做历史的分析，不能就事论事地只强调下雨对张三的影响。

我那篇文章其实着重谈到的也只是两个方面的历史背景，其一是指出，共产党人历史上是严格按照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行事的，新民主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并非是毛泽东的独创，它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共产党人革命阶段论的一种延伸。换言之，新民主主义主张的思想萌芽及其雏形，也早在中国革命“两步走”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之类的主张里面，就已经清楚地显露其端倪了。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还再三叮嘱中共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强调新政权在国内应当团结资产阶级，在国际上应当积极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贸关系，原因也在于此。其二是指出，革命阶

段论本身就规定了上篇与下篇的关系，不断革命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共“一大”纲领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到以后不要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策，以及苏维埃时期那些彻底得不能再彻底的革命措施，都与其理论上的这种规定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党内之容易“左”倾，几乎不可避免。

讲到这一点，我想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那篇文章只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才能讨论和发表的原因了。有人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针对当年党内主张超越革命阶段的“左”倾倾向而提出的，这显然是对当时中共历史的一种想当然。为什么？因为抗战以来，毛泽东等人所感受到的最大的危险是右，而不是所谓“左”。毛泽东之所以不满王明的那些主张，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照王明的想法去做，已经被迫屈从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很可能会淹没在民族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因此，自抗战开始之日起，毛泽东从来都在设想如何使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最初，中共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但因自身力量太过弱小未能发生影响。红军被迫改编，苏维埃被迫改制之后，它又提出过“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试图用真假三民主义的争论来使自己切实站在高于国民党的地位上。但“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毕竟不是中共自己的东西。1939年夏，由于中共的力量已经空前壮大，毛泽东依据欧洲战争爆发和共产国际改变欧洲党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中国国共两党磨擦冲突加剧的情况，开始提出“资产阶级投降的必然性”问题。进而于1940年大胆提出区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政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其目的，就是想要从理论上解决排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确立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内在的几个革命阶级的政策，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实行由共产党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主张提出之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就围绕着应不应该

继续团结仍旧抗日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开始发生严重分歧的重要原因。

注意到上述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主张的提出，既是中共意识形态内容所规定的，同时又是中共依据现实力量对比和政治需要所提出的一种政治斗争中带有极大进攻性质的策略口号。它是服从于当时那个特定阶段的，以争取共产党领导地位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口号。一旦那个阶段过去，新的阶段出现，且力量对比有利，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主要矛盾的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对于毛泽东这样擅长捕捉战机和具有强烈进取心的领导人来说，毅然地转向下一阶段的革命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中共中央在1948年秋天就已经认定建国以后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按照毛的观点，主要矛盾决定社会的主要性质，新中国一旦建立起来，新民主主义就很自然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所以要有几年的过渡时期，一是因为俄国革命的经验使然，二是因为最初经济上的力量对比还不够有利。1952年国营经济的比重占到60%以上，毛泽东毅然放弃新民主主义而转向社会主义，实属必然之举。

问：对这类问题的重新研究和解释，是否也需要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呢？

杨：其实研究这种接近于思想史的问题，对档案开放的需要不是很大。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允许重新解释的环境，当然，光有了研究的环境还不够。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像早些年那样不能利用原始的文本文献来订正被修改过的文本文献，这种研究也还是进行不了。过去人们之所以不会从中共历史上政治主张和策略变化的角度来就此提出疑问，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大家习惯了利用毛选来谈毛的思想主张。殊不知，编在毛选里的文章只是毛精选的一小部分，且不少在关键的地方还根据后来的认识做了重大的改动。对此，我在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时系统地考证了可以找到的毛泽东的各

种版本的文字，同时把它们同当时中共的各种文献相比较，这样才弄清楚了毛的思想，以及中共的主张，不断地为着适合于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发生变动的情况。比如，如果我们像过去那样，依据毛选，认定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就已经清楚地划分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具体提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无法清楚了解毛泽东何以会在1940年才具体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不过，档案的开放对我在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有帮助的。比如，正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的档案开放，相关的研究人员才可能写文章介绍毛泽东和王明在党内围绕着要不要团结蒋介石集团抗日的争论的情况。了解到这一情况，就更印证了我对毛当年这一主张的进攻性质的判断。

问：您对陈独秀所谓“右倾”问题的研究应该也是这种情况吧？从陈独秀问题的研究是不是可以看出，档案的利用更为重要呢？即使这些档案来自海外。

杨：当然。陈独秀“右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纯粹的中共党史问题，因此对档案材料的需要程度要大得多。过去研究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时期的政策主张和政治态度，多半只是利用一些公开发表物，完全忽略了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其公开的言论是代表当时党的领导集体的言论，远不足以反映其实际的立场。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四川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讨论会时，就曾经讨论到陈独秀的所谓“右倾”问题，当时我们就认为这种观点很难成立。但那个时候一是缺少足够的档案文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二是没有那个刊物敢去发表辨正这个问题的文章。由于国内保存的关于那个年代的相关资料十分匮乏，因此20世纪90年代保存有大量当时中国革命史料的俄国档案的开放，就极大地推动了陈独秀研究的进展。再加上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太长的时间，讨论这类问题也不再那样敏

感了，我才有可能写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这样的文章，来对这段历史做一个辨正与梳理。

问：说到陈独秀研究，您好像很重视对中国现代史上这种政治人物的研究，尤其重视探讨历史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情感的变化。像您写《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孙中山与共产党》《“容共”还是“分共”？》《走向“三二〇”》《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以及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似乎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杨：不错，我是重视人物研究，并且很重视人物心理和思想情感变化的研究。因为我们研究的历史，不管是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历史，或者是某个具体的社会团体或民间村落的历史，说到底都只是许许多多人的历史。离开了对活动于其中的具体的人的研究，根本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研究真正贴近历史真实。当然，对于我来说，注意到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个人对历史的认识逐渐深化后的一个结果。我最早开始写毕业论文时，研究的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这样一个题目。当时，有关这个问题的书案资料非常少，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自从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中共核心领导地位之后，一切政策就都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了。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在中共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上，只是起了些消极的作用。这样的文章当时发了不少，包括一些当时最权威的教授也如此说明，而他们并非完全不占有资料。但深入研究当时可以找到的各种公开的文献资料，我发现他们对资料的解读和利用存在着明显的各取所需的情况，如果把当时的各种相关史料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会发现，事情的经过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当时就强烈地感受到，对历史不能孤立地和静止地去认识，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是在各方面因素先后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一个复杂的变动过程。我以后的文章，不少从题目上就强调

“变化”，“变动”和“演变”问题，也就是想要说明，不能把历史看成孤立的和静止的。

注意到历史本身，比如一个政党的方针政策、思想主张和策略路线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动，自然也就会注意到作为一个政党或一段历史中，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件上发生作用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和政治态度的变化了。像我早期研究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变动时，就是因为注意到当时学界只看到李大钊较早出来欢呼俄国革命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一面，完全忽略了他那些在思想上倾向于改良，而非主张革命的另一面。其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当时往往更关心去发掘李大钊激进革命的历史，只盯住那几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没有在意在此之前他的思想倾向和在当时国内政治分野中他所处的位置，完全没有在意其思想从改良到革命不仅需要而且也确实要经历一个转变的过程。结果在解读他的文字时，难免会存在某些偏向，不注意分析其原本的语义指向，甚至忽略了他的其它一些文章和文字，错解了他的某些意思。

李大钊思想的研究，使我对研究人物思想的变化问题多了一层警觉。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研究历史上的政党和人物的思想主张时，往往只是着重于借助这些政党和人物公开的文字言论来做分析论证的依据。这样做，一旦存在着某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者容易轻信自己已经看到的资料，或者容易在选择史料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剔除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符合其公开言论主张的逻辑的部分，以使自己的分析说明一以贯之。但事实上，站在我们今人的角度，如果不能对历史上的一个政党或一个人物做较长时段的综合的考察，仅凭其公开的文字言论，很容易漏读反映其思想侧面的其他内容，甚至会造成对其真实意图或真实倾向的误读。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历史上常常有一个政党或一个人物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会发表一些口不对心的言论。要了解其真实的思想主张，就必须找到那些隐藏在这些公开言论背后的东

西。而这些东西却往往不那么容易被找到，因为它们或者被人遗忘过久，找起来很难；或者被藏得很深，不易发掘；或者当事人根本就不留记录，并且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事后已修改了当初的文字。

那么，如何才能不上那些假象的当呢？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要尽可能地穷尽史料，也就是要想办法把所有相关的资料，从公开的到内部的，统统发掘出来，占为己有，做全面的比较和分析。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占有史料。这就要求我们在尽可能占有史料的情况下，还要采取迂回的研究策略。即要想办法能够贴近当时的历史环境，深入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以理解的同情的心态，来获得对历史人物当时思想情感和思想观点的正确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关注历史人物的家庭出身、生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际遇及其性格特点与情感经历等种种因素的作用，重视对日记、口述及回忆史料分析和利用。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如果再能适当地注意心理层面的分析和研究，对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与思想变化的解释，才容易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并且也才能够让读者更立体更全面地了解历史。

问：在这方面，您对蒋介石在早年国共合作期间政治态度的研究似乎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证。但为什么您就能够发掘出那样多的史料，从而证明蒋介石早年其实并不像他自己后来自诩的那样，或像我们后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贯反共。相反，他倒是曾经对共产党员有过不少肯定，支持过国共合作，甚至接受过共产党人的不少主张？包括中山舰事件，在您看来，也是有许多复杂因素所促成的，并非蒋介石的一个阴谋。

杨：关于中山舰事件（即“三·二〇”事件）的真相，早在十几年前杨天石教授就已经发表过一篇极具水准的论文：《“中山舰事件”之谜》。这篇文章再清楚不过地纠正了“三·二〇”事件是蒋介石的一个反共阴谋的传统说法。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补充，或者说是贡献，不

过是更全面地考察了他和共产党人关系的历史，和他政治思想变化的背景、原因和具体过程。用经过考据的史料证实了他在事变发生前不仅是赞同学习苏俄，支持国共党内合作的，而且对中共的一些主张，特别是对中共党员，也曾经有过相当好的印象，从而从蒋介石和中共关系发展变化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杨天石的说法。

说到发掘史料，严格说来这确实是我感到很有些诧异的一个问题。这就像茅海建老师在北京第一档案馆里查档时，发现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在老师的安排下在那里参观，不禁奇怪地质问那些学生说：这种地方也是你们来参观的吗？同样，很多史料就摆在那里，有些要费些工夫去翻出来，有些根本用不着下工夫，但我们过去的不少历史工作者却就是熟视无睹。这里面有懒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是看不到资料，只是因为没有被培养成要尽可能穷尽史料后再来研究问题的习惯。另外有些人的情况不是如此，而是因为思想长期形成思维定式，变得麻木而不敏感了。蒋介石20年代中期的言论很多，并不难找。在他去台湾后发表的各种全集里固然删去了不少，但我们研究蒋介石绝不能只靠翻阅他后来整理发表的言论集吧。蒋过去那些带有明显左派色彩的言论大都是公开的，不仅过去反蒋势力揭露过这种情况，大陆不少大城市的图书馆里，乃至日本、香港等地的大学图书馆里至今都很容易找到，更不要说他的不少文章或讲演当年是发表在公开的报纸和杂志上的。了解蒋介石当年想过什么，说过什么，后来反共了，极力想要掩盖那段历史，删去了什么，这其实恰好是历史学工作者应当做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工作许多年却鲜有人做，这其实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因为蒋介石到底不是一般人物，研究蒋介石甚至一度很热，光是蒋介石的传记就出了不知多少种了。然而，有多少人下功夫去发掘占有蒋介石所有言论资料，深入地，哪怕是分阶段地考察和研究过蒋介石的政治思想及其政治态度的变化呢？

问：其实，我们做学生的有时最困惑也正是这一点。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资料，经常是有资料却看不出问题来。比如像蒋介石当年对共产党人态度这件事，即使我们早于您看到您所利用的那些足以证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颇具好感的资料，大概也只会怀疑蒋是言不由衷，或干脆就是一种阴谋。

杨：这一方面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毕竟研究历史的时间还太短，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还缺少经验和感受。接触的课题多了，发现的问题多了，知道历史上的人和事有着太多的侧面，你们分辨真伪和提出质疑的能力自然也就会增强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还是和你们过去所受的训练有关。那就是你们还不习惯于自觉地“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过去一些年好像曾经很流行过一句口号吧，叫“理解万岁”。何谓理解？你不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以别人所有的知识、情感和处境，来了解别人的想法和观点，只依据你自己的地位、情感、知识和好恶，又如何能够做到理解别人呢？日常生活中都做不到理解，在历史研究当中就能做到吗？从没有听说过一个平常对人对事态度较偏激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会很客观。蒋介石过去是被描述成那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如今即使评价上有了许多改变，但在其反共这一点上改变的并不多。再加上他自己过去也刻意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反共的先知先觉，就更增加了研究他的难度。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问题在于，如果你了解人是社会的，是受环境影响和制约的；如果你了解人是历史的，其生长和成熟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你就会了解，其实历史上的人物，不仅是在变化着的，而且其好与坏也是相对而言的。我们研究历史上的人物思想，有时更多地要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当你相信某些神话时，不妨想一想自己和周围的人能不能做得到。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再伟大或再丑恶，到底也还是人。是人就要学习，就有局限性。很多事情他们也只是第一次面对，

第一次经历，把他们描写成未卜先知而运筹帷幄，或能掐会算早就预谋设计的样子，不是造神，就是丑化。

问：您好像非常推崇陈寅恪先生关于研究历史，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的说法。研究人物，要能同情，才能理解。但我发现，不少研究人物的学者会走另一个极端，即很容易深陷于同情之中，而不能对研究对象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我注意到您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研究，在这方面似乎分寸能把握得比较好，为什么？

杨：你说的问题的确存在。做人物研究要能深入进去，也要能够跳得出来。深入进去是为了以同情的心态去理解人物，跳得出来是要让自己在认识和评价人物时能够确实保持一种客观并且是批判的精神。这其实也是研究历史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方法。但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有不少的难度。你问我为什么能把握住分寸，如果我说我是A型血并且是天秤座的人，你可能会认为我有些“迷信”。但血型和星座这种东西对人的性格及习性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影响，这应该也不全是瞎说。当然，略去这层不谈，人要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要追根究底，就要养成较强的批判意识，绝不能盲从或轻信什么。同时很重要的是对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只有如此，才能够经常自觉地看到别人的长处，也才能够自觉地要求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问：但如何才能做到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去看人看事，进而不带偏见地以一种同情的心态去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循呢？

杨：我想我的情况可能和我蹲监狱的经历有关。我过去也并不就是一个很能理解别人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孩子天生如此。但很多人不容易理解别人，其实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因为自己没有犯过多少错误，更没有沉沦的经历，因此对自己的道德操守、人品、地位乃至形

象太过自信自爱了。反过来，对那些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哪怕是在一些方面不如自己或低于自己很多的人，难免会抱以一种不屑与伍，甚至是从内心里鄙视厌恶的心态。但监狱生活使我看到了作为人的另外一面。

我坐监狱时曾被调换过两三个囚室，因此和几个犯人有过交往。和这些犯人接触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我过去想象中的坏人。这一段经历留给我的种种感触对我有很大影响，改变了不少对社会和对历史的看法。在我看来，不学历史的人尚且应当学会理解和宽容，学历史的人尤其应当善于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凭一己印象来取好恶。如果我们对周围一时间尚不能完全弄清楚子丑寅卯的人和事，都没有办法在理解的前提下予以同情和宽容，看不到事情有发展变化的一面，我们又如何能够对表面上看起来早已盖棺论定的历史真正做到客观，并公平地注意到其背后的复杂背景和它可能的发展变化呢？毕竟，由于历史发展的关系，过去的人和事更容易受到环境和条件上的局限，也更容易被后来人为的种种假象所蒙蔽。不注意这一点，就很容易凭一己印象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先定义好坏。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坏人，也没有绝对不会做坏事的好人。何况我们通常所谓的好坏本身就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它们多半只是特定背景、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一些在甲看来是好的，在乙看来则可能是坏的；一些在过去看来正确的东西，在今天看来却可能是错误的；一些按照通常的价值观难以理解的事情，在当事人却往往会有不得不如此的复杂原因。我们不能拿甲的观点来要求乙，也不能简单地拿今人的看法来衡量过去。我所以坚持研究历史，包括在研究毛泽东、研究蒋介石的问题上，要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就是因为我相信，不如此即不足以真正

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动机，不足以准确地解释他们行为的内在的逻辑。

问：听您这样讲，我一下子联想到近些年来在近现代史学界尚未争出胜负的史观问题来了。您对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和人文史观怎样看？事实上这涉及一个以什么为标准来评价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人和事的问题。您是否认为不存在这样一种客观的标准，或者没有必要刻意设定一个统一的参照系？

杨：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我们这里能够讨论得清楚的。简单的说，我不认为拿革命与否作为衡量近现代史中人和事进步与反动的标准，是合适的。但我也并不认为简单地基于“告别革命”的理念来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对历史研究来说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历史的发展有没有客观规律可循，这是一个在历史学家当中始终都在争论着的问题，但我相信，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乃是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从这个角度，历史的必然与规律并非完全触摸不到，拿现代化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关照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也并非毫无意义。但是，必须了解，正如革命不能当饭吃一样，现代化本身也绝对不是人类自身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研究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现代化不过是人类文明活动的一部分而已。这是因为，所谓人类文明史，说到底还是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历史，是以人的思想和活动来作为全部研究对象的。因此，我们的研究，只有以人为本才有实际的意义。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强调历史学的人文价值的关键所在，它也是我主张历史学家要有现实关怀的关键所在。毕竟，不管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改善和提高自身存在的形式和意义而进行的斗争。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正是以不断提升对人的生命及其存在形式和意义的关注，作为其进步的尺度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不可能完全没有价值判断。尽管我们应

该也能够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局限性，清楚我们不能拿今人的认识来要求过去，但我们还是会基于我们今天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价值观，从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的角度，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甚至为那些已经过去了人和事感到由衷的遗憾与悲哀，不愿看到那样的历史重现。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坚守我们的岗位，努力提供给社会更多更真实的历史图像。严格说来，只要我们能以求真之心，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史料，细心地爬梳比较，客观地描述出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动机，既注意到历史中人纯粹理性的一面，也注意到种种非理性的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就一定会是有意义的。就这一点而言，标准的问题有时也并非就是最要紧的。

（原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5期，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者为李国芳。）

一、对过去历史的疑惑是我研究的动力

我小学三四年级以后，父亲就给我灌输上清华，学工科的好处。而小学音乐老师那时候也看上了我，认为我有唱歌的条件，因此定期给我辅导，让我参加合唱队，包括演节目，鼓励我将来报考广播学院附中。可是我刚上到五年级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成了“失学儿童”。以后跟着父亲去了“五七”干校，多少个月起早贪黑跟着原国家计委委员廖季立把连队的羊群赶到十几公里以外的水库滩地上去放牧。一年以后回北京分配进了工厂，从学徒当到学徒的师傅。一直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因为写“黑诗”被抓进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我想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以后会去研究什么学问。1977年从监狱出来，有了高考的机会，当时家里商量的也是将来要跟着父亲向经济学方面去发展。只是由于当时第一次恢复高考，高校还没有经济学专业的设置，因此头两个志愿报的是政治经济学，是为正打。想不到头两个都没录取，最后歪着到第三志愿：历史。所谓歪着，则是说我被录取的其实还不是历史，而是中共党史专业。这个中共党史专业，当时——今天恐怕也一样——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它完全是一个“四不像”：既非史学，也非政治学，被划在所谓政治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却写的是“法学”学士。结果很搞笑，我知道中共党史专业毕业的学生，不少都转去法律系读研究生，更有些学生，一天法律知识没学过，仅凭着一张法学学士或法学硕士的学位证书，摇身一变就直接进了法律界，甚或当上了律师。

影响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授课中，还是有历史课的设置，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给我们上课的还有个别资深的老教授，如郑昌淦先生等。同时，党史系里也还是有一些按照史学方法做研究的教授，包括我的论

文指导教授杨云若、思想史教研室的教授彭明等。他们对我都有影响。第二个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党史的学习，使我对许多历史问题发生了兴趣，同时当时条件下大量不顾史实的党史宣教，也刺激了我想要从事中共历史研究的意向。因此，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再去读学位，而是找关系进了中共中共党校党史教研室做了《党史研究》杂志的编辑。在1982年那个时候，中共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刚成立不久，资料条件还并不十分好，中共中央党校因为历史悠久，又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档案馆是平行单位，久有业务往来，因此从挖掘中共历史文献资料的角度，那里是最适合我们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地方。我正是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史学研究之路。

但是，更让我对研究我们和我们的父辈经历的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感兴趣的原因，还是和我们及其父辈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读新中国建国前后大批跨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书信时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他们中许多人在1950年代以前和以后书信的称谓及书写格式，出现了极大的改变。以前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的称谓方式，即区别尊卑、长幼、亲疏、大小等种种身份差别的书面敬语，1949年以后几乎不复存在了，大家都逐渐改换成了最简化的苏式的“亲爱的××同志”和“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或“致布礼”）之类的最两化的方式。影响到今天，许多年轻学生，连给老师写信时该用“你”还是该用“您”都毫无概念。类似的这种改变，从穿衣戴帽到言谈举止，到接人待物，到婚丧嫁娶，乃至到思维方式，几乎都是颠覆性的。我经常想，当我们几十年来堂而皇之地批判所谓“全盘西化”，大谈所谓“中国化”，强调“爱国”和“民族”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人意识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1949年以后恰恰是中国被两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

至于说到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种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空间里的中国人，都无法不受到这种传统断裂的冲击和影响。而旧的传统一旦丧失，新的观念习俗就会渗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怕是没有什么课能够补得回来的。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任何一种所谓传统文化，指的其实主要是溶化在亿万国人血液中的观念、礼俗和行为举止等种种习惯性的社会生活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它的延续多半是通过按照这些传统方式生活的家庭和由无数这种家庭所构成的社会环境的习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一旦旧的传统方式被外力强行中断，或破坏，就一定会被其他非传统的新的观念、礼俗和行为方式所取代。当人们逐渐接受和习惯了这些新的观念、礼俗和行为方式以后，你想通过改变某些书本的内容，或像于丹那样按照她的理解水平去给老百姓灌输一些经过她演绎的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观念，去恢复国人久违了的传统，实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上还有多少传统的东西存在着。我很清楚，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早已西化得不成样子。我唯一觉得庆幸的是，我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却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还保留了某些传统礼俗的家庭里面。我很清楚地记得，从小外婆就手把手地教我和妹妹吃饭前如何摆筷子，爸爸的座位应该在哪儿，妈妈的座位应该在哪儿，外婆的座位应该在哪儿，我和妹妹的座位应该在哪儿。摆筷子时两支筷子应当并拢摆齐，筷子尖应当冲里。爸爸妈妈回来得再晚，只要没有事先说明，再饿也要等他们回来才能开饭。快吃饭时要听到大人叫才坐到桌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双手还要放在桌下，既不能趴在桌上，也不能玩弄桌上的东西。要等爸爸妈妈动了筷子，小孩子才可以开始动筷子。吃饭时人再小也要把碗端起来吃，夹菜碗里的菜不能去乱翻，更不能挑里面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来吃，只能从面上夹，还不要把筷子伸到菜碗的另一侧去，只应当夹菜碗朝着自己一侧的那部分菜。嚼饭菜的时候还要把嘴闭起来，不能张着喇叭唧

叭唧弄出声来。……更不用说家丑不可外扬，即使吵嘴，都不能扯开嗓子，把声音传到窗户外面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家里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规矩，今天已经数不过来了，但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不给旁人造成麻烦早已成了一种习惯。这些未必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是我们父辈以上许多最基本的为人处世或接人待物的礼俗文化都是从这种家教和祖孙相处的耳熏目染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些又恰恰是今天我们这个号称“文明”的新中国所极度欠缺的。每每看到今天国人走路做事自顾自不顾旁人的种种行为，就不能不生出许多感慨来。

因为那些在今天人们看来的繁文缛节，说到底都是富裕人家才会去讲究的东西，穷人家多半是没条件去学的。孔子所谓“仓廩足而知礼节”；孟子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用阶级斗争的方法颠覆了这个社会以后，给多数穷人带来了利益，过去有文化的人再不能主导和影响中国社会，他们甚至还成为了被压制的对象。然而，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连同他们的阶级出身一起，也不可避免地被当成脏水一道泼掉了。即使像我外婆或父母那样从小有意无意地还会对我们灌输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规矩，长期生活在那种“无法无天”的革命年代里，留在我们身上的传统的烙印也越来越少了。和那些从来没有接触到这种家教，也无法从学校和社会上得到这种教育的孩子们相比，我们可能充其量也就是在待人处世上稍多一些顾忌，知道人还要顾些羞耻，有些敬畏而已。

二、研究历史的乐趣

有人问我研究历史的乐趣的是什么，我说过，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

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如何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都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但是，随着自己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和读者、学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直接，我就越发感到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职业的兴趣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和同学们讲“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经常提醒年轻的历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就是基于我自身和当今史学研究的某种危机感出发的。我们还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清楚地发现，现今的历史研究由于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介入，变得越来越重视微观，重视下层。许多学生，甚至是学者的研究题目，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研究出来以后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处。我们那个时候做过粗略的统计，不要说大量地方杂志上发表的史学论文，仅以北京当时最好的《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来说，其中许多文章发表后，除了作者自己用来评职称需要和极少数几个因为要写相关论文的学生会去读一下以外，就成了废纸一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历史问题，或在实际上是必须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解答的问题，需要有人去研究啊！为什么我们的学者不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针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人们关心的问题，去做出比较深入和比较专业的解释来呢？我的观点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确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话，我们有什么必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历史，认识我们的今天，帮助我们的后人更好地把握未来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呢？而我今天研究历史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的每篇文章或

每本书，都有相当多的读者，而绝大多数读者都能够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和书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

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多一些暴力，多死一些人，没有什么。有人称之为“必要之恶”。要知道，即使是当年从改良转向革命的毛泽东也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当年就讲过：“这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问题在于，在过去那个年代里，只要你相信阶级斗争，相信民族斗争不可调和，你死我活，最终就难免会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会逐渐不再视恐怖为恐怖，甚至还会把恶视为最大之善。

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东北日报》就公开报道过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而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下，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搞土改运动，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就多达25万人之众。不难了解，这虽然并不是中共中央所赞同的，几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就发现并紧急纠偏，而且制止住了，但死人已不能复生了。这里有多少是“必要的恶”，有多少是不必要之恶呢？想来一望即知。然而，这样的历史反反复复地发生得太多了。从早年“富田事变”，到鄂豫皖“肃反”，到延安“整风”中“审干运动”，到1947年土改“左倾”，到1957年“反右”，到1959年“反右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其他各种运动，不断制造此种不必要之恶已成惯性，愈演愈烈，了无底止，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质疑此种逻辑之荒谬？

不仅如此，所谓“必要之恶”的逻辑中，最让人不可接受的，就是其中全无人性和人道的观念。好像相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构成国家、民族的单个的人无关紧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该牺牲的就应牺牲，不应有任何怜悯之情，不能存任何妇人之仁。尤其令人

难以容忍的是，这种逻辑的主张者，同样也必定是新的阶级论或种姓论的赞同者。在他们的观念中，凡不赞同他们主张者，即非我族类。既然非我族类，也就无所谓这类人的权利和感受。换言之，在他们的观念中，根本就不会有“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与意识，更不懂得当今社会中的人，其实首先是毫无区别的同样的有生命的人，然后才是张三、李四，才有其地域、阶级、民族和国家等种种属性，没有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后天的属性，去剥夺他人人生而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包括他坚持异议的权利。如今，我们连牺牲环境来求发展的逻辑都已经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以牺牲人的自由和生命为代价的这种“必要之恶”的荒唐逻辑呢？

三、记忆中的八九十年代

1980年代我曾在三个单位呆过，在人民大学上学，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然后又回到人民大学当老师，1990年终于选择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10年是我步入史学研究的开始，1985年和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杨云若老师合出了第一本书，即《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同时主编了三卷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集）》。那些年可以说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面，当时还没有用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教研室所藏资料，除了建国以后的部分以外，绝大部分都找来读过，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万张以上。那个时候也没有科研经费一说，我们编资料集完全是自费，按照全国期刊篇目索引，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都跑遍了。因为没钱，全部都是坐坐铺，有时还得站着。那个时候刚刚通过《档案法》，中央档案馆也一度不得不对外开放，因此我给校领导打了报告，经过批准后，有空儿就坐上公共汽车往中央档案馆跑，一连跑了几年时间。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工作在下一个10年，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那10年，我从1991年开始，接连出版了6部专著。

记忆中的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10年。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中共党史大讨论，什么意见都有，包括胡乔木在起草新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初期，许多讲法都十分大胆。中央档案馆那时的开放，也是他力推的结果。但严格说来，当时中共党史的研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较深。尤其是在新的决议发表之后，许多已经开始的讨论受到了新的限制。而另一个方面，即对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在那个年代却出现了一个高潮。随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开放，中国国民党史研究顿时成为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许多过去做中共党史研究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学者转去做国民党史研究，一时成绩斐然。只可惜，1990年代初期，风向再转，有人鼓吹“人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说什么前苏联就是修史不善以致灭亡。此说一时甚嚣尘上，影响到档案开放全面倒退，就连国民党的档案也连带挨批。

有人认为八十年代有过党史热。严格说来，那并不是中共党史，而是领袖、名人的故事热。这也是传记文学作品大量出现的一个原因。叶永烈作品的长处，和稍早前权延赤的一样，主要在他们做了大量的口述史。对于口述史的重视，中国史学界是直到199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的，而叶永烈、权延赤他们在这方面明显地走在了前面。因为重视口述史，他们的作品中就有很多在文献史料当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包括人物性格、言谈举止，甚至有一些重要情节内幕的具体描写，这便于他们编故事。但即使像我这样专业的研究者，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以便借助他们披露的口述材料和我们从文献史料分析中所得出的认识来进行对照比较。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者，更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因而他们写领袖故事，只是着眼于歌功颂德，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进程的把握，通常只是依赖于相关史书梳理的脉络和逻辑人云亦云。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偏颇，自然也就体现在他们的书里。

四、与台湾学者的交往

我和台湾学者交往较多的是蒋永敬教授和陈永发教授等。蒋永敬教授是国民党史研究者，陈永发教授才是中共党史研究者。

蒋公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术前辈。我第一次见蒋公是1991年在沈阳的七七事变研讨会上，当时蒋公评我的论文，具体意见不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有过交谈，没有更深一步的接触。此后两年左右，我因为读到蒋公的一篇文章，发现他并不了解我的研究，因而寄了我在1991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一书给他。没想到他很快就通读了全书，并且专门写了一篇书评，极力称赞我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发现。不仅如此，蒋公力劝我把西安事变研究写出来书来。其实，我虽然一直关心西安事变研究的资料，并有自己新的发现和观点，但因为我一位于在美国经商的同学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准备写书，因此我并没有自己在这方面出书的打算。纯粹是因为蒋公的一再劝说和推动，我才最后下决心用了半年时间把这本书写了出来，经蒋公写序，很快就于1995年在台湾出版了。

熟悉蒋公著作的研究者都知道，蒋公过去研究国共关系的著作，和其他台湾的国民党史专家一样，也都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或感情色彩。但两岸交流开始之后，蒋公则是台湾国民党史专家当中最早通过这种交流，在这一问题上转向客观的学者。有关这一点，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能了解了。蒋公在将近10年前就提出过一个说法，叫做“操之在我”。那意思是讲，其实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在热爱中国和想要救国的问题上并无两样。只是，因为各自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所在不同，因而他们对政治对错的判断也就截然相反。一切以“操之在我”为准绳。“操之在我”，则一切皆对，不对也对；“操之在你”，则一切皆错，不错也错。

我知道陈永发教授还在1984年。当时斯坦福大学教授范力沛来华时曾到我家里做客，他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位台湾学生，称赞不已。陈

也确实了得，其成名作《制造革命》在美国出版后即得了学术奖。他的那种近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当时还鲜有见到。以后他长期从事中共历史的研究，成为台湾迄今为止最有权威的中共历史研究的专家。

第一次和陈教授见面的时间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不修边幅。蓬乱的头发和一脸胡茬，衣服从来不熨，即使是西服也总是皱巴巴的。他习惯于微微歪着头，常透过眼镜的上半边镜片，盯着你的眼睛和你说话。他的随和和不事张扬的性格，使他在同事中间颇受好评。他能做到近史所所长和中研院院士，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以外，与此不无关系。

不过，永发兄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却并不怎样中庸。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明显地带有批判性。他最大的特长是能够注意到别人不大去注意的那些边缘性的史料，并据此做出让许多研究者心服口服的分析来。他的《制造革命》、《延安的阴影》以及《红太阳下的罌粟花》等，都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他在这方面的长材。但永发兄的研究，至少在我看来有一点不足，就是因其批判性较强，有时立论及分析容易出现偏颇。但永发兄最令人佩服之处，也是至今旁人所不能企及的，就是他的宽容与大度。我曾不止一次地撰文批评过他的书和文章，而他从未因此对我拒而远之，耿耿于怀，我们始终是很好的朋友。

五、大陆以外的党史研究界

任何历史文献都不存在所谓质量的问题。只要你能确定它是历史文献，它就有其价值。即使是历史上某一方所伪造的文献，也一定有其值得去研究的价值所在。何况，什么叫质量？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常常在事后修改他们过去的文章，那么究竟是毛泽东修改过的文章没有质量，还是蒋介石修改过的文章没有质量？其实，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受到某一集团高度控制的社会里，人们所能看到的文献永远都是片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任何一种哪怕是用来暴露这种控制的荒谬性的资料的出版，虽然其同样片面，却必定会有其价值。因为当你既看

到这边公布的文献资料，又看到那边开放的文献资料之后，你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比较。有比较就有鉴别，有比较也才有分析，所谓质量也就存在于其中了。

所谓海外党史研究，在今天来谈它们，多少会给人以明日黄花的感觉。因为，包括萧延中主编的那些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过去二三十年以前海外的研究成果了。在1970年代，乃至1980年代初，我们还可以说海外存在着“中共党史研究”。自1980年代初期以后，这样的情况早已逐渐消失了。无论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过去那些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基本上都已经改行了。我和日本目前还在继续坚持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开玩笑说：他们比日本的大熊猫还要珍贵。很显然，今天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可以用于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献资料不知丰富了多少倍。也就是说，今天研究中共党史的条件远好于过去。依据今天的资料来评价二三十年前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水平，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

我曾经和国外的朋友谈起过旅英作家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告诉他们这本书最大问题在哪里。法国有朋友曾经希望我写一个长篇书评，实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上哈佛燕京学社曾集中一批学者开会评论过张的这本书，台湾的陈永发教授也写过书评，大家已有很多批评，因此我也就没有专门去写这个书评了。坦率地说，我和张戎比较熟。她写书的几年时间里每年都会来大陆一两次，几乎都会找我询问一些史实方面的问题。我对她那本在欧洲得奖的《鸿》很感兴趣，也认识她的丈夫，知道她是在写一本有关毛泽东的历史“小说”。因此，我对她的问题几乎是有问必答。她在书末也注明采访过我。但奇怪的是，她书出之后再没有来找过我，不仅没有送书给我，连封信也没写来过，更不用说询问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的意见了。这说明，她是知道我们的基本态度的。

就张书而言，我在网站上对关心此书的网友有过一个简单的答复。大致如下：

首先，张的书值得一看。从批判的角度，把毛妖魔化的书其实有的是，只不过过去大多数都是台湾学者或海外国民党的同情者写的，而且真正在史料上去下功夫的书不多。张不仅“长在红旗下”，而且是干部子弟，对中共历史自然会有全然不同于台湾和海外学者的深切了解和体会。特别是张与她的丈夫花10年左右的时间，在世界各国广泛查找历史书案文献，对相当多历史亲历者进行访谈，获得了大量史料，也揭示了不少新的史实，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看法，从而使该书在史实方面的颠覆性远比以往那些批毛的书籍更具冲击力。只看大陆出版的片面捧毛的书，而不读这种有较大冲击力的批毛的书，一旦有朝一日读到，难免会从根本上怀疑自己过去所得到的历史教育全是骗人。因此，我是主张要更多地广泛阅读各种不同观点和不同说法的历史书的。多读这些书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断那些靠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胡编乱造来挣钱的书商们的财路，让更多基于学术研究的客观谈论毛生平史实的著作成为读者的需要。

当然，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张的这本书是有其严重的弱点的，那就是作者缺乏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主观色彩过于强烈，不知道围绕着诸如毛的重要生平及史实问题，凡出新论，不能简单地自说自话，非做严格的考据工夫不可。该书仅满足于另外讲一套故事，对史料的利用和解读完全服从于作者的情感倾向性，常常表现得过于偏颇、武断和为我所用。

举一个例子，张书为证明1937年底因王明回国毛权力失落对王明怀恨在心，所用的论据是：在当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众人一致推举王明在未来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并且在进一步的举证中又说，1938年2月底政治局会议为抵制毛的擅权，大多数人又一次支持了王明，再次确认王明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张的结论

是：“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然而，张在这里显然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第一，1935年遵义会议推举的中共中央总的负责人是张闻天，不是毛。无论毛在实际权力方面掌握多少，在中共中央内部，张闻天到1937、1938年仍旧是党的第一领导人。如果王明回国要夺权的话，首先要夺的也只能是张闻天的权，而非毛的权。

第二，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七大”的决议很明确：“筹备委员会廿五人：毛泽东、张闻天、陈绍禹、陈云……秘书处五人：泽东、王明、洛甫、陈云、康生。主席泽东，书记王明。”这里可以看出，因为王明回国，毛泽东的排名反而提前了。

第三，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根本就未提到“七大”报告人的问题。这次会议所提到的报告起草问题也有，但不是指“七大”报告，而是指十二月政治会议的决议，规定“王明起草”。1938年二月政治局会议时，王明也特别讲到过这个情况，说他因为十二月会后即去了武汉，以至于没有就十二月会议起草一个正式的决议，这是一个遗憾。

第四，在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人们才第一次提出了“七大”报告的起草问题，但是与张书所说不同的是，会议决定：“报告的准备人：十年结论-毛泽东（由洛甫、毛、王、张共同起草）；统一战线-王明（王、毛、周、任）；军事-朱德（副报告）（朱、毛准备）；职工运动-项英（康生、国焘、王明）；组织报告-周恩来（周、博、董）。报告人现在不决定，上面的是报告准备人。”同时王明提议：为准备七次大会，应由毛起草一政治提纲，即十年来我党奋斗的提纲；王明准备一个统一战线工作的提纲；洛甫准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等。由上可以看出，会议并没有明确指定“七大”政治报告的报告人是王明，不仅如此，因为决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来主持起草和准备，让王明准

备统战报告，也可以看出会议意向中的政治报告的人选也应当是毛泽东，而不可能是王明。

再联系到194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王稼祥、任弼时转达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当着几位中共代表的面告诫王明他不熟悉国内事务，不要去争总书记位置的谈话情况，可知张书中这一段关于众人推举王明担任未来“七大”政治报告人，因而证明王当时已经成为众人心目中的领袖的说法，并不是事实。

类似这种似是而非或生吞活剥的情况，可以说充斥于该书的绝大部分章节，要一一订正起来可想而知会多麻烦。张确实挖掘到了相当多的史料，但只要预先将毛在内心中定性为恶，再多的史料在其眼中，也只会从恶的方面来理解和解读，而难以被客观地运用。这可以说是该书最为失败之处。

六、研究历史，需要悟性和想象力

任何研究都需要较高的悟性和想象力，历史研究也不例外。我前面说过，历史研究很像警察破案，要通过大量蛛丝马迹和历史碎片来重建历史的图像。悟性高的学者能够举一反三，把大量常识性的知识与书中得来的各种信息运用于有逻辑的联想，从而容易寻找出各种蛛丝马迹与历史碎片相互之间的联系，编织起证据链接逻辑严密的历史图画。他甚至还会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地发现其他更多更大的历史问题，做出既微观又宏大、既历史又现实的历史研究课题。缺乏悟性和想象力的学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会差得很多。他们的研究题目往往过于褊狭，文意晦涩难懂，即使能做出一些应时的题目，其成果也通常缺少应有的张力和对读者思想的冲击力。

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痼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即使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好像变化剧烈，但影响左右我们生活乃至命运的许多东西也依旧在那里起作用，未必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知道，过去所发生过的许多情况，今

后就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呢？举一个例子，10年以前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政治笑话，说是把所有基层干部排起来都枪毙，多半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今天各级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程度无疑远甚于当年了，因此，推崇建国初期“三反”运动，希望再来一次群众运动，彻底惩治贪污腐败的网友和民众，人数众多。如果我们的某些决策者不了解“三反”运动之类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种种内幕及其严重危害性，而是一味地相信我们今天众多教科书和相关著作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的“三反”运动的伟大意义，谁能保证他们有朝一日逼不得已不会再来这样一场运动呢？

对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史研究者而言，绝不能简单地满足于重现或重构过去本身。不难了解，过去从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没有什么不是历史，没有什么不可以去重现。问题是，我们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去重现它们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的意义何在？还是那句话，如果要让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有其实际的意义的话，除了要考虑个人的职称评定以外，还是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研究的动机更多些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始终反反复复在艰难前进之中的社会来说，我们历史学家尤其应当对创建一个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注重人性和人道的文明的人文社会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历史重现和历史解释，以便激发更多人反思和警醒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只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多一个人明白“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多一个人明白“必要的恶”的逻辑之可怕，就多一份建构中国未来文明社会的力量，中国就会多一分和谐与发展的希望。

研究历史，拼的就是查找和解读史料的功夫。尽管研究中共历史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从学校出来后瞄的就是传统史学的研究路数，因此，也是非从史料入手不可。中共史的史料，最主要的就是各种档案资料。而我1982年从人大毕业时，和今天各种开放的档案史料汗牛充栋的情况全然不同，那时几乎还看不到开放档案的希望，那个时候要想靠个别杂志偶尔公布几则资料来做中共史研究，其难度之大不难想象。当年要想在中共史研究上做出成绩来，靠用功没什么作用。要么你能被分到中央一级专门研究机构去，要么你能参加某个中央领导人的课题组，总之，你要能接触到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才行。我的幸运在于，我刚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不过两年时间又赶上了档案开放的一段好时候，虽然我并没有机会进中央级别的专门研究机构，也没有参加过什么课题组，却还是获得了进入中央档案馆查档的机会。

当然，能够进得了中央档案馆的大门是一回事，能不能取得自己所希望的收获是另一回事。那段阅档经历曾经让一些同行很是羡慕，但我相信，真换了他们，多数人大概早就中途撤了。

只有我是一个“常客”

中央档案馆（1993年后来与中国国家档案局合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白家瞳的一处山坳里。据中央档案馆自己介绍，它收藏的档案从中共建党，到1990年，有125万卷，上亿页，案卷排架长度达1.3万米。其中又以中共中央书案为最重要。

比如最早的“中央文库”书案，这是长期秘密保存于上海，涉及从1921年到1934年的中共各种文件和资料，1950年建国后才运来北京的。

比如中共中央在延安和两柏坡时期的档案，这包括了从红军长征，一直到1949年的各种中共档案资料。

比如中共各中央局的档案，这主要是指历史上中共各地方组织的档案，它分别是以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档案资料为主，同时涵盖有各局所领导的地方组织和地方各个根据地的各种档案资料。

再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这部分书案包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各种会议文件及成员手稿，包括中共一大至六大历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资料，和中共代表团与东北抗联之间大量往来函电和报告资料。

不用说，那里还存有中共建国后各个时期的会议资料、领导人讲话资料、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形成的各种文献资料。如果加上与国家档案局合并后，国务院下属各政府机关的档案资料，其数量和内容就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了。

在中央档案馆里还保存有大量中共建国前后重要领导人的个人书案。其中保存最全的，应该就是毛泽东的个人文献了。光是毛建国前后的各种手稿，它就收藏有4万多件。

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尤其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如果能进中央档案馆查档，想想都会兴奋不已。

然而，至今为止，中央档案馆公开介绍其工作范围时，还是明确告诉世人说，它的主要职能只包括：（1）接收、征集、整理、保管这些档案资料；（2）保守其机密，维护其完整，确保其安全；（3）“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有关事宜”。

也就是说，向社会开放和提供学者利用研究，都不在其工作范围之内。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学人很少有人能进那里查档的一个根本原因。

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我能进中央档案馆查档，是因为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工作，这个单位级别够高，当时又意外地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公开提议规范我国的档案保管与解密制度，主张学习各国惯例，制定《档案法》，让档案解密法制化。

1980年初，在中共中央的同意下，档案局等部门开始起草档案法草案。1982年，即我进中央党校开始工作那年，草案正式成文上报国务院审查修改。5年后，即1987年9月，经过各级相关部门反复讨论修改，该法交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于1988年1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

《档案法》对于历史学界最具重要价值的是第十九条关于定期解密的规定。该条文字内容如下：

“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的开放期限，可以少于30年。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老实说，我刚去中央党校工作时，既不清楚档案法起草的情况，也不关心中央档案馆开放与否。因为我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传播上，很大一部分精力在跑北京和全国各地图书馆，查找旧报刊资料。1984年，我在人民大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杨云若教授邀我与她合写《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我负责1935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段，因为这个原因我这才动了去中央档案馆查档的念头。

我是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的。在人大读书时，我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当时

这方面的研究很薄弱，资料条件尤其有限，除了设法查阅英、日、俄和台、港的相关资料信息外，在国内唯一有条件能够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旧资料的地方，主要的也只有人大党史系的资料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图书馆了。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后，我发现，我所在的党史教研室的资料室里收藏有一套《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其中可以找到一些在人大看不到的历史文献。不过，涉及到我要撰写的那个年代中共和共产国际关系方面的资料，也还是找不到。

从1980年代初开始，我们已经知道有个别学者曾有机会或正在中央档案馆查书。比如我们在人大党史系的老师李良志、王琪、杨云若，就都去过中央档案馆。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因为参与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某个项目，或被借调到某个中央领导人回忆录、传记的编撰组里去，以完成集体项目的名义，去中央档案馆查过书案。我到中央党校工作后，知道党史教研室的有些教师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去中央档案馆查书的。个人申请并成功去查书的，那时还没有听说过。

当年个人去查书之所以很困难，主要是因为审批手续太复杂。比如，人大党史系教师虽然是研究党史的，完全有资格去查书，但任何人去中央档案馆查书，都不能直接跑去那里，开单位组织介绍信也不行。你必须层层上报理由，经由各级部门审批。人大教师要先打报告给本系党总支，经总支同意后报校党委，校党委同意后再报教育部党委，教育部党委同意后再报中央办公厅，办公厅同意后再转签给中央书案局，再由书案局转批给中央档案馆执行。这里面哪一个环节没审过，就进行不下去了。因此，一般教师很少有谁在没有参加中央交办的集体项目的情况下，个人去闯这一道道关卡的。

我当年所以敢申请，是因为我意外地得知中央党校因其机构层级高的原因，党校负责人签字同意，党校的教师就可以直接到中央档案馆去申请查书，不用转经中办和档案局。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马上向当时负责编辑部工作的何明老师提出我想去档案馆查档的想法，他

很痛快，表示我可以写个报告试试。我于是就向党校校长提交了一份申请报告，理由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编辑部当时这类稿件甚多，需要查档了解和印证相关情况。

当时中央党校的正校长还是胡耀邦，整个风气比较开放。我的报告递交上去后没有几天，主管副校长就批复“同意”，我随后去校党办开了介绍信，也就等于顺利地拿到了进入中央书案馆大门的“通行证”了。

一年多的功夫瞎了

1984年春暖花开的一天，我按照去过中央档案馆的老师的指引，从中央党校后门乘公共汽车，沿着京密引水渠一直向北，在路上辗转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才第一次来到中央档案馆。当我经过站岗的卫兵允许，进到院里，找到办公楼，把党校的介绍信交给利用处接待人员后，对方拿着介绍信看了好一会儿，又把里间一位年长些的干部叫出来，他们小声商量了一下，然后才由那位年长者问我说：你想具体查那些材料？

我来档案馆前已经向两三位老师了解过到中央书案馆查书可能遇到的问题。他们都告诉我，中央档案馆没有，也不提供任何查档目录，你必须具体提出要查阅的文件名称和时间。如果你提交的目录太不具体，或具体到哪一个词不准确，都可能被告知没有该项文件。因此，我预先已经准备了一个相对比较准确，但只有不多几条的资料目录。

目录提交给他们后，利用处负责接待的年轻人把我引到一楼过道顶头的一间大房间里。当时没有电子监视设备，在这个阅览室里靠门口处，专门安排有一位馆里的工作人员的坐位，他的任务就是监控室内人员的读书情况。不过，我的档案拿来时，已经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了。因为整个机关都要午饭和午休，我还没来得及摸到档案，就被请出了阅览室。好在档案馆对外来读书人员一视同仁，都可以到馆里

的集体食堂去吃饭，饭后可以在一间公共休息室休息，故午休时间虽然长达两个多小时，也还不算难过。

我并没有打算在一开始查档就取得怎样的收获，而要想找到想要的资料，又能够比较准确地提交出文件名来，也必须要从比较一般的，甚至外围一些文献资料摸起。因此，最初两三次查档其实并没有什么收获。

我的办法是持之以恒、细水长流。因为我还必须完成编辑工作，每周可以去档案馆的时间其实很少，一周最多能挤出两天时间，有时一两周都没有时间去。但我只要有时间，哪怕半天，来回坐车或骑车，费时费力，我也要去跑一趟，照个面。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省得间断的时间太长，还要再开介绍信；二是混个脸熟。

这样跑了半年以后，我逐渐和馆里的一些年轻人熟了起来。他们知道我是《党史研究》编辑部的编辑，他们本身又有评职称的压力，也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如何选题和如何写论文的帮助，在这方面我也确实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好的建议。

在中央档案馆查档，除了因为有级别的限制，有些高层的档案我们一般人看不到以外，通常政策性或工作性质的文献资料，当时还是比较开放的。关键就看你能不能提交出比较准确的文献篇目，和负责调档的保管人员愿不愿意为你多花功夫查找。和馆里人比较熟悉了之后，我不仅逐步了解到一些索档的小窍门，而且也能够说服利用处人员和保管人员帮我查找一些看起来名目不够准确的文献资料了。这样一来，我能够查阅和找到的资料范围明显地就大多了。

不过，在中央档案馆能看到资料，并不等于就能把抄录的资料带出来。

我刚准备去那里查档案的时候，有的老师就提醒我，要准备几张卡片，万一碰到比较重要的资料，要小心地把要点抄在卡片上。因为他们的经验是，档案馆对所有查阅者抄录的资料都会逐字逐句地进行

审查，看到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就会用毛笔蘸上浓墨给涂掉。被涂掉的字句，你就是对着太阳也别想看出来了。

我自进中央档案馆查档后，就一直用一个工作笔记本，用档案馆提供的铅笔抄档。抄完后就当监管人员的面，放在他们指定的地方，从没有拿回去过。我就这样断断续续抄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85年我必须结束这一问题的查档，才请他们审阅我抄的档案，允许我把本子带出来。结果很让人吃惊，我拿到本子的时候发现，里面绝大部分内容都被用毛笔抹掉了，留给我可以看到的内容，只剩下了很少的几段。

记得那天我出档案馆主楼的时候，恰好碰到负责审阅我的抄本的那个“×处”，当时真有一种上去和他理论一番的冲动。

“羡慕忌妒恨”？

我向来不是一个爱生气的人，那次所以会有点冲动的感觉，主要也不在这位“×处”抹去了我一年多的心血。我知道，这是他的工作。我之所以想和他理论，是因为前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实在觉得他的一些作法让人气不过。

“×处”头发花白，在馆里资格较老，因年龄关系好像已经升到头了，政治警觉性却还是特别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我第二次到馆查档，当时我正在阅览室阅档，他不知道为什么专门过来看我。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他进来，更不知道他不声不响地站在我身后看我抄档案，直到我感觉到有人在我后脑勺上呼气，扭头看他时，他才若无其事地走到我桌子前面来，不苟言笑地问东问西。什么“你看这些档案做什么用？”“为什么要到中央档案馆来查档？”他的意思是，你想了解的问题中央决议和党史教材上都已经写清楚了，你这么一个人有什么必要还要自己来研究？这话很像我所在部门老主任讲的：你再聪明，你能比党中央毛主席聪明？然后，他又讲了一通中央档案如何如

何重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机密，档案文件不能随便抄录，必须要经过馆里审查批准，你抄了也不见得能拿走，云云。

我后来得知，我是改革开放后中央档案馆允许个人申请查档以来，到馆里来查档的最年轻的学者。因为我不是作为任何中央或地方的集体项目的成员来查档，而是以个人身份，由中央党校负责人批准来查档的一个年轻编辑，因此就格外惹眼。这也难怪这位老同志，出于工作习惯和政治警觉，会表现得那么敏感。对此，我其实早有思想准备，并没有当回事儿。

以后的事情就有点儿不对劲儿了。在我来馆查档一年后的某一天，馆里和我已经很熟的一个年轻人突然找到我，小声问我是不是和“×处”发生了什么过节。原因是他在下午工作时间经过我们来馆查阅档案的人员的衣帽间外，恰巧看到“×处”正在翻检我存放在柜子里的私人衣物。这种情况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因此非常意外，怀疑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得罪了“×处”，或被“×处”发现了什么不守规矩的行为。

我听了这件事真有点哭笑不得。我们的衣物，包括书包等，都是用馆里提供的锁锁起来的，钥匙在我们个人的手里。“×处”肯定是通过利用处收藏的备用钥匙，找到我放衣物的柜子，乘我们在阅档的时候偷偷开锁检查我的私人物品。好在我书包里也没有什么夹带的卡片和其他秘密，因此我并不担心，只是苦笑着告诉这位好心者说：没关系，随便他翻，那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即使不高兴，也没有办法去和“×处”当面理论。一来我已经知道他会负责审查我们的抄件，没必要去得罪他；二来我也不能告诉他我是从哪里知道他背着我偷翻我私人物品的。

这件事过去一些天后，“×处”忽然到阅览室把我叫到走廊里，严肃地问我是不是要出国。他的问话弄得我一头雾水。他看我莫名其妙的样子，绷着脸好像抓到了什么现行一样，进一步严厉地质问道：

“你要去加拿大开会，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这才想起来，我确实曾经收到过加拿大谢培智教授的邀请函，请我去参加北美历史学年会，但是这已经是一两个月前的事情了，我并没有计划要去参加这个会议。我告诉他他的消息不准确，我并不准备去参加这个会，但他还是不依不饶，反复告诉我说我不能再继续查档了。因为我如果出国，就有泄密的可能。我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进去。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我这次查档不仅被叫停了，而且“×处”在审查我的抄件时更是痛下杀手，几乎把我所抄的所有没有公开的资料全部抹黑了，只留下几段已经在杂志上公开发表了的资料。

我被邀请去加拿大开会的事情，“×处”怎么会知道呢？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对我来中央档案馆查档“羡慕忌妒恨”的，主要还不是“×处”，多半首先是中央党校和我同一个教研室的一位老教授。馆里有位利用处的年轻人早就听到这位老教授向“×处”告状，说不应该让我看档案，说是不能开这样的头。他的理由是，到中央档案馆来看档案的人，应该是经过党的各级部门严格审查过，并且是参加过集体项目，受过长期考验的同志。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什么都不懂，又没有参加集体项目，怎么能个人就到中央档案馆来查档呢？！

这一次阻止我继续看档的又是这位老教授。正是他告诉“×处”和馆里的领导人，说我要出国，并且说我来查看档案很可能就是为了要出国用的。

说起来，“×处”暗中翻查我的私人物品，阻止我看档，抹黑我几乎全部抄件，始作俑者竟是我同单位的这位老教授。

摘抄不能替代的收获

在《档案法》起草制定的那几年，档案开放是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认同的，直接负责中共中央档案开放工作的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胡乔木本人，当时就是开放党史档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因此，

“×处”也好，我们单位那位老教授也好，当时并不能阻止我再到档

案馆去查档。过了半年左右，我就又写了报告，再度拿了介绍信，又去档案馆查档去了。当时，加拿大的会早就开过了，馆里也没有理由不让我查档，因此，我又陆陆续续在中央档案馆看了一年多时间的档案。

记得在1985-1986年间，即《档案法》草案已经基本成形后，中央档案馆曾经出现过一个准备对外开放的很重要的迹象。当时，档案馆专门花人力物力开始做档案电子化的工作，特别是开始编辑一套1949年前的开放档案的查阅目录，抗战结束前的部分纸质目录已经放到利用处来，准备提供给前来查档的人员检索。这说明当时档案开放是大势所趋，中央档案馆也不能不改变过去过于僵化的作法，正试着逐步跟上这一开放的步伐。

但不难想象的是，要对外开放中央档案馆，到底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这不仅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关键是必须要根本改变传统的体制和思维观念。问题是，认为开放档案政治上会具有极大危险的担心始终存在，管理体制的改变并无进展，像“×处”这样长期相信档案就是秘密，对开放档案有抵触心理的人比比皆是。

因此，这一次查档我也学聪明了。我只是持续不断地调卷和阅读，很少花时间去做大段的摘抄。这样我可以花更多时间查看大量当年还未开放的档案，了解我所关心的种种事件及其经过情形，和我所了解的国内外各种研究成果及其其他史料相对照，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全面完整的历史认识，省得把时间浪费在明知拿不走的抄档上。每次查档形成的印象和看法，我只是在晚上回家后，抽空儿把要点记下来。这些虽然不能当原始档案留存和使用，但这种系统的和大量的资料阅读对我熟悉党史内情却更有帮助。

1987年，《档案法》通过了，但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档案馆也从开放的趋势，重新转回到不开放的方向去了。引发这一转向的导火索看起来是一个很偶然，也很孤立的事件。那是因为，就在这一年，

有位公子前来查阅其亡父的档案。本来档案馆管理人员对子女前来查阅这类档案就认为不大妥当，该公子又夹带了部分档案原件离馆，并且很快出国了。这一事件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议论很多，弄得中央档案馆十分被动。理论上这件事情和档案开放政策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多半都是当时条件下管理手段落后等原因造成的，但是，因为担心开放危害的人太多，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中央档案馆的对外开放却还是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再继续在馆里阅档也变得很困难了。再加上这一年我已调离中央党校，去了大学，因此，我也识趣地结束了查档。当我告诉他们我将结束查档时，“×处”很明确地告诉我说，我抄录的本子不能交给我带走。不过，这一次我却很坦然。因为能够大量查阅档案本身就已经让我收获很大，很知足了。

这次去台北，主要是去查档案。可是实际上，在台湾，既没有政府颁布的档案法，也没有作为公共事业的档案馆。唯一的一家所谓“档案馆”，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己创办的。这说起来似乎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

没有档案馆，有点历史原因。中国传统上就没有档案馆之说。编修历史向来就是当政者的特权，普通人哪里有看档案写历史的资格？无论是当年的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最多也就是成立一个国史馆，收藏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档案，找些御用文人根据上面的要求来编写历史罢了。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档案，还要保存在当政者自己的手里。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依旧照此办理，最重要的档案由自己的侍从室掌管，密级稍低一些档案交由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保管，一般性的政府事务档案则由“国史馆”来保存。由于当初从大陆撤退时过于匆忙，有些档案运抵台湾，无人照管，比如部分北京政府的外交档案之类，成立中研院近史所之后，就被近史所收藏起来，于是乎近史所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一个档案馆。但这样一来，在台湾看档案也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它那里没有一个像大陆、俄国和美国那样的成系统的档案馆网络，可以按照时期或门类集中保管和查阅档案。

大陆搞档案馆，是建国以后跟苏联人学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清朝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南京政府的历史档案，北京中央档案馆（含国家档案馆）主要保管中共中央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军事档案馆主要保管军队系统的档案。另外各省市还有各省市自己的档案馆，负责保管本地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及各级政府和各

部门超过一定时限的档案资料，均应分别交由上述档案馆进行保管，并应在档案形成30年以后陆续解密，提供研究者查阅和利用。

在台湾，由于没有档案法，政府部门各行其是，愿交就交，不交拉倒，甚至谁愿收就交谁。因此，目前台湾仅收藏其在大陆阶段的历史档案的部门，至少就不少于6个。一是“国史馆”；二是党史会；三是史政局；四是“外交部”；五是调查局；六是近史所档案馆。另外像教育部等各部会也有自己的档案保管部门。除党史会目前主要收藏国民党党的历史档案，和调查局主要收藏情侦资料以外，其他各处收藏的档案门类则互有交叉。虽然国史馆严格说来是政府档案最主要的收藏点，但要查某一个部门的档案，光跑一个国史馆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或者该部门未将已过时的档案全部移交，或者它将部分档案转交给了其他方面，比如近史所档案馆。

没有档案法，又没有正规的档案馆，是否学者查阅利用档案就很困难呢？情况并非如此。大概这也是台湾众多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吧。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史所参加了一个“档案与历史研究”的研讨会。研讨会嘛，自然是学者们各谈各的题目，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等收藏档案的部门均有最高负责人带多人来参加。1995年在台北时，也见过同样的阵势。而他们参加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听取学者们对他们各自部门工作的意见。和我在1995年那次看到的情况有些不同的是，这一次学者们对这些单位的批评似乎不像上次那么多。相反，很少讲客套话，喜欢放炮的众多台北学者，这回对上述单位服务工作虽然仍有直率的批评，但明显地多了一些赞许之辞。比较大陆的档案机关从不与学术界发生关系的情况，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其实，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也多是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列，属于官本位体制，它们完全可以像大陆的档案部门那样与学术界“老

死不相往来”，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反正乌纱的大小与对学者和公众的服务态度的好坏无关。但近几年来，台湾搞所谓“民主化”从某一个方面也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地位，以为上级服务为能事的官本位体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听台北的学者讲，包括“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在内的各个档案收藏部门，过去也一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但许多怠慢学者的衙门作风这几年都大大改变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可以在报纸上乃至在议会中公开批评这些明明是靠纳税人养着的政府部门。批评多了，不仅会影响到这些部门的形象、官员的升迁，还会影响到要由议会批准的行政拨款。其作风自然大大改变了。

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服务改善到了什么程度？在会上我听说，有学者去看书案，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会给你倒咖啡喝。哇，我当场差点晕倒！会后我就急急忙忙去了国史馆，想享受一下咖啡待遇，结果连个咖啡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后来才听说咖啡待遇是党史会某位接待人员热情服务的见证。可惜我到党史会查书时，此公已经退休。当然，我还真的赶上过一次咖啡待遇，只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年轻的刘姓先生给屋子里所有查书者都送上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却独独没有我的那份。也不知道他此举是冲着当时满屋子的日本学者呢，还是向那几位受聘为日本人服务的年轻女大学生献殷勤，或者干脆就是反感大陆人？反正由此我知道，倒咖啡的服务在今天大概是只剩下了个美好的记忆罢了。

不过，无论有没有咖啡服务，在台北查书案总还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在国史馆以及党史会几乎是一日不拉地“蹲”了两个月，的确感受到了他们服务的热忱与周到。和大陆目前的档案利用情况相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

第一，在大陆，虽有30年解密的档案法规定，实际上因行政干预和保密限制，造成中央书案局内定的解密限制甚多。1980年代有10大

方面不得开放，2000年以来更增至28个方面，许多开放过的档案重新又收回去不开放了。台湾虽然没有档案法，但各档案保管部门近年来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30年解密的措施。比如“国史馆”、党史会等，已严格按照30年的时限开放档案，以30年为期，过一年解密一年，包括过去密级最高的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个人书案，都已完全解密，学者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和利用。

第二，大陆书案馆系统完备，但查阅利用书案有时手续繁琐。在台北，就完全没有这种种麻烦。任何人，包括中国大陆人和外国人，只要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或证件，就可以直接到“国史馆”、党史会等书案收藏部门去要求查阅档案。也没有人会限制你查档的范围和次数，你只要去了，就可以随时调阅目录，随时请工作人员为你调书，根本用不着回家去等几个星期每天每天地打电话去问自己要的档案是否调出来了。

第三，大陆的最主要的几家书案馆，大都不提供具体的书案分类目录。在台北，各个档案收藏机构，都不存在这种情况。那里凡30年前的书案目录都是公开的。虽然它们各自目录整理水平不一，读者查阅起来难度各异，但至少你一进入档案馆的阅览室以后，就有大批档案目录供你检索。通过仔细检索目当，你可以很清楚你能够到哪些卷宗里去找你想要的东西。

第四，大陆的不少档案馆不重视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大陆的学者中间有句玩笑话，说是研究者总是嫌档案资料不够开放，而档案馆总是认为档案资料公布太多，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这话也许有些过分，但档案馆不少工作人员很少有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如今台北国史馆和党史会的解密工作已经制度化，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已很强。他们很清楚，对于已经解密的档案，他们的任务就是向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为查档者提供方便。“国史馆”档案阅览室的几

位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两次我到阅览室较早，当班负责开门的刘小姐在门口一见到我，就忙不迭地表示歉意，并赶紧开门、开灯，迅速拿钥匙推车上楼到机要保管室去把我要的档案推下来，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太早到了。负责调档的陈先生更是位细心人，每当你调出来的书案快要看完时，他都会主动前来提醒你是否要继续调书，并给你拿来目录，以免你看完眼前的档案后再调档等候太多时间。为查档者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难能可贵。

第五，说到服务意识，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对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批评。比如我们一些书案馆的服务收费问题，就是一例。调阅一个卷宗，不论其中有几份文件，要收调卷费3-5元，涉及所谓“重要档案”的复印费，一页要收10元。查阅书案收取调卷费，这在我所去过的美国、俄国、德国、日本和台北，都不曾听说过。据说在英国及欧洲各国也无例可循。据了解，各国的档案馆中，只有俄国的个别书案馆和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因为经济一度极端困难，曾经做过出售档案复印件的事情。然而我在俄国党务档案馆（当时叫俄罗斯当代历史档案保管与研究中心）看档案时，他们当时经济上已经相当困难，有时工资都开不出来，就是那样，他们调卷也分文不取，复印也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不曾漫天要价。

在台湾查书，唯一收费的只有复印，并且也只是收取复印本身的一个成本费2个台币（相当于人民币0.5元），这个价格同北京一般街头复印点的复印费差不多。

由台北看书案，竟至写到大陆书案利用方面的一些不足，多少可能有点跑题。不过，比较一下两岸档案利用的情况，用以自鉴，相信读者也会有所理解。

注释：

[\[1\]—《新京报》访谈录](#)

[2]—《历史教学》访谈录

[3]《湘声报》向继东整理。

[4]原文发表于《天高人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
书

[5]这是我写的台北印象的系列文章之一，因与本书第二编文字的内
容有关，故附当于此。

封底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现代史的研究亦如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杨奎松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04(2013. 3重印)

ISBN 978-7-5108-0030-6

I. ①学… II. ①杨… III. ①中国-现代史-文集 IV. ①K270.7-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3899号

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

作者 杨奎松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张 21.25

字数 380千字

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3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8-0030-6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